

邓力群文集

第二卷

当代中国出版社

D108/09

目 录

- 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 (1)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 宣传部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问题..... (22)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三日)
- 开创新局面的党代表大会..... (27)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 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61)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
-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 (79)
(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日)
- 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 (86)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
- 新时期要做好党员教育工作..... (107)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 (133)

-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把宣传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159)
- (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
- 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65)
-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八日)
- 关于编辑人道主义问题研究资料的意见…………… (168)
-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 中央和地方各级都要重视广播电视事业…………… (176)
- (一九八三年四月九日)
- 一个呼吁，一个请求…………… (189)
-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一日)
- 关于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的意见…………… (193)
-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
- 试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
-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七日)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217)
-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 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255)
- (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
- 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在新时期的光荣职责…………… (264)
-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
- 认真抓好师范教育是普及教育的关键…………… (290)
- (一九八三年十月)
- 了解祖国，建设祖国…………… (297)

- (一九八三年十月四日)
- 两次传达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 (302)
-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一日)
- 在首都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 (320)
-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八日)
- 干部培训工作要有规划…………… (341)
-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 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 (348)
-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掌握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 (374)
-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七日)
- 开展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的评论工作…………… (384)
-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
- 同外国朋友谈建设精神文明及
清除精神污染…………… (396)
-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
- 关于编辑《中国美术全集》、
《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的意见…………… (405)
-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四日、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
- 保护·研究·利用
——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 (412)
- (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日)
- 从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谈起…………… (425)
- (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

- 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 (442)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八日)
- 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研究宣传提纲…………… (463)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 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
 宣传党的政策…………… (491)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 在城市经济改革思想教育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 (501)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 宣传部门需要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520)
 (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
- 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 (532)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
- 引导专业户成为文明户…………… (537)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
- 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 (540)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 学习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
 研究改进宣传工作…………… (551)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
- 当前宣传工作中要注意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573)
 (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日)
-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591)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三日)

-
- 坚持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611)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 同国外友人谈对外开放…………… (620)
（一九八五年七月）
- 对“四有”宣传教育问题的意见…………… (625)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六日）
- 坚持对共产主义的忠贞和深情
——为老师闻天同志八十五岁诞辰而作…………… (637)
（一九八五年八月）

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1】

保持党的共产主义性质，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命运，对于党自身的命运，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 即将发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腐化变质的长期斗争中，我们的许多党员和干部，将要反复经受严峻考验。我们一定要在党内，在党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以及他们的子女亲属中，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严肃党的纪律，严格管理监督。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第一组的发言。

干部,都要重新学习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严肃地坚决地保持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决不允许降低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更不允许共产党员腐化变质。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忠实履行入党时的庄严誓言,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牢记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我们党的最终目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2】

这里作出的重要论断和重要决定,对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对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对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党性,具有重大意义。

(三)从当前党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很有必要重温有关党的性质、纲领以及对党员要求方面的一些原理、原则。

第一条,我们党是共产主义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第二条,我们党的最终目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3】;“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4】;“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5】;“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6】;使无产阶级成为领

导阶级，团结广大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7】；“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8】。这些是对共产党的纲领的最基本的说明。

第三条，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员，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来观察一切社会问题、处理一切社会问题。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制定和实行适应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革命纲领，制定和实行适应各种不同情况而又同共产主义目标相联系的方针、政策。实际生活告诉我们，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制定、理解和执行政策，还是离开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去制定、理解和执行政策，情况是大不一样的。

第四条，现在，我们党所领导的、我们党员所参加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运动，即已经进入马克思和列宁所论述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运动。

胡乔木同志在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部分同志的谈话中说到，共产主义，一个是指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一个是指共产主义的运动。这个说法同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说法字句上稍有差别，实际内容是一致的。我的理解，共产主义的运动，说的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运动。我们从事的共产主义运动，从我们党成立之日起，就有组织、有纲领地在中国开始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讲，以

《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这个运动已经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陆续完成了以往各个阶段的任务，现在中心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设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取得政权以后，要采取一系列步骤和措施。他们列了十条。其中第九条是这样写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9】在一八八八年的英文版中，这一条的写法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10】我们消灭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但是城乡差别远没有消灭。除了这一条我们还没有完成外，其他九条我们都超过或基本达到了那个纲领中列举的步骤。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理想，已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经过中国各族人民几十年的实践，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我们党已经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进行了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从事的，已经不是一般所说的广泛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尚未胜利，无产阶级尚未取得政权，尚未成为统治阶级情况下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是进入了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即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制度这种情况下的共产主义运动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员，这是足以自豪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怎么样，需要专门研究。但是起码可以说，我们同他们相比，在领导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原则性、方向性的根本问题

上，是没有落后的，在某些方面是居于前列的。

我们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11】我们每个党员在自己岗位上所从事的，都是这个伟大革命运动的一个侧面、一项工作。

第五条，要使这个运动继续前进和取得胜利，我们党需要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首先是在党员和干部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来进行工作，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正确处理一切社会关系、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只应该提社会主义道德，不应该提共产主义道德。这个观点已经受到一些同志的批评。我同意这种批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要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刘少奇同志也提出共产党员要具有共产主义道德，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倒反而不能提共产主义道德了呢？在社会主义社会

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要遵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一定要继续贯彻这一原则,并在政策上不断加以完善,继续克服平均主义的弊病。奖金本来是超额劳动的报酬,这几年实行的结果,不少企业名不副实,也需要认真改进。为什么不能同时在人民中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呢?一部分落后分子中存在着所谓“按酬付劳”这种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雇佣态度,为什么不可以、不应该进行教育呢?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在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为什么自己不应该积极从事无定额的、不计较报酬的自觉自愿的劳动呢?事实上,在我们党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在我们国内有许多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天天、月月、年年都在从事这种共产主义的高尚劳动。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表彰、提倡他们的共产主义的光辉业绩呢?坚持按劳分配和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不仅不妨碍按劳分配制度的实行,不妨碍社会主义现阶段各项社会政策的贯彻,而且对它们是不可缺少的补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种极为宝贵的共产主义因素,对于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条,共产党员入党是自愿的,退党是自由的。从党组织来讲,对党员是有选择、有要求的。所谓自愿入党,就是要从宣誓入党之日起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自觉地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这包含决心牺牲一切不利于党的利

益的东西，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正确处理纪律性和创造性的关系。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观察，它们可以一致，也应该一致。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的先烈，有很多这方面的模范事例。周恩来同志就是一个好榜样。很多同志都听他讲过，他一生中很少有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事，都是党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就钻什么。而他无论干什么都有很大的创造。在我们某些同志看来，好像四项基本原则一提出，就不能解放思想了，就不能发挥创造性了，就不能敢想、敢说、敢写了。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所谓解放思想，所谓创造性，所谓敢想、敢说、敢写，都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外去进行什么创造，那就离开了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讲得很清楚，党内讨论充分发表意见，高度发扬民主，对中央也可以提意见。可是一经中央作了决定，你在言论和行动上就必须坚决地执行。容许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在行动上不能违背。

第七条，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提高自己，帮助同志。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我们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是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主要方法。《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了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发言的一部分《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按照陈云同志发言的精神，首先有准备地进行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

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发言的精神,对于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党员同志,同样是适用的。

有个别从事理论工作的共产党员,自己的思想、言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错了,党也明明白白提出批评了,还一直坚持错误,一点认真的自我批评都不愿意作。有的同志对这些错误不是进行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而是为之辩护。这对认识和改正错误有害无益。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12】}这些告诫,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终生铭记不忘。

(四) 谈谈不久前的历史和面临的现实。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用极左的面貌或者说从极左的方面,来破坏共产主义原理,破坏共产主义运动,使我们党的共产主义性质,使我们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受到很大的损害。他们的余毒,到现在还远远没有肃清,还在一部分人中起腐蚀作用。

林彪的所谓“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毒害很大。在这个思想煽动下，一些冒险分子、投机分子和社会渣滓，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左右串联，从老革命家和一切忠诚的革命干部手里夺权。这种提法，使一些人灵魂中间最肮脏的东西以理论的形态出现，并在政治上合法化，使离开党性原则的一切肮脏活动都有了“理论根据”。从我们党内一些同志来说，“文化大革命”以前，个人主义有时候也多少冒出来，但更多的是想到这些个人的东西在同志们面前、在组织面前是拿不出来的，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本来想说也就不说了，想做也就不做了。哪里有“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事呀，我看你不顺眼就把你推倒，与其你当权还不如我当权；你这一派不照顾我这一派就不行，我这一派有多大力量就要占多少份额。公开谈判，公开摊牌呀！丑恶的灵魂，毫无掩饰地进行自我表演，以至于到现在，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人身上还成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建立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建立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基础之上的。这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国外敌对势力及资产阶级中的敌对分子，时时刻刻在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破坏我们的党，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确面临着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这个

斗争将是长期的。

资本家的有钱就有一切、一切向钱看、金钱崇拜、金钱万能，对我们一部分不坚定分子毒害很大。他们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唯利是图，损公肥私，其不择手段，恬不知耻，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铤而走险，敢于践踏法律，敢于犯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现在，我国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分子，和这类资本家有什么两样？这些人有的还是共产党员，但脑子里头还有什么共产党？还有什么共产主义？还有什么爱国主义？还有什么民族自尊心？还有什么国格和人格？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来自不同方面、采取不同手段的破坏，虽然各有特点，但都是对共产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形式不同，实质上是相通的，而且往往是互相结合的。党中央的指示中也讲到，现在一些人大量掠夺国家和集体财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林彪、“四人帮”的残余。他们中有人公开说：政治上垮了台，要在经济上富起来；有了钱，再夺权。他们过去是权势狂，现在是金钱狂。胡耀邦同志讲，老干部中间也有极少数人，已经实实在在地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征服了，打倒了。

为了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我们要继续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腐蚀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我们需要从不止一个方面作战，在党内还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肃清林彪、江青一伙的余毒，批评“左”的思想影响，又

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目前尤其要进行反腐败的斗争，并且按照法律程序，严惩一切严重犯罪分子。广东历史上曾经有几次受香港风的影响。去年有同志到广东看了一下，感触很深，被拉下水的干部那么多，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以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严肃对待，不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再搞几年，就很可能积重难返。

历史和现实都向我们提出，共产党员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

(五)对于党的状况，对于从不同方面腐蚀我们党组织、党员和干部的状况，要有全面的清醒的认识。关于这个问题，胡耀邦同志在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作了很好的阐述，需要认真学习领会。

从整体来讲，我们党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已经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重申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制定和执行了对内对外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显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也要看到另外的方面。

一是，极少数老党员脑子里的共产主义思想程度不同地淡薄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之一，是他们中的一些同志原来对革命和革命后的现实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鲁迅说过：“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

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子,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13】对于那些因为党在某一时期指导思想发生失误造成了重大挫折,或者因为遇到了严重困难,而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的人,鲁迅这些话依然富有启发性。原因之二,是有些同志中了“四人帮”“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谬论的毒害,重新工作后,忘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初衷,一心一意为自己和亲属子女经营这个、经营那

个。当然还有其他种种原因。

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许多年轻党员，缺乏共产主义的教育。这是大家都经常接触到的。

(六)党在思想、政治、组织方面，面临许多新问题、新任务，都需要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观察和解决。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当时主要是打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束缚。不打破这种束缚，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对于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深远意义，绝不可低估。现在，“左”的思想的束缚，在一部分人中间还没有完全解除。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这同时，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愈来愈严重。解放思想的含义，中央历来是明确的。中央有关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批评“两个凡是”以后的一系列谈话，讲得清清楚楚，并且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但是，“解放思想”这个口号，确实受到了“左”的方面的抵制，也受到了右的方面的歪曲。

这几年，我们的对外学术交流日益开展。我们吸收了外国一些好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也知道了一点世界范围内在学术领域中过去不太知道的情况，眼界比过去宽广了，思路比过去开阔了。这应该肯定，而且应该继续这样做。可是也要承认，在学术交流中间，我们有些同志，由于了解不透，研究不深，对外国的一些东西，缺乏科学的分析。有些人写文章、发表讲话，宣传了一些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批判了的的东西；有些人就盲目地把它

引进来,说这是好得不得了的东西。《团的情况》中说到,现在青年中间,有些人对西方流行的思潮,如萨特的存在主义等等,很感兴趣。有些青年确实是在探索,跟追逐低级趣味的人不同,也确实用脑筋,想学习一点东西。因为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国家糟踏得不像样子,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形象被损害了,遗留的问题又不是可以一下完全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懂得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的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缺乏信心,一下子接触到西方的思潮,似乎找到了新的出路,获得了新的“真理”。所以,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坚持中央的方针,就要在批判“左”的东西的同时,对在一部分人中间有影响的某些西方流行的思潮,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分析地指出其中某些合理部分,对其错误的东西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这是我们搞宣传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采取了一些社会政策。例如对外实行开放,吸收外资、合办企业、来料加工、劳务合作等等;对内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在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发展多种经营,扩大自留地,开放农贸市场;在城镇实行经济责任制,发展集体经济,使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的劳动者的个体经济得到一定范围的发展;财政上实行地方“分灶吃饭”,企业利润分成,恢复奖金,允许生产、基建和物资流通在计划外有一定程度的机动权。还有其他许多社会政

策，等等。实践证明，实行这些政策是必要的、正确的，并且已经取得成效。我们要坚持这些政策，进一步落实这些政策，并且使它们越来越完善。但是也要承认，由于一些同志没有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下正确地执行这些政策，出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曲解。这就要加以澄清。各种经济责任制实行以后，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在抬头。我们三年花了一千四百亿元来改善群众的生活，但由于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够，城市里还有人说怪话。所以，要坚持中央确定的国内外各种正确的社会政策，就必须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论证，这也是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党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制定政策的。执行政策，宣传政策，论证政策，也都有一个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进行指导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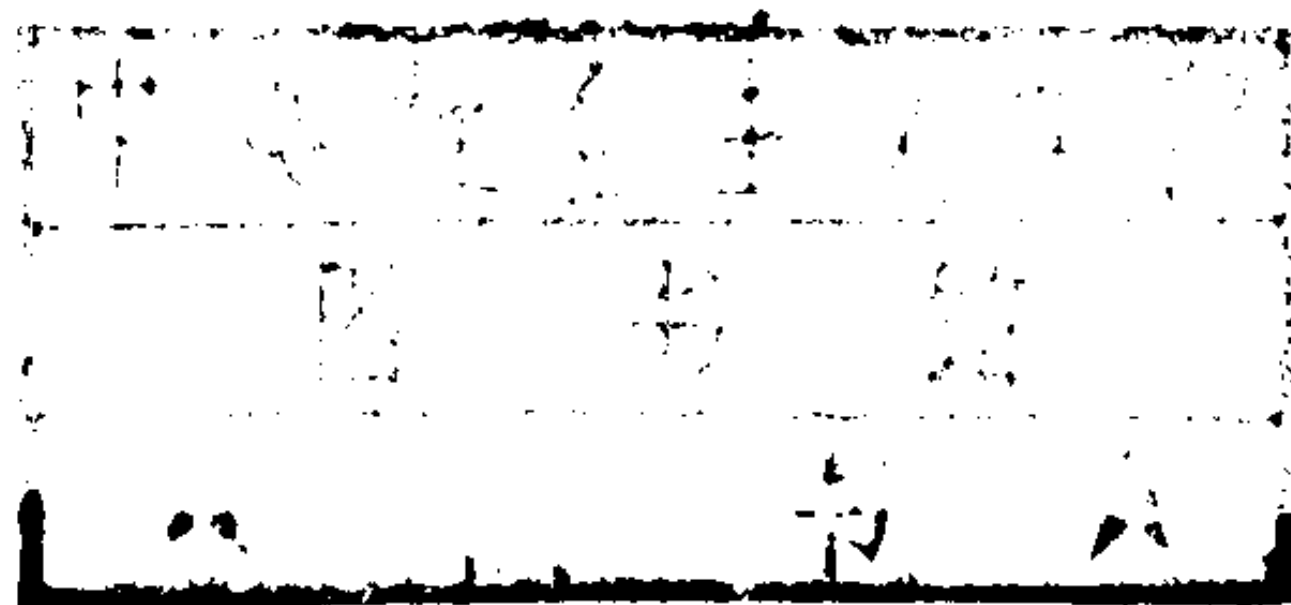
（七）我们有信心、有希望、有办法使我们党的共产主义性质更好地保持下去，使我们绝大多数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更好地坚持下去。

我们党所代表的阶级和人民，不容许我们动摇和削弱党的共产主义性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容许共产党员被资本主义思想所腐化，而是必然地要求共产党员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要求我们党坚持优良传统，坚持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阵地。

建议同志们重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中的一段话和列宁对这段话的评价。《神圣家族》写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

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14】，“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15】。“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16】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必然成为革命的方面，而不是保守的方面。只有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其传统观念，无产阶级才能最后得到解放。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实际上已经开始提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社会主义：这个转变是显著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17】

这些话，很值得我们结合党的历史和现状来深刻领会。六十多年中间，我们党尽管经过许多曲折，甚至遭到几次失败，但是，我们党仍然在坚定不移地履行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我们取得了无数胜利。我们没有在取得某个胜利之后停顿下来，总是在取得一个胜利之后又去争取新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尖锐批判了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指出我们一方面要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因为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但主要的还在另一方面，就是发展阵



地，夺取新的阵地。我们的事业，总是在向着我们的伟大理想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党不愧为这样一个党。

去年冬天以来，党和国家抓两件大事。一个是机构改革，一个是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这两件事情确实很得人心。有的群众说：“中国共产党抓这两件事情，抓到我们心里头了。现在的问题是要看抓得怎么样了。”国内外都十分关心，议论很多。绝大多数人表示赞成，也有信心。有表示怀疑的，自然也有破坏和诽谤的。我们已经作出的决定和已经采取的措施是有成效的。

在机构改革中，老干部能够认识历史的规律，接受中央的号召，退居第二线，或者离休、退休。他们退下来以后，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要介绍这方面的经验，使我们的老干部退下来以后，有个新的广阔天地。眼前需要我们做而能够做的事情，真可以说是千千万万。只要下了决心，任何一件小事情，一直做到自己去世为止，都可以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贡献，放出共产主义思想的灿烂光辉。这一件一件事情的本身似乎并不轰轰烈烈，但是整个说来，对我们社会的改造，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而又深远的意义。

现在大量中青年同志被提拔起来，还需要得到老干部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也要针对他们的情况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宣传如何保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纯洁性，帮助他们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精神上的武器。

(八) 我们可以重读一下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一九一八年三月,根据列宁的提议,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更改党的名称,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这个报告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还是有指导意义的。列宁说,恢复共产党的名称,就是恢复《共产党宣言》以来的优良范例。这次是在什么情况下更改党的名称呢?列宁说:“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就会了解到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旧概念在我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过时了。我们建立了西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民主类型。”【18】关于新的党纲,列宁说:“对新型国家的评述应当在我们纲领中占显著的地位。”【19】这就是说,他把更改党的名称和已经建立的新型民主政权联系在一起。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叫共产党,早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问题是,在新的形势下,怎么样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些方面,我们已经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同时吸收外国的有益经验,在新的宪法中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宪法正式通过、公布和开始实施以后,理论宣传工作者有责任认真加以宣传和阐述。

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更鲜明地首先在党内提出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重复过去的“左”的理论和“左”的实践。我们一定要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讲的:“我们现在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20】

我们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坚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绝不是要立即实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21】

现在的情况同当时已经不同了,但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原则仍然是适用的。我们现在不是搞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我们早已胜利完成了。我们现在是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它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毕竟是很不相同的,而且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又提出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目前采取的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社会政策,如在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等等。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不能因为实行某种社会政策而有丝毫动摇;另一方面,要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决定政策,不能因为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就立即实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制度。

注 释

-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95 页。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63 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64 页。
- 【4】 同上书，第 262 页。
- 【5】 同上书，第 264 页。

-
- 【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页。
- 【7】 同上书，第264页。
- 【8】 同上书，第271—272页。
- 【9】 同上书，第273页。
- 【10】 同上书，第273页注2。
- 【1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01—202页。
- 【1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96—1097页。
- 【13】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233—234页。
- 【14】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 【15】 同上。
- 【16】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 【17】 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 【18】 列宁：《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4页。
- 【19】 同上书，第124页。
- 【2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
- 【2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宣传部的组织纪律和 政治纪律问题*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三日)

所有工作人员，随时随地都要想到我们工作的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义不容辞、理所当然地只能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无论发文件、讲话、写文章，以及开展有关的业务活动，都必须牢记这一点。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经过实践检验作了结论的理论问题，也要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够、也不允许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对外活动中，在同外单位联系中，在写文件、讲话、写文章以至日常工作中，在重大问题、原则问题上宣传同中央不一致的东西。从部长到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都必须严守这条纪律。如果违犯了，轻的，劝告；重的，批评；再严重的，要受处分。本人要理所当然地作自我批评，保证改正这一类错误。部长、副部长要带头遵守这条纪律，尤其是部长。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宣部部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全体工作人员有权利也有义务对部长、副部长进行监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按照陈云同志的话去做，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也不要害怕部长、副部长打击报复。如果有打击报复，同志们就直接向中央控告。

中央书记处昨天开会谈到，宣传战线不遵守纪律的问题值得严重注意。邓小平同志说，在这个问题上，要对整个宣传战线进行整顿。整顿，首先从部长、副部长做起。过去的事不处分，但也应该作自我批评，真正接受教训。重要的是，今后必须保证自觉自愿地做到这一条。中央讲了多次了，部里也讲了多次了。我们这里确有该做自我批评的同志，但至今还没有做。对于这样的同志，着眼点还是教育。只要能认真检查过去的缺点错误，以后引为借鉴，谨慎从事，心悦诚服地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好同志。如果不愿改变或者改变不了自己的观点，组织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工作也没有用，那就要考虑调整一下工作。当然，即使到别的单位，一个共产党员也必须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对在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则要求更严格一些。我们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反复讲，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必须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而且是自觉自愿的、不带丝毫勉强的。愿意保证这一条的，哪怕水平差一些，工作能力弱一点，也可以留下工作；本人不愿做到或做不到这一点，随时提出，随时欢送，概不挽留。我们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摆在全体工作人员面前，请大家讨论一下。希望全体工作人员都要认真对待和考虑这个问题。

这是否就是剥夺了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完全是按党章办事，按党的生活准则办事。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必须允许充分地自由地进行讨论，高度发扬民主，讲什么意见都可以，甚至对中央提出的草案提意见，都不算违犯纪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范例。整整花了二十个月的时间，反复进行了讨论，许多意见很尖锐。世界上所谓最民主的国家的任何政党，讨论重大问题时都没有、也不可能像我们党这样高度发扬民主。这次修改宪法的讨论也一样，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讲了，将来还要提交到全民中去讨论。我们部内的民主生活，就要按照《决议》形成的这样一种办法，并且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六中全会决议草案讨论过程中，有同志讲了很错误的意见，但是没有批判，更谈不上处分。在党组织作出决定之前，对发表错误意见的同志进行批评、处分，是违犯党的纪律、剥夺党员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压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是违犯党规、党法的。这是不能允许的，也是一条纪律。如果问题已经由本级组织、上级组织、党中央作出了决定，我们就必须坚决执行。这就是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的结合。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包括言论、写文章）一定要维护党的决定，不能消极对待，更不能不执行。坚决执行过程中，发现了新问题，甚至发现原决定不妥当，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补充、修正的意见，但在上级没有作出新决定前，仍应执行原决定。邓小平同志、书记处的同志说了，六中全会后，确有一小部分同志对《决议》有意见，不同意四项基

本原则，采取消极态度。不能听任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要想办法加以整顿。邓小平同志讲过，六中全会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如果有同志思想上不通，必须组织上服从。组织上服从，就包括不能持消极态度，而是要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去进行宣传。这就好比打仗，打仗前各种意见都可以提，但作战方案决定了，命令下了，就要服从命令，就要竭尽全力把仗打好。打仗问题与思想领域的问题是有不同，但是在必须执行决定这一点上，又是相同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但作为一个有觉悟、有党性的共产党员，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产党员，应该懂得这是合乎规律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没有别的武器，就是把自己组织起来，组织成一个阶级队伍，这个队伍由先锋队来领导。我们掌握了这个规律，把自己组织起来，未作出决定以前，心里有话就痛痛快快地讲出来，作了决定以后，就高高兴兴地去执行。我们入党时也宣誓自愿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执行党的决议。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这都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执行这一条纪律，光讲道理还不够，还要有一定的制度。希望大家通过讨论，总结过去的经验，建立起能够在一定时期之内可以切实实行的、有效的制度，在执行中再不断补充、修改。从部长做起，部长的重要言论、行动，要经过部务会议的讨论和同意。这是指提出新的重要问题。如果只是讲中央或部务会议已经决定了的问题，只是比较细微的问题，就不一定事事都要经过这样的程序了。现在新问题层

出不穷，我们要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一点新的意见。就是中央决定了的，我们也不能只是照本宣科，也要在中央确定的方针下有新的意见、新的创造、新的发挥。一个人的意见可能准，也可能不准，多几个人商量总要好些。以部的名义发出的文件，最低限度部的领导传阅一下，重要问题要讨论几次。副部长的讲话、文章，涉及到新情况、新问题时，也要交换意见，讨论一下。部的顾问也得接受这个约束。依此类推，各局局长、副局长发表意见，在局内一定范围议论之后，要征求分管的副部长的意见。司局长以下干部的讲话、文章，可给本局局长、副局长看看。这都是指有关中央方针、政策的讲话和文章，特别是有新的提法和没有把握的讲话、文章，不是指学术性的讲话、学术性的讨论。没有决定的理论性问题的讨论也不在内。集思广益，总比个人闭门造车好得多。要懂得我们这个集体的可爱。我们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要互教互学，教学相长，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不是消极地避免犯错误，而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开创新局面的党代表大会*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邓小平同志最近在接见外宾时说：十二大的作用与我们党的七大一样。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这两句话，是对十二大历史地位的准确说明。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历史已经作了结论，党内同志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了。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和广大群众相信这个判断，少数同志因为对情况缺乏全面的了解，不那么相信。到底小平同志的判断有没有根据？根据是什么？胡耀邦同志作的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开幕词中有这么几句话：“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1】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讲点对开幕词和十二大报告的体会。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

一、关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问题

(一)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2】

十二大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从思想、政治、组织、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党的建设等方面，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分清了是非，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我们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通过总结三十多年来的丰富经验，已经从过去那种不完全、不准确的情况，发展到现在比较完全、比较准确了。对于任何事物、任何规律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一眼就把事物看穿，把规律看准，正确地把握住，从来没有这样的人，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的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包括着这样那样的曲折，包括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即正确逐步克服错误。

(二) 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客观世界。”【3】他还说：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4】他在讲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又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5】“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6】

这样的观点，斯大林也曾经说过。在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时，有人问他，规律是怎么回事？认识规律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他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规律没有被破坏的时候，它平安无事地坐着，它的地址谁也不知道，它是无所不在又是无所在的。通俗地讲，就是到处存在着规律，可是你一下子找不到它在哪里。他接着说：一般说来所有的规律都是在被破坏时才令人感觉到，而破坏规律不能不遭殃。他在这里讲了违反规律必受惩罚，促使人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道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这类的事例。当空气比较充足时，人们不大感到空气的存在和空气对

人们生命的必要性。好比我们这个大礼堂，空气比较充足，坐在这里讲话、听讲话，不会感觉到空气的必要，可是一旦被关闭在空气很不够的房子里，那时就很容易呼吸困难，才感到空气对于我们是绝对不可少的。

毛泽东同志和斯大林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对规律的认识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领导革命也好，领导建设也好，都要认识规律，都需要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而且，往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多次的比较，我们的认识才能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由不正确的知到正确的知。在这个过程中，怎样看待胜利和失败，特别是怎样看待失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一种极为严峻的考验。不正确对待胜利会带来错误，很多同志都有这个经验。胜利了，容易头脑发热，不那么谦虚谨慎。失败了怎么办？有一种表现是我们坚决反对的，那就是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暂时遭受挫折，就动摇，就灰心丧气，甚至当逃兵，当叛徒。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我们党的党员从六万多下降到一万多。蒋介石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这些同志是英雄好汉，不愧为共产主义战士，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永远学习。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也有那么一些人悲观失望，脱离革命，或者从此退隐，或者在国民党报纸上登自首书，甚至成了叛徒，成了反革命。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也不赞成，就是对坚持革命但是犯有错误的同志，以及存在某些思想动摇的同志，采取绝对的态度，把革命失败的原因仅仅归之于个人，大批大整，无限上纲，不做思想工作，不

是采取延安整风时期那样的方针，像毛泽东同志讲的，着重于分析当时的环境，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结果，挨整的人和整人的人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训。所以，革命者怎样对待失败、怎样对待错误和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遭受点挫折就悲观失望，埋怨指责，牢骚满腹，以至于不再干了，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过，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这些弱点。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在失败以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然后从头做起，做得更谨慎，更周密，更顽强。大革命失败以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总结了革命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要我们正确对待革命的失败和犯错误的同志。他总是讲，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犯了错误改正了就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不能采取“不准革命”的态度，要一看二帮，要团结一切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同志一道前进，不要嫌弃他们。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不应着重于追究个人的责任，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根源的分析，从中找出改正错误的办法。他警告说，一件事情失败了，大家纷纷指责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犯错误的同志神气得很，骄傲得很，头脑不清醒，这种同志昨天不犯错误，明天就一定要犯错误。这个

道理,不仅对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适用,实际上对于一切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人们都同样是适用的。

十二大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有了八大以后胜利和挫折几次反复的比较,正确地总结胜利的经验 and 挫折的教训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它因此也就比较地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三)认识规律的,开始总是少数人,然后才有较多的人,再后来才有绝大多数人。一种规律,一开始就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也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首先提出,要尊重少数人。这是从我们经验中得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我们党内,是毛泽东同志和为数不多的老一代革命家首先认识的。是不是大家马上都同意了呢?不是这样。八大期间,少奇同志讲过,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一九三〇年以后,特别是临时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他还被排除在中央领导之外呢?就是因为当时多数领导干部还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只有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了遵义会议,大家回顾毛泽东同志领导时取得的胜利和“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受到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多数领导干部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确认他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有了遵义会议,有了遵义会议以后的历史转折,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间才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拿社会主义建设来讲，回顾三十多年的历史，读读《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经过比较和思考，起码大多数同志会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陈云同志是首先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人之一。一九五六年八大时候陈云同志的发言，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评价；一九五六年以后，毛泽东同志也仍然多次肯定陈云同志的主张，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更注意听取陈云同志的意见。“大跃进”、“反右倾”一来，陈云同志在经济问题上的正确主张就不大行得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提出的一些战略决策、一些重要建议，为中央所接受，在实际工作中越来越见效。这时，我们才进一步认识到，应该学习他观察经济现象、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

规律起初为少数人认识，后来为多数人认识，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开始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中央最早作出这一决策的时候，即使在党内，也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赞成，但是实践教育了大家。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村面貌很快产生变化，广大农民日益富裕起来，并且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继续怀疑这一新生事物的同志，已经越来越少了。有些地方的有些农民，曾经把包产到户、大包干看成是分田单干，有一阵子把土地分得很碎，但是许多地方仍然把土地分成若干等级，连成片来经营。这些事实说明：坚持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公有制，坚持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现在不但已为大多数干部所认识，而且已为大多数农民所认识了。

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对于尊重少数的问题，作了很明确的规定：“党禁止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对中央、对党组织作出的决定，每个党员、每个干部，必须在行动上坚决执行，同时也允许保留意见，可以向党组织直到党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见。我们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同时也尊重少数同志的意见。这样，就可以更有效地避免片面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认识社会规律的群众队伍越来越扩大的过程。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这一过程，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最科学、最革命的理论，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人，开创了广阔的领域。但是，人民群众不能自发地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东西，就要通过必要的宣传、教育或者说灌输工作。这种宣传、教育或灌输工作，必须采取为群众能够接受的多种多样的方法，引导群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认识规律、掌握真理。

我们各个时期、各条战线的各级干部，可以说都经受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和考验。特别是建国以来我们自己培养的近千万大专和中专学校毕业生，他们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一道成长，年富力强，懂得各种专业知识，也经受了正反

两方面的教育和考验，在不同程度上认识了社会主义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有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和不断进步，我们的事业就必将一步步取得更大的胜利。

（四）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党、行动的党。我们党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应该体现为制定和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像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一样，也要有个过程，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很正确、很完善，而是逐步正确、逐步完善。

正因为正确的认识要付诸行动，所以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解决这个总路线在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各种工作中怎么具体贯彻执行的问题。小平同志讲十二大同八大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表现在这个方面。八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是对头的，可是还不明确、不完备。十二大的路线比八大明确得多，完备得多。八大规定了一条总路线，但是它在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各种工作中怎么具体地贯彻执行，还没有提上日程。七大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不仅是因为规定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而且还因为规定了在各条路线、各个方面、各种工作中具体贯彻执行这条总路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样才使得我们在七大以后，全党思想一致，行动一致，超过原来的计划，提前打败了蒋介石。八大有一条总路线，但因为缺少各种与这条总路线相适应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因此执行总路线时，你按照你的理解，他按照他的理解，到了“大跃进”的时候，纷纷“放卫星”，说要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发生了各种

各样的问题。因为有了“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同志才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一篇道理。他说，无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我们党都要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样才能教育干部和群众，统一他们的认识，工作才好做。这篇道理实在说得很好。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讲了我们的总路线即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7】在这个总任务的指导下，我们在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民主、对外政策、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都在总结过去正反两面的经验，着手具体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并且规定了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五年间要实现三个根本好转的具体步骤。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应该承认，十二大将引导建设走向胜利，这个判断是站得住的，是符合实际、符合认识的规律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打仗，说为什么战争指导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对于革命者，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办一切事情都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的区

别。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是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说，就是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毛泽东同志讲，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都没有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使主观符合于客观。完全符合是没有的，但是可以比较符合或者基本符合。有了这一条，这个领导就是基本正确，或者说在整体上来看是正确的。十二大文件，我们党中央的各项决策，是基本上符合我国当前的客观实际的。我们还会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深化和完善。但是，正因为我们能够基本上或者说比较好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所以我们将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也能比较快地发现和纠正。这样来看我们的中央，这样来看我们的党，这样来看我们的多数干部，是不是公正的？我认为是公正的。因此，怀疑十二大的决定，怀疑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怀疑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想通，完全可以保留意见，可以继续看下去。但是我们相信，历史的规律、历史前进的辩证法一定会证明，在实践的教育下，曾经有过怀疑的同志，一定会对事实表示信服。

二、走自己的道路

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讲：“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8】这一点非常重要。

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我们的口号，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这么一个非常伟大、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共产党人，首先依靠和团结本国、本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打败反动派，在本国、本民族的范围内完成革命的任务。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作为国际主义者的崇高品质。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共产党人要首先按照共产主义的精神把本国、本民族的事情办好，不能坐等别人的援助。坐而论道，空谈共产主义，不行动，不战斗，不准备牺牲，想等人家革命搞成功了来给自己帮忙，这是曲解国际主义。你是国际主义者，就要首先在本国、本民族的范围内完成根据当时、当地情况提出的任务。完成本国、本民族的任务，必须正确认识本国、本民族的实际，由此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正确的行动。外国的经验、其他民族的经验当然要借鉴，但必须分析哪些适合于本国的情况，哪些不适合于本国的情况。即使适合，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所变化，有所发展，不能够照搬照套。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前面是说最一般的战争的规律，进一层是说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又说：“中

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9】这就更进一步具体化了。讲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时候，他还指出：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也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后来战争的情况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非常丰富，从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就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于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每个时期战争的规律不同，对每个时期战争的指导也不能完全一样。这就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有所发展，有所创造。这是说战争。革命的指导，建设的指导，也得这样办。不能停止于我们过去在根据地搞经济建设的办法，不能只知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建设的规律或者我们建国初期搞建设的规律，要研究在当前中国的新情况下搞建设的规律。这里涉及到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问题。正像小平同志在开幕词中讲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我们不能只是了解建设的一般规律，还一定要了解一般规律在中国条件下的特殊表现，以及我们自己在建设的不同时期的某些特殊规律。

这些年来，讨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的思想界、理论界很活跃。过去，我们同外国的文化、学术交流很少，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对资本主义国家的

情况知道得更少。这几年我们出去考察,请外国学者到中国来讲学,翻译出版有关著作,对外国的情况、经验知道得比过去多了,学习外国的经营管理经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也比过去好得多了。首先应该肯定,主流是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程度不同地有照搬照抄的现象。过去搞革命,我们照搬照抄吃过大亏。搞建设,在工业问题上,在计划管理上,照抄苏联,我们也吃了亏,有些问题到现在也还有待于解决。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有几种模式时,比较多的同志认为有三种。这样一些问题当然要研究。我们现在不是研究多了,而是研究得不够。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只能从这三种模式中间,找一种来套在自己身上。邓小平同志说要走自己的道路,这话是有针对性的。研究人家的模式是必要的,但这种研究只能够供我们参考。我们的路要由我们自己来走,不能照搬这个模式那个模式,哪怕是到处叫好的模式。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各个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中国又是十亿人口、其中八亿是农民的大国,把苏联、日本、美国、东欧、西欧的农民加起来,也没有中国的农民多。还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党同中国各族人民,已经有了六十多年同战斗、共甘苦,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我们在农村问题上也犯过错误,但是我们党同广大农民有这么深厚的联系,这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很突出的。这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社会生活中,谁也抹不掉的、带有根

本意义的特点。“大跃进”使农民受到很大的损害。一九六一年春天，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几个组进行农村调查。刘少奇同志也亲自到农村调查。调查回来，少奇同志谈到，他在湖南，农民跟他讲：你们这几年搞得实在不像样子，可是我们没有上街，没有打扁担，更没有造反；共产党大概睡觉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等你们睡醒来。现在果然等到了，你们醒来了，下来了，听我们的话了。这是中国农民在那种困难情况下说的很富有感情而又意义深刻的话，表明我们党同农民的联系是多么紧密。我们搞现代化，还遇到一个很大的矛盾，也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搞现代化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现有的劳动力要相对减少，怎么解决充分就业的问题？陈云同志说，我们讲实事求是，就要考虑十亿人口中有八亿农民，这是最大的事实。我们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问题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考虑怎么使农民这个大头能够安定下来。所以，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下决心从国外进口一批粮食，减少从农村征购粮食的数量，使农民休养生息。少向农民征购粮食，农民自己吃饱了，就可以有积极性，有条件发展多种经营。没有这一条，我们推行生产责任制，就要遇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困难。我们现在农村实行的这一套，是适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是适合我国经济结构的情况的。其前途正像胡耀邦同志讲的，方兴未艾。这套东西能够从外国模式里抄来吗？照搬这个模式那个模式，能搞得像我们现在这样好吗？

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办事,走自己的路,就涉及到中国同外国的关系问题,涉及到我们党同兄弟党的关系问题。开幕词说:“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1】话虽然很短,但确实说出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话,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心里话。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说:“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建国三十三年来,我们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12】这些是我们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一贯遵循的原则,也是十二大开会以前和十二大以后我们处理各种国际关系所坚持的原则。大会报告发表以后,在国际上引起最大反响的是对外政策部分。国际上对整个大会,特别是对我们的对外政策,反应是好的,态度比较公正。

这里,我想讲讲大家关心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问题。

关于中美关系。八月十七日公布了《中美联合公报》。这是继《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之后中美关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台湾问题是我国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公报都以正

式文件的形式表述了我们的看法。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开端。重要的是要看美国以后的行动。在同他们谈判中间，在我们领导同志同他们个别谈话中间，都一再说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问题，这是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乌云。他们表示，要力求做到不因为《与台湾关系法》而损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这只是口头承诺。最近，美国有些人讲，减少向台出售武器数量，要考虑到美元贬值的因素，过去一年六个亿，今后七个亿也是减少。像这样一种动向，很值得注意。昨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条消息，讲美国有一小股反华势力又活跃起来，正在盘算如何迫使美国国会做出使中美联合公报从属于《与台湾关系法》的解释，以阻挠美国政府履行中美联合公报，破坏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人民珍视同美国人民的友谊，但是从来认为，任何时候都要坚决维护我国主权，都不允许别国损害我国的主权。

关于中日关系，从七月二十七日开始，我们就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的问题，在报刊上公开地对他们进行批判，并且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了交涉。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很清楚，日本确实有一小撮人在进行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一样，日本大资产阶级中间也确实有人以为，在中日关系中，中国有求于日本，不管他们怎么干，中国都会吞下损害自己国家利益的苦果。这种看法完全错了。对于他们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活动，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极少数军

国主义分子。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日本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教科书的一些执笔者是反对的,日本在野党和社会团体,以及自民党内的一部分人也是不同意或者反对的。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而且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日本人民首先起来反对日本篡改教科书,要求日本政府改正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中日两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我们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在日本人民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日本官方、民间都很注意我们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关于中日关系的部分。很多人对报告首先讲中日关系很满意,认为报告批判复活军国主义,不是指他们的人民,也不是指他们的政府,而是指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这样可以得到安慰。他们普遍注意报告中关于中日关系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即“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13】。

关于中苏关系。中苏两国人民有着长期的友谊。目前中苏关系成为这个样子,原因是苏联执行了霸权主义政策。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我们要保持严肃的、清醒的态度。考虑同苏联的关系,不能只是看到苏联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对我们进行武力威胁。这一点很重要,但事情不止于此。中苏关系不只是两国的双边关系,应该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苏联实行霸权主义政策的问题。他们实行霸权主义政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是我们国际战略的基石,是我们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不能后退。多年以来,我们敢于同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斗,大军压境、陈兵百万,我们也不害怕。我们讲过,他即

使把北京、华北都占了，这也只是战争的开始，绝不是战争的结束。中国人有那么一股劲，你打来了，就一定要和你拼到底，十年不行，二十年照样干下去。阿富汗是个不大的国家，但是苏联征服不了，人民的反抗是很有力的。要征服中国，历史证明是不可能的。

十二大的报告不写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再次表明了我们对苏联人民的友情。我们也不写苏联是修正主义，因为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这样的用语只适合于说明党内的倾向。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〇年五月的一次谈话中，对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问题作了如下的阐述：“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14】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也讲了我们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党与党关系应该遵守的原则。报告说：“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是一律平等的。不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历史长的党还是历史短的党，执政的党还是没有执政的党，都不能有尊卑上下之分。我们党吃过自封的老子党企图控制我们的苦头。众所周知，我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胜利，就是抵制了这种控制的结果。”“我们坚持各国党应当互相尊重。各国党都有长处和短处。由于处境不同，各国党对形势和任务的想法不可能完全一致，这种意

见分歧只能通过友好协商和互相等待来逐步解决。我们赞成各国党都从别国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学习，这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旺发达。”【15】我们将始终遵循这些原则。

总之，在对外关系问题上，确实如开幕词所说的，“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6】我们在延安唱过一首歌，其中有这样的话：“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主要是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里面，集合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共产党人要干大事业，要在全世界推翻一切剥削制度，要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是无限光明、无限美好、无限幸福的社会制度。实现这个理想要经过好多代人的努力。我们坚信，这个理想终究要实现的。我们活着的共产党人，应该把全部身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这个事业，经过我们的努力，一步一步使我们的国家以至于全世界越来越接近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从事这样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最高尚的人、最光荣的人。我们同外国资本家交往，同华侨及港澳同胞中的资本家交往，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最后的宗旨也还是为了共产主义。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合作，可是在合作的时候，总是想到不能够丢掉共产主义的旗帜，不能辱没共产党人的身份。这几年来，因为对外开放，同资本家的交往多

了，也确有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忘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贪图小利，接受贿赂，甚至向人家敲诈勒索。得到一部电视机，得到一部录音机，得到一点洋玩艺儿，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在资本家面前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丧失了国格，丧失了党格，同样也丧失了人格。我们在学习开幕词的时候，在学习报告的时候，有必要重温共产党员究竟是干什么的道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应该具备什么起码的道德，以便使我们今后的言行，能够无愧于“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中国共产党人”这样的光荣称号。

三、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最重要的保证

第一项，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机构改革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全面的改革，还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拟订方案，逐步进行。要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又是坚持不懈地搞下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生产关系就要调整得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层建筑也要进行调整，以便于保证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所以，邓小平同志讲，机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是

一年、两年的事情，是长期都要进行的工作。我们经济建设的前进，要伴随着机构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

今年七月，邓小平同志听取国家计委负责同志汇报以后，讲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很重要的意见。他说，体制改革，中心应该抓两条：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制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没有“明白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来。现在是应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白的时候了。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改革得好不好，不仅看它订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看它选的人好不好。“文化大革命”前，大专毕业生和自学达到同样水平的知识分子五百多万，用好这些人，是很顶事的。要议出几条办法来，把真正的人才提起来。要加快这个步伐。各行各业，包括企业，都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又说，最难的是，没有一套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用起来。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起来。说缺乏经验，只有使用，才能积累经验。前些时候搞名单，一说某某有点骄傲情绪，就认为不合格。他就不赞成这种不加分析的说法。没点自信的人，是很难干出什么事情来的。有些人有些毛病，掌了舵，会改的。我们的企业要想办法给“明白人”开一条路出来，让这些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起来，不能老把这些人卡住。这条路还没开出来。

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明白人”，我理解，就是符合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的人，而现在特别要使年富力强的

中青年干部更快地成长起来。“明白”是通俗的用语。这样说，群众容易接受。

第二项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十二大政治报告非常鲜明、非常突出、非常深刻地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怎样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制度，认识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过去我们比较多地注意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这些方面，而对于精神领域，不是没有提，而是没有提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十二大指出，除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方面的特征外，“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按照十二大报告的精神，进一步研究和进行发挥、论证，特别是需要在实践中间使它具体化，使它越来越完善。

十二大开会以前，在相当一个范围里，曾经把报告稿子发给大家，请大家进行讨论，提出意见。讨论过程中间，有的同志提出，要不要对精神文明进行阶级分析。去年十一月国务院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现在的十二大报告，都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对精神文明应该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但是，不能认为精神文明的每一项具体内容都具有阶级性。例如，文化教育，在它的指导思想、

在它为谁服务这个问题上,当然是有阶级性的;可是它的许多具体内容,例如一般的文化知识,像数学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像体育、卫生等等,它的具体内容就很难说有阶级性。思想建设方面也不能说统统都有阶级性。其中有一部分,包括了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要发展,社会的公共生活要正常运转,都必须具备的某些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举个很普通的例子:交通规则。有的国家行人靠左,有的国家行人靠右,有的国家汽车的方向盘靠左,有的靠右。还有红灯绿灯,绿灯开了就放行,红灯开了就止步。我们“文化大革命”中间不是闹了笑话,说靠右边走是右派,要改到靠左边走;说红灯才应该前进,绿灯应该停止吗?在讨论中间,我们有些同志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说讲礼貌也有阶级性,你替我做了一件事情,说“谢谢”;我踩了你的脚,说“对不起”。诸如此类的礼貌用语,如果硬要去分成什么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什么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那我们的生活就没法正常进行。说你说的谢谢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我说的谢谢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谁也分不清楚这种阶级性。

邓小平同志四月三日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的时候,只讲了三句话: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后来他让我们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很多同志建议加“有文化”。理由是,我们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文化不行。邓小平同志同意加上这句话。所以在交十一届七中全会讨论的稿子里面,已经说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有些同志则不同意把“有文化”同“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

相提并论，理由是：强调了文化，就会使共产主义的核心作用、指导作用不鲜明，不突出。这样一种意见，就把“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同“有文化”对立起来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革命的理想、道德、纪律，没有一项不是同一定的社会文化相联系的。列宁就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也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我们的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现在的解放军，一向有个传统，文盲一到军队，就要让他们识字、学文化，成为能够读书看报的战士。部队还设有专职的文化教员。毛泽东同志还讲，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你字都不识，句子都念不通，勉强念通了以后，也不知道它的意思，怎么领会理论的精神实质？我们党重视文化的作用，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文化本身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革命的力量。现在 we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应该重视这一点。

报告对于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作了全面的阐述：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能够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能够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这几年来，我们着重解决国民经济内部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问题，在调整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积累和消费

的比例关系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十二大报告把教育、科学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过去我们的计划着重在经济方面,没有把科学、文化作为重要的部分。从“六五”计划起,计划的名称改了,叫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等,都将作为整个计划里不可缺少的重要的部分。这是我们工作的一大进步。这些年来,国家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和科学的部分,也确实增加得不少。但是,从认识上、工作上来说,我们一直还没有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同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问题提上日程。我们过去注意了经济内部比例关系的调整,也注意了教育、科学、文化方面财政支出的增加。但是,没有像调整经济内部的比例关系那样,调整经济发展与教育、科学发展的比例;没有看到除经济内部比例关系不协调、需要调整外,还有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科学的发展很不协调。这个不协调确实很严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很重要,可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质设施,也很难搞。一个好的发明创造,要推广并加以应用,在更大范围里发挥作用。一篇好文章、好小说要给人们以启示、以激励,首先离不开出版、印刷、发行,离不开纸张、仓库、交通等等。上演剧本、拍摄电影,都要物质设施。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只是脑子里想,嘴巴上说。要在广大的范围里发挥作用,就离不开必要的物质设施。在座的都是负责干部,我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呼吁一下,大家都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就要想点办法使必

要的物质设施不断得到增加、得到改善，要在这方面花点钱。国家有困难，可是，如果从别的方面省一点钱出来，减少一点浪费，是可以比现在搞得好的多的。希望同志们在校学习以后，在工作中切实地重视和支持精神文明建设。

再拿出版事业来讲，经过这几年的工作，所谓“书荒”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出书难，出版周期越来越长。有的同志讲，旧中国不发生开学以前教科书到不了学生手里的问题，那个时候只发生一个问题，穷人家孩子交不起学费，买不起课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三年了，上学的孩子多了，能交得起学费、买得起课本了，这是我们的成绩。可是，这些年来经常出现开学以后教科书没有到手的现象。为什么呢？印不出来，送不到手。历史上造纸、印刷术是我们的祖先首先发明的。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我们的造纸和印刷赶上当代世界的先进水平。

同志们，不要以为搞精神文明建设只是花钱的事情。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不仅成为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标志，而且将大大地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新技术的普遍采用所创造的财富，决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黑龙江在一万一千亩土地上种大豆，采取了一点新办法，增产百分之二十，每亩增加纯收入二十一元。有些地方种棉花、花生、水稻，使用地膜覆盖，仅此一项，就增产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一亩地多产三十到四十斤皮棉、一百到二百斤花生、一百五十到二百斤水稻。出版要花点钱，但是出版系统每年还给国家创造几个亿的利润。全国仅电影一项，每年

收入十几个亿。出版印刷的发展可以刺激机械工业的发展。电视机多了,国家出售电视机可以增加收入,并且有助于电视工业本身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我们要看到它同整个国家各项事业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

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非常重要,需要我们做切实的工作,需要我们具体进行物质方面的基本建设。我们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停止在手工业的水平,而应该发展到现代化的水平,这样才能同整个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第三项,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

今年四月十日在讨论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文件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实行不过一两年的时间,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少量,国家在经济上受的损失也不小。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煞住这股风,有些干部、有些党组织,一定会在三五年内发生变质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全过程。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所以要有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这件事情,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实现四个现代化,包括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保证。

十二大报告除了讲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以外，还提出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也存在着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大家已经知道西安的劫机事件。也有极个别与敌台、敌特挂钩的事件。由于对外开放，淫秽反动的录音、录像、图片、书刊涌进来，腐蚀了相当一批人。在解放初期已经被禁绝了的有些犯罪活动，现在又死灰复燃。严重刑事案件也时有发生。所以，报告说，“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着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人民同这些敌对分子的斗争。”【17】这个提法包含一个意思，我们不是把一般犯罪活动统统看成阶级斗争，而是看作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映。这种一般的犯罪活动，不能等同于上面所说的那样的阶级斗争，更不能够说成是敌我斗争。

有的同志对于中央提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一场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有一点埋怨情绪。他们说，你看，没有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不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吗？因此，对于这样的政策是不是要继续，是不是要坚持，发生了怀疑。胡耀邦同志曾经要我们回顾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一九三七年，我们同国民党重建统一战线以后，蒋介石妄图在抗日战争中间削弱中国共产党五分之二的力量，后来又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且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改变成为“溶共”政策。这对于我们党内不坚定分子确实发生了作用。先有王明的

新投降主义,接着又有张国焘的叛逃出走,后来也有一些部队被国民党吃掉。有些没有出息的共产党员,同国民党官员接触,人家在肩膀上拍一拍,就以为身价倍增。我们有些同志,看到国民党军官戴个军衔牌牌,也有点羡慕。我们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不是因为党内、军内出现了这些被腐蚀的现象,就说不要搞统一战线了呢?毛泽东同志英明地、及时地提出了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号召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提出反对阶级对阶级、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后来,又总结两次革命时期的经验,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教导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实行什么样的社会政策,都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不能够允许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斗争的结果怎么样呢?是国民党把共产党“溶化”了,还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败了?这不是大家清清楚楚看到的事实吗?现在的情况和政策同那个时候当然大不相同,可是这些异常珍贵的历史经验,不是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教益和启示吗?我们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实践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执行过程中也确有缺点错误,其原因正如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中所说的,由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必要的管理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对已经发现的某些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没有及时给予有力的打击;由于有些同志对政策的理解不正确,执行中间出了毛病;由于种种原因,正确的政策被有些人歪曲了。因此,

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陈云同志讲的，要总结经验。我们吃了一点亏，可以而且应该学得更聪明一些。我们完全有信心使我们的现行政策更加正确，更加完善，完全有信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更大的发展。

第四项保证，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

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好的党章。这是党内党外一致公认的。十二大决定用三年时间，按照党章的规定，进行全国范围的整党，这也反映了党内党外共同的愿望。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党的决心，看出中央对我们党的组织、党员成分的情况有清醒的估计。大会提出实现三个根本好转，主要是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这三条都是很得人心的。党内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同志，从中得到很大的鼓舞和鞭策。有了这几条，每个党员就有了衡量自己的标准，有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大家可以根据党章，根据十二大的精神，衡量一下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哪些合格，哪些不合格。有不合格的地方也知道该怎么努力改正。党内还有些人，入党就是为了做官，就是为了谋取私利。对于这样一些原来入党的目的就不正确，入党以后干了一些损害党、损害国家、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以后也不想改正的人，公布了党章，决定了要整党，又下决心要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他们就被置于非法的地位。人民群众和党内的同志也可以根据十二大精神对这些人进行监督。

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没有

党的领导是不行的。同时也证明，如果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某些单位领导软弱涣散，也不能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党风不正，你这个党组织里三个不纯很严重，党员、领导干部很不像样子，言行同党章相违背，你能够实行党的领导吗？你说话人家相信吗？群众不相信，不买账。所以，党的状况如何，是各项任务能否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实现的最关键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也讲，四项基本原则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只要我们按照十二大精神、按照新党章把党整顿好了，我们就完全有把握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而要把党整顿好，首先就要求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模范地遵守党章。我们这些人，决不要以为党章条文我都知道了，几十年都是这样做的，因此认为新党章只是对新党员、普通党员适用，需要照办的只是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思想，那就糟了。十二大报告和党章的规定，对党的各级干部，提出了比一般党员更严格的、更高的要求。这不能成为一纸空文。整党整得好不好，党风的根本转变能不能够实现，首先决定于各级领导干部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执行党章的各项规定，带头改正不符合党章规定的各种弊病，带头把自己整顿好，把自己所在的单位整顿好，这样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整下去，那就会使全党满意，使全国人民满意。不这样做，只是对下不对上、对别人不对自己，那是不行的。邓颖超同志在十一届七中全会上讲，党章很好，现在的问题就是

看能够不能够实现，而要实现，首先要从干部开始，从领导干部开始。我完全同意邓大姐这个看法。

注 释

- 【1】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 【2】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01页。
- 【3】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5页。
- 【4】 同上书，第825—826页。
- 【5】 同上书，第826页。
- 【6】 同上书，第829页。
- 【7】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 【8】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 【9】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 【10】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 【11】 同上。
- 【12】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261页。

- 【13】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2 页。
- 【14】 邓小平：《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第 318—319 页。
- 【15】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67 页。
- 【16】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 【17】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7 页。

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

同志们要我发表一些意见。昨天同会议领导小组的同志商量，准备就下面几个问题讲些意见。

第一个问题，这次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是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继续。那两年的规划会议和规划工作，对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科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无论是学科的建设、队伍的组织、学术研究的成绩，这几年来都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当然主要靠各级党委的领导，靠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但是，也不能否认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规划会议和工作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各科研单位的组织工作进一步加强了计划性，大家相互配合、相互支援，工作就好做多了。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年这两年没有开规划会议，少数同志还在做规划工作，但是全国范围的规划停下来了。从中国社科院的领导来讲，这是个缺点，我们抓得不够紧。现在党的十二

大开了,社会科学的规划工作再次提上了日程。这次规划座谈会,同志们都认为开得很必要、很及时。我们相信,经过这次会,加上会后的工作,一定会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同志们建议写一个会议纪要,就讨论中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或者说已经讨论得比较成熟的问题,形成一个文件。领导小组同志同意这个意见。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中宣部同志负责起草纪要,定稿后采取适当方式转发下去。

第二个问题,会后,各级各类社会科学单位都要立即着手制订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五年和十年规划,要使它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列入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今年十一月间将召开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讨论和通过“六五”计划。明年还将提出和讨论“七五”规划的要点。我们国家的计划,比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它不仅是经济的计划,还包括了社会发展的计划。本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应该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等,过去也有这些方面的指标,但是,作为计划来说很不完备。从“六五”计划起,不仅要包括经济,也要包括社会的各个重要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教育、科学、文化等等。“六五”计划中有专门一部分写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同志们很高兴。还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进行修改,以便使这一部分能够比现在写得水平高一点。但是很明显,这一部分尽管写得相当好,也还只是个纲要,或者是叫作方向性质的东西,还需要

有一个比较完备的、比较切实的五年规划以至于十年规划。所以，我们的规划座谈会只能说是规划工作的重新开始，不能认为开了这么个会，写了一个纪要，“六五”计划中社会科学的部分改好了，我们的规划工作就算完成了。大量的规划工作还在会后，要努力使“七五”计划中社会科学事业比“六五”计划大大地前进一步。请同志们回去切实地商量一下，报告省委，看应该怎么样组织力量，在八九个月的时间里，抓紧把社会科学事业在本地区今后五年的发展规划认真地搞出来，然后再进一步考虑十年发展规划。

党和国家已经决定把教育、科学作为战略重点。这里所说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起草党的十二大的报告时，这个观念是非常明确的。会后，我们又反复问国家计划委员会，他们也明确肯定，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今后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如果国家的计划或者计划的战略重点只有自然科学，没有社会科学，那么，这个计划、这个战略重点就没有全面地体现出来，就会是有缺陷的、片面的，而不是完整的，因为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缺了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计划的进行，必然会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甚至于会造成某些障碍。认识这一点很重要。这方面还要做些宣传工作。我们有相当多的同志，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讲到科学，很容易想到这大概就只是自然科学，没有包括社会科学。那么到了十二大以后，还是这样看待问题，那就应该说是落在时代的后面了。

怎么样搞规划？领导小组提了这么几点意见：

（一）乔木同志的讲话帮助我们打开了眼界，在我们面前展现了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广阔天地。很多过去没有想到的事情，或者需要研究的东西，他讲到了。有些比较零碎的问题，经他一讲就更系统了。社会科学工作，究竟将来会有一个什么前途，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听了讲话后更明确了。所以，请同志们回去以后，好好把乔木同志的讲话进行传达，组织讨论。同时，要在讨论的基础上多找一些学者、专家来开座谈会。应该说，关于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景，我们对不少问题、不少学科、不少方面的知识还了解不够。而搞规划工作，不吸收真正有学问、有知识的人来参加，只靠少数人，不可能是全面的。各个地方都会有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学者、专家。希望大家回去以后，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系统的、教育系统的、产业部门的、党政领导机关的、党校的、真正有学问和有专长的人谈谈，向他们求教。

这里，不仅要想到头十年，而且要想到后十年；不仅要考虑本省、市、自治区或者自己这个学科，自己这个系统，而且要考虑到全国，以至于面向全世界。把我们的眼界放得更宽一点，学科搞得更精细一点，时间想得更长一点。我个人的意见，有些问题即使十年、二十年还没有条件纳入规划，也不妨列出来，使我们知道十年、二十年内要准备条件，来开拓一系列新的领域。这里要强调的是，必须找确实有学问、有专长的人，不要找那些光知道空想、海阔天空地谈一通而又定不下一个题目的人。有学问、有专长的人，才知道

某门学科的重要,知道其中的甘苦,知道需要创造什么条件和怎样创造条件。这对于我们很有好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科学发展的规模。乔木同志讲,我们同外国有可比的部分,有不能比的部分。就发展规模来讲,有相当多的学科,相当多的问题,我们还没开始。找找这个差距,对于我们搞规划,会有好处。

(二)有了远景,有了广阔的视野,就要进一步考虑和研究实现的步骤。要搞清楚,哪些五年之内就应该着手,哪些前五年应该准备条件,十年才可以着手进行。要坚持斯大林讲过的工作方法: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求实精神。只看广阔的前景而缺少求实精神,规划搞不好。步骤的制定、项目的开列、人员的配备等等,都必须同本地区的工作,同全国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紧密结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向党政领导机关、计划部门请教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打开眼界、贯彻求实精神必经的途径。这就要了解本地区的全面计划,了解本地区在执行全国计划中的重点。确定为了完成地方和国家的五年和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和人员应该干些什么,要承担什么任务,承担什么责任。

这些年来,地方也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好,其他研究单位也好,在配合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些地方社会科学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得到当地党政机关、计划部门的高度重视。乔木同志一九七九年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得力助手。这个要求,对地方也完全适用。应该说,有些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

机关,在这方面做得比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好一些。有的同志讲,他那里党政机关、计划部门的一些同志不太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这种事情一定有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是不是可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单位未能有意识地使自己成为当地党委、当地政府的得力助手,未能做出确实受到当地领导承认的成绩。当地党政部门、计划部门给我们什么任务,不论大小都应该勇于承担,而且做出成绩。只要各地方的社会科学院都积极地经常地得到地方党委、地方政府的领导,全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就能得到可靠的保证。

(三) 求实精神中还包括在制定规划、承担任务时,要考虑社会科学研究系统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条件。不仅要了解国家和地方社会科学研究系统的力量,还要考虑教育系统、业务部门、党校和干校、军队研究单位以及党政领导机关、群众团体研究单位的力量。每个省委都有个研究室。要对这些分布在各条战线上的力量进行全面调查,有些什么机构,有多少人,从事哪些项目的研究等等。这样就可以看清楚,国家或地方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哪些我们承担得了,哪些眼前还承担不了。承担得了的,就要马上办起来;眼前承担不了而计划又要求我们承担的,就要准备条件。所以,一方面要积极要求党政领导机关、计划部门向我们下达任务,提出题目;另一方面,也要主动提出建议,主动承担任务。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在五年计划、十年计划的执行中做出了贡献,取得了成绩,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展，就不仅是切实的，而且是一定有前途的，一定能够更好地发展的。

（四）这次会议以后，主要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按不同学科召开全国范围的学者、专家的会议，首先制定各学科的发展规划。在这个基础上汇总起来，制定各个学科协调发展，而又有助于保证重点的、切实可行的总的规划。首先是五年的，然后是十年或更长时间的。要使这个规划能够列入全国的总计划，成为它的不可分割的、紧密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各个地区也采取类似的办法，照顾地方的特点，考虑地方五年、十年的需要，先发展什么，后发展什么。要各有特点，发挥地方优势。经济建设如此，社会科学研究也如此。视野要宽，列入规划的东西一定要可行。地方社会科学研究五年、十年的规划，要能作为本地区五年、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部分。规划制定出来了，希望给我们通气，送点材料。这样便于全国的综合平衡。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有些学科、有些问题，各个地方都列了，难免重复劳动。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可以请有关同志协商，做适当的分工。

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知识不够，另一方面由于情况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这次的规划，全国的也好，地方的也好，难免是不完备、不准确的，需要在实践中随着认识的提高，有所修正，有所补充，使它逐步完备、逐步准确。我们很同意大家的意见，今后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规划会议，检查本年度规划执行的情况，布置制定下年度规划的要求，从而

使我们的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以至更长远的规划,越来越完备、越来越准确。我们还要通过规划的制定、执行和检查,来密切中央和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密切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和其他中央一级研究机构的关系。地方也是同样。总之,要通过共同讨论,共同决定我们应当承担的任务;制定规划,共同检查,相互督促,完满地执行规划,以求得社会科学战线的各个方面、各个系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至少在目前情况下,这样来协调我们的关系,加强我们的合作,改进我们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比较合适、比较有效的办法。

第三个问题,十二大已经明确规定,我们的经济建设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不是也要经过两个时期?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景一样,社会科学事业的前景也是很好的。我们为此而高兴,受到鼓舞,感到信心百倍。可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们现有的机构,现有的力量,不但同前景来比差距很大,而且同经济建设发展的现有规模相比也很落后。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比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基础要小得多、薄弱得多。所以,前十年一定要把基础打得牢靠一点,这样才能有利于将来的大发展。

为了打好基础,为了将来的更大发展,现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队伍有一个整顿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五千多人,经过多年的考察,有些同志确实不大适宜做社会科

学研究工作，他们的长处在于别的方面。要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充分考虑这些同志的长处，做出妥善安排，使这些同志能够在别的战线、别的岗位上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我不了解地方上的情况，是不是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问题。与此有关，还有个机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些机构是空架子，行政人员不少，研究人员却很少。这就要加以调整，或者加强、充实，或者合并。

所谓整顿，最重要的是思想的整顿、学风的整顿。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的大体上有两类同志：一类有较多实际工作经验，但是理论准备不够、专业知识不多；一类理论准备比较好、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是实际工作经验和对社会的了解比较差。后面这类同志占大多数。这两类同志都有个思想整顿、学风整顿的问题。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情况是不是大体上也是这样？

在思想整顿、学风整顿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讲过很多深刻的、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要遵循的道理，这是同志们都熟悉的。我只想向同志们推荐两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宝贵经验，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一个榜样是陈云同志。去年起草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时候，陈云同志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讲，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间，毛泽东曾多次向他建议多学一点哲学。那个时候他在生病，利用休养时间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包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以及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他自己觉

得,学习以后收获很大,思想上的进步可以说发生了一个飞跃。七大以前,他去边区财经办事处做负责工作。当时在延安的同志都有这么个印象,他去以后,边区的经济工作很快就有明显进步。日本投降以后他到东北,任东北局委员、北满分局书记。那时,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集中精锐兵力向东北解放区进攻,长驱直入。陈云同志建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接受了这个建议。长春失守,我们军事上很困难,杜聿明甚至想进攻哈尔滨。面临严重局势,陈云同志又建议开辟南满战线。这个建议也为东北局所接受,为中央所接受。他自告奋勇去当南满分局书记。从此以后,就形成两条战线:北满一条战线,南满一条战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由于两条战线协同作战,我军南北配合,牵制敌军,国民党的部队被我们调动,疲于奔命,很快扭转了战局,提前解放了全东北。全国解放以后,陈云同志主持经济工作。他的主要言论,收入《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已经出版两本。大家读了,都认为,在经济问题上,陈云同志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过去曾经指导我们取得显著的成绩,而且现在对我们的工作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又读了《资本论》,读了《列宁全集》中十月革命后的各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中有很多意见、建议,也为中央所采纳,并且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读了十二大报告中关于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布局各有关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其中体现的指导思想,同陈云同志在解放后

各时期我国经济工作中坚持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也有充实和发展。

第二个榜样是张闻天同志。这次会议发了张闻天同志四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出发归来记》。这篇文章讲他从事调查研究所得到的体会，诚恳地检查了自己过去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大家知道，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转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从此以后，他一直拥护和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他在延安作过很多的报告、讲话，也写过很多文章，都是维护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这些都说明他在政治上确实转过来了，说明他同党中央在政治上是保持一致的。但是，也应该承认，他在延安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他的理论活动，绝大部分还是从事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宣传、解释和论证，很难说有很多理论上的创见和发展。一九四一年，他听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向中央要求，组织几个同志一起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前后经过一年零四个月，到了晋西北，到了绥德、米脂，写了大量调查报告。最后有个总结，就是这次印发给大家的材料。这次的调查，延安整风，使张闻天同志对自己的思想作风有了新的认识，新的觉醒。日本投降后，他到东北。在东北工作中，他和陈云等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一九四七年，全国许多地方土改出现“左”的偏向。张闻天同志领导的合江省委基本上没受影响，土改进行得比较健康，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一九四八年，东北大部分地区先后解放，并且连成一片，老区的土地改革基

本完成。同年夏天,张闻天同志起草了一个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和建设方针的文件,分析东北的五种经济成分,主张分别采取不同的方针,总的说就是经过过渡的步骤,使东北的经济向着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方向前进;提出东北解放以后已进入一个过渡时期,要采取类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个文件得到东北局的同意,报到党中央,也引起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经济部分中,讲得更完善、更科学了,为我党在全国解放后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里面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同张闻天同志起草的文件是完全一致的。张闻天同志的理论贡献,是应该载入党的史册的。很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有理论准备,有书本知识,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一定要诚心诚意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实际经验太少,实际知识太少。认识了这点,就必须像张闻天同志那样,切实地向实际学习。

要承担社会科学研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任务,就一定要下大决心,周密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陈云同志讲,要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调查研究,然后用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出决策。那是讲实际工作。我们做研究工作,情况也许不同一点,但是一定要下决心,对于重大问题,特别是新问题,我们缺少知识、缺少实际经验的问题,应该拿大部分时间先去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以条理化、加以深化。这关系到我们今后能否完成任务,能否做出成果。一

个机关也好，个人也好，能不能做好工作，这是关系成败的一条最重要、最重要的条件，是事情的关键。否则，文章写不出来，意见提不出来；写了、提了，也很难是创造性的、切实可行的。

张闻天同志文章里讲到：“所以，调查研究工作，不是什么一个时期的突击工作，也不是只在工作的某一阶段才需要的工作，也不只是对于某一种人才需要的工作，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1】}做调查研究工作，要付出劳动，付出牺牲。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也会有成功，有失败。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诚实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就看你学风改进了没有，是不是真正注意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真正注意了切实的调查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所有同志，都要把学风搞正。学风搞不正，人员再多也不会出成果。十年内进来的人将来要带徒弟，下一个十年他们就成为老师了，就成为领导了。他们的学风不正，新人进来以后，也要被他们带坏。他们学风正了，新的人进来，就有可能跟着正下去，把好的学风一直坚持并且发扬光大起来。

学风中间还有个问题，就是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和“双百”方针的关系问题。这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可以保证执行“双百”方针的正

确方向；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又有助于中央作出决策的时候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广泛吸收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使中央的方针更完善、更准确、更全面。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共产党员必须坚决执行。党章已经规定了，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允许保留意见，可以向上级直到中央提出不同意见。不同的意见，也可以专门研究，也可以著书立说。但是，每个共产党员都无权在公开场合、公开报刊随意发表政治上同中央不一致的甚至相对立的意见。不论他担负什么职务、从事什么工作，这都是起码的要求。否则，党就不成其为一个战斗组织，党就不成其为党了。十二大确定了总方针，但还有很多问题要求我们深入地展开研究，进行讨论。只有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有利于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有利于中央进一步做出具体决定。作为共产党员，把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与实行“双百”方针总看得格格不入，没办法协调，我觉得这不合乎我们的实际生活。

第四个问题，由于我们肩负着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必须不断培养新生力量，不断地扩大我们的队伍。

要采取种种办法增加研究生，提高研究生的质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今后应该重点为地方培养和输送研究生。也希望各个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凡是有条件的，也招收研究生。更重要的是，各个大学要招收研究生和举办研究生班。教育部完全同意这个意见。要同教育部门合作，以后大学生的培养和分配，都要充分考虑到怎样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输送新的人才。还有培养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新的途

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所准备同首钢合办一个研究所。两方面都有积极性。可以预计,这个新的研究所不但人员编制的问题比现在好解决,而且研究成果也会比现在好得多。现在,大庆已经有研究所,鞍山也有研究所。将来的大型企业、联合公司,都会要求成立各种各样的研究所,不仅有自然科学的,而且有社会科学的,从两方面来研究提高经济效益等问题。我们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部门,现在很多都有研究机构,叫研究室或研究所。这些所将来也会发展,也会增加。从长远来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第一线上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会相对地减少,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会相对地增多。其中势必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整个国家有这个需要,各个地区有这个需要,各个部门、各个企业都有这个需要。所谓智力开发,不仅只是自然科学的智力开发,也包含社会科学的智力开发。工作的前进,事业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日益被用来解决经济发展、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需要有而且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个工作。还要看到,现在工人的文化水平比解放前高了,工人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将会越来越高。第一线上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减少下来以后,从文化水平较高、又有生产经验的人们中间,会涌现出一大批可以卓有成效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这个远景是我们应该看到的。眼前就有这样的事实。有一些曾经插队落户的青年,后来考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对农村有感情,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自愿要求把一生献给农村工作。我知道的,北京就有五六十个人,实

实际上绝不止这么些。我们打了二十八年仗，从军队中培养出一大批治党、治政、治经、治文的人才。在座的我想也有相当多的同志是打过仗的，后来做党的工作，做政府的工作，做经济工作，做企业管理工作，做文化工作。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从事第一线物质生产的人，因为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趋势，将会一批一批地转到社会科学研究战线上来，不断扩大我们的队伍。其数量很可能比从大学培养的学生多，其研究能力也可能绝不逊色。我们没有理由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前途产生悲观心理。我们相信，只要前十年准备工作做得好，基础打得好，条件创造得好，后十年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发展。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布局或学科的布局，总的来讲，以后重点就是放在发展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摆在北京，也不合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还要增加一点人，更重要的是调整、整顿。以后发展主要是在地方，地方要成倍地发展，长远来说，要几倍地发展。我们一个省，比有的国家还大。现在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总共才五千人，其中研究人员只有三千多人。这与我们的事业不相称。当然，要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各地方要明确重点发展什么，哪些要有，哪些让人家去研究，本地就不设了。不要求全。这只能靠同志们同地方党委、政府、计划部门商量。邓小平同志讲，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要适应这个要求。地方的建设也应该各有特色，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社会科学研究机

构的设置，人员的培养，任务的承担，也必须同各省、市、自治区建设要有特色这个状况衔接起来。我们有了每年的规划会议，可以交流情况，交流经验，交换意见。搞几年，慢慢就会把我们机构的设置、任务的安排搞得越来越合理。

第五个问题，现在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研究人员三千四百多人，辅助工作人员八百九十人，行政工作人员一千一百多人，合起来五千多一点。我们设想，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辅助人员、行政人员，到一九八五年达到一万人，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都已同意。请同志们注意，力求不要再增加行政人员了，多增加些研究人员和必要的辅助人员。要增加这么些人员，就需要有人头费、研究费、办公费，也需要盖点房子，有点基本建设投资。根据二十三个省市的统计，到一九八五年，所有这些合起来要两亿多元。关于人员、经费，财政部、劳动人事部的同志表示，这是应该的，以后要在现有基础上逐年有所增加，以满足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这里还没有包括教育系统的研究人员，各个部门、企业和党校系统、干部学校系统的研究人员，还有军队系统的研究人员。这都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逐步增加。

社会科学的经费要专立一个户头，同自然科学、同教育分开来。财政部同意专拨一批款项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我讲的这些，凡是领导小组讨论过的，有个表达得准确不准确的问题；领导小组没有讨论过的，我补充了一些意见，就更没有把握了。同志们觉得哪些意见可以吸收就吸

收。尤其希望同志们对不妥当的意见提出批评，我一定诚恳接受，予以改正。

注 释

- 【1】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325页。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

(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日)

最近读了一些文件、文章，有点想法。

我们反复讲，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已经有不少文章讲这个道理，讲得对。问题是怎样切实地理解和运用。

这几年的实际生活告诉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够的。

比如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最早并不是我们，而是农民创造出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搞责任田很坚决。农民把责任田叫做“救命田”。责任田在某些方面有点接近今天的包产到户。解决农业问题，我们也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过了，特别是“大跃进”以后的办法，效果不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我们，才走到今天这条路上来。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重点转移，纠正“左”倾指导思想，搞了个《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

* 这是邓力群同志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部分同志的谈话。

案)》。当时尚未直接提出生产责任制问题,但是强调必须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求切实保证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克服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些都起了重要作用。三中全会以后,一些生产责任制的初级形式、包括包产到户出现了,一个队、一个公社、一个县,只要一搞,很快就改变面貌。

在农业生产上搞包工,这种形式过去也有,问题在于和报酬的联系。到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比一年前的草案前进了。《决定》再次强调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反对滥用行政命令、“一刀切”,提出“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搞包产到户”。这已经开了不小的口子。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进一步总结一年来贯彻四中全会农业决定的经验,提出把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作为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座谈会纪要把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分为两类: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和包工包产、联产计酬。但是对包产到户留了一点尾巴: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说这是解决温饱的必要措施,这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这还有点入“另册”的味道。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农民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搞责任制,凤阳县最穷的梨园公社搞大包干

到组，有个最困难的小岗生产队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年终算账，全公社粮食总产量比上年翻一番，油料增产八倍，农副业纯收入增长二倍。小岗成了冒尖队：人均粮食比公社多二百多斤，人均产油料是公社的三倍。安徽普遍推行生产责任制，农村面貌很快改变。当时江苏没有搞，但是和安徽交界的一些地方，农民已经暗暗干起来了，而且越传越广。省委同志下去调查，才知道确实见效，于是加以支持。农民在实践中根据本地的情况不断有新的创造，对已有的形式也有所丰富、有所发展。这些新创造很快被中央发现，在中央的文件中肯定了下來。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纪要》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下苦功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真正做到因队制宜，又不可撒手不管，任其自流。这个文件下去以后，许多地方也很快赶了上来。十二大政治报告集中群众的愿望，明确指出：“近几年在农村建立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只能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决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轻率变动，更不能走回头路。”^{【1】}农民说，党的七大使人民站起来，十二大使人民富起来。的确，农民深深感到党同他们是心连心的。

我们的农民已经是合作制下的新农民。不是说农村中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应该承认,农村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而且农民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小生产、小私有心理的影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也还在发生作用。这些都必须看到。因此,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要做。但是从主流来看,不能把今天的农民和旧社会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等量齐观。从主流来看,现在的事实是,我们的农民群众正在创造着社会主义新事物。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历史性转折的最主要的根据。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中,说群众中蕴藏着很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完全正确的。过去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自上而下,强迫命令,一级一级往下压,瞎指挥,一刀切,“运动群众”。以致农民说,我们种了几辈子地,现在不会了;一个县只有一个人会种地,就是县委书记,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都要书记统一下命令。这还谈得上什么群众的积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通过认识上、工作上的拨乱反正,帮助群众摆脱“左”的一套的束缚,放开手脚进行新的创造。党坚定地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自觉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很多东西,都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在实践中见效了,然后党把群众的经验总结起来,加以提高,加以条理化,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广开去。贯彻执行方针、政策的时候,党总是强调要尊重群众

的意愿,充分考虑各地的不同情况,给群众继续发挥创造性提供条件、开辟广阔的天地,使我们的几亿农民越来越大有用武之地了。这个创造、总结、再创造、再总结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是新事物不断涌现、越来越有生命力的过程,也是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创造性日益提高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日益完善的过程。许多同志都是在群众的启示下、推动下,使自己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丰富,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至于工作出问题的地方,一定是背离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一定是束缚着群众的创造精神、不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的地方。从党中央的领导来说,确实真正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方法,真正恢复和发展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十二大政治报告重申了列宁的一段话: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这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也是贯穿十二大报告的一个基本精神。

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是”,即客观规律到底在哪里?陈云同志说过不唯书、不唯上。这个“是”,就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历史创造活动过程中。书是要读的,脑子是要用的,但是,不能照抄书本、冥思苦想、坐而论道。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肯读书,也动脑子,但是千万不可忘记联系群众,倾听实践的呼声,否则实在有可能重复一些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评过的观点,或者照搬只适用于别的国家而不适用于中国的办法。这不能叫解放思想。也不能照抄照套上级的规定,而一定要充分

考虑本地方、本部门的特点和群众的实践,坚定不移地而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总之,解放思想,必须和群众路线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实事求是必须和群众路线联系起来才能做到。不到群众中去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不向群众学习,不虚心总结群众的创造,谈不上解放思想。最近开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一位同志说,什么时候下去调查研究了,什么时候思想就解放了;什么时候不下去调查研究,思想一定僵化。这很有道理。

与此有关,还有一个问题。这几年来听得比较多的意见是,批“左”有助于解放思想,批右一定有碍于解放思想。这是一种误解。批“左”有助于解放思想,这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应该承认,批右也有助于解放思想。十二大说不能走回头路。有两种回头路:重复过去“左”的那一套是回头路,回到旧中国去也是回头路。这样的问题,也还是只有老老实实地向实践学习才能解决。刚刚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时候,我们一些干部怕右,认为这是右的表现;农民中间也确有少部分人认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就是单干,确有少数人想回到旧中国小农经济的老路上去。有的地方这样搞了,行不通。农民中青壮年都是在合作制下长大的。生产力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像水利、机械、科技成果等等,分工越来越细,既有多种经营意义上的分工,又有同一生产过程内部各个环节的分工,劳动者即群众和干部的文化技术水平、经营管理经验也在起作用。有的地方搞了一段,多数人觉悟了,又回到生产责任制

的路上来。所以说，“左”不行，右也不行。

这样一些想法，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请大家考虑。我觉得，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解放思想也罢，做各项工作也罢，都不能背离这个原理。在这方面，很有必要认真思考，收集材料，写若干篇有分量的文章。

注 释

- 【1】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页。

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 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

讲五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现在农村形势确实很好。农村形势是怎样好起来的，怎样才能更好，可以从多方面回答这个问题，但首先应说到的是，对我国广大农民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各方面的成就，归根到底，是由于我们党坚定地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党适应人民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因而使得我们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在农村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农村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合作化，消灭了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剥削阶级，尽管农民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作为整体，不应该再把他们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农民一样看待，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民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量事实反复地告诉我们，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得到进一步发挥，他们是农村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动力。

这几年农村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各种经营管理形式的改革，大多是来自农民群众的创造。农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了，取得成果了，当地群众承认，周围群众跟着学，一传十，十传百，并且经过各级党组织的总结，得到中央的肯定，加以系统化，才逐步推广。他们是先生，我们是学生。这样一个情况，根本改变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的农村工作。那时，提倡什么，推广什么，许多是自上而下一级一级往下压，最后压到农民身上，愿意也得办，不愿意也得办。这种办法，好事也得办糟，更不要说有些主意是上面单凭主观想出来的，本来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更加不好了。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定地、勇敢地纠正“左”倾错误，彻底改变那套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办法，解除了加在农民身上的束缚。广大农民群众得到很大的解放，他们中间原来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充分地发挥出来。扩大生产队自主权，扩大群众自己决定问题的权力，提高了农民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真正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这个期间，党中央反复强调，中国农村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什么事情都不能一刀切，改革也好，典型

经验的推广也好,都要给农民选择的余地,都要由农民自己和当地干部按照因地、因时、因事制宜的原则,或者自己创造,或者选择别人成功的经验。所谓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顺应社会、经济、自然的规律来进行活动,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按照规律办事。这当然只是开始,不能够估计过高,但这个开始非常可贵。我们农业的前途,农村的前途,大有希望。

这样说,并不是低估党的领导作用,更不是主张放弃党的领导,放任自流,离开国家的总体利益,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农民的活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问题在于,怎样才是真正加强党的领导呢?党的领导,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发指示、下命令。张闻天同志说过,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看法很深刻。我们所说的领导,应该能够使人民愈来愈充分地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并且团结起来,为之而奋斗,也就是提高人民的觉悟,集中人民的意志,由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充分发挥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导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人民摆脱各种各样的枷锁,包括从剥削阶级那里来的精神枷锁,也包括他们自己由于不觉悟而形成的精神枷锁。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中央领导回到了七大、八大时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创造性能够得到发挥,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拨乱反正工作,克服了“左”倾错误,解除了主观主

义、教条主义对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束缚,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敢想敢说敢做,放手地进行创造。没有这一项工作,不把农民的手脚放开来,农民的积极性没法发挥,想创造也很难创造。党中央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条件,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几亿农民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我们党中央领导的正确,就在于真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于农民群众的每个新创造,党中央从来没有压抑,从来没有泼冷水,而总是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肯定,加以总结,加以提高,帮助群众使它逐步完善并推广开去。推广的时候,提倡同各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遵循自愿原则,允许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不采取任何强迫的办法。很多东西,都是群众先创造,中央总结、提高,群众再创造,中央再总结、提高,不断反复,这样才使新生事物迅速成长,才使党中央的政策愈来愈完善,愈来愈丰富。党中央支持农民的创造,又领导农民进行创造。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充分说明,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已经恢复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制定和检验、修正、完善政策。正因为党中央的政策真正集中了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所以它又极大地支持和鼓舞着群众更好地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我们说,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正确高明,这些年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刚才所说的这些事实,应该是最重要的标志、最重要的根据。

这里还涉及对这几年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估价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究竟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我认为对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地、简单地回答,不能只在两个答案中间选择一个,而应该做具体分析。经过拨乱反正,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大为提高,得到发挥。从这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削弱了,而是大大加强了。拨乱反正不能说不同时是思想政治工作。讨论真理标准,解放思想,恢复、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十一届四中全会叶剑英同志报告的传达和讨论,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和六中全会决议的传达和讨论,十二大精神的传达和讨论,都同时是巨大规模的、充分说理的思想政治工作,收到的效果也是多年来没有的。没有这样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今天广大农民群众能够这样放手地进行创造吗?当然是不能的。

这几年拨乱反正,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批评“左”的错误,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好、比较多。相对地讲,从正面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还做得不够。错误的东西清理了,正确的是什么?该如何坚持?怎样把道理讲清楚,为农民、为干部所掌握,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导?这些都做得不够。

其次,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适合农村情况、符合农民心愿的方针政策。在推行这些方针政策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学习和宣传,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就事论事、就政策论政策比较多,就事论理比较少。特别是在执行过程

中间，群众、干部中发生了思想问题，我们有针对性地进行回答和解释做得很不够，以致到现在，群众还在一些问题上有这个担心、那个担心，干部有这个疑虑、那个疑虑，有的甚至有抵触。这说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有待于加强，有待于做大量艰苦细致、深入具体的工作。

我们农村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可是，不能因为主流很好，农民的多数很好，就说农村一切都好。我们农村还存在着消极方面。群众和干部头脑中仍然存在着两种影响，应该给予足够的估计。一种是“左”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干部中，还没有完全消除。相当一些干部还没有从“左”的思想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农民怕变。第二种是农民中有些人还没有摆脱或者说还没有完全摆脱小生产、小私有的思想或习气，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对他们还有影响，还发生腐蚀作用。有些地方，干部和群众一起盗窃以至于抢劫国家的财物，破坏森林等等，情节不能说不严重。至于一般的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行为，在一部分人中就更有一定的普遍性。还要看到，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继续坚持。但是，也的确出现了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生活上的严重犯罪活动，在有些地方还相当猖獗。这就证明，阶级斗争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个估计不能够说只适用于城市，不适用于农村。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看到农村的主流很好，就放松了应有的警惕。

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和内容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普遍原则在任何方面都是适用的。胡耀邦同志前些时候讲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讲的一段话:“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1】这虽然是就军队来说的,但这个道理对各方面的工作都适用。我们这次会要着重研究的,是怎样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般原则和农村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怎样把一般的原则运用到农村中去。这是个大问题,要做出完善的解决,只有一般的原则还不够,还一定要结合农村的特点,使它具体化。这就要我们了解农村的特点是什么,农村工作同其他工作有什么不同。比如,我国农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交通不便,相对来讲,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居住又很分散。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它的方法,就不能不考虑这些情况。它既不同于城市,又不同于工厂、学校、部队、机关。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2】这个党领导群众的基本原则,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尤为重要。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接受我们的道理,接受我们的政策,不是根据我们

讲得多么漂亮，条文定得多么完善，而是根据他们亲身的经验。他们有了亲身的经验，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觉得顺耳、顺心、顺劲，就接受了。他们感觉不顺劲，你讲得尽管头头是道，他无非是不予理睬或者扭头而去，勉强要他坐在那里听，也是一个耳朵进去，另一个耳朵出来。他们是根据切身经验来接受或者拒绝我们党的政策、我们讲的道理的。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内容和方法。

因此，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还是要围绕农村各项工作、围绕现行政策来做，不能离开农村现行政策，不能离开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经验。思想政治工作要讲道理，看来首先是做什么讲什么，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经济工作中去。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还希望进一步努力。一个政策下来了，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恰恰在这些问题上，过去我们讲得很不够。我们所说就事论事比较多，就事论理比较少，就是指这种情况。往往读一通党中央的政策文件，照本宣科，至于中央为什么要制定这项政策，根据是什么，是针对什么问题的，应该怎样从农村实际出发来理解，来贯彻执行，就讲得很少了。执行中间，还要根据农民提出的新问题，有针对性地给予回答。要讲清楚为什么，要结合农民的实际，适合农民的理解能力，使他从内心里接受你这一番道理。

今冬明春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结合农村的情况，宣传十二大精神。十二大讲了今后二十年要办的事，讲到了各个

方面。十二大的主要精神应该传达，应该讨论，应该贯彻；但是，还应该着重讲十二大关于农村问题、农业问题的决定和指导思想，开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这样，十二大精神的学习就同农民最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了。要经过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十二大提出的长期坚持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使它逐步完善的任务。

围绕联产承包责任制做思想政治工作，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次会议印发了一个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材料。问题是提得好的，是经过调查以后集中起来的，是有针对性的，都是农民和干部中间迫切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道理也讲了一些。如果说有缺点的话，是通俗性不够。因此，还只能作为干部的阅读材料；如果给农民做思想工作，靠念这个本子恐怕有困难。请同志们看看，什么问题该讲还没有讲到，或者有些道理还没讲透，提出来后再进一步修改。

今冬明春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党员进行教育。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工作和管理工作，切实改进过去那种包揽日常事务太多，造成党不管党的毛病。希望通过这次教育，不仅使党员本人有个进步，而且使我们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也有个进步。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另外还有一个会，也要制定文件，进行传达。在贯彻执行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农村的特点，围绕各种生产责任制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同对农村党员加强教育结合起来。

同志们希望我讲一讲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需要认真研究，我也讲不好。

我要说的，是同思想政治工作有关的一些论点。

毛泽东同志有个论点：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有的报刊曾经发表文章批评这个论点，认为它站不住，理由是经济工作有它自己的生命线，怎么能把思想政治工作说成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说这是外加的。经过反复考虑，六中全会的决议认为这种批评是不对的，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这个论点。那么，这个论点主要意思是什么呢？中央在讨论时指出，就是一切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都要有正确的方向。单是埋头经济工作，埋头业务工作，忽视政治，不问政治，往往会迷失方向。所以需要有思想政治工作来提醒这些同志，做经济工作和业务工作的时候，要端正方向，不能偏离方向。没有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方向就掌握不稳。所谓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今年四月三日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有四项政治保证。他说，这四项政治保证，就是使我国在搞四个现代化、搞经济建设的时候，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真正使之成为重要保证，就需要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说的四项，每一项都有大量复杂的工作。机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整党，说起来是四句话，做起工作来事情就多得很。如果这几项工作做不好，或者不

做，那确实会发生四个现代化、经济建设究竟走哪个方向、哪条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还有一个论点：“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3】我们的经验说明，政策本身有威力，政策本身就是政治，可是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使群众自觉自愿地执行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把思想工作做好了，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政策的贯彻执行，经济工作任务的完成，就会得到更好的保证。思想工作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不能干扰、妨碍、破坏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毛泽东同志讲，通过思想工作达到官兵一致，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领导和群众团结在一起，激发农民和农村干部最大限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了这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有的生产条件，现有的生产工具，将来加上现代化，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思想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协调人民内部的关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使大家心情舒畅、同心同德、聚精会神地搞农村建设。

把这两个论点联系起来，就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懂得，思想工作一定要同经济工作结合在一起，谁也不能离开谁。过去的问题是“两张皮”，没有结合或者没有很好结合。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使它们能够水乳交融，密切结合。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复争论的问题。思想工作

落实到哪里?那个时候一论突出政治,二论突出政治,三论突出政治,后来就批评一种观点,说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业务上是错误的。实际上这句话是周恩来同志讲的。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我们应该肯定,周恩来同志的话没有错。思想政治工作如果吊在空中,尽说假话、空话、大话,就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工作的前进,不能在经济发展中显出强大效果,相反会妨碍经济工作的进行。

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内容,或者说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加强现行政策教育和形势任务教育。关于共产主义思想和现行政策的关系,大家都承认,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那么,究竟这个区别和联系应该怎样理解?从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说起,就比较容易理解。比如,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按劳分配的关系问题。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没有定额、不计报酬、自觉自愿的劳动。按劳分配,按照我们习惯说法,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这两者的联系在我们生活里也是常见的。干部也好,工人也好,八小时工作制是定额,也是现行政策。可是,我们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战士,超过八小时工作的人很多,到处可以见到。我们多搞几小时的工作,计较过没有?是不是因为超过了几个小时没有给报酬,就心情不愉快,多要几小时的工资?大多数同志是这样想问题的吗?不是的。这叫不叫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符合不符合列宁的要求?回答当然是肯定的。由此看来,坚持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和坚持现行政

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又是严格区别的。报纸上经常发表一些材料，说一些模范人物走在时间的前面，有些人半年完成了一年的任务，有的人一年完成了几年的工作。这些同志没有斤斤计较报酬，而是照样忘我地辛勤劳动。这当然是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应该加以表扬。可是，反过来，如果因为先进分子半年就完成了一年的定额，因此我们工厂的定额要普遍提高，结果大多数工人都达不到，就会使这些先进的同志孤立了。这里的联系，这里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还有创造发明问题。最近召开科学技术授奖大会，有十三项发明创造，每项每年为国家增加的收入达一千万元以上，有的达到亿元以上。其中一定包含不计定额的、八小时以上的劳动。他们是不是因此提出要求，说我的发明创造每年给国家增加一千万元，你不要全部给我，给我五百万好不好？没有一个科技工作者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个叫不叫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当然叫。还有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牺牲在战场上，牺牲在敌人监狱里。他们想过自己应该得什么报酬没有？从没有想过。如果念念不忘个人的私利，决当不了烈士。当然，我们也不能反过来，确定一条社会政策，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不考虑个人利益，都必须牺牲个人利益。对于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是应该这样要求的，但是对广大群众不能这样要求。我们的社会政策，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同按劳分配的政策，在我们生活里既是严格区别的，又是密切联系的，这是大家都理解的。把这个问题想通了，以此类推，来

解释共产主义思想同现行政策的关系,大家比较易于接受。当然,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论证、探讨,只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我们现实的基地,就比较容易取得成果了。

陈云同志讲过一个很重要的意见,认为农村生产责任制以及工业企业的经济责任制,它的发生,它的成长,逐步打破了吃“大锅饭”,捧“铁饭碗”的状况,其意义不下于三大改造。打破“铁饭碗”,是革平均主义的命,可以解决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要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的。这个意见涉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其中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最近有个农民写了一副对联:“七大使人民站起来,十二大使人民富起来。”从这副对联看,农民确实是根据自己切身的经验,认识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现历史性转变的深刻意义。这里讲站起来,应该不仅指土改,也包括三大改造。经过这几年的工作,特别是各种责任制的推行,我国的农村已经开始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讲到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或者四个要素,即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在生产方面,我们已经摸到了一些很有特色的东西,不同于我们的过去,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曾经讲到生产的消费、个人的消费,由于生产方面的变革,在消费问题上农村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的全面情况如何,还需要做些细致的调查。原来个人消

费中有相当一部分采取集体消费的形式，最后还是归个人享用。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原则上说过，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用于集体形式的消费，包括公园、小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等，在消费基金中所占比例应该越来越重。过去由于穷，农村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尽管有公益金，但这方面的事情做得很少，有的只能解决照顾五保户的问题。将来生产发展了，从提留中间拿出愈来愈多的钱搞集体的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是可能的。特别是在分配问题上，我们采取了适合农民需要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确是一大创造。现在显得落后的是交换，大家意见最多，问题也最多。这也表明，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需要懂得，自己工作的意义非常大，可以做的工作非常多，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地投身这一事业，一定可以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把八亿农民的事办好，这确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

三、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步骤

这个步骤，概括地说，就是先干部后群众，先党员团员后非党员非团员。先做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理由是：

马克思主义一再讲的，“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不能离开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通过他们去做，如果他们思想不通，再好的政策也难以完满实现。他们通了，心情舒畅了，思想解放了，积极性提高了，不但正确的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而且如果某些政策对当地具体情况来说有某些缺点或不足之处，他们也能够经上级党

委同意，在执行中负责地加以补充、完善。现在对各级干部都有一个重新教育的问题。这是我们领导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还要大力提倡虚心地向群众学习，特别是虚心地向这几年做出了许多创造的农民群众学习，从中进一步领会毛泽东同志的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4】我们应该深刻领会这个千真万确的真理，把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点。

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方法和工具

由于农村的巨大变化，我们再继续执行“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不适宜了。我同意这个意见。那么，以后我们的工作路线应该怎么提呢？有的同志提出，是不是可以叫做团结、组织和依靠农村的先进分子，向广大农民群众做思想政治工作。我想，在没有更好的提法之前，是不是首先这样做，然后，在实践中去补充和完善我们的看法。这里讲先进分子，不要与首先富裕的人相混淆。我们鼓励农民劳动致富，但是，经济上富裕起来和思想上、政治上先进，并不能划等号。先进分子，应当包括合格的共产党员、合格的共青团员，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行党的政策表现好的干部、农民，表现好的复员军人、中小学教员、知识青年。把这样一些先进分子组织起来，我们农村的各项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就有一支相当大的队伍可以依靠；把他们的工作做好了，然后通过他们采取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面可以扩大，工作可以做深、做细，而且可以造成声势。

要坚持说服教育、表扬先进为主的方法，再也不能重复过去那种“大批判开路”的方法了。这次会上印发的典型经验很好，内容很丰富。各地都有很多很好的创造，要宣传推广，建议新华社、报纸发表，并且汇编成书。

有一些方法看来是可以普遍推行的。例如，“党员联系户”的制度，制订和实行“乡规民约”。这当然要走群众路线，不是由领导、由干部想几条，而是要由群众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提出几条，大家一致同意了，就共同遵守，互相检查。这是“文明礼貌月”以来群众自己的创造，效果是好的。

要充分发挥农村各种组织，像文化站、广播站、技术推广站、青年之家、农民夜校、农民政治学校、业余体育、文娱组织，以及不断涌现的很多新的组织的作用。要根据各地的条件，群众愿意的要大力支持，不愿意的也不要勉强。特别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电影、书报等宣传工具。这方面我们还很落后，今后的五年、十年要有适当的发展。一方面国家要想办法拿点钱，另外，农民确实富裕了，农村建设陆续发展了，农民自己有这个要求，也可以从集体收入中提取一部分或由社员自愿集资兴办文化设施。

所有这些活动，都要汇总起来，朝向一个总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有些地方农民自愿开展的文明村、文明户、五好家庭等活动，就是朝着把农村建设成为文明的、富裕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个方向前进的。有条件的地方，群众有要求的地方，就应该采取支持的态度。但不

要“刮风”，不要什么事情一听好就“大办”一通。农民最需要办、也愿意办和可能办的事情，可以先办。要从少到多，稳步发展。在这方面，各地经验很多，要宣传介绍。

五、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党委的重要议程，定期讨论，定期检查。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思想政治工作。要党政分工，党委不要包揽日常行政事务。新党章总纲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这里是把政治、思想的领导放在前面的。当然政治的领导包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了以后，就要通过普遍的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它能够贯彻执行。讲党的领导，归根结底，是政治的、思想的领导。无产阶级要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里头有这么几句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七大时刘少奇同志在党章修改报告中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段话，至今对于我们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仍然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做好的；因为只有做好了这第一步，才能进入第二步，即是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

后，我们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了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5】这一段话是讲得很好的。照着这段话去做，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过去“左”的东西，除了指导思想以外，命令主义、包办代替也的确不少。

要把这样的观点贯彻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就必须认真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经验，这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群众现在有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做任何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都有一个首先向群众学习的问题。学习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向群众调查研究。汇报会时有同志说了两句话，我认为是很好的：谁到群众中间调查研究，谁的思想就解放；谁不到群众中间调查研究，谁的思想就难免僵化。为了避免思想僵化，就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向群众调查，向群众学习。

在全国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中央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实践证明完全是对的。可是对于思想解放，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有的理解确实不那么妥当，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几年有正确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有对思想解放理解错了的经验。要思想解放就必须尊重群众的创造性，不

尊重群众创造性的人，思想非走弯路不可。批“左”有利于思想解放，批右也有利于思想解放。有一段时间有个误解，好像批“左”是解放思想，批右一定束缚思想。不能这样看。只有尊重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经常向群众作调查，倾听实践的呼声，才能够使我们的思想解放走上正确的轨道。只是就书本论书本，照搬外国，或者离群索居，冥思苦想，都不会真正解放思想。真正的思想解放，来自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实际，来自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怎样发展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前者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只是从头脑中臆想出来，靠天才空想出一套自以为全新的完善的救世良方。与此相反，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要如实地研究社会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像恩格斯所说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6】。特别是我们做实际工作、做农村工作的同志，更要经常下去了解、发现农村中到处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创造，这才有助于我们开动脑筋，才能找到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好办法。

党领导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对农村的各种力量、各种组织和人员进行全面的安排，组织成为一条战线，彼此有分工，也有协作，做出统一的调配，不能光依靠少数人。工作要做细，只有人多了，组织好了，协作好了，才能真有成效。当前，农村中新事物层出不穷，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要党的各级组织切实加强领导，

把一切能够做、愿意做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和人员的力量一起调动起来，让他们都贡献才智、发挥创造精神，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就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注 释

- 【1】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 【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 【3】 毛泽东：《又红又专》。《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3页。
- 【4】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 【5】 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2页。
- 【6】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5页。

新时期要做好党员教育工作*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这次会议的主要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决定或者叫通知，一个是宋任穷同志的讲话。两个文件都要请同志们提出意见，进行修改，报中央审批。我们希望前者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后者全文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我想就这两个文件中间的一些内容和同志们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些解释和说明。不少问题，我自己也还在继续研究，不可能讲得很准确，只能讲些供同志们参考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

党的十二大报告的第二、三、四、五部分，讲的是我们党今后的任务，也可以说是我们党今后要贯彻执行的政治路线。第六部分，是讲要实现上述政治路线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题目是“把党的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我们要按照这条组织路线把党的建设搞好，以保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证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对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关系，讲得很清楚。政治路线的正确或者错误，同党的建设的发展或者后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互相影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反面经验，“文化大革命”前几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正面经验，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个真理。十二大所确定的宏伟任务，能不能完成，取决于我们党是不是能够把自己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如果我们能够把党建设成这样的坚强核心，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十二大所规定的宏伟任务，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十二大展示了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前途。这一光辉前途吸引着我们，鼓舞着我们，也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搞好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

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将达到十二亿。在以后的十八年中，要把增长的人口力求控制在两亿以内，做到少生、优生、优养、优教，是不容易的。同样艰巨的任务是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平均每人二千三百多元。我们职工的平均收入，一九八〇年每人每月六十三元五角，全年七百六十二元。按照一个职工赡养一口人计算，平均每人是三百八十一元。有个国际性组织到中国考察，认为我们职工每人每月的收入不是六十几元，而是一百六十元左右。他们是把我们国家用于职工的各项补贴、公共福利、社会保险，以及职工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得到的好处，综合起来算的。在建设高度

物质文明的同时,我们还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到本世纪末,争取消除文盲、半文盲,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觉悟、道德水平和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将大大提高。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同外国人谈话,特别是同美国人谈话,经常讲这个道理,说我们现在确实还穷,军事技术也不算先进,可是中国有十亿人口,人民又是团结的,因此,在国际事务中的份量是谁也不能够轻视的。十二大的任务完成以后,我们就不仅以人口众多、人民团结这个份量在国际事务中引起重视,而且会同时以人民生活普遍富裕、精神境界很高这样一种状况居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到现在为止,我国城镇的工资劳动者是一亿一千万人。如果每年增加就业三百万人,今后二十年城镇要增加五六千万职工。在农村,由于经济的发展、分工的进步、大批小城镇的出现,将有相当多的农民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转化为乡村或者小城镇的工资劳动者。现在全国有五万四千多个公社。到本世纪末,如果每个公社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工资劳动者以一千人计算,那就有五千四百多万人。就是说,到本世纪末,工人阶级队伍要达到两亿以上。我们翻两番,一半要靠技术进步。以后的十年、二十年,我们不仅要不断提高技术装备水平,而且要使工人阶级能够掌握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使其中相当多的人掌握九十年代的先进技术。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最有前途的阶级。随着工人阶级所从事的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他们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所起的重大作用,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我国农村目前大半自给的、劳动力主要从事种植业的状况，将会得到很大的改变，从事林业、牧业、渔业、养殖业、副业、商业、服务业和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的政策不主张农村人口大量地涌进大中城市，而是主张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人口留在农村，“离土不离乡”，离开土地的经营，但是留在农村从事种植业以外的各种各样事业。到本世纪末，在广大农村，将有大量新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先后涌现出来。毛泽东同志五十年代后期曾经设想，要把每个公社的所在地建设成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可以相信，到本世纪末，在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力争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科学下乡，文化下乡，农村各种建设事业的发展，将会促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逐步缩小。这些年来，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创造和推广，表现了广大农民的首创精神。这种首创精神，在今后农村的发展中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它在改变农村面貌上，过去已经起了很大作用，今后还会起更大作用。中国广大农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

我们的军队，到本世纪末，数量不会有多少增加，但是政治素质、军事素质、科学文化水平都会比现在大为提高。那时，可以有比现在更多的钱来搞国防建设。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的任务肯定能够实现。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国防、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我们的幼儿教育现在还很落后，托儿所、幼儿园办得很

少，从事幼儿教育的老师、保育员很多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今后十几年中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的文化教育一定会相应地得到发展。到本世纪末，要努力使学龄前的六七千万儿童受到正规的幼儿教育。一九八五年，争取全国绝大部分县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城市普及初中教育。一九九〇年以后，全国城乡都将普及小学教育，农村也将逐步普及初中教育。初中毕业以后，应当受到定向教育。要实行中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城乡各种职业学校。这些职业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在从事各种职业以前，就能初步掌握将要从事的工作所需要的文化、技术知识。今年大学招生三十一万。大学招生大体上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左右。这样计算，到本世纪末，一年招收的大学生就达到一百二十万左右。现在全国小学、中学、高等院校在校的学生是二亿一千万人，到本世纪末如果达到三亿人，十二亿人口中间就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学校接受教育。在这十几年中间，要采取多种办法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不断补充新的教师，扩大教师队伍。如果这样，整个国民教育水平就会比现在大大提高。

这里说一点知识分子的状况。到现在为止，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大专、中专毕业生将近一千万人。以后大、中专毕业生会比现在成倍增长。现在全国每十万人中间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六百，按照保守的计算，到本世纪末应该达到一千万人。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世界上发达的国家比，这个数字不算高。但是，从绝对数字来讲，到本世纪末，

我们就会有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加上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上党领导的正确，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对于科学研究事业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必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知识分子把智慧贡献出来，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对于这个情况，绝对不能低估。

现在全国的干部有一千九百多万人，其中包括九百万大中小学教员、文化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体育工作者、经济管理人员等。全国党委系统的干部五十多万，群众团体的干部不到二十万，国家机关的干部三百多万（其中还包括一些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总的说来，我们机构要精简，有的也要补充一点。教员、医务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者、经济管理工作者，其中包括会计师、经济师、工程师等，从我们事业的发展来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今后有的要成倍增长，有的增加一倍还不够，拿大中小学教员来讲，如果在校学生达到三亿，按师生的比较合理的比例，至少需要二千万，可能到本世纪末我们还达不到。我们现在要求领导干部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将来应该要求所有干部都能达到“四化”。录用、选拔干部要考虑是否具备“四化”的条件。最近中央在几次会议上又反复强调，对各级在职干部一定要严格实行定期轮训制度。首先要做到每个干部三年左右轮训一次，以后还要经常轮训，以适应知识更新的要求。

我们要在全社会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新型社会关系,使国内各民族之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干部群众之间、军民军政之间以至全体人民内部,都能团结一致、友爱互助、共同奋斗、共同前进。这种新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必须充分发挥各种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经过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到本世纪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大大进展。作上面这些简单的、粗略的展望,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前景是光明的、美好的,当然任务也是既宏伟又艰巨的。但我们相信,经过艰苦努力,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要在中国实现这样宏伟而艰巨的任务,是任何其他政党都承担不了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承担。我们党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任务,也有信心完满地实现这个任务。正是为了完满地实现这一任务,十二大不仅提出了建设的纲领,而且适应建设纲领的需要,提出了建党的纲领。

第二个问题,提高实现建设纲领和建党纲领的信心。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要提高实现建设纲领的信心,首先要提高实现建党纲领的信心。现在党内也好,党外也好,对于我们能不能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能不能保证新党章的执行,绝大多数人是有信心、有决心的。信心问题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不能光讲空道理,必须尊重事实,让事实来说话,才是最有说服力的。那么,事实是什么呢?我们有信心的根据是什么呢?只要回忆一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的情况,加以对比,我们就可以确

认,由于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国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十二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说明这些事实,认识这些事实,信心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前不久有一家日本报纸评论说,在世界经济萧条中,唯有中国的经济扬眉吐气。联邦德国有个政治家讲,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一九七九年五月,我们提出实行经济调整的方针,不少外国评论家曾经说过各种各样挖苦、讽刺、讥笑的话。可是经过不到四年时间,他们的调子就改变了。他们的困难没有解决,而我们的困难已经得到很大的克服。他们没有找到出路,而我们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政治上,十二大所实现的新老交替和合作,外国人也承认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我们领导的连续性,政策的稳定性,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政局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上这些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广大党员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些变化能够自然而然地出现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各项事业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最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是有战斗力的。

这里联系到对党员状况的估价问题。据这次大家讨论中反映,以及会前中组部和中宣部对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党员状况的调查,党内的状况大体上是:能起模范作用的党

员大概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基本不合格和完全不合格的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所谓不前不后处于中间状态的占百分之五六十或者六七十。对于这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党员，要看到他们不够的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面，但是确实也要承认，在这三年多来，总的说来这些同志是跟着党走的。他们不前不后，但没有拖后腿，没有倒退，总算跟过来了。他们的模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党组织对他们教育不够。在讨论中间，山西的同志讲了个例子，很有代表性。一个老党员多年不太起作用，支部书记就去找他谈话，说你这个党员不起作用，索性退党算了。他说，庄稼长得不好，我们还知道加点肥料，你看到我这个党员不起作用，你该帮助帮助我嘛！你帮助过没有？支部书记只好说，我没有帮助。有的党员承认自己确实没起作用或很少起作用，可是他反过来问：支部领导给我们谈过应该怎样起作用没有？这一说，支部书记就傻眼了。湖南长岭炼油厂原先也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即大约一千一百名党员处于不前不后的状态，经过党组织的工作，一千人转变过来了。这两方面的事实都说明，很多党员处于中间状态，不前不后，主要原因是各级党组织没有或者很少对他们进行教育。要把党的建设提到重要的位置，要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长岭炼油厂的经验说明，中间状态的党员，经过教育是可以迎头赶上来的，是可以振奋起来，起到党员的模范作用的。黑龙江省的经验也表明，许多基本不合格的党员，经过我们的说服教

育工作,有相当一部分同志逐步转到合格这个方面来。党员教育工作做好了,中间状态的可以变成先进,落后的也有一部分人可以跟上来,先进的可以更加先进。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有充分的信心把党建设好,使新党章得到实现。这是我们党的主流方面。

当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不加掩饰地承认,我们的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党内还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需要整顿。党内也确实混进了极少数的坏人,也确实有少数原来合格的党员,因为受到各种各样的腐蚀,蜕化变质了。如果不争取党风根本好转,如果不进行整党,如果不把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状况加以改变,如果不有效地加强党员教育,如果不大大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全党同志的觉悟,尽管新党章很好,也可能成为一纸空文。那么,我们党就担负不起、完成不了十二大所规定的宏伟任务。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决心做好党员教育工作,做好整党的工作。

第三个问题,新党章要系统地学,也要有重点地学。

省、市、自治区的同志说,前一段主要是学了十二大的报告和几个讲话,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学习党章。看来,需要集中一段时间,组织党员系统地学习新党章,使每个党员对新党章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要经过学习,经过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自觉,激发他们的热情,争当合格的共产党员。

同志们希望有一个教材。中宣部和中组部从一九八〇

年开始，就在编写党章课本，现在正按照新党章进行修改。然后再请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修改，或者以这个做基础，结合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内的情况，分别写出适合于农民党员、工人党员的通俗性的党章课本。

系统学习新党章，不是一次两次可以完成的，要反复学，不断地有所提高。但是，每次学习又应该结合不同时期的情况有所侧重。中央正式部署整党之前，我们的工作很繁重。这次党员教育的目的是为整党作好思想准备，所以学习重点应该使每个党员懂得他是否真正符合党章所规定的条件，能否充分履行党员的义务。有的地方学习新党章时进行三对照，即对照党章、对照先进党员、对照自己的入党誓言，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如果不合格，认真考虑应该怎么办。为了做好整党前的思想准备，在系统学习党章的同时，要重点学好党章的第一、二、三、四条，以及其他各条中与这四条关系比较密切的内容。要认真地学，深入地学，扎实地学。经过学习，使每个党员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要下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这里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提出来和同志们一起讨论。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这本来是一个常识，许多书上已经讲清楚了，问题是我们的宣传教育不够，以致相当多的党员还了解得很少、很浅，

甚至不大了解。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上下两篇文章。民主革命是我们党的最低纲领；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党的最高纲领。现在民主革命的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早已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早已完成了。目前，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二大文件里，把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把现阶段的总任务称作最低纲领是不妥当的。这虽然是一个用语问题，但它的确是涉及到能否正确地概括和反映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客观进程的原则问题。

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要使每个共产党员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里要进行两个比较。

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有些年轻人只从现象看问题。他们说，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些东西，例如贪污盗窃、走私贩私、杀人抢劫、歧视妇女这样一些现象，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同样存在。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可是，在现象的后面隐藏着很重要的本质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现象的根源，就是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去掠夺大多数人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罪恶，根子都在这里。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是资产阶级法律的核心内容。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各国是合法的，从这个合法的根源所产生的一切社会祸害，尽管他们也

想加以惩治,但是终究无法根除。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祸害,从根本上说,是旧的剥削阶级残余的影响,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它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根本对立的。在我们社会里,不论用何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不论以何种形式进行剥削(贪污盗窃按其本性来说也是一种剥削)和侵吞公有财产,都是不合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搞走私贩私、贪污盗窃的人,一个时期可以很神气,好像神通广大,但是终究要暴露。一旦暴露,他们就非倒霉不可。这些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昨天是阔佬儿,今天就要变成人民民主专政的阶下囚。因此,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时候,要把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比较。

还有一个比较,就是把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相比较。这两个阶段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原来的剥削阶级不再存在了,但是,还有阶级差别。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切阶级差别都要消灭。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公有制,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的个体经济、少量的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只有单一的、全社会的公有制,按习惯的说法,叫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全社会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在这点上它同初级阶段大不相同。初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两者发展程度的不同、成熟程度的不同。当然,认为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一点共产主义的

东西都没有，这是不合乎实际的。事实上，在初级阶段，各条战线上都大量涌现出为社会为人民献身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身上就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

为了使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能够更深入，使党员的觉悟得到提高，进行这两种比较是必要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应该成为我们今后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应该把这种研究和宣传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二，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劳动。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只允许全体成员之间进行等量的劳动交换。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其他先进分子，应该为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而奋斗。共产党员应该始终用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态度去劳动，必要时还要自觉自愿地进行没有定额、不计报酬的劳动，并且带动愈来愈多的群众进行这样的劳动。实际上，在共产党员中间，在先进分子中间，已有不少人多年来都在从事这样的劳动。马克思讲过，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人们把劳动不仅是看作谋生的手段，而且看作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里讲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和全体社会成员的觉悟已经达到的程度。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间，是不是已经有不少的共产党员，不少的先进分子，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精神境界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现实生活中间的例子是大量存在的。就拿在座的同志来讲，到这里开会，没有什么星期天，没有什么假期，工作一紧张，超过八小时，都很自然，没有任何一个同志提出应该多付给他报

酬。在我们的工人、农民、战士、干部、知识分子中，自觉自愿地从事这样一种没有定额、不计报酬的劳动的，何止成千上万。在我们共产党员中间，要严肃批评那种按酬付劳的雇佣态度。这种态度是同共产党员的身份根本不相称的。

第三，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提倡和遵守的只能是社会主义道德，不能是共产主义道德，不赞成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行共产主义道德。理由是，现在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言论行动，超越了阶段。只要回顾一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同他们一起战斗的许多共产主义战士，就已经用共产主义的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动。一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同时代的革命先辈的书籍里，这种事实的记载很多很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列宁、斯大林和俄国许多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也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我国，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许许多多牺牲了的革命先烈，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里，我们的革命前辈，我们的革命先烈，都能够而且模范地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言行，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提倡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行为，倒成了超越阶段吗？

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道德，从根本上说是统治阶

级利益的反映。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道德应该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和领导力量的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映。我们不能把道德看成一种抽象的、玄而又玄的东西。道德问题是要经过自我修养,但是,它终究不能离开实践,要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要在他的行为中间以及语言文字中间表现出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共产主义道德还是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很重要的一点,就看他在处理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上态度对还是不对,是好还是坏。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讲了共产党员要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以后,主要篇幅是讲怎么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这次学习新党章,应该重新鲜明地提出,共产党员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有没有共产主义思想,首先看在处理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上是正确还是错误。这在新党章的有关条文中已作了明确的规定。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和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邓小平同志说过,实行对外开放,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会进来;对内搞活经济,也有一个限制什么,限制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今年初,中央在全党面前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资本主义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在这个斗争面前,共产党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要“拒腐蚀,永不沾”。讨论中间同志们提到,城市也好,农村也好,有些政策还要放宽;如果进一步放宽政策,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办?如果允许共产党员参加这些活动,是不是参加这些活动的共产党员,

个个都一定要蜕化变质呢?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教育,在于每个同志的共产主义觉悟。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的革命活动和科学研究,曾经违心地替他的父亲去经营一个企业,当代理人。我们党在地下斗争的年代,有的同志就办过工厂、开过商店、当过老板。现在的情况和地下斗争的时候完全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共产党员不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要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都不能降低自己的水平。在放宽政策、从事为政策许可的经济活动的时候,决不能唯利是图、伤天害理,而要时刻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要走和群众共同富裕的道路;自己的经营情况,包括利润的多少,不向党隐瞒,要按照法律规定纳税,甚至于多交点党费,想办法从自己的收入中间拿出一些来帮助困难户发展生产。比如,买来拖拉机,总应该设法帮助周围困难户代耕;代耕的时候不要多赚人家的钱,收点成本费就可以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不应这样做呢?我想是应该这样做的。只要努力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还可以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第五,在民族地区的共产党员中间,要反复地、经常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的教育。毛泽东同志一九五〇年说,要孤立民族反动派,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培养大批共产主义的民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建党、教育党员,这至今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民族地区,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民族包括汉族的党员,首先是党员干部,能够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来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要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要坚持宗教和政权分离,宗

教和教育分离，反对宗教干预政务、干预教育。这在即将通过和公布的宪法中间，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个民族地区的党员，包括汉族的党员，都必须模范地遵守和执行。

第六，这次中央、国家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实行新老交替，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重要原因之一，是老同志表现出了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他们顾大局，看得远。他们入党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做官。特别是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前入党，那时没有想到入党以后要做什么官，而是为了共产主义，为了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为了后代子孙，随时都准备牺牲，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他们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胜利，但是自己能不能够看得到，谁也不知道，没说看不到就不干。这些老同志，当革命需要他们承担领导工作的时候，他们没日没夜地在领导岗位上勤奋工作；当革命继续向前发展，需要把中青年干部提到领导岗位的时候，他们又自愿地退下来，扶助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胡耀邦同志说，机构改革，主要依靠在台上的老同志。老同志带头宣传和落实中央的方针，考察、推荐和支持优秀的、年富力强的同志上台。小平同志讲，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如果履行不了，履行不好，我们老同志就要犯历史性的的大错误。事实证明，我们的老同志履行了而且还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现在各省、市、自治区的机构改革已经提上日程，接着地、县也要开始。全党全国将有大批老干部退居第二线或者第三线。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要有共产主义精神；退下来以后，仍然需要保持共产主义精神。人退休、离休了，并不是说可以

不要共产主义精神了。相反，必须继续履行入党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词。究竟我们的老同志有没有共产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精神旺盛不旺盛，这次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考验的结果，绝大多数是够格的。但是考验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进行。因此，准备退下或者已经退下来的同志，要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也是这次党员教育工作的内容之一。

大批老干部退下来，在我们党组织面前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怎样安排离休退休的同志从事适当的工作。根据现在的情况，到一九八五年，抗战时期入党的同志大部分都要退下来。忙了大半辈子，退下来以后闲不住，总还想做点事。现在医疗卫生条件越来越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政协里老早就有这样的话：“七十八十多来兮，五十六十小弟弟。”六十岁退下来，活到八十岁还有二十年，活到七十也有十年。党组织如果不安排适当的工作，这些同志会感到精神没有寄托，对于革命事业也是一种损失。要想各种办法使这些同志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贡献。胡耀邦同志在五省调查期间说，许多老同志退下来以后，可以做很多事。至少在五年之内：一是帮助搞机构改革；二是帮助搞整党；三是参加全面的经济改革，做调查，提意见。这些同志即使退到二线三线，还是可以参加调查研究，参加设计，提供经验，教育青年，教育群众，教育干部。在中宣部和中组部前些日子召开的宣传文教干部管理工作座谈会上，我们根据宣传文教战线的实际情况列举了一些事，可以吸收老同志中间的一部分人参加：第一，职工教育，包括职

工和干部的在职教育；第二，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参加这个或那个学会的经常工作；第三，胡乔木同志提议，编一部《当代中国》大型丛书，各部门、各地方都写，研究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帮助人们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老同志可以做很多工作；第四，宣传文教部门的调查研究；第五，当报告员、宣传员，参加宣讲工作；第六，联系宣传文教部门的一个基层单位，比如一个广播站，一个托儿所，一个学校，一个剧团，等等。当然还可以列举很多。以后组织部门在办理每个同志离休退休的时候，要征求离休退休同志的意见，看他们愿意和能够从事什么工作，由组织部门介绍到有关单位去，并且经常关心他们工作的情况。

第七，新党章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1】}这是新党章总结我们党执政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所增加的重要条款，是新的情况下搞好党的建设的很重要的规定。其他有关条目，把这个意思更具体化了。共产党领导全国政权，共产党员中间有很多人走上了领导岗位。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的确有的共产党员经受不住考验，翻了车。在执政的情况下，每个共产党员都面临一个很大危险。什么危险、什么问题呢？就是上述条款的反面，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特权。所谓党风不正，所谓党风没有根本好转，大多数问题都与此密切相关。不但当了领导可以谋

取私利和特权，即使不当领导，只在某一个方面有点权，也可以谋取私利和特权。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我们应该由此得出教训，引以为戒。可是，我们不能同意一种错误意见，即认为共产党执政以后，不是某几个人、少数人，而是党作为整体，或者就其基本的方面来说，会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个新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进行过多次严重的争论。无政府主义者把国家看成祸害，主张废除一切国家。列宁反驳他们，重申马克思主义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观点，提出无产阶级国家只能“自行消亡”。不能因为执政以后产生官僚主义，有人变质，就因噎废食，取消、废除无产阶级国家机器。自己解除了武装，必然给敌人帮忙。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代表组成的政府机构，像列宁讲的，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国家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为了避免官僚主义甚至蜕化变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自下而上地监督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新党章和新宪法，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权利的规定，比过去充分得多了。每个共产党员，有责任保证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这同样是有没有共产主义信念的问题。一个共产党员，要始终想到入党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身体力行，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谋取私利和特权。党章中关于党员义务的规定，党员权利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条款的规定，就是要求共产党员在一切

言论和行动中坚持共产主义精神。如果这次对新党章的学习，能够把这些条款里所包含的内容学好了，大多数党员，特别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党员，一定会提高自己的觉悟，互相勉励，互相督促，互相帮助，争当合格的共产党员。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这次整党以前的党员教育真正为整党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第八，现在广大群众特别是先进分子都熟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因素就在我们身边。”报纸上也陆续报道这方面的活动，意思是说，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它不是空想。我们自己，我们周围的人，很多都在实践共产主义。我们的宣传工作，我们的说服教育工作，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果说在这方面有缺点的话，恰恰是不会用身边的、用日常生活中的大量事实，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的文章，我们的讲话，是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但是讲的那些道理，工人、农民听不懂，或者听起来没有味道。因此，我们的宣传工作人员确实有一个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的问题。不仅要学习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实践，而且要学习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语言。

第四个问题，党员教育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各级党的领导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重视党员的教育工作。如果党员合格，可以正确地反映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群众的要求、群众的困难、群众的经验，党的领导就有科学的依据来制定、完善党的方针政策；正确的方针政策制定以后，有几千万合格的共产党员在各项工

作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又经过他们向群众做工作,团结群众同他们一起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我们的各项事业就必将取得更加伟大的成绩。所以,要实现党的正确领导,不抓紧对几千万党员的教育工作,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

这几年来,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合乎民心,合乎党心。清查“四人帮”残余分子,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使党的组织比过去纯洁了一些,都是整党的必要步骤。这一段时间,党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花了相当大的力量来进行新老交替和合作的工作,这也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班子搞好了,经过他们来领导将来的整党,就不至于出现大的偏差,能够按照中央的要求顺利进行。但是,相对地来说,党员教育工作仍然是我们党的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现在确有必要下决心认真改变这种状况。

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为了做好党员教育工作,需要解决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搞清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点或关键是什么。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批评了“把行政方法搬到党内,用行政的方法代替党内有决定意义的说服方法”的缺点,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具有自动精神的党组织变成了空洞无物的文牍主义的机关。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他说:“说服方法是党领导工人阶级的基本方法”【2】，“党应当每天每天取得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任,

应当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博得群众的拥护，党不应当命令群众，而首先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易于根据本身经验来认识党的政策的正确”【3】。这就是说，无论在党内，无论在党和群众之间，都必须进行说服教育的工作。斯大林多次强调，不能仅仅用命令和指示来领导，简单的形式主义的领导只能引起不满，“为什么呢？因为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需求提高了，工人们对我们工作的缺点更敏感了，工人们的要求更严格了”【4】。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说，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还没有决心，还不愿意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所谓耐心地等待，不是说不做工作，而是要经过我们的说服教育工作，使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应该领导群众去进行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形式而遭到失败。

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发挥全体党员在一切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的先锋模范作用。”【5】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当

然要对各方面的工作和各项生产建设事业进行领导，而这种领导要充分有效，就必须熟悉业务，结合业务进行。但是，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对于干部的选拔、分配、考核和监督，不应当等同于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挥。党不应当包办代替它们的工作。只有这样，党才能保证政府和企业独立地、有效地进行工作，自己也才能集中精力研究制定重要的政策，检查政策的执行，加强对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6】

所有这些，中心的意思就是各级党组织要摆脱日常行政事务，腾出手来用更多的时间把党管好，把党员教育好、管理好，使几千万党员都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并且团结几千万共青团员，结合各项业务，向广大群众做好思想工作，以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样，任何困难我们都能克服，任何敌对势力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任何艰巨的任务我们都能胜利完成。

注 释

- 【1】 《中国共产党章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
- 【2】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1页。
- 【3】 同上书，第42—43页。
- 【4】 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3页。

-
- 【5】 《中国共产党章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9 页。
- 【6】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72 页。

中国青年的道路： 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同志们正在学习党中央向大会的祝词和团中央向大会的报告。我是三十年代的共青团员，今年六十七岁了，很高兴同当代的共青团员一起学习、讨论祝词和报告。报告已经大会通过并已正式发表，可是还有一个加深理解、广泛宣传的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说一点个人的想法，供同志们参考。

报告说：“我们这一代青年是跨世纪的一代。在我们生命火花最明亮、最炽热的二三十年里，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阶段。”【1】这段话，我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加深理解：一个方面是大家年龄的逐渐增长，另一个方面是历史使命的日益繁重。

先说前一个方面。团章规定团员的年龄是十四周岁以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上,二十八周岁以下。现在十五岁的团员到了本世纪末是三十三岁,到二〇二七年的时候,是六十岁。现在二十八岁的团员到本世纪末是四十六岁,到二〇一四年的时候,是六十岁。这就是说,到下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你们都将成为六十岁以上的人。在这二三十年到三四十年中间,你们应该、而且必将成为我们国家各条战线的各级领导骨干。

再说后一个方面。这次团代会提出的近期的、也就是五年的任务是:“为着四化建设而英勇劳动,根据四化需要而勤奋学习,适应四化要求而开创新风”【2】。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产值翻两番,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任,将越来越落在你们的肩上。按照我们党的规划,到本世纪末,我们所实现的四个现代化还不是高度的现代化,还只是一定程度的现代化。这个世纪完了以后,还需要经过二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够使我们国家达到高度的现代化水平。那时,现在六十几岁的人都已经不在世了,这个重任将靠你们来承担。

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够更明确地认识到,随着你们年龄的增长,思想水平、知识和技术水平以及工作能力的不断提高,所承担的任务也一定会越来越重。今后的三四十年,将成为你们大有作为,大显身手的三四十年,也是你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三四十年。你们的成长,你们的努力,将决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样来看问题,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代青年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光荣感。

八十年代是新老交替、新老合作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的年代。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满腔热情，高度负责，有条不紊地把一批又一批中青年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自己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退居第二线或者第三线，向中青年交班。交个什么班呢？就是在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之后，把集中全力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重任，交给中青年干部。现在事实证明，以后的事实还会证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确实不愧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党在政治上是高度成熟的。

今后的三四十年，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来说，是最关键的三四十年。如果大家的工作做得好，那就可以完成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

那么，青年一代靠什么使自己能够成长得越来越符合时代的要求，靠什么去胜利地完成时代所赋予的重任呢？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党中央在十二大报告中讲的，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也就是祝词中所说的“科学信念”。因此，需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用共产主义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指导自己的一切工作。

我们的青年团是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次通过的团章，第一条就规定共青团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一个合格的共青团员，应该是青年共产主义者，最低限度应该经过一段学习和锻炼成为青年共产主义者。

下面，想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谈谈共青团员和共

产主义思想体系、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等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是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这已经是历史的结论。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共经历了一百零九年。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对我们进行侵略，压迫中国人民，欺侮中华民族。中国各族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侵略者的抵抗。在斗争中，中国各个阶层都有人挺身而出，为救国救民做出了贡献。第一个著名人物是林则徐，后来有黑旗军的刘永福，甲午战争的邓世昌。那时知识分子中间首先觉醒的人有龚自珍、魏源、严复。后来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开始比较活跃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著名人物有谭嗣同，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和林旭、杨锐等六人被慈禧太后杀掉了，史称“六君子”。资产阶级改良派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起来代替了他们。其中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还有黄兴、女英雄秋瑾，等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民就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著名领袖有洪秀全、洪仁玕，以及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的英雄们。他们的事迹是可歌可泣的，很多人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慷慨悲歌，英勇就义，永远都值得我们敬佩。可是历史证明，这些仁人志士、爱国爱民的人物没有能够拯救中国，没有能够把外国侵略者打败，他们的救国方案都没有得到成功。

五四运动以后，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我们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五四”以前有很多先进人物牺牲了，也有的失败以后继续革命，继续救国，继续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这些人首先接受了这个真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各地纷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不少成员，都经过了在这以前的摸索，经过了反复失败、反复斗争的过程。像李大钊同志、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都是这样的。他们的亲身经验说明，别的道路、别的办法都不能够救中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毛泽东同志早年学习唯心论，后来转到马克思主义。周恩来同志也是这样，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但那时还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在法国才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建党的工作。董必武同志早年是同盟会员，实践使他认识到资产阶级不能救中国，才相信共产主义，参加了党的一大。还有一些早期的共产党员，走过的道路更曲折。朱德同志早年敬仰义和团，因为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的入侵，激起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入云南讲武堂，目的就是为了救国。他不久入同盟会，又入哥老会。他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战争，后来又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但这些都不能拯救祖国。他在上海访问孙中山，孙中山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他，但当时也没有救国良策，而孙中山身边的汪精卫、胡汉民却给他留下很坏的印象。这时，由于香港罢工的胜利

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普遍兴起，他已经有了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但是，当他费很大气力找到党的负责人陈独秀时，却遭到了拒绝。他于是到欧洲，希望在那里充实和提高自己。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中引用他当时的话说：“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旧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一九二二年他在柏林见到周恩来同志，陈述自己的愿望，终于成为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中国最先进的分子团结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力量很小，党的一大到会代表十二人，所代表的党员也只有五六十人。可是，这支在当时就很小的力量敢于向压迫中国的各帝国主义者宣战，敢于向中国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宣战，藐视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够胜利。

自从共产主义传到中国，就产生了共产主义适合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題。围绕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反复进行了大争论、大斗争。首先是北洋军阀，后来是蒋介石，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方针是斩尽杀绝。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有一句臭名远扬的话：对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共产主义者，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搞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抗日战争时期，汉奸卖国贼、国民党的投降派和顽固派同日本侵略者明里暗里联合起来，继续屠杀共产主义者和先进分子。日本投降了，美帝国主义代替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和武装蒋介石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在战场上，在敌人的监狱里，又牺牲了很多同志。结果怎么样呢？反动派杀人越多，越激起更多的人反对

他们。一九二八年被蒋介石杀掉的夏明翰同志，当时只有二十八岁，临刑前留下了四句话：“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们杀了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但更多的共产主义者又重新起来战斗了。共产主义者的鲜血流遍了祖国的大地，渗进了祖国的土地，任什么人都休想挖掉；共产主义者的形象烙印在各族人民的心中，任什么人都休想磨灭。他们用生命写下了历史的结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在科学共产主义的指引下，我们这个民族得救了，我们的国家独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共产主义政党，如果不把维护祖国的荣誉、捍卫民族的尊严作为神圣的职责，没有在自己的斗争中高举起爱国的旗帜、民族的旗帜，那就离开了共产主义的原则，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各个进步阶级、甚至反动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个别人，不同阶级中的一些阶层、派别、政党，都程度不同地做出过贡献，付出了牺牲。但是我们要说，在这种斗争中取得最突出成果、付出最大牺牲和流血最多的，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女——中国共产党人。

第二个问题，矢志救国、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者，经过各种探索，经过各种艰难险阻、曲折失败，在事实的教育下，最后必然会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亲密朋友；沿着这个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自己也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这里举几个大家都知道的人物。

现代中国有两个大文豪，一个是鲁迅，一个是郭沫若。鲁迅年轻时到南京矿业学堂读书，想用实业来救国。后来留学到日本学医。这时正赶上日俄战争，他看了一次电影，看到把中国人绑起来要杀头，围观的中国人体格强壮但是神情麻木。他由此感到，如果不使人民在精神上觉醒起来，仍然不能救国。于是他转而从事文学活动，想用文学唤起国民的觉悟。那时他还相信进化论，相信生物在进步，人类也在进步，后一代人总比前一代人强。他就是以这样一种世界观来参加五四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以后几年的文学活动的。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全国屠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目睹同是青年而分成两个阵营的情形，开始认识到进化论的偏颇，进化论不能救中国。他这时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从此思想转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认识社会，认识到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表现他思想转变的第一部著作叫《二心集》。他在实际斗争中转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同我们党亲密合作，在一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直到逝世。在生命的后期，他的思想、他的著作、他的行为、他的品德，不管哪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尽管他在组织上没有入党。

看了郭沫若同志的自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轨迹。他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曾经有过各种追求。他在《创造十年》中回忆：“早知道爱国，也早想学一些本领来报效国家。”他在四川家乡读小学、中学，已经是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并为此被开除过三次。一九一〇年底，他参加了成都学生的立

宪请愿运动。他热烈地欢迎辛亥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没有拯救祖国，现实使他苦闷到了极点，然后就到日本学医，接受泛神论的影响。五四运动时期，他写了很多充满爱国激情的文学作品，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那时的朋友中，还有国家主义派，有无政府主义者，有浪漫主义作家，有自我表现主义者。他还在交接各种人，进行各种探索。一九二三年，我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给他很大震动。一九二四年，他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久又亲自参加五卅运动，同共产党人有了接触。他参加过北伐，写了声讨蒋介石叛变的名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由于亲身经验，由于实践的教育，最后他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所以，到一九二七年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和一些同志倡导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讨论，影响很大。这以后，他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不论是从事政治活动，还是从事文艺的或学术的活动，直到逝世，始终是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为中国人民忠诚战斗。

当代中国妇女界有两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一个是宋庆龄同志。她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早年在美国留学，相信基督教，毕业后信仰三民主义，成为孙中山先生的战友和伴侣。她帮助孙中山提出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蒋介石叛变，屠杀共产党，她起来抗议。她始终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顾亲朋好友的劝说，不顾蒋介石的威胁、迫害、引诱，毫不动摇，成为共产党最亲密的朋友。

她在上海，是同鲁迅配合行动的。抗日战争中，她支援抗日军民。解放战争中，她支援解放区。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建国后做了很多贡献。她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临终前还提出要求。经过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吸收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经过这样的路、那样的路，她成为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最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妇女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用周恩来同志的话说，是“国之瑰宝”。

再一个是何香凝同志。她参加同盟会，和孙中山先生一起从事反对清朝的革命活动，并同廖仲恺先生结为夫妇。她后来也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右派把廖仲恺先生暗杀了，她继承廖仲恺先生的遗志，继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直坚持到底。虽然她组织上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她一生的言行、一生的活动，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女战士。

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中华民族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各个阶层的人只要真爱国，尽管曾经这样追求、那样追求，这样碰钉子、那样碰钉子，只要坚持下去，必然会成为共产党人的朋友，然后成为共产主义者。

第三个问题，中国共产主义者，包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团结一切爱国者共同前进，风雨同舟，和衷共济，这是我们过去革命能够得到发展、以至于能够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也是今后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得到成功、我们

事业能够向前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中国青年，自五四运动以来，在历次爱国运动的斗争中，都是首先觉醒的部分。经过共青团中央及各级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卓有成效的工作，近年来在我们广大青年中出现了一种非常令人可喜的新趋向，这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多起来了。这种趋向还在继续向前发展。要从本质上、从发展中看我们的青年。当然，要全面地认识问题，那就还要看到：（一）青年共产主义者，或者说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在广大青年中越来越多了，而且最终必然会成为当代青年中的多数，但是目前还不能说已经是多数；（二）青年中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尽管程度不同，他们可以而且一定会成为共产主义的朋友。共青团的各级组织以及广大共青团员，应当在青年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帮助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把个人的命运和前途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结合起来，把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同党的命运和前途结合起来。

向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各种各样的领域，多种多样的办法。要善于从青年的思想和行动中间，发现他们身上存在着的爱国主义的“触发点”、“闪光点”。青年人的觉悟程度、经历、爱好、愿望是各种各样的，要把他们的爱国热情激发出来，需要充分考虑每个人的不同情况。一件事，一个人，一本书，一个电影，一次活动，只要善于引导，都可能触发青年中本来蕴藏着的爱国主义热情。我一九三

一年从湖南到北京，恰好碰上九一八事变，两三天内，东北三省广大土地被日本占领了，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当时我参加游行，参加抵制日货的活动，那也是爱国的表现，但基本上是随大流，自觉性、主动性是不够的。一九三三年长城事变，日本的飞机天天在北京上空回旋。我们的学校是一个美国的教会学校，校方害怕日本飞机的炸弹，就在教室楼顶铺上一面美国旗。顶着美国旗帜在中国读书，使我感到受了很大侮辱，从此觉得不能把爱国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要寻找新的道路。这也算个“触发点”吧。我们工作做细一点，就可以找到每个青年的这种爱国的“触发点”、“闪光点”。要去发现，要做耐心的工作，要跟他们交朋友。发现了以后，再加以引导，使他们得到提高。

每个爱国者，都想寻找他认为有效的爱国的道路、爱国的方案。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有这个问题。他要自己去探索，以至于碰钉子，然后才能接受真理。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绝不要指责，绝不要歧视。要允许他们探索，要与他们商量。这个方案不行，那个方案不行，道理何在？要使他们心悦诚服地同我们一起走上正确的爱国道路。

共产主义者应当是胸怀非常广阔的人。李斯的《谏逐客书》里有两句话：“泰山不攘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共产主义比泰山高大得多，比大河大海深广得多。它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只要是爱国的人，不管他今天的状况如何，只要做了一件爱国的事，做了一件对国家有贡献的事情，都应该肯定，都应该团结。即使过去做了

坏事的人，只要改恶从善，我们就不应嫌弃他们；只要弃旧图新，我们就不应疏远他们。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人总是越多越好。同样，爱国的人也是越多越好。我们要有这样的胸怀，要学会这样的本领。

第四个问题，我们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已经指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但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但是还必须看到，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从来都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充分考虑，爱国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爱国，历史内容都不同。所以，我们的爱国主义要有坚实的基础，就必须考察我们这个国家的现状，考察我们国家现在正处在什么历史阶段上。我们现在的祖国不但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也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我们已经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阶段的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就更不能够分开，更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一个什么阶段的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批评了“共产主义渺茫论”。有的同志或许会讲，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实践虽然不渺茫，但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还相当渺茫。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初级阶段，一个高级阶段。如果讲高级阶

段，我们确实没有实现，那是还要经过几代人努力奋斗的。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制度已经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上的社会制度。

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要使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认识到，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要把这个阶段的情况认识得很清楚，需要进行两种比较。

一种是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最重要、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大多数人的剩余价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经过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也出现了各种祸害。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剥削阶级残余的影响，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必然产物。在我们的社会里，不许用任何方式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不论以何种形式侵占公有财产，都是我们的法律不允许的，都要受到制裁。搞走私贩私、贪污盗窃的人，一个时期可以很神气，好像神通广大，但是终究要暴露。这些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昨天还是阔佬儿，暴露以后就一定会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阶下囚。

青年同志很幸福，生长在红旗下，但是不清楚旧社会是什么样子，什么叫做剥削，剥削给人民带来的是一些什么痛苦。对于剥削制度下人民受到的蹂躏和侮辱，青年人毕竟没

有切身的体验。对新社会好，旧社会坏，没有感性的比较。有的同志就觉得好也不过如此，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影响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再就是把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进行比较。这两个阶段，有很大不同。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不再存在了，但是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存在，社会上还有阶级差别。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切阶级差别都将消灭。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公有制，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当前还有相当数量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共产主义社会就只有单一的、全社会的公有制了。都是公有制，但程度、性质却不同。初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高级阶段要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尽管有这些不同，但这是同一个社会形态里两个发展阶段的不同、成熟程度的不同。认为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一点共产主义的东西都没有，是不合乎实际的。事实上，在初级阶段就有大量的共产主义因素在不断产生、日益发展。各条战线上大量涌现的为社会、为人民献身的英雄模范人物的身上，都闪烁着共产主义的光辉。我们的代表中间，就有很多这样的同志。从历史发展来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经过革命是不行的。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也还需要革命，也还需要保持革命精神，其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斗争，但这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要发展生产力。这个问题，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已经说清楚了。这两种过渡，性质上有

根本区别。

第五个问题，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按劳分配的关系。

这是我们每个同志天天都会遇到的问题。共产主义的劳动，像列宁说的，是没有定额、不计报酬、自觉自愿的劳动。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这两者的联系，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是常见的。八小时工作制就是定额。可是，我们的干部、工人、知识分子、战士超过八小时工作的人很多很多。是不是多干了几小时工作就斤斤计较呢？是不是超过了几小时没有给报酬就心情不舒畅、非多要工资不可呢？大多数同志不是这样想问题的。这叫不叫共产主义劳动，符合不符合列宁所说的要求？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们大会代表中间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物。他们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一年计划的定额，他们十个月、甚至半年就完成了。有的人一年做了几年的工作。昨天有个消息讲，一个工人四年做了十年的工作。还有一个消息讲，有个工人十年做了三十年的工作。最近有一个电影叫《春晖》，里面教员对学生进行辅导和教育，很感人。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的确可爱。他们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技术工作、教学工作、医疗工作等等，很少计较时间和定额，就是一年到头勤勤恳恳地干。只要工作需要，多干几小时，他们照样高高兴兴。罗健夫、蒋筑英，就是这些同志的代表人物。还有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牺牲在战场上，牺牲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们想过自己应得什么报酬没有？从来都没有想过。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我们的社会里，

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人在自觉自愿地从事共产主义劳动。这些同志从不斤斤计较报酬，而是照样忘我地干。这就是共产主义劳动，应当加以表扬。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倾向应当克服。一种是要求所有的劳动者都同样达到先进分子的定额。这实际上只能使先进分子孤立起来，给他们帮倒忙。另外一种倾向，就是用雇佣态度来从事自己的工作。解放初期，我们曾经在工人群众中间进行过反对雇佣思想的教育。工人阶级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决不能用雇佣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不应该采取按酬付劳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劳动。

第六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应该提倡共产主义道德。

胡乔木同志提出，这次代表大会，以至代表回去以后，首先要在改变社会风气上行动起来，尽快取得好的效果。这是离不开共产主义道德的。社会风气的改变，与我们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密切联系在一起。前些年，理论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提倡和遵守的只能是社会主义道德，不能是共产主义道德。理由是，现在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言论和行动，超越了阶段，超越了青年的思想和觉悟水平。只要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可以看出，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和他们一起战斗过的许多共产主义战士，都已经用共产主义的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动。进入帝国主义

阶段以后，列宁、斯大林与俄国的许多布尔什维克，也是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我国，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牺牲了的革命先烈，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面，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我们的革命先辈、先烈，都能够模范地用共产主义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提倡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规范党员、团员和先进分子的行为，反倒成了超越阶段吗？

我想向同志们提供两个我亲身受到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事例。

一个是王震同志。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湖南，同一些知识分子党员跑到武汉。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他担心同他一起逃出来的知识分子党员被敌人逮捕、杀害，所以请他们安心在住处读书用功，自己每天出去卖苦力，拉洋车，做装卸工人，挣钱养活这些知识分子党员。

还有一个是张启龙同志，湘赣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有一次打仗，俘虏了一个姓张的国民党团长。他遵照释放俘虏的政策，把这个张团长放了。当时我们党内有一种“左”倾思想，要追究这个事，说两个都姓张，大概有什么勾结，一下子把他撤职，开除党籍，关进监狱。但他在我们苏维埃的监狱里，却动员人们遵守制度，好好劳动，还组织学习文化。后来长征，对他不放心，

又把他捆起来，派保卫局的人监视着他，要他跟着一起走。因为艰苦，监视他的人也不管了，人们说反正他是个反革命，跑了就跑了吧。可是，张启龙同志受了那么大的冤屈，还一定非要跟着队伍长征不可，拉肚子，也照样每天行军，一直坚持下来，到了陕北。

这都是共产主义高尚道德的感人教材。

我们现在处在和平环境中，有少数同志却一有机会就牢骚满腹。要想想我们的老前辈，想想我们的革命先烈，他们是怎样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模范的共产主义道德，来对待革命事业、对待人民、对待同志的。在道德的修养上，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要向周围的先进分子学习，也建议青年同志交一两个老革命、老干部作朋友，从他们身上学一点革命的精神、革命的信念、革命的道德。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冲击，每当遇到想不通的问题时，就想起了许多老前辈，包括王震同志和张启龙同志的事迹，从中受到鼓舞，得到支持。

这里想连带讲一下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多年来，我们的宣传教育很少讲这个问题，很少讲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甚至必要的时候要牺牲个人利益，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好像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在我们的脑子里已经没有位置了。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道德，从根本上来说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反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道德应该是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和领导力量的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映。我们不能够把道德看成一

种抽象的、玄而又玄的东西。道德问题要经过自我修养，但是终究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它一定要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要在他们的行为、语言、文字中表现出来。有道德还是没有道德，道德好还是道德坏，是可以衡量的，可以检查的，可以比较的。一个人，有共产主义道德还是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在处理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上，态度是对还是不对，是好还是坏。我们不抹煞个人利益，问题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什么位置。如果坚持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之上，总有一天非倒霉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后来的多次讲话中说过，问题是要把个人利益放在大众利益之中，大众利益实现了，个人利益也就跟着解决了。很有必要重新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领会其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我们新通过的宪法作了这样的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3】美国有些法学家看了这一条规定，大为赞扬，说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就没有这一条。他们也不可能有这一条。我们的党员、团员，首先应该把宪法中有关权利和义务的各项规定，作为自己行为的规范、道德的准则。

第七个问题，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和保

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邓小平同志讲过，对外实行开放，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就会进来；对内搞活经济，也有一个限制什么、限制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今年初，中央在全党面前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资本主义腐蚀和我们反腐败的斗争。团内也是这样。在这个斗争面前，共产主义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要“拒腐蚀，永不沾”。今天在座的有铁道部广九二组团支部的代表。这个团支部教育团员青年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在天天有人腐蚀的情况下，二十多年来没有一个青年外逃香港，没有一个青年走私贩私。他们先后拾到港币四千四百多元、美金五百二十元、照相机十四部、手表一块、打字机一台，全部都交了公。二十多年来这个支部换了三代人，但拒腐蚀、永不沾的传统始终代代相传。这些同志保持了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无愧于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光荣称号。

第八个问题，团员不仅要关心团的建设，也要关心党的建设。

团员不仅要学习团章，也有必要学习党章。你们中很多人是未来的共产党员，要向这个方向前进。了解党的建设，学习党章是一种必要的准备。

新党章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4】这是总结了我们党执政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

所增加的重要条款，是在新的情况下搞好党的建设的很重要的规定。其他有关条款，把这个意思更加具体化了。共产党领导全国政权，共产党员中间有很多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这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确实有的共产党员经受不住考验，翻了车。这个问题是我们共产党员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险。在全国执政以前不那么尖锐，而在执政以后，就成为一个普遍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了。什么危险、什么问题呢？就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特权。所谓党风不正，所谓党风没有根本好转，大多数问题都与此密切相关。

为了避免官僚主义，避免蜕化变质，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自下而上地监督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新党章和新宪法，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权利的规定，比过去充分得多了。这次通过的新宪法，外国的评论都认为有很大特色。这个特色就是民主。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责任保证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

这次到会的代表，开完会回去，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坚持党的原则，监督别人不搞特权，不谋私利，自己也不搞任何微小的私利。通过你们的模范行为来影响社会，影响全体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

第九个问题，共产主义因素就在我们身边。

这是广大群众特别是先进分子并不陌生的一句话。报纸上也在陆续报道这方面的活动，意思是说，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并不是空想。我们自己，我们周围的人，很多都在实

践共产主义。这几年来，广大团员、青年中，学习之风正在兴起，思想信仰更加坚定，道德水平正在升华，劳动热情正在增长。我们希望全社会，特别是我们的文艺界、新闻界、理论界和教育界，都对青年的健康成长负起责任来，积极宣传青年中间层出不穷的共产主义的创举。在“五讲四美”活动中，全国出现了五十多万个学雷锋小组、贴心人小组、青年服务队，还有农村中的青年助耕队，等等。这些青年不计报酬，不讲定额，自觉地助人为乐，做了无以数计的好事。这的确是“五讲四美”活动中的明珠。群众把青年们的这些活动，亲切地称为人与人之间热的交流。青年们的这些业绩，已经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承认，已经得到全社会的承认。老一点的同志谈起这些事，都为青年一代的迅速成长感到高兴，感到鼓舞。我们的青年，的确是创新风的先锋。这说明，各级团组织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我们的几千万共青团员、两亿多青年是大有作为、前途无量的。

第十个问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统一的。

共产主义者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环顾世界，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总的说来是向前发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这前后还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出现，逐渐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五十年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蓬勃发展的。后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挫折，损害了共产主义的形象，使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这些挫折，在它还没

有得到克服的时候，确实让人痛苦，使人困惑，遭受折磨。可是，另一方面，这对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锻炼，看你在挫折面前是经得住还是经不住考验。等到我们把这些挫折克服了，就得到了有益的教训，就能使我们的运动更好地向前发展。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这些挫折。为了克服这些挫折，使我们的事业进一步发展，需要做很多工作。有一点大家亲眼看到了，中国尽管经过十年内乱，可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正像同志们讲的，这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党中央、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有回天之力。近两年来，我们的经济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一事实，不但我们在国内生活的人已经感觉到了，就是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都不能不承认。日本的报纸评论说，在世界经济萧条中，唯有中国的经济扬眉吐气。联邦德国一位政治家说，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昨天的《参考消息》登了日本《国际贸易》周报的一篇文章，说我们外汇增加，除了还外债，还有贸易顺差等，认为“中国是佼佼者”。

我们八十年代有三大任务：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集中全力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三项任务的中心。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共产党员有四千万，我们要分期分批进行整党，不合格并且不愿使自己合格的党员要劝其退党。这次团代会后，要按照新的团章进行团的

教育，搞好团的建设。通过整党，通过团的建设，使党员成为合格的党员，使团员成为合格的团员。也许总的数目要减少一点，但是，我们党员、团员政治思想各方面的素质将大为提高。党员、团员合起来八千几百万人，如果都合格，每个人在工作中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全心全意，振作精神，还不能够把十亿人带动起来吗？我们有信心，经过合格党员、合格团员、先进分子团结和带动全国各族人民，把我们的各项事业办好，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这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贡献，也就是很好地履行了我们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发展中应尽的责任。其结果，必将影响和吸引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来，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共同斗争。

以上这些，都是广大团员、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天天可以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可以成为一个题目，就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这起码是五四运动以来，几代青年走过的道路。这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规律，也可以说是当代青年的道路，今后若干代的年轻人也会走这样一条道路。

中央祝词中有一句话：“光荣属于面向共产主义未来的青年一代！”【5】你们加了一句话，概括成为两句话，这就是：“未来属于青年，青年创造未来。”请允许我对你们加的这一句话作一点解释：就是经过你们英勇的劳动，勤奋的学习，养成良好的品德，创造的未来一定会比我们现在好，一定也

会比你们今天好，而且将为你们下一代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美好幸福的未来。我们相信，你们这样崇高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注 释

- 【1】 《团结各族青年，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前程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82年12月25日第2版。
- 【2】 同上。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82年12月5日第1版。
- 【4】 《中国共产党章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
- 【5】 《殷切的期望》（在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日报》1982年12月21日第1版。

把宣传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思想结合起来*

(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

把“五讲四美”、“三热爱”(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把十二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同“五讲四美”结合起来的一个重要途径。进行持久的、广泛的、深入的爱国主义宣传,同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可以结合得很好。

下面讲几点意见,和同志们共同商量。

第一,中国共产主义者是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这已经是历史的结论。五四运动以来,几代人走上革命道路,绝大多数都经历了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程。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爱国,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卖国贼。历史证明,不是别的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才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卖国贼的最坚决最热诚的爱国主义者。解放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时期,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蒋介石,也不是其他的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人才是最坚决的、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至于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就更不用说了,站在最前线,牺牲最大,流血最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站得住,之所以能够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信任的领导核心,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六十多年以来,直到现在,都是以争取祖国的独立,维护祖国的荣誉,争取民族的解放,捍卫民族的尊严,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的。从我们党产生的那天起直到现在,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哪一个党、哪一个党的党员,维护祖国的荣誉,捍卫民族的尊严,最坚决、最勇敢、最忠诚?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也证明,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如果不把维护祖国的荣誉、捍卫民族的尊严作为神圣的职责,如果不在自己的斗争中始终高举起爱国的旗帜、民族的旗帜,那实际上就离开了共产主义的原则。这样的党,在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中,就站不住脚,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地位。

第二,凡是立志救国、始终不渝的爱国者,不管经过多少探索和曲折,经过多少艰难险阻的锻炼和考验,最后必然会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亲密朋友,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自己也会成为共产主义者。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人物,普通的人物,卓越的人物,都大有人在。鲁迅、郭沫若、宋庆龄、何香凝,还有其他人,都是从爱国走到共产主义的。在新疆,我认识了陶峙岳同志。他现在成了共产党员。一九

四九年，我到乌鲁木齐去见他。他对我说，军人嘛！守土卫国！不能忘记袍泽之情。率领的十万部队，究竟将来有个什么出路？他有责任安排得妥当一点。他是爱国的。他后来成了我军二十二兵团的司令员，到了北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许多领导人。他回去讲，湖南出了很多为我们祖国和民族的解放立了大功的共产党人，他很高兴，决心跟着共产党走。这当然还不是共产主义思想，但是他从爱国主义出发，终于成了共产党人的朋友。后来他入党，在申请书里讲了自己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根据他的亲身经验，认识到共产党员是诚实的朋友，真正的爱国者，所以决心加入这样的党。

第三，中国共产主义者，包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团结一切爱国者共同前进。这是我们过去革命能够得到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正确方针，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得到成功、我们的事业能够不断向前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们自己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我们应该团结一切爱国者，同我们一道前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了；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外国居住的中国人也被人看得起了。

第四，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和历史上的情况比，今天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过去是实现民主革命的纲领，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的爱国是爱社会主义的祖国。在这样情况下，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就比过去历史上任何阶

段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从共产主义者来讲,爱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是爱社会主义,就是在逐步走向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同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就必然爱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各族人民是爱国的。台湾、港澳同胞,华侨,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有的人可能不赞成共产主义,或者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在爱国主义问题上,谁如果公然宣称不爱国,就势必立即被全体中国人所抛弃,彻底孤立起来。所以,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宣传爱国主义,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可以得到除了想当卖国贼以外的一切中国人的支持和拥护。尽管有些人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祖国独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我们的宣传工作,我们的出版工作,怎样通过各种方式有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重要问题。不仅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各个学科,要贯穿爱国主义的教育;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各个学科,也要贯穿爱国主义教育。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希望今后安排出版,把这个问题放在脑子里。李约瑟就写了七大卷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的书,用大量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贡献。任何一门学科,都要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爱国热情,而不是有损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

在出版工作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当适应人民中间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教育程度的要求。各

种教科书、幼儿读物、青少年读物，都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这方面还要多动脑筋。小学、中学、大学怎样进行教育，参加工作以后的工人、职员怎样进行教育，农民怎样进行教育，可以开辟的领域非常宽广。举个具体的例子。旅游局出了一本中国旅游词典，列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三千多个旅游点的情况，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是不是可以把各旅游点拍成影片，给人以美的享受。前些日子台湾转播大陆的风貌，大部分利用了这些地方的材料，引起在大陆长大的人的强烈的怀乡感情。拍这种片子，不一定用很多政治语言，但是一定要有感情。我接触过几个孩子，“文化大革命”中间父母亲被冲击，他们十几岁，利用大串联的机会，跑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他们讲，看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培养了热爱伟大祖国的感情。其中有的人读了一点书，走到哪里，知道这是一个大战场，就翻翻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些英雄人物在这个大战场作战，怎么胜了，怎么败了，哪些民族英雄牺牲在大战场上了，就更增加了爱国热情。

胡耀邦同志曾经讲过，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都可以写。我们要认真落实。怎么有计划地把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民族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近代中国史，包括一些爱国志士，为了救国，反复摸索，英勇斗争的业绩，有计划地写这样的书，写艺术作品、写专门的研究性著作、写通俗小册子，有计划地排这样的戏，拍这样的电影，很有意义。这都是我们要认真研究、亟需完成的工作。还要通过文物的发掘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希望各个出版社，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出版社，也包括其他各类出版社，把这当做重要问题研究，切实提上工作日程。

北京航空学院开了一门课，叫中国古典文学选修课。有些学生听了老师的讲授，读了些名诗人、名词人、名小说家、名戏剧家的作品，改变了一个观念。原来以为大文豪都出在西方，没有想到中国也有很多很多，也有这么好的作品，由此增加了热爱祖国的感情。希望出版部门认真规划一下，通过多种多样的领域，多种多样的方法，多种多样的层次，使我们的各种出版物都能贯穿爱国主义的精神、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其他宣传阵地也有这个问题。比如地方的电视台、中央的电视台互相合作，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我们电视台的面貌和对观众的影响，就会大为进步。

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八日)

我赞成成立这样一个研究会,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我想提一个问题,请大家考虑一下。

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特别是在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期,如何处理好党和本阶级——工人阶级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非常重要。这是个老问题了。根据我国的经验,根据外国的经验,怎样处理好这个关系,确实值得研究。

先从反面讲。波兰党的历史比我们党长,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比我们早。他们出了几次事件,最近一次是一九八〇年,到现在快三年了,还没有解决。在这个国家里,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出现了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人反对自己的政府,反对自己阶级的政党的事;党员的相当多数,成为党的反对派。形成这种关系的原因很多,这样一个反面

经验，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们同波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是不是需要从他们的历史教训中吸取一些东西呢？很有必要。我们党执政以后，共产党员当了政府官员，他就可以用行政官员的身份下达命令；共产党员当了企业的厂长、经理，他就可以用厂长、经理的权力下达命令。命令下得好，没有问题。命令下得不好，群众就会联系到政府官员、厂长、经理是党员，再加上党的领导体制、工作方法不妥当，群众就很可能把行政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的错误与党组织搞在一起。这种状况，给我们党的领导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从我们党的状况看，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等领导的一系列改革，按“左”的一套办法搞下去，我们党、政府同自己的阶级、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会怎么样？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认真研究。

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党的领导要注意什么问题，采取什么领导制度，用什么领导方法，都要认真研究。人民内部矛盾很多。解决这些矛盾采取什么方法，是由党委把一切矛盾集中起来解决好，还是在不同范围内分散解决好；分散解决用什么方法、什么形式，都要研究。所有事情都集中到党委来解决，其结果就是使大大小小的矛盾都集中于党委，容易使党和自己的阶级，和人民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因此，各方面要进行改革，领导体制也要进行改革，党政要分工。党委要实行政治和思想的领导；要集中主要力量做群众的工作，反映群众的要求，代表群众的

利益，正确地制定和掌握政策；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方针政策的执行。

共产党对自己的阶级、对广大群众不能强迫命令。党只能说服自己的阶级，用真理，用正确的路线、政策，用党员的模范行动来说服人，使阶级和群众自愿跟着党走，使工人、群众心里有话找党组织讲，找党员讲。现在确实有个别地方和企业，官僚主义严重，老百姓有话没有地方说，使一些坏人钻空子，诱使群众成为这些单位党组织的反对派。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党和自己阶级、广大群众的关系怎样才能处理好，我们党的工作应该怎样做？需要很好研究，需要做很多工作，需要研究出许多办法，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总之，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为本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与他们同命运、共呼吸，要忠实地代表他们的意见，很好地为他们服务。如能达到以上要求，我们党就可以克服任何困难。

关于编辑人道主义问题 研究资料的意见*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今天请同志们来开个会。事情是这样的：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周扬同志作了一个学术报告。他在报告的时候就讲到，他这些意见是探讨，希望同志们提批评意见，进行商讨。听了这个报告以后，到会的同志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既然有不同意见，于是请这些同志在会上讲一讲。当时发言的有四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周扬同志的文章于三月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同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四位同志不同意见的摘要。今后，《人民日报》还准备陆续发表黄楠森、王锐生等同志发言的全文（靳辉明同志的发言已经在《红旗》杂志发表）。

关于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这样展开一下讨论，其中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包括相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一个会上的讲话。

互之间的批评，很有好处。我们想经过这个问题的讨论，能更好地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异化的问题，关于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解，在国内已经进行了几年的讨论，发表的文章也不少了，据统计有四百多篇，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两个文集。为了更好地进行讨论和研究，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需要对这个问题接触一下，学习一下，研究一下。

今天请同志们来开这个会，就是想共同商量一下，在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等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怎么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么样进行一种正常的讨论。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有这么一个意见：首先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比较切实地了解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用比较长的时间，陆陆续续地、心平气和地，以探讨真理的态度和方针来进行讨论；根据我们的水平，尽我们的努力，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上求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所谓比较好的结果，其中的重要一条是，由此使我们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的讨论能够形成一种正常的空气，包括讨论的方式、作风，也包括使用的文字和语言。有了这样一种空气，有了这样一种方式，即使一年两年之内得不出多数同志都同意的一致意见，那也还可以按照这种方式继续讨论下去。如果搞得好，这对于活跃我们的学术讨论，进行理论探讨，会是一件好事。

这项工作准备分几个步骤来进行。第一个步骤就是详

细地占有材料。我们设想几个题目，提出来供同志们议论一下。

一是资产阶级古典哲学有关人道主义、人性、人的问题的论述，包括异化问题的论述。关于人的问题，可以说从有精神生产、精神劳动以来就开始讨论了。占有材料，追溯到古代希腊哲学、中国诸子百家，范围就太大了。是不是上限定在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从欧洲文艺复兴，到百科全书派，以至于到后来的黑格尔、费尔巴哈，看看这些人在这些问题上有些什么论述。这也只是讲他们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没有翻译成中文的，这次先不去管它。有些没翻成中文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很重要，也可以组织力量翻出来，但这只能是个别的。这些论述，采取摘要的形式。不是掐头去尾，而是比较准确地、比较完整地把他们的论断摘引下来。按人、按时间编排，这是第一本材料。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道主义、人性和异化问题的论述。也是就已经翻成中文的马恩著作，把其中讲到这些问题的言论比较完整、比较准确地摘出来，按时间先后编排。包括马克思早期的和后期的，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以至《资本论》等著作中，涉及这个问题的都在内，摘编一本。已经翻成中文的，要尽其所有，没有遗漏，都选编进来。

三是各国共产党以及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或者是个人，或者是组织，他们研究、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道主义、人性、异化等问题的观点的著作和文章，包括

他们的理解，他们的发挥。好比说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们是怎么说的。只要他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他相信马克思主义，都放在这一类。这里包括执政党，也包括没有执政的党。时间不限，只限于我们翻译过来的著作。

四是资产阶级、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言论。他们自己鲜明地说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发表的评论和观点，包括善意的，也包括恶意的。其中包括对国际共运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他们是怎么评价的。这也限于我们已经翻译过来的论著。

五是执了政的共产党国家里持不同政见者的有关言论。凡是共产党、工人党执政的国家，他们那里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最早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后来是苏联的萨哈罗夫等人，还有现在波兰的团结工会这些人，其他的国家也有。像波兰的沙夫，不要放在这本材料里头，把他放到马克思主义队伍里的一种观点、一种学派里。编这个材料，不要包括我们中国的。

六是我们国内对于这些问题的观点。时间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中全会以前的如果需要，搞个索引就行了。很明显，国内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可以不可以这样说，王若水代表其中的一种观点。有一些同志大体上同意他的观点，具体的意见也不完全一样。还有一些同志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所谓不同意的，包括指名同他们争论的，也包括不指名批评，只是申述自己的观点的。例如，最

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就属于阐述自己看法。这一本资料，如果篇幅多，也可以分成两本。

最后，是摘编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方面的有关论点，例如主张文学就是要写人性论，主张我们的作品就应该揭露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头的异化，等等。一部分是国内的；一部分是外国的文艺理论、文艺评论，已经翻成中文的。

这样一说，就是七本资料。凡是已经翻成中文的，或者中国人自己写的文章已经发表了，要求应有尽有，都要看，都要搜集，然后尽可能把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言论摘要汇编起来，力求不致遗漏。因为不是文集，也不是丛书，只是摘要，要力求准确。比如你摘了我的文章，我一看，你摘我的文章没有断章取义，没有拼拼凑凑。如果我本来不是这种观点，你这里摘几句，那里摘几句，使我的观点变了样了，那就不好了。我们虽然不可能把每个作者、每篇文章的论点摘编以后都请他本人看，但是要做到这本书到了他的手里，看到对他论点的摘要，他自己认为是准确的，没有歪曲的。我们要对作者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想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文章都找来看。有了这个摘要以后，他就知道有哪些人发表过文章，有哪些人写过书，他们的论点是什么。他如果愿意研究，然后再找原文和原著作来看。

这项工作工作量很大。我们今天请这么多单位、这么多同志来参加，就是想各有分工，一个单位分一本，分一个题；

认定以后，全部工作由这个单位负责，实现上述的要求。因为工作量很大，尽管分工，还是需要组织一定的人搞，才比较可靠，一个单位靠一个人两个人不行。参加这个工作的同志，应当是对这个问题过去接触过的，有研究的，有兴趣的。一个单位如果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人，编材料的时候都要邀请他们参加。

我们想有个期限，最迟半年之内把这几本材料全部编好。快的希望三个月之内编好。陆续编好，陆续付印，陆续出版。争取半年内把这七本资料书都编出来。

编了以后，还要不要有人统一看稿子呢？我们商量的意见，实行承包制，按刚才所说的，经过大家讨论，自己认定的也好，分给你的也好，这本书就由你完全负责了。因为我们不加观点，只是在现有的文章和书籍中摘要，只要负起责任来，看来不难，也不会出什么毛病。

由哪个地方来出版？经过商定，整个出版工作责成人民出版社负责。至于每本书具体出版时用什么名义，是用人民出版社，还是用商务、三联书店的名义，请你们同他们商量。书的格式，发行数量，售书办法，也请人民出版社提出意见，报中宣部。

这些资料书陆续出版了以后，就要组织力量来进行研究讨论，这是第二个步骤。

今天请同志们来，除了承担编资料以外，现在就要开始准备组织力量，进行研究。一个单位可以有若干同志参加编辑工作，有若干同志开始进行研究。前提是要对这个问题有

兴趣，有研究，不要勉强。参加这个工作的同志，首先要认真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认真地学习、理解、体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问题上是些什么观点，自己怎样理解。马克思还有个前期后期问题，《共产党宣言》以前是怎么说的，《共产党宣言》以后又是怎么说的。这两者中间，又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是什么，联系是什么，这些都不能由我们任意附加给马克思。要准确地完整地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对马恩有关论点的学习和理解，讨论若干次。然后讨论国内的文章和观点，再联系国外，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因此，学习马恩原著的那个步骤非常重要。我们对马克思的论点有了完整的准确的了解以后，再来看看国内这种观点、那种观点的文章，首先考虑是不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为他们是以马克思的名义来发表这些文章的，说马克思怎么说了，马克思的意思就是怎么个意思，因此他就主张怎么样怎么样。事实上，有的同志的文章确实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有的同志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他所理解的并不一定是马克思的原意。弄清这些以后，就可以再进一步讨论这些观点经得起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包括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和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观点。

整个讨论，我们应该采取一种老实的态度，按部就班的步骤和方法。学习也好，讨论也好，发言、写文章也好，都要力求采取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态度，绝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应该采取商榷的态度、商榷的方式、商榷的语言。你说马克思是这

个意思,根据我反复查阅,我的理解,马克思不是这个意思,你有些意见是附加上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找不到印证的。尖酸刻薄、冷嘲热讽这类方式和语言,在讨论中、在文章中都要避免。应该完全是同志式的、平等的、商量的态度,也应该是谦虚的态度。不要认为我的理解百分之百正确,你的理解百分之百错误,这种态度不好。留点余地总好嘛,说我现在初步理解是这样,有的理解可能还不太准确,我们大家商量,怎么使这个理解准确一点。毛主席教导我们,科学的问题上不能调皮。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进行这个讨论。

经过讨论之后再出点题目,分头写文章。不要倾盆大雨。一篇一篇的,写成熟了就发;不成熟,多讨论几次,多改几次,时间隔得长一点没关系。题目恐怕现在出不出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准备一年两年三年,到一九八五年即“六五”计划完成的时候,多数同志对于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共同的而且确实有说服力的比较正确的看法,就不错了。

人道主义问题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但是现在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很多,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理论问题要研究。不要给人一个印象,似乎这个问题现在成为中心的主要的问题了。同志们回去,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空气。

中央和地方各级都要重视 广播电视事业*

(一九八三年四月九日)

对广播电视事业，中央重视，地方各级同样要重视。

广播电视是我们整个宣传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宣传手段这个方面来说，广播电视比起其他宣传部门就更现代化一些，这就使它比其他部门能够更直接地同广大群众见面。

我们国家国土广大，可是交通不方便。报纸印出来了，有的地方当天可以看到，有的地方当天看不到。图书出版工作也有同样的问题。可是只要有收音机，只要有电视机，一打开，就可以听到和看到。在这一点上，广播电视具有其他的宣传工具难以相比的优越性。

再从文化程度来看。我们去年的人口统计说，全国十亿多人口中间，还有百分之二十三的文盲，不是文盲的，文化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全国记协第三届理事会会议上的讲话。

水平也参差不齐。报刊图书即使到了那个地方，文盲没法看；文化水平差一点的，也不一定都能看懂。可是广播、电视，一般人都可以听懂、看懂。

还有一点，电视同报刊书籍不同，既有语言，又有图像，两者互相结合的形象化的宣传办法，可以使观众感染更深，印象更深。

一个表演团体的演出，最好的效果，一个剧场里头不过千把人，一两千人。每天演一场，就算场场满座，一年也才几十万人。可是电视一转播，一个好戏可以使几亿人民同时受到教育，受到感染。

我们党多年来提倡面对面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要求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形成正确的政策；政策制定以后，又回到群众中间去贯彻执行。各级领导者要深入群众，同群众谈话，向群众做宣传。有了电视，有了广播，可以使我们这种面对面的领导扩大、加快，效果更显著。

有了这样一种现代化的工具，凡是要动员全国人民来办的事，都可以经过广播、电视，在同一个时间，使我们十亿多人口中间相当多的人同时听到看到，比较快地行动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正确的集中，做到五个统一，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广播电视是实现全国政令统一的最有效的工具。所以，我们要把广播电视事业进一步发展起来，凡是动员广大群众来做的事，都应该而且可以通

过广播电视直接同群众见面。把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用广播电视,同时结合其他方式,直接同群众见面,事实证明效果是好的。

这次会议,大家都很高兴,都拥护四级覆盖的规划。这样一来,县一级的、市一级的、省一级的、中央一级的广播电视,就能把本地区覆盖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希望,县一级的、市一级的、省一级的、中央一级的各部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这个宣传工具、宣传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所有一批年轻人,春节到山西调查小河流综合治理的经验。他们在代县结识了一位姓赵的七十三岁的老农民。这位老农民承包一条山沟,一共有八九十亩地,根据山的坡度、土壤特点来安排种植:比较高一点的地方种各种树木,坡度小一点的地方种草,平地种庄稼。几年之后,这个小山沟水土流失的问题完全解决了,成片果木树长起来了,平地上经济作物、粮食亩产量也提高了,老农民收入大大增加了。他们问他,你的经验是什么?他说,经验是两条。第一条,有一个收音机,每天听新闻广播,了解政策,学习政策,看看中央和地方的政策是不是有变化。如果变了,就缩回来一点;如果没有变就放手一点。他说几十年坚持这一条,可是也吃过苦头:一阵子好像说允许宽一点儿了,就来搞搞这个、搞搞那个;一阵子又“割资本主义尾巴”了,割得一塌糊涂。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是天天听广播,不是变得更不好,而是变得越来越好,所以经营小山沟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规划更扩大

了。第二条经验就是有关的科技书籍，比如，果树栽培法、林木管理法，这个种田方法、那个种田方法。他说，你们看，这片果木林长得很好，就是靠了从书店买回来的《果树栽培法》。这两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农村一靠政策，二靠科学。靠政策，解决一个生产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靠科学，有了积极性，还要会干，干得好。他的第二条即看科技书籍，也和我们有关系。实际上，广播电视也可以普及各种科技知识。搞得好，两条都可以靠广播电视。整个农村形势的发展，整个经济形势、政治形势的发展和人民对文化事业的要求，使我们认识到，从事广播电视工作，是大有前途的，是大有希望的。人民希望我们的事业大大发展，要求我们的事业大大发展。

我们大家都希望各级党委加强对整个宣传工作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加强宣传战线各个部门的建设。要把广播电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放在比较重要的地位或者首要的地位。根据毛泽东同志勤俭办事业的方针，我们要用有限的钱首先办好最有效的事业。各方面都需要经费，应该适当照顾，但是稍微集中一点钱把广播电视事业搞起来，首先关心、扶持和督促解决这个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整个宣传事业都是有益的。在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 and 建设中间，中央一级和地方各级应该有适当的分工。中央一级要把重点建设搞好，把全国广播电视的统一的方针政策抓起来。地方主要是搞网点建设，做好广播电视的普及工作。

全国的广播电视,吴冷西同志报告中讲了长远的设想,讲了实现这个设想的步骤,我都同意。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成这样几句话:一九八六年底以前除了为放广播卫星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以外,我们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首先普及广播,除了少数边远、人口稀少、实在困难的地区以外,其他的地方,包括少数民族一些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内,做到县县、社社、队队都通广播,或者有线或者无线,户户、人人都能够听到。同时,把电视通到全国大多数的县。这个要求高不高?能不能做到?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希望每个地方具体地、实事求是地做出规划来,看究竟能够达到个什么程度。一九八六年如果我们的广播卫星上天了,再分几个步骤,到本世纪末做到户户、人人都能够看到电视。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还有十七年多时间,分几个步骤,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可能的。

要把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密切结合起来。

吴冷西同志报告中讲了,宣传工作是各级广播电视机构的中心工作,广播电视节目的安排要以国际国内新闻为骨干,这些我都同意。我想补充的是,宣传工作的内容,各项节目的安排,都要以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中心。我想就这个问题先讲一点理由,然后提一些建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过去历史已经检验过的、将来的历史还要继续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伟大真理的深刻内容,是多方面的,我只能够扼要地提到。

从民族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规律。

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近现代和当代中国许多先进分子已经走过、正在走着、将要走上的共同道路。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为挽救民族的危亡，争取民族的解放，捍卫国家的独立，维护祖国的尊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各个进步阶级、甚至反动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个别人，都程度不同地付出了牺牲。但是我们要说，在这种斗争中取得最突出成果、付出最大牺牲和流血最多的，是中国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女——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人才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信任。

八十年代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三大任务：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加紧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在八十年代以至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爱祖国和爱社会主义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由于祖国统一的任务尚待完成，我们还面临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政策的威胁，祖国大陆、台澎金马、香港澳门这些土地上居住的各族人民，以及海外的广大侨胞，广大的各族人民中间，有可能而且必须组成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从爱国主义入手进行思想教育，可以为最广泛的人民、为每一个爱国者所接受。怎样使各个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社会经历、不同思想觉悟的人们

逐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呢？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我们从这里入手，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拥护，然后可以结合我们国内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实践活动，把思想教育深入下去，提高一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也有能力使广大的爱国者的思想觉悟逐步达到共产主义的水平，使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多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共同前进，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奋斗。

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真理性、有效性，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证明了的，今后还将继续证明。我们各条战线的宣传工作，包括理论、教育、新闻、出版、文艺等等，包括广义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有必要通过自己的业务，采取同自己的业务相结合的丰富多样的方法，来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我们应该以此为中心，大大改进广播电视的内容和节目。

为了逐步做到这一点，我想提一些具体建议。

第一，反映祖国新貌、建设成就、英雄人物、先进事迹。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有一种系列短片，叫《祖国新貌》，是很好的。建议电视台与制片厂合作，增加拍摄和播放这方面的影片，最好逐步做到每天电视节目中都有十几分钟的《祖国新貌》。它应有别于《新闻联播》。这对提高、鼓舞我们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很有作用；而且可以扩大观众的视野，知道祖国天天都有新的事物出现，到处有新貌，不

只是看见眼皮底下这么一点小角落。

英雄人物、先进事迹，这方面可以宣传的事情很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说，我们的英雄人物千千万万，可是我们的文学家很少去找他们，去写他们，去表现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记者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宣传了一些，但是同人民所创造的英雄业绩相比，毕竟还不够。我们在新闻报道、小说、戏曲里头，所反映出来的连万分之一都没有。

前几天参加中国科学院野外科研工作表彰大会。大会授予二十个先进集体、三十一位先进工作者以荣誉称号，表扬了五十七个集体、一百零九位同志。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讲，这些集体，这些先进工作者，事迹都是非常感人的。他们都是在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了科学、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坚持干了几十年，做出很大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可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科学院的同志认为，我们报刊、新闻，反映这些先进集体、先进人物的时候，缺少一个东西，就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风格。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以苦为乐，事业心强。正因为这样，所以什么艰苦都不在话下。希望我们的记者、作家，热心地反映这些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事迹，把他们的高贵品质真实地反映出来。不要给读者、观众这样一个印象，好像这些人就是苦行僧，无可奈何，没有办法。他们的精神状态不是这样的。

一个对事业有热情的人，对社会主义有信心的人，不管

是从事大的事业，还是小的事业，都要付出巨大的劳动，甚至于必要的牺牲，才能够取得突破。一旦突破以后，他自己精神上就得到极大愉快，感到非常幸福，然后反过来鼓舞、支持他去寻求新的突破，准备付出更大的牺牲来实现新的突破。这才叫社会主义新人。历史上有成就的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马克思讲，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只有下决心入这个地狱的人，才能够真正得到科学事业的成功。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人是愈来愈多了。

我们的电视台是不是可以同记协合作，同作家协会合作，首先把那些在最艰苦条件底下坚持工作、取得成绩，孜孜不倦、乐在其中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有步骤地在电视上表现出来。各行各业都有很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我们新闻工作方面也有，比如安珂同志。前不久召开了一个中小学教员、幼儿园老师先进工作者、模范人物的表彰大会。很多教员的事迹，使人感动得流泪。其中不少人的事迹和精神，比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所反映的内容丰富得多。

反映这些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要一步一步来。比方第一步，一星期播一次先进集体的电视，一次先进个人的电视。方法要力求多样，使广大观众喜闻乐见。要研究哪一种形式反映比较合适。如果能够做到每天都有先进集体、先进人物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一年就有三百六十多部片子了。就是做到了这一步，同我们实际上存在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比，也还不过万分之一吧。

现在已经有很多先进集体、先进人物，随着我们事业的

前进，还会有更多的先进集体、更多的英雄人物涌现出来。我们的电视台需要反映、我们的新闻记者需要采访、我们的作家需要表现的，真是千千万万，源泉永远不会枯竭，反而会愈来愈宽广，愈来愈深厚。

第二，广播电视长时间以来有一个节目叫《祖国各地》，从中可以看到很多祖国的名胜古迹，可是同祖国的锦绣河山相比，已经得到反映的也不过是凤毛麟角。

旅游部门出了个旅游词典，介绍中国三千多个旅游点的情况。各省、市、自治区是不是可以分片包干，在若干年内，把这三千多个旅游点，一个点拍一部电视片。这种电视片不仅有风景、名胜、古迹，也有到过这地方的历史人物和爱国者，也有民间传说，也有同这个旅游点相联系的古代神话、诗词歌赋、好的文章、好的碑刻石雕等。我看过《黄山颂》，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缺乏全貌，只有一些片断，连贯不起来。这件事情如果几年之内做好了，在国内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使大家看到我们祖国如此美丽，宁愿为它牺牲一切。同时，也可以为外国游客提供丰富的旅游资料。

第三，表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我们的历史很长，历史人物很多。是不是可以首先从近代史开始，反映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各民族怎样受侵略者的欺负，我们的人民、各阶层爱国者怎样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采取不同方式同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

可以先把近代史中的事件和人物做个安排。这里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事件，

包括党内、也包括党外的爱国者。由近到远，上溯到古代，看有过什么样的人物，有过什么样的重大事件；我们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其他历史人物，为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形成、团结和发展，曾经进行过什么样的斗争。与历史教科书不同，我们的电视及电影、戏剧、小说等，应该着重从人物出发，围绕人物展开与他联系的历史事件。

第四，从古代到现代，大诗人、大作家、大画家、大音乐家、大戏剧家、大表演艺术家、大书法家等，他们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著作，他们的爱国主义事迹，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宣传。这样既能使读者、观众增强爱国主义的感情，又提高了文化修养。

第五，从古到今，我们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杰出的学者、杰出的思想家，为了祖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做出了很大贡献。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各个专业，这种人物都很多。曾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每个所、每个专业就爱国主义宣传问题出题目，看从古到今，有哪几个人、哪几件事应该让人民知道，向人民进行教育。社会科学院有二十几个所，全院一百多个专业，哪怕一个专业只出十个题目，也就有一千多个题目了。事实上绝不止这些。英国人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人类的贡献，写出了几卷本的著作。我们自己，不是可以和应该写得更好，写得更丰富、更确切、更有说服力吗？

第六，历代文物的介绍。我们的文物同世界上许多国家

比起来，数量的丰富，年代的久远，工艺结构的精美，应该说是名列前茅的。可以选择在我们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推动历史前进的文物，经过电视进行宣传。

第七，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各具特色的工艺美术品，以及歌舞戏曲、著名演员、著名舞蹈家、著名表演艺术家的介绍。

第八，我们有五十六个少数民族。建议对每个民族的历史、现状，解放前后的比较，每个民族最美好的东西，文化也好，物质文明也好，优良传统也好，道德品质也好，集中起来，一个民族最少拍一部电视片，有的可以多拍几部。

第九，国外爱国者的事迹，爱国者的著作。各国都有爱国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为了他们的祖国、民族，英勇牺牲，献出一切。这种精神，中国人民是尊敬的，是应该学习的。“五四”前后，鲁迅、茅盾等人着重翻译了东欧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介绍了一些东欧、北欧被压迫民族中起来奋争的英雄人物。现在应该继续搞，加以丰富，加以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爱国者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事迹，特别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对于建国前后青年一代的成长，起过很大作用。广东电视台有一个《名著与名画》，搞了两集，中央电视台转播了。这样的形式很好。

总之，爱国主义教育的领域、范围很宽广。我们的各个民族、各个地方、各行各业，在不同时期都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爱国者，都从不同方面为祖国做出了贡献。应该结合自己的业务，各自的学科，作出计划，一步一步地把这种爱国主

义素材，经过加工，通过各种形式，采用各种表现方法，使广播电视节目丰富多彩，使看了电视的人可以从中吸取爱国主义的营养。这些事情光靠电视台是不行的，要各个学科、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合作来办。不可能一二年搞成，把这些内容系统地反映出来，搞到二十世纪末也搞不完。可是不能再等待了。这里只列举了我想到的一些，实际上还有很多方面没有想到。文艺界有位同志提了个意见，希望对中国国宝性的人物和大著作，不要搞得太轻率。搞得太轻率，会损害我们这些国宝的形象和名誉。属于全世界公认的大作家、大作品，制作过程中一定要几个方面很好地合作。各地风景、名胜、人物、史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也都要认真搞，才能搞好，即使先从容易搞的做起，也应该认真对待。

一个呼吁，一个请求^{*}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一日)

这次中国史学会的年会，同志们希望胡耀邦同志、胡乔木同志来和大家见见面，讲讲话。他们两位委托我代表他们向同志们问好，特别是要向老一代史学工作者、专家、学者、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我从宣传工作的角度，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请求大家从不同的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向我们的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所有同志应该共同承担的责任。希望史学界负起更重要的责任。

我们宣传工作的对象，包括儿童、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包括工农兵学商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人，包括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各群众团体成员和各族广大人民群众。对所有这些人，都要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我们史学工作者不但有责任而且有更好的条件进行这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方面的工作。我国历史悠久，各族人民在长期劳动和斗争生活中形成许多深厚的优良传统。我国史学界本身就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通过历史的研究、教学和写作等方式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史学界的同志能够发挥独特的、重大的作用。

我想出点题目，提出一点希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经三十多年了。在胡乔木同志倡议下，我们已经组织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各部委报名承担编写的书已有二百种以上。胡乔木同志又提出编写《中国地理》丛书，目前正在筹划，初步拟订的题目也在八九十种以上。《中国地理》包括我国的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各种丰富的资源，要分别写成普及的或专门的著作。以上两种丛书可能是比较专门的著作。出版局还想出版一种普及性爱国主义丛书，其中包含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内容，包括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的各方面的成就，要分别写出通俗著作，有长有短，适应向各种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三十多年来，那些为了使我们的事业顺利发展而奋斗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先进事迹也可以分别写成各种各样的读物。

我国的历史很长，各个时代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值得写出专门的著作。首先要强调近代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因为这同我们这一代人以至下一代人的关系最为密切。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凌辱的历史，同时也是爱国者、广大人民群众同侵略者和国内奉行卖国政策和反动统治阶级英勇斗争的历史。很需要把这

些历史表现出来。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大作家、大诗人、大音乐家、大戏剧家、大表演艺术家、大书法家，有很多著名的著作、文章、诗词、歌赋、戏剧、绘画、乐曲，需要向我们的年轻人、向我们的人民进行介绍，进行宣传。我们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东西，只是后来落伍了。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也为世界科学技术做出了贡献，需要一个一个地、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把它写出来。

我们的文物古老而且丰富。不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世界上有好几个国家的历史同我们是相当的，但就历史文物、古迹来说，恐怕世界上没有比我们多的。这就很需要从许多历史文物、历史古迹中选出一些能够说明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世界文明做过贡献的东西，分别写出著作来。

我们国内现在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是五十六个，还有其他若干尚未正式命名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历史，这些民族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这些民族对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都需要分别写成著作，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总之，我们科学文化的积累，优良传统的发扬，精神财富的创造，是各民族劳动人民共同劳动做出的贡献。他们的崇高的爱国主义品格，他们的聪明才智，都要通过各种著作，向我们的年轻人，向尚不知道这些情况的人们进行宣传，进行教育。不仅社会科学各个专业，自然科学的各个专业也需要写出这样的著作来。这些东西写出来以后，可以从

不同的角度增加青年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丰富爱国主义感情，激发爱国主义热忱。

同志们都是学者、专家，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史学界首先行动起来，通过自己的教学、研究、写作，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大家共同来承担向我们的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责任。如果可能的话，在我们这一次年会上，先拟出一批题目来。在有人、有条件的情况下，年内就可以完成一批。至于哪个单位、哪些同志承担什么题目，是不是大家商量，采取自愿承担的办法。这中间，史学会就可以发挥一种调节的、联系的、交流情况和经验的作用。搞得好的话，年内除了完成其他任务，在这方面也可以做出一定的成绩来。然后经过我们的带头，影响所有从事史学工作的同志一起来做这件事。史学界这样做了，再来推动其他学科的同志一起这样来做。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提出这样的呼吁和请求，请同志们考虑一下，看看该怎么做。

关于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和 华侨大学的意见*

(一九八三年五月一日)

为推进台湾回归祖国，收回港澳，完成统一祖国大业，亟需加强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工作。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外籍华人，都希望我们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培养出适合他们居住地区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为此，提出以下意见：

一、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列为全国重点大学。其隶属关系划归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由国务院侨办和教育部共同领导，以国务院侨办领导为主。国务院侨办和教育部要具体商定如何分工协作，共同办好这两所大学。

二、为了把这两所大学办成具有特色的华侨大学，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方针。两校今后招生的主要对象，是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台湾青年和外籍华人；也适当招收少量在大

* 这是邓力群同志主持起草的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名义报送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的一份报告。

陆上的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子女和台湾省籍青年；学生中的非侨眷子女，要逐年减少。要培养他们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热爱祖国、能够为他们居住地区发展各项实业、事业做出良好服务的专门人才。两校的院系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要求、学校管理等，都可以与国内其他大学有所不同，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华侨大学。

三、两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要充分考虑港、澳、台和国外的需要，为毕业生回到本地能被优先录用创造有利条件。在教学中，既要重视各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又要注意突出应用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新成果，拓宽专业面，增强适应性。要加强外语教学，尽量用英语讲课。政治教育的主课是爱国主义。内容包括祖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地理、文化艺术、道德风尚等优秀的民族传统，以及华侨爱国史、创业史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等内容，贯穿融汇在爱国主义教育课程之中。学校中的各项专业课程，也都要根据本学科内容的特点，生动地、切实地、有机结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共党史等课程可作为选修课。

四、两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觉悟，通过各项课程的教学，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帮助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做贡献的思想。教育的渠道，主要是依靠广大教师教书育人，潜移默化。教育

的方法要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注重启发，做到理论教育与形象感染结合，言教与身教结合，课堂教育与学生课外自我教育结合。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全部过程中，都要注意耐心细致、入情入理。

五、学制要灵活多样。除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外，也要办二年制专科和一年或更短的专修班。还可办预科和函授教育。要实行学分制。

六、允许两校单独招生。在大陆、港澳均可设考场。海外可由使馆代考。根据我使馆驻在国的不同处境、条件可由我驻外使馆代考或推荐（附被推荐人的高中毕业证及二年学习成绩单），实行学校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招收新生。对重要统战对象的子女，经国务院侨办批准，可个别吸收。对来校学习的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台湾青年和外籍华人，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毕业后，个别愿留大陆工作者，要妥善安排。对国内归侨、侨眷学生，愿出国进修、留学、就业者，给予方便。回港澳工作的毕业生，我驻港澳机构要承认学历，择优录用，工资待遇不低于当地同类毕业生的标准。

七、对这两所华侨大学，应当作为教育战线的重点项目进行投资。学校的基建、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和生活、文体等设施，标准应当高于国内其他大学。考虑到海外影响和教学的急需，对暨南大学代管的广州华侨医院的基本建设投资及卫生事业费，要给予保证。建议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科委，每年能多拨一些教育经费、基建经费和科研经费，作为办好两所华侨大学的专款，下达给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也要欢迎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外籍华人对两校的捐助。学校在经费的管理使用上，要讲究效益。学生的助学金，应逐步改为以奖学金为主。

八、学校的董事会，要聘请国内侨务界的领导同志和海内外热心华侨教育的知名人士担任董事。正副校长人选，由正副董事长提名，经国务院侨办征求广东省委或福建省委意见后，校长报国务院任命，副校长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任命。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要建立党组。党组成员由中央任命。党组的工作，中央委托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代管。党组的任务，是保证中央文件所列各项方针、政策在校内的贯彻执行。学校机关党委，负责党的建设，加强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行政工作实行保证监督。

九、主管部门要多给学校一些自主权。在教学改革、机构设置、基建设计、学术交流、国际往来等方面，要放宽政策，适当简化审批手续。允许学校多聘请一些有真才实学的海外华侨和外籍华人来校任教或短期讲学。

十、加强学校领导班子的建设，是办好这两所学校至关重要的大事。要选择那些热心华侨教育、懂得侨务政策、熟悉国内外教育情况的有志之士，特别是归国华侨，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领导人员的配备，在坚持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原则下，与一般大学相比，主要领导人的年龄可以大一些，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应当高一些。领导班子必须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团结协作，注重效率的工作班子。

试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已于七月十二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学习的领导。中央的通知指出，学习《邓小平文选》是全面整党的重要思想准备。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不仅自己要认真学习好，而且要在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帮助别的同志也学好。《邓小平文选》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国大纲，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实现四化建设各项任务的正确指针，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文选》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二年这关键性的八年中走过的道路，内容涉及国际国内，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非常广泛，非常丰富。总起来说，《邓小平文选》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所谓出发点,就是说,我们进行这么一个事业,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已经走过了相当一段历程,已经取得了相当巩固、相当坚实的前进阵地,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去说了。社会主义改造,是有中国特色的,是有我们自己的创造的。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我们碰了一些钉子,遇到一些曲折,但是,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都可以成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决不是一无是处,毫无成绩,而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实践经验,理论概括,有相当一部分到今天也还证明是正确的,是应该坚持的。这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一方面正确地总结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了新经验,研究和解决了新问题。四年半中间,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正像小平同志讲的,比过去、比八大那个时候,认识深刻多了,经验丰富多了,贯彻执行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实践,取得了这样的成就,所以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提法,不是偶然地或者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我们经验的总结,历史发展的必然。可以说,这样一个提法,是对于我们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这同时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

尽管我们取得了相当巩固、相当坚实的前进阵地，可是我们终究还要承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一个有待于继续完成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制度，正像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讲的，还要经历一个从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说过，社会主义这个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要分成两个阶段，首先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然后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够进到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进程的存在和它的长短，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当然，工作做得好一点，这个历史进程可以加快。但是，如果再犯错误，再折腾，这个历史进程不但不能快，相反还会延长。我们要充分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鼓舞信心，同时要更多地想到工作中的困难，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如果工作做得好，避免犯大错误，从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达到本世纪末比较完善，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坚持下去，又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这是陈云同志反复强调的。最近中央工作会议前讨论这个问题，有的领导同志尖锐地提出，一九八二年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过猛，计划外的基建投资失去控制。这件事不解决，我们这几年来好形势有可能好景不长，重新来个折腾，一两年后又得重新调整。小平同志讲，不要在形势好的时候头脑发热。这话讲了几次。陈云同志讲，过去几次都是事后才发现有问题，这次同过去不同，正在进行中间就发现了，中央就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确实证明党中央的领导比过去

成熟多了。社会主义建设，确实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打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后，一动员，一组织，在正确方针指导下，大家一拼命，几个月就打胜了。可是，说几个月要建成长江三峡电站，就是把全国人民都带上去拼命，也成不了。不用说长江三峡，龙羊峡电站建设了好多年，要完全建成也还得几年。把青海的人民全部动员起来去拼一次命，要在几个月内建成也不可能。我们已经走上了正确道路，今后继续按照党中央、按照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指出的道路，扎扎实实工作下去，在十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是完全有信心的。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不管是巩固已有的前进阵地，还是实现将来的奋斗目标，都有一个思想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这是决定我们成败的思想基础。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以后，提出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他一有机会就讲，反反复复地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靠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批评“两个凡是”，批评思想僵化，就是说他们违反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解放思想、克服思想僵化，也是讲必须实行实事求是原则。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集中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后来在东北巡视工作，又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他还讲，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项工作，任何一个单位，小到一个生产队，都要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思想符合于实际，主观符合于客观，这就是实事求是。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党章总纲部分明确写上，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讲，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是否对头。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靠的是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要靠实事求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讲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是群众路线，第三是独立自主。实际上，第二、第三都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小平同志文选中的每个重要论断，他向中央的建议，以及在中央开会的时候作出的决策，所以能够得到实践的证明，就是因为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反复讲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丢，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实事求是这个原则必须坚持，不能违背。如果像有些同志讲的那样，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那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一丢掉，听任思想混乱的状况泛滥，后果很难设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可以而且应该从各方面进行探讨。四川省委宣传部就这个问题搞了一个宣传学习提纲，进行了一种有益的尝试。从理论上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是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李琦同志介绍小平同志文选的讲话，列举了文选中包括的十个

内容，也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探索。《光明日报》还辟了专栏来讨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这些都很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研究提纲)》提出，一方面要进行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另一方面要进行宏观的综合的研究，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更多的同志应该去调查研究微观的具体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清楚，搞透彻，但是也不能缺少另一方面的工作，即一部分同志在这个基础上加以综合。我想从三个方面提出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也就此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

第一，政治方面。

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重申了这个理论。宪法对此作出了明文规定。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不存在以后，仍然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我们国家，国内的阶级关系究竟怎么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同国内的阶级关系是不是相符合？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作了科学的表述：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有同志提出，把“专政”两个字勾掉，就叫人民民主国家不好吗？也有个别同志讲，“专政”两个字翻译得不好，日本人有个更好的翻译，叫“执政”，中央没有采纳这些意见。人民民主专政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适合我们国情的，是适合国内阶级关系的实际的。

邓小平同志讲,伴随四化建设的整个进程,要始终坚持两手:一方面要坚持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另一方面要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犯罪活动。对严重犯罪分子、各种敌对分子要依法惩治。去年一月以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成绩很大。到今年四月为止,揭发出的和自己坦白的经济犯罪案件有十九万二千多件,共产党员受党纪处分的二万三千七百人,依法判刑的(包括非党员)近三万人,追回赃款(包括自动退回的)四亿多元。规模不小,可是因为我们采取依法惩处的办法,不像过去那样搞群众运动,错案很少很少。

党的十二大确定,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把高度民主作为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讲,建设高度的民主,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之一。十二大根据这样一个精神,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要求把社会主义民主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这些既符合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要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进一步完善国家各种体制和各种政治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经

济、文化和社会、行政以及各方面的立法工作，系统地制定各种法律，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监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宪法和党章都明确规定，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实行党政分工，要建立有权威的政府指挥系统，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这些，都是我们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要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更加完善的方面。

在国内外关系上，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到当时为止，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是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国内唤起民众，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是在国外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当时讲了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这是根据当时国内国际的政治关系确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明确地说，国内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国内的统一战线还要巩固，还要发展。这个统一战线，现在叫做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国际上，我们进行反对霸权主义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在邓小平同志的十二大

开幕词中讲得非常有力。特别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党的赞赏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处理同兄弟党、工人党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些已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既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增添了符合新情况的新内容。

第二，经济方面。

对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我们平常有一种概括性的说法，叫做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占优势，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实际生活当然比这种概括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所有制形式和经营管理形式方面，已经出现了而且还会继续出现许多中间的、过渡的东西。全民所有制也好，集体所有制也好，个体经济也好，经营管理形式都是多种多样。我们的研究不能停止在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占优势、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几句话上，要面对现实的经济生活，对已经出现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经营管理形式，包括中外合营经济以及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投资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一般说来，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营管理形式，对我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好的作用，应该肯定。对外开放政策，还要愈来愈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也要继续坚持。如果因为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怀疑甚至反对这种政策，是错误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在人们中引起不同反映是不奇怪的。问题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干

部,包括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干部,要清醒地看到,确实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有责任进行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概念应该加以区别。宪法承认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不同,有些地方很落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些任务承担不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这作为国家的社会政策,是没有错的。但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理论工作,不要把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存在的个体经济,也说成社会主义,说成社会主义制度。允许这些东西存在、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存在,这是一回事;它们是什么性质,是另一回事。对新出现的所有制形式、经营管理形式,多做调查研究,多进行具体分析,不要轻率、盲目地一下子给这些形式下个结论,定下性质。

我们的经济体制还要进行改革。可是始终要记住,做每件事情、进行每项改革都要记住,改革的总目标,鉴别改革是否成功,是前进还是后退,还是邓小平同志讲三条标准: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在进行改革和检查改革是否正确的时候,我们宣传工作者必须认真考虑,这个改革是不是符合这三条标准。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对

某些问题作一些必要的让步,这是允许的,但必须是头脑清醒的。

陈云同志强调,我们要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十二大讲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我们还要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商品交换,因此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中间,价值规律要起作用。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和分配,要尊重价值规律的要求,实行有计划的调节。除此以外的一些小的商品,千百万种的商品,在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是不可少的,但占的比重比较小,就要让价值规律自发地进行调节。同时,对这种自发调节的商品生产,在宏观上也要通过国家政策和经济力量进行干预和管理。与此密切联系的,就是小平同志在最近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重大问题、重大项目、重大方面,既然是计划经济为主,就必须实行集中。其他的要实行适当的分散,包括人力、财力、物力,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权。在农村,在城市,要把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些都是我们根据中国已有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

经济生活、经济制度中有一个按劳分配问题。农村现在就提出了一些问题。农民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他自己的。这比过去的工分制度好得多,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同志说,这是按劳分配的彻底实现。有的同志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这里除了按劳分配,还包含着由于生产资料状况不同而造成的分配上的差

距,用他们的说法叫收益分成。又有的同志不赞成这个收益分成的说法。现在我们农村出现一些专业户、重点户,家庭经济、家庭经营和他们的分配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比如承包土地,土地是公有的,灌溉要用公共的水利设施,有的时候抢耕抢种,还要用集体的拖拉机。另外一种承包户,除了耕种自留地以外,专心养鸡、养鸭、养猪。他也不多要土地,不要拖拉机。有的同志讲,这要同那种统一经营、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家庭经营加以区别,不能一概而论。城市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分配问题,也有与农村类似的情况。

全民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包括交通运输企业中个人消费品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仍然需要我们用大力气来解决。可是,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一些商店、工厂搞承包以后,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有些同志忘记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里批判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时提出的观点,在做法上有点搞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味道。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从社会总产品中首先应该扣除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中扣除: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只有作了这些扣除以后,才能谈得上劳动者个人的消费品的分配。所以马克思回答拉萨尔讲,这不是不折

不扣的，而是有折有扣的。分配的原则是，每一个生产者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而他个人从社会领得的是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肯定和重申了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可是，最近以来的一些承包中间，由于我们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没有提醒这方面的问题，也由于企业管理人员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础知识不太了解，或者学了以后忘记了，结果发生了承包以后发奖金的时候，相当一些单位根本不考虑各种必要的扣除，实际上只看到我有多少营业额，有多少利润，发多少奖金。比如商业承包，地点不同，就有区别。在闹市搞一个门市部，在偏僻的街道上搞一个门市部，显然闹市的门市部营业额很高，偏僻胡同里就很低。商品不同也有区别，卖电视机的，一天卖十部，一部一千六，十部一万六。卖蔬菜的，比卖电视机辛苦得多，一个月都很难卖到一万六千元。还要考虑到，电视机是赚钱的，而蔬菜是国家赔本的。再有一个行业的不同。农副产品是国家补贴的，而工业品除少数外基本上是赚钱的。还有季节的不同。冬天卖西瓜，价格当然高，夏天的价格就大大下降了。冬天卖细菜，价格很高，夏天卖西红柿就比冬天便宜得多。这四种不同情况，加上对上一年营业额到底有多少，谁也没有原始记录，今年搞承包时争来争去，想办法把基数压低。执行以后，卖电视机的部门一人一月可得一百元或更多奖金；卖菜的工资实行浮动，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基本工资都没法保证。同样卖副食品，卖鱼的，卖肉的，也一个人分几十元，卖菜的得不到。

闹市的营业额很高，赢利多，奖金也多，偏僻胡同里的商店没有多少营业额，也没有什么奖金。在闹市，修理道路，商场建设，都是国家投资。多年历史形成那样一个集中点，这就是级差地租，而这种级差地租主要是国家投资造成的。这种级差地租应该全部交给国家，按说不该纳入职工奖金进行分配。可是，经理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门市部主任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职工更不想这个问题。这样一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都没有标准可衡量了。卖菜的比卖肉的辛苦得多，卖肉的又比卖电视机的辛苦得多。由于没有经验，没有办法，这个地方搞了，别的地方也跟着搞，包得成功不成功，首先看奖金是多是少。除了将必须扣除的东西拿来参加个人分配以外，还向消费者打主意。有一段猪肉提价了，蔬菜提价了，好些商品提价了。一方面向国家打主意，一方面向消费者打主意。所以，在一个时期，互相影响，互相攀比，职工也好，企业的领导也好，就想怎样多得点钱。说的是国家得大头，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国家得小头。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必要的扣除中间有一部分是用作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的，像抚恤金、公费医疗、节假日工资、妇女产假。有些地方搞承包，就把女职工的产假缩短了，有的产假也得扣奖金，有的甚至于把公费医疗、劳动保险实行包干制。这样一来，妇女、老工人受了损失，意见很大。

这些现象，确实给我们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现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在宣传上不能盲目地说这个好、那个不好。这里还有一个按劳分配

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关系问题,也不要忽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不能任意地加以割裂。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就谈不上实行按劳分配。而这个主导地位要巩固、要发展,又必须实行必要的扣留,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现在我们研究按劳分配,对必要的扣留不注意,结果难免一些人把按劳分配歪曲成一味追求个人眼前利益,助长人们都来挖社会主义墙角的错误倾向。

第三,文化方面。

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这是党的十二大确定的目标和方针。精神文明又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要逐步做到协调发展。同志们希望同步发展,实际上现在很难做到,只能逐步协调发展。可是,思想建设要先行,要比文化建设先行,也要比经济建设先行,要统帅文化建设,也要统帅物质文明建设。这是应该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十二大提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重要特征之一,是我们党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这实际上就是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指导制定社会主义阶段的现行政策,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指导共产党员的言行。

有的同志认为,只要制定和执行社会主义阶段现行政

策就行了,可以不提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还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怎么到了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倒反而不要提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了呢?

有的同志因为群众中一部分人说共产主义渺茫,认为宣传共产主义群众难接受,主张只要宣传和执行现行政策就行了,不用宣传共产主义了。这种意见也不能同意。社会主义阶段的实践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不难向群众宣传清楚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这就是对上面意见的回答。

我们经常说,要牢固树立全局观点,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这些观点,陈云同志通俗而又深刻地作了表述,这就是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申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分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不仅只看到眼前,还要想到将来。改善生活,不能只是一年改善,得长远改善。为了长远改善,今年创造的国民收入,除了适当给大家增加工资,增加奖金以外,就要留下一部分来扩大再生产,保证能够年年有所改善,而且是更大的改善。只要我们结合群众的切身体验,把工作做到家,这个道理群众是容易接受的。

前年物价涨得比较高的时候，城市居民对我们党和政府有很大的意见。沈阳市委用算经济账的办法做思想政治工作，先算每个家庭的账，工资增加了多少？就业人数增加了多少？全家每个月的收入增加了多少？因为涨价，多付出了多少？除了个别家庭还有待业人口，还有困难以外，尽管物价涨了，大多数家庭还是改善了生活。由家庭经济账算到企业经济账，由市里的经济账算到国家的经济账。这样，职工群众的牢骚大大消除了，生产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有的同志不太赞成向人民群众灌输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似乎这个道理在取得政权以前适用，取得政权以后不适用了。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情况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党居于执政地位，不仅可以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各项方针、政策，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使它付诸实现，而且还可以通过国家的法律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实施。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时候，不能合法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和政策。我们取得政权以后，掌握了各种宣传工具，可以合法地、经常地向人民宣传各项政策，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应该说，这些都是向人民群众灌输科学共产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后来又提出四项政治保证，上了党的文件，而且列入宪法，这还不叫灌输科学共产主义？当然，只靠上面这些还不够。党制定了政策，国家制定了法律，一通过，一宣传，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就百分之百完成了，就可

以万事大吉了？如果这样看，那是不对的。我们还要根据不同情况，针对不同对象，加强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有一个经验：宣传党的政策不能就事论事，还要针对群众中间所产生的各种思想问题，有说服力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这种工作稍一放松，正确的方针、政策就要受到抵制，甚至受到歪曲。最近这个时期，“一切向钱看”的思潮相当泛滥。这除了我们工作上有些缺点之外，也确实从反面证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缺少针对性、说服力，人民群众的思想就会产生混乱，错误的思潮就会影响人们，而且会越来越厉害。最近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尖锐地提出要制止盲目建设，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集中物力财力保证重点建设，合理分配国民收入。这就更深刻更广泛地揭露了，在我们经济生活里，不但普通的劳动者，甚至各级干部中间，也有一部分同志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的思想倾向。中央常委同志的讲话，都是针对我们干部中间的错误倾向，进行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向我们全党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在执政以后，还有必要向人民继续灌输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虽然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但各人的经历不同、觉悟不同、水平不同，他们受旧社会的影响也很不同。有相当一些人，身上还背着旧社会留给他们的包袱。剥削阶级不存在了，可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存在。对内搞活经济以后，剥削阶级残余也有故态复萌的状况。对

外实行开放,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作风渗透进来。所有这些,都不能不使我们的劳动者、干部、党员中间的一些意志薄弱者受到腐蚀。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期,还存在着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社会生产发展得还很不够,还不能消除消费品分配方面的某些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此外还有认识上的原因。因此,包括普通劳动者和一些相当高的领导干部,对于个人利益,对于本单位利益,往往容易看到,感受深切,确实有一大堆问题压在身上。我们的资金分散,不能说没有认识上的原因。多年来积累了一大堆问题,企业里头,职工中间,不少问题没有解决。干部听到这种呼声,受到这种压力,总希望想点办法,多留一点钱,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属于认识上的原因。人们对眼前的、局部的东西感受深切,对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往往想不到,容易忽略,以至于完全忘记。从局部利益出发,想到整体利益,不是那么容易的;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容易理解,要凭脑子去思维的东西,终究是间接的,想到了以后,也不那么紧迫。所以,历史的原因,社会的原因,认识的原因,就形成这样一种社会条件,在劳动者中间,在干部中间,不少同志不大考虑国家利益、整体利益。至于一些人经常用不正当的甚至犯罪的手段捞一把,那自然更严重了。

这些都说明,只靠制定政策、报纸宣传来灌输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经常地向不同对象,就不同问题,进行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有效地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向人民灌输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那就不能适应当前的实际，不能有效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

各级宣传部门，是各级党委的工作机关，要在思想战线上为党委当好参谋，当好助手，当好哨兵，了解思想动向，发现倾向性的问题，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议，并且在党委的领导下，承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灌输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的宣传部门，必须牢固地树立全局观点，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向实际作调查。宣传系统各部门缺少科学共产主义系统知识的同志，要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个缺点，自学也好，培训也好，要找机会补上这一课。不弥补，宣传部门的繁重任务就很难承担起来。

这次会议以后，以至在整党期间，我们都要切实地学好《邓小平文选》。要认真领会，并以此对照检查、总结工作，不断提高宣传部门干部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我们这样做，尽管不能使工作在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飞跃地进步，但总能做到一年比一年好一点、更好一点，这是完全有希望的。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页。

【2】 同上书，第262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 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

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1】}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需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

党章规定：“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2】}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以后，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建设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阶

* 这是邓力群同志主持撰写的一份研究提纲，原题为《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作为中宣部文件印发，征求意见后做了修改补充。

段。我国的共产主义实践，已经是建设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实践。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剥削制度消灭以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两个发展程度、成熟程度不同的阶段。它们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称社会主义制度为共产主义制度的时候，必须说明它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列宁说：“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3】

这不仅是个名词和用语问题，而是要用科学的概念来表述我们当前的社会性质和我们从事的实践活动。进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已经不仅是一种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现在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政策，也就是共产主义在今天的实践。

二

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须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4】我们常说，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是说从比较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完

善的社会主义,直到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要经过长久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们虽然不断地、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从不完善到完善需要有一个过程,但在长时期内,把完成这个过程看得太容易了,总想快一点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由于超过了实际可能,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违反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结果想快反而慢,想近反而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很多同志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不平衡性,多次犯了“左”的错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由于不认识在中国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苦性、不平衡性,又犯了两次大的错误,招致了大的损失。这些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三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党内同志所犯的 error,都是“左”倾的错误,但其表现形态却是很不相同的。

“大跃进”时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急于向高级形式过渡。在农村,匆忙地把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认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

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在城镇,取消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和合作商店合并,以至升级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合并了许多适合于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盲目的集中生产和集中经营。这样,适应市场需要的灵活性没有了,商品的花色品种也越来越单调了。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上推行供给制,误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提倡人民公社内部自给自足,在公社内部各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甚至在各公社之间实行产品调拨,实际上是想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搞高指标,要求钢铁产量一年翻一番,提出各省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结果是导致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到处泛滥。当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程度估计过高,对某些尚在试验中的事物肯定过早,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缺点不作批评,反而加以发展。正是在这种不适当的估计的基础上,肯定了许多不应该肯定的东西。当时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实际行动上,则是到处都积极“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失,使人民群众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挫伤。

在“文化大革命”中,认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多年之后,集体经济中的劳动者仍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小生产者一样,还会“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并且认为全民所

有制企业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是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说企业的领导人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等，不搞无产阶级政治。认为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要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认为在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七八年就要来一次，而且要进行多次。总之，在认识上，是把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看得一团漆黑，否定了许多不应该否定的东西，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党的指导思想来说，已经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都要总结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继续清理“左”的影响。要把过去两次大的“左”倾错误的不同表现形态加以区别，同时对两种形态分别进行具体分析。

今天以前，对“左”的错误的清理，大体说来，存在着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实际工作转过来了，“左”的思想影响也清理好了；第二种情况是，实际工作基本上转过来了，“左”的思想影响清理了一些，但还没有完成；第三种情况是，在实际工作上和思想上清理“左”的影响的任务都还比较重。由于“左”的错误延续的时间很长，影响很深，以致我们的不少同志习以为常，不觉得自己受了“左”的思想的束缚，对不少事情的认识还没有意识到要根据实践来检验，甚至在大量的新事物出现以后，也不觉得有重新加以

考虑的必要。党中央最近又指出，我们的思想还解放得不够。彻底从“左”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这是需要我们继续付出努力才能完成的重要任务。

同时，我们也要继续注意清理右的思想影响。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以来，在思想政治领域，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在经济和其他领域，发生了严重的犯罪活动。我们近年来同这些倾向和犯罪活动所作的斗争是有成绩的。但是，应该估计到，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是长期的。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各种犯罪现象等等估计不足，甚至加以支持，是一种右的倾向。右的思想也是一种思想枷锁。防止和克服“左”的思想影响是解放思想，防止和克服右的思想影响同样是解放思想。

不论“左”的错误还是右的错误，都要认真地清理，实事求是地清理。应该否定的必须否定，应该肯定的必须肯定。不论否定错误的东西，还是肯定正确的东西，都是为了沿着社会主义轨道更好地前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制度，“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所有这些，都写进党的十二大文件和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有的还载入了宪法，都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和正在实现的任务，都必须肯定。思想解放是为了巩固它

们,而不能削弱它们;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而不应妨碍前进。

四

党中央发了今年一号文件以后,胡耀邦同志作了关于四化建设和改革的讲话。遵照十二大的精神,在各方面实行进一步的改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各方面的改革都需要人去进行。参加改革的人,首先是各级领导人,必须具备正确的指导思想。所有的改革,都必须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进行,必须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同各项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

要积极宣传改革,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对实行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提高对党的改革方针、政策的认识。要反对因循守旧、不求进取的精神状态。共产党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广大共产党员和整个工人阶级历来站在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前列,现在同样站在改革的前列。我们要积极地参加改革,领导改革。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改革,经过试点,逐步推广,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清改革同实现十二大战略部署的关系,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关系。

在实行机构改革、领导班子调整中,大批老干部主动地从第一线退下来,热情地负责地推荐和支持优秀的中青年

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工作,表现了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他们今后还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事自己有专长、有兴趣的工作,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我们应该广泛宣传和表彰老干部的共产主义崇高品格。同时也要使陆续上来的中青年干部懂得,走上领导岗位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接共产主义事业的班,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全心全意地、精益求精地做好工作,使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经过自己这一代人的努力,更好地继续下去。

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一定会涉及国家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单位利益、个人利益的关系。既不能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整体利益,不顾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也不能不顾整体利益,滑到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上去。在几个方面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各个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要用共产主义的态度来处理,都要反对“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5】}邓小平同志最近又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事业发展得好或不好、各项改革进行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胡耀邦同志在关于四化建设和改革的讲话中,重申了这些原则,指出: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这里就包括着,我们的改革必须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有助于巩固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进行每一项改革,改革的每一个步骤,都要充分注意到是否符合于上述标准和总目标的要求。进行改革,宣传改革,都不能偏离总的方向和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十二大所提出的宏伟纲领。

改革是涉及十亿多人口的大问题。人们的职业分工不同,社会经历不同,思想觉悟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要注意和重视人们在改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要求和意愿。要经常注意研究改革中的新事物,及时地加以总结。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偏离总要求和总目标的倾向,要及时加以引导和教育。

五

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所进行的或大或小的改革,我们的所有制形式多样化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继续占着优势,比以往更加壮大了。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的城乡个体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城镇和乡村都有一些劳动者请了几个帮工、带了几个徒弟,也有极少数人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外国资本家、港澳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同我们开办了合营企业,数量很少,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生产经营方面责任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渡形态的经济形式。随着各项改革的进展,这种中间的、过渡的经济形式还会更多地出现。总

之，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局面，已经发展并将继续发展。

就经营方式来说，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同样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小型企业（包括工业、商业、饮食、服务、修理等），有的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有的可以租借给集体或者个人，实行国家征税、资金付费、自负盈亏；大中型企业则逐步推行以税代利。在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各个地方，甚至同一个地方，具体做法也各不相同，互有差异。

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它们的存在、发展、转换、淘汰，或者被新的所代替，归根到底，取决于是否能够适应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某一种所有制形式，某一种经营方式，因为适合某一个地方的生产力水平，因而是优越的；而在另外的地方，由于生产力低于或高于那种程度，这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就不一定是优越的了。

在上述各方面，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研究的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对于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要求的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进行综合的总体的研究，即整体的、宏观的研究，需要组织一批既有实际经验又有理论素养的专门家去做。与此同时，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单位，对于本部门、本地区、本单位的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微观的研究。不论哪种研究，都要着重注意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都不能用孤立的、

静止的、片面的、只见其表不见其里的方法。对每一个新事物，都要研究它产生的环境、存在的条件，同周围事物的关系、发展趋势和对人们的不同影响，以及在各个发展阶段人们的思想动向和实际表现。总之，要力戒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力求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共产主义在今天的实践。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对于城乡超过国务院的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中央领导同志还明确指出，有个别户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明确，头脑清醒，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中央文件讲不要公开宣传，当然不是说不要注意观察，不是说不要进行调查研究。建议省、市、自治区的宣传部门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各选若干典型，进行深入、细致、周密的调查研究，然后在适当时机，召开全国性的会议，专门进行讨论。

在调查研究中，有几点是应该注意的。现在的雇工户，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出现的，它产生的社会条件同旧社会根本不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注意数量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产生作理论分析时，曾经分析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数量界限。现在由于许多具体条件很不相同，可能需要有多种不同的数量界限，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当时提出的数量界限。第三点，要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值是劳动创造的，通过雇工占有别人的剩

余劳动,即使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也不能说不是剥削。当然,也不能把劳动者之间的换工,说成是雇工。第四点,对雇工户的利润分配情况,交公多少,雇主和雇工各得多少,要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建议,由主管部门制定对雇主征税的税种、税目和税率。

“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以前一段时间,曾经把许多本来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说成是资本主义,有的地方甚至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去“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教训必须记取,这个错误不应重犯。当然,我们也绝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把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说成不是资本主义,把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也说成是社会主义。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慎重对待。

六

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包括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人员,也包括重视社会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工作者。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什么条件下必须存在,要创造什么条件才能消失;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方面都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分别地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写出有分析、有见解、有说服力的著作。

搞社会科学的人要学点自然科学,搞自然科学的人也

要学点社会科学。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都要用自己的知识为这个伟大事业服务。因此,所有知识分子都要了解这个事业,以便服务得越来越好。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需要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需要高尚美好的精神产品。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要在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增长人们的科学知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形成人 and 人之间的新型关系等方面,担负重要的责任,作出应有的贡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规模和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高低和文化素养的深浅。因此,知识分子都要自觉提高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建立对本职工作的高度事业心,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同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同共产主义事业密切联系起来。知识分子都要积极参加今天的共产主义实践,密切同工农群众的联系,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行动。

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学习,加强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学习,将比过去越来越重要。我们的事业在前进,国内国外的情况在变化,许多新问题会不断提出来。为使这些新问题得到正确解决,以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需要社会科学的知识。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党中央越来越显示出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但是,这决不等于我们宣传文教战线的同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理解和贯彻执行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水平都很高。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同党中央的要求还很不适应,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还很不够。列宁夫人回忆说,列宁遇到重大问题要解决的时候,总是向马克思请教,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要学习列宁的态度和方法,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请教,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和中央所制定的文件请教,向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首先是邓小平、陈云同志的著作请教。

这里有个大题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怎样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邓小平文选》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提高认识,加深理解。怎样把学到的东西同我们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加以宣传,加以阐述,这是宣传文教部门首先应该承担的任务。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共同努力,从不同侧面进行研究,进行论证,争取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贡献。

要大大提高对知识的重要性的认识,继续批评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特别要重视人民教师的作用,他们是培养下一代、提高我们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力量,要养成尊师的社会风尚。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进知识分子的管理制度,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

活条件等等,我们党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并还将采取措施进一步解决。首先要打破人才的“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单位所有制”,切实改变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状况,使人才适应国家建设各方面的需要,能够合理流动。这当然不是说,可以不顾国家的需要,只按照个人的打算随意流动。要认真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确实做到多劳多得。胡乔木同志说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多数精神产品要作为商品流通,但任何精神产品决不能脱离自己的精神目的而盲目地商品化,它们的生产者决不能商人化。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记住这条重要原则。我们要注意防止和纠正使精神产品脱离精神目的而盲目地商品化的做法和说法。

七

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制度,而且是一个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包括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的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的历史条件以及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的失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and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也需要日益发展和完善。我们的目标,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之

努力奋斗的三位一体的任务。

因此，在建设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经常地注意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这里面也包括一系列的改革，主要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前面说到的关于国家机构的改革，就是这种改革的一部分。还要注意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如果说由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和艰巨的任务的话，那么由于同样的原因，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一个长期的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持久地、毫不动摇地注意和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也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观察民主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各项任务。这里至少包括以下一些方面：（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共产主义（包括它的第一阶段）与以往所有其他社会形态不同的地方，在于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群众自觉地参加创造历史的活动，参加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建设。这种特点必然要求发展高度的民主，使全体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二）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产生和建立起来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民主问题。社会主义民主亦即无产阶级民主或人民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有根本的区别。资产阶级民主是剥削阶级的民主，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人民内部最广泛的民主

与对极少数阶级敌人的专政的结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离开阶级分析的观点,是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的。(三)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此相适应,应当是全体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享有管理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和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实现,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健康发展。(四)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社会主义要求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要求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这种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就是要求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高度的集中。从这方面说,社会主义民主也与反映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资产阶级民主有根本的不同。(五)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经济顺利发展的保证,但也要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正如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样,建设高度民主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能脱离经济文化水平企图一蹴而就。同时,任何时候也不能松懈这方面的努力。(六)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将来由这个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民主的发展同整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发展一样,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这就是人

类从必然到自由的发展，全体人民不仅要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而且要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在它的高级阶段上，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

八

现在既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整个社会来讲，我们当然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现在妨碍按劳分配原则贯彻执行的最大障碍是平均主义。要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需要继续批评和克服平均主义。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寻找适合各自情况的克服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办法。

这几年重点批评和纠正平均主义，强调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起了重要作用。农村情况比较好。国营企业也开始有所改善。批评和纠正平均主义，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有任何动摇，必须长期坚持。但是在理论、政策的宣传上，又要防止和克服某些片面性。比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从社会总产品中首先应该扣除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

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马克思说：“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7】}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肯定和重申了这些观点。我们由于没有能很好结合我国情况全面地、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观点，以致有些人就只看到个人、本企业的所谓“劳动所得”，很少或根本不考虑必要的扣除，实际上把按劳分配理解为分光吃光。在社会总产品中，如果没有必要的扣除，怎么维持简单再生产、进行扩大再生产？国家怎么集中资金进行建设？如果遇到不幸事故、自然灾害怎么办？在消费资料中，如果没有必要的扣除，国家机关、军队的正常活动怎么维持？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及其他社会公共事业怎么发展？怎么进行智力投资？国家拿什么提供各方面的必不可少的补贴、救济？等等。只考虑个人或本企业得到的越多越好，吸引大家都去只想自己多挣钱，搞承包基数越低越好，根本不管国家利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甚至不惜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直到采取各种办法揩国家的油，这叫什么按劳分配？与此相关，还有些现象也很值得注意。特别像国家规定女职工应该享受的一些福利待遇，本来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但在有些搞经济承包的企业也受到了影响。这些企业撤掉哺乳室，不执行晚婚、晚育的优待规定，擅自缩短产假或产假期间扣发工资。这显然是

错误的。总之，为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了每个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的利益，必须保证各项必要的扣除，不能把这个也叫做平均主义。

这里还有一个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些特点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丝毫也不能割裂开来。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就谈不上实行按劳分配。现在有些文章讲按劳分配，就不大注意这种关系，似乎按劳分配就是一切，个人眼前实惠就是一切，以至于发生挖社会主义经济墙脚的事情。实行按劳分配，进行按劳分配的理论研究和宣传，都不能忘记按劳分配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必须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否则就同自己的性质相背离了。

这些道理，只要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切实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可以讲清楚的，广大群众是可以接受的。

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把按劳分配原则当成革命的最终目标，也不是要放弃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列宁说过：“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8】}我们的一切革命工作都是在共

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进行的，都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发扬共产主义革命风格，既是共产主义事业所要求的，也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可缺少的。现在有一种现象，即名义上说实行按劳分配，实际上却违反按劳分配的原则，如用各种名义滥发奖金，损害了国家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这是必须防止和纠正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只有站在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度，才能深刻理解和正确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我们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政策，坚持不懈地同“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贯彻执行按劳分配政策主要应该批评平均主义，同时也要批评用雇佣态度来对待按劳分配。实行按劳分配，现在不是过头的问题，而是实行得不够的问题。我们有些同志前两三年把按劳分配的原则说成是斤斤计较、两两计较；在提出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后，有的同志又走回到老路上，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性质。看来，很有必要结合各方面的改革，正确宣传和坚决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既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指导，歪曲按劳分配原则，也不能一提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又对按劳分配原则发生怀疑和动摇。

九

按劳分配是物质利益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但物质利益原则包括的内容比按劳分配宽广得多。物质利益原则除了承认个人物质利益以外，还包括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长远和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不能只用按劳分配的原则去说明。不能因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误认为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同物质利益原则二者是统一的、一致的，是应该结合、也是可以结合的。这也涉及怎样看待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质利益原则的关系。

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述。党的任务就是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动员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归根到底是根据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正确解决人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9】。这里讲了政策，也讲了宣传，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当然，利益不仅是物质利益，但是物质利益毕竟是利益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还讲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0】“领

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11】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党要领导人民取得建设的成功,使人民的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有所改善。与此同时,也要领导人民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认为只需要讲眼前的物质利益,不必讲马克思主义,不必讲共产主义,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人们要真正认识自己的利益所在,特别是要认识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是不容易的,需要进行教育。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否认个人利益,同时又认为,个人利益只有随着民族的、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不能离开整体利益追求个人利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地位,形成了全体人民的共同的物质利益。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都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总水平。社会生产的增长,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民收入总额的增加,成为实现和不断提高全体人民个人物质利益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再具有对抗的性质。这三者的利益可以也应该结合起来和统一起来,其前提就是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进行这些方面的教育,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

+

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列宁有一段话:“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些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按照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按照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需要。”【12】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讲:“所谓共产主义,严格说来就是无报酬地为社会工作,不考虑个人的差别,丝毫没有世俗偏见,没有守旧心理,没有旧的习气,消除各个工作部门的差别,劳动报酬上的差别等等。这是我们能够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仅投入军事斗争而且投入和平建设的最大保证之一。”【13】

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原则。一般地说,我们要求劳动者有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主人翁的态度。是不是因为要实行按劳分配,要实行物质利益原则,就回避、削弱对共产主义劳动的提倡和宣传呢?不应该这样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由少到多、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有许多共同点,高级阶段的许多因素,往往在低级阶段就产生、存在了。共产主义劳动就

是其中的一种。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从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来，很多党员、很多先烈就是自觉自愿地以共产主义精神来进行工作和劳动的。社会主义时期，甚至在“四人帮”压制的时期，我们很多的先进分子和劳动者也还是这样做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提倡共产主义劳动的时候，特别强调自觉自愿。我们宣传、提倡共产主义劳动，也要强调自觉自愿的原则。不能用强迫的办法，硬要人人都从事没有报酬、不用定额的共产主义劳动。当然，这不能理解为不可以为了公共利益来组织人民进行各种形式的义务劳动。我们宣传、提倡、表扬从事共产主义劳动的人们，这只会有利于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而不会有害于实行这个原则。

共产党员也要吃穿住行，也有个人利益，多劳也应该多得。但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不应该去追逐个人的物质利益；工作和劳动首先不是为了换取社会给自己的报酬，而是为了对党对国家为人民多作贡献。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自己加点班，吃点苦，应视为当然。你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如果不严格要求自己，鞠躬尽瘁地为党工作，而是一味计较个人的待遇和地位，这不是把自己降低到落后分子的水平了吗？

十一

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要继续坚持下去。我们的

对外开放政策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确定的，也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正确认识和处理在实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和外国人搞合营企业，我们的工人创造的利润，一部分被外国资本家拿去了，对这种现象怎么看？允许外国人到中国来设厂，同他们订合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共产主义者怎样同资本家打交道？陈云同志讲得好：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中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以后还要发展。要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我们的原则是平等互利。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过去我们吃了一些亏，有些是难免的。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善我们的经营，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尤其重要的是，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记住，和我们打交道的大多数是资本家，千万不要抱有这样一种幻想，以为他们会不图自己的利益来帮助我们的四化建设。我们的四化建设，归根到底，还是得靠自己，靠自己的艰苦奋斗。这是共产主义者从事自己事业的基本出发点。共产主义运动是个国际性的运动，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要完成国际主义的任务，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首先要把自己的民族解放出来，在本民族争得无产阶级的统治，并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对外实行开放怎么同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联系起来，要从这个方面去加以理解，提高我们的觉悟。

十二

邓小平同志讲：“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14】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爱国主义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在现阶段，爱国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讲的这三大任务。要把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结合起来。

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国一切共产主义者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必须履行的历史职责，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神圣任务。共产主义者是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者，不论经过怎样漫长曲折的道路，终究会认识到这个真理，把共产主义者看成自己的好朋友；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也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收回香港和澳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一切爱国者的共同愿望。党和政府已经宣布，在统一之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也就是说，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

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允许台湾和港澳保留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可以在共产主义问题上保留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祖国统一、主权完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问题上，应该而且能够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5】}共产主义者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不是心胸狭隘的人，而是胸怀非常广阔的人。只要是爱国的人，只要做了爱国的事，都应该肯定，都应该团结。即使过去做了坏事的人，只要改恶从善，我们就不应嫌弃他们；只要弃旧图新，我们就不应疏远他们。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人越多越好。同样，爱国的人也是越多越好。我们要有这样的胸怀，学会这样的本领。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也是我们爱国主义的原则立场。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不只是坚决反对美苏两国当局对别的国家实行霸权主义政策，同时也坚决反对他们对中国实行霸权主义政策，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从民族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规律。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中国许多先进分子已经走过、正在走着的共同道路。我们应该清醒地估计到，决心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奋斗终身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现在还是少数，包括共产主义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

在内的爱国主义者则是绝大多数。不爱国甚至卖国的人很少很少。我们要根据人们的切身经验,联系经常发生的具体事件,从爱国主义教育入手,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提高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并把这种热情和觉悟同人们所从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逐步提高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为争取祖国独立、维护祖国荣誉、争取民族解放、捍卫民族尊严而英勇奋斗了六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有本领团结和领导绝大多数爱国者,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

十三

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6】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说：“中国用以指导自己同各国发展关系的一贯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7】}同时，“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18】}

这种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体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这里所讲的每一项原则，都需要根据历史的经验，进行论证和阐述。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外交往的发展，经常发生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政府遵循这些原则来分析新情况，决定各个时期对外活动的具体方针、政策。从事宣传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要密切注视，认真理解，组织研究，积极宣传，对内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同时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要正确地阐述我国的对外政策，生动活泼地介绍我国的建设成就，以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

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所以，研究外国和向外国宣传中国这两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开展和加强。指导思想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 we 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

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

十四

愈是对外实行开放,愈是对内搞活经济,愈是进行各项改革,就愈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这是每条战线、每个部门、每个地方所有共产党员都应该注意的问题。这里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制定和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和进行各项改革的具体政策,都应该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二是由于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各种思潮的影响,如果方向不明确,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即使是正确的政策,也可能被歪曲,甚至遭到严重破坏。三是我们愈是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就愈有力量、愈有办法保证对内对外政策的正确执行,即使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能够妥善地解决。

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进行各项改革,总的方向、总的目标都是要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这也是宣传工作的总方向、总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宣传部门的同志和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牢牢记住恩格斯的话,不能为了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我们还要牢牢记住列宁多次讲过的话,不能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

级的根本利益。我们解决每个阶级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采取一个个切实的步骤,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理想,绝不能离开这个伟大理想。进行改革要做某些必要的让步,但我们的头脑必须是清醒的。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实际,运用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论阵地。

列宁说:“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20】}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21】}

在工人阶级政党执政以前,列宁曾经多次指出,工人运动只能自发地产生工联主义的意识,要使工人阶级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从外部灌输进去。共产党人应该把工人提高为革命者,而不是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共产党人是觉悟工人的代表,而不是不觉悟工人的代表,至于迎合部分工人的落后性,那更是最危险和最有罪的事情。工人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列宁的这个基本观点是不是过时了?我们认为不仅没有过时,还必须坚持,而且要根据新的条件给予补充和发

展。这进一步说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令、条例，都是在向人民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它们保证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制定一条路线，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只要颁布一些法律、法令、条例，只要有了广播、电视、报刊、书籍的宣传，所有问题就可以畅通无阻、毫无遗漏地全部得到妥善解决。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包括他们自身利益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利益，认识他们当前的活动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联系，认识并自觉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必须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针对不同问题、不同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否则，任何一个正确的方针、政策，都可能在贯彻执行中间被曲解，产生和原来设想相反的后果。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宣传教育工具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手里，我国人民在全体规模上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觉悟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共产主义实践的发展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的精神面貌还将日新月异地发生变化。但是，中国封建社会有悠久的历史，封建主义思想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但是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仍然存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存在了，但是资产阶级的影响仍然存在。对外实

行开放政策以来，外国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重新涌进来。出国人员愈来愈多，有些人迷惑于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崇洋媚外、卑躬屈节、丧失国格人格的人和事，屡有出现。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的严重犯罪活动大量发生，这是国内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集中表现。党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保持共产主义纯洁性，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很有针对性的，是非常及时的。

十五

上面这些，大体上都是同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是我们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我们坚持十二大所确定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要通过先进分子来影响和推动人民中间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进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宣传和教育。要把现阶段从事的共产主义实践，同将来要达到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使人们不仅知道目前阶段我们要做什么事，而且知道向着什么目标前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还宣传共产主义，现在进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了，怎么能够停止这样的宣传呢？当然，这种宣传必须是科学的，就是说，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绝不是像一九五八年那样，没有根据地描绘一些具体的细节，把共

产主义庸俗化。那种不科学的宣传，只能损害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十六

十二大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党章。按照新党章，把党整顿好，建设好，使党员成为合格的党员，并经过他们去团结一切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这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组织保证。

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员要提高共产主义觉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要特别强调的是，共产党员要有自我牺牲精神，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如果向共产党员说，共产主义好得不得了呀，你个人一点损失也不会有呀，就像鲁迅讽刺一些人的时候讲的那样，“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22】}如果这样宣传，就危险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很伟大的。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光荣的。要实现这个伟大理想，没有共产党员和其他先进分子的自我牺牲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主张无谓的牺牲。但是必要的自我牺牲应该提倡，已经作出牺牲的应该表扬。不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自觉自愿地自我牺牲，就绝不会有我们事业的胜利，绝不会有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果我们

不在共产党员中提倡自我牺牲精神，党就不会有战斗力，而且会腐败下去。在自我牺牲这个问题上经不起考验的人，是不配称为共产党员的。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执政党不能追求党员的数量，而应注意党员的质量。列宁主张，“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23】

胡耀邦同志讲，整党也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经过新党章的教育和学习，使共产党员都成为合格的党员。不合乎党员标准的人，就不能让他有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干营私舞弊、争权夺利的事，这是绝不能允许的。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降低共产党员的标准。

按照新党章的要求，共产党员都成为合格的党员，按照新团章的要求，共青团员都成为合格的团员，再由他们去团结一大批愿意干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十二大提出的伟大目标，一定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比较不完善发展到比较完善，并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创造条件，逐步地过渡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注 释

-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 【2】 《中国共产党章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4 页。
- 【3】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4 页。
-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8 页。
- 【5】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2 页。
- 【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73 页。
- 【7】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0—11 页。
- 【8】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8 页。
- 【9】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28 页。
- 【10】 毛泽东：《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63 页。
- 【11】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73 页。
- 【12】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列宁全集》第 38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43 页。
- 【13】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 37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49—350 页。
- 【14】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 【15】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1 页。

-
- 【16】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 【17】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 【18】 同上书，第226页。
- 【19】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 【20】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 【21】 同上书，第40页。
- 【22】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页。
- 【23】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页。

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

坚持党性,是做好新闻工作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中央一级的报纸,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办得比较好的,对这个问题认识都比较清楚。个别的报纸,包括中央一级的报纸,一时出了一点毛病(有的时候毛病出得还不算小),原因之一,也还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对于党的领导、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说,民主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不能代替科学的领导。党为了实行正确的领导,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门科学。少数服从多数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革命和建设中的很多问题是不能只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解决的。只有民主和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把少数服从多数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取得胜利。

在党性和人民性这个问题上,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有的同志说话不妥当,做法也不妥当。有的同志讲,个人服从

* 这是邓力群同志同华北六报协作会议部分负责同志的谈话。

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三条的实质都是少数服从多数。按照这个逻辑，党中央就要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党中央是少数；全国代表大会就应服从全体党员，因为三千多个代表在四千万党员中也是少数；而四千万党员在全国人口中还占不到百分之三，也还是少数，那就要服从全国人民。有些同志就这样把少数服从多数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处理一切重大问题的唯一的原则，可以代替一切的原则。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实际上是要求一切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得经过全民投票表决。这样才算是民主的充分实现。当然，我们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对许多同志来说，都有一个加深认识、统一认识的过程，不要以为正确的东西能够一下子都会为多数所赞成。比如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中央是下了决心的，如果实行全民表决，能够不能够通过，我看是一个问题，起码是相当困难，甚至可能通不过。因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本位主义思想，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作怪。中央的这一决策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继续前进，不能得到发展。表面上看，只是中央作了决定，领导机关作了决定，并没有进行全民投票，但实际上这个决定真正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不仅符合人民的眼前利益，而且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这才是科学的领导。

有这样一类说法：党性来自于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据此，在实际工作中也就提出，报纸究竟是对人民负责还是对党负责？是听人民的意见还是听党委的意见？发表这

种看法的同志认为,过去我们吃亏就吃在不听人民的意见,只听党中央的、同级党委的意见。所以,以后要办好报纸,就必须首先听人民的意见。至于党中央的、同级党委的意见,如果我这个编辑、记者认为它符合人民的意见,可以照办,否则就可以不执行、不宣传。

这种看法,涉及到党报要不要坚持党性的问题,这是新闻工作中的一个占首要地位的问题。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它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既代表人民的眼前利益,也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党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集中和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见和意志。因此,党报坚持党性,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也只有坚持党性,才能体现人民的利益。把党性同人民利益分开以至对立起来的任何说法,都是错误的。胡乔木同志讲过,不要以为多数就不犯错误,也不要以为人民就不犯错误,历史上人民犯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的例子是很多的。我们的编辑、记者,即使是很好的同志,也很难保证自己认为好的意见就都是代表人民、符合人民利益的。何况难免发生另外的情形,就是这些同志所谓的人民的意见、多数的意见,实际上并不是多数的意见,就是说,实际上是把少数人的意见当成多数人的意见,用所谓“人民”的名义来改正所谓“党的错误”。当然,出现这种情形,一般地说不是有意的,而是因为思想认识水平不高,接触的人有限,了解社会情况有限,因而反映人民的意见及其正确程度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每个报纸都经常收到大量群众来信。很多信确实反映了我们工作中间的毛病、问

题。但是，如果报纸对人民来信中提出的意见不加分析、一概照办，恐怕就会在人民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

应当指出，现在人们提出的所谓人民性，在概念上是含糊不清的。由此提出什么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无论是说人民性高于党性，或者党性高于人民性，都只能引起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对正确理解和坚持我们的党性毫无帮助。“人民性”这个用语，马克思在《莱茵报》上用过一次，成为我们一些同志坚持自己道理的一个理论根据。俄国激进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用得比较多。我们“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沿用别林斯基他们的提法。马克思当时用人民性这个术语，有它特定的背景和含义。它是针对当时德国诸侯的代表要求所有出版物成为反映他们的观点的上流社会出版物这一情况而说的，而当时德国那些出版物，本来就是民主主义的出版物，因此马克思用了“人民性”这个术语。别林斯基他们用“人民性”这个术语，主要是讲文学创作中反对帝俄专制主义的民主精神。他们的意见，在当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什么人民性、党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含义。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同意离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不对每个历史时期人民中间的阶级划分、经济结构、政治状况进行具体分析，而抽象出一个人民性的概念来。人民的利益、愿望有其共同的

方面，也有其不同的方面，就是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的利益也并不等于是人民中不同阶级、阶层各自利益的数学的总和。人民的利益仍然集中于工人阶级领导的进步事业中间。你说报纸的人民性，这个人民性是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反映哪个阶级，支持哪个阶级的？我们今天在讲党报要反映人民意见这个问题上，使用“人民性”这个用语是不科学的。我们说的党性，是指无产阶级党性。讲党性来自于人民性，同马克思主义原理是相违背的。无产阶级党性从何而来？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列宁讲得很清楚，不用说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本身，也只能自发产生经济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工人阶级只能提出经济要求，或者诸如保证工人运动合法性、保证工会活动合法性一类的政治要求。这一阶段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仅仅是罢工，目的是改善生活，改善政治地位。比如说劳动时间太长了，工人通过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资本论》就讲到劳动立法等等是经过工人斗争得来的。可是，这一阶段工人的经济的斗争、政治的斗争，正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灌输，不可能提出消灭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统治的要求。这种政治要求不是在工人阶级内部自发产生的。只有靠先进的科学家、先进的知识分子、先进的人物，总结和提高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人类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够产生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使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

阶级以后,才能为上述政治目的而奋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是从外部灌输到工人中间去的。所以,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来讲,也不能认为党性来自人民性。

有的同志讲,我们党过去犯过很多错误,报纸也跟着犯错误。如果当时报纸不跟着党委的意见办,不跟着中央的意见办,不是可以避免那些错误吗?请同志们回想一下,“大跃进”的时候,我们的记者、编辑、总编辑,个个都那么高明?有几个同志当时发现了问题?那股风愈刮愈大,我们的报纸一点责任也没有?我们党历史上犯的错误,应该由领导承担责任。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党中央已经承担了责任。但是,这不是说其他同志就没有经验教训了。恐怕在座的同志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可能犯错误,而人民中间的其他阶级、阶层,是不会犯错误的。如果这样的说法可以站得住脚,那么整个现代史就要完全改写,四项基本原则也可以不要了。我们办报的同志有局限性,也有优点。如果我们报纸的记者、编辑跟群众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能够及时地、正确地反映群众的要求,这正是他们坚持党性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记者、编辑真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的党委,我们的中央,是会接受的,现在更是这样。你们向党委提出,如果同级党委不听,再向上一级党委反映;上一级党委不听,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也可能一个时期不听你的意见,但是你要相信,经过一个时期以后,当实践证明你的意见确实合乎人民的眼前利益、又合乎人民的长远利益时,同级党委,直到

党中央，一定会接受你的意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实践进一步证明，党性来自于人民性的观点是站不住的。我们不能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对立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作出各项决策，既考虑到全国人民的眼前利益，又考虑到长远利益；既照顾了局部利益，又照顾了全局利益。这样，才使我们的各项事业一年比一年更好。如果只顾眼前，那就像陈云同志讲的“分光吃光，国家没有希望”。我们中央不是采取这个政策，而是主张吃了穿了以后，还有余力搞建设。这样国家才有希望。从全国范围来说，这些决策是中央作出的，并不是哪一个工人、农民或者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但实践证明它们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个别同志甚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界走在党中央的前面。认为是理论界提出理论，制造舆论，然后迫使党中央接受这些意见，制定出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界的同志做了很多工作，有贡献，这是对的。但是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形成的一套路线、方针、政策，那就不能归功于理论界，更不能归功于理论界的哪个同志。这是全党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全党总结经验教训，又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意见。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重申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各个方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不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的错误，即使有错误，也可以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说党中央制定政策是跟着理论界一部分人走，这种说法是很可笑的。

如果我们同意党性来自于人民性的说法，我们党就不能有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统一的步调。你认为中央这个不对，他认为中央那个不对，究竟对不对，只能由实践来回答。如果一个人只根据自己局部的、片面的、表面的经验，肤浅的观察，甚至是道听途说，就对党中央的决策、对党委的意见持怀疑和抵触甚至反对的态度，编报纸的同志这样搞，理论工作者这样搞，文艺工作者这样搞，那我们全党怎么行动，各级党委怎么来领导呢？

党章充分保证全党所有同志有向中央反映各种问题、向中央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的权利，以及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但是党章又规定，在中央、党委改变决定以前，任何党员都必须在行动上执行中央、党委已经作出的决定。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我对中央的某项决定有意见，就在报纸上发一篇评论，发一个消息，公开宣传和中央不一致的甚至相背离的意见。你有意见，可以和应该在党内提出来。公开宣传同党中央不一致的意见，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是会产生不良后果的。党报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只有这样，才谈得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当人民的喉舌。把听党的话和代表人民对立起来，认为二者势不两立，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讲过对人民负责和对上级负责的一致性。这二者应该一致，可以一致。有时候也可能发生一些矛盾，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既坚持原则性，又坚持纪律性，积极向党委直至中央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但在行动上必须执行党委的决定。各地都有

这样坚持党性原则办报的经验,我们希望很好地总结起来,对本地区、本单位从事新闻工作、宣传工作的同志进行一次教育。

知识分子的成长和 在新时期的光荣职责*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

我们几个同志是八月十四日到兰州的。适逢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一九八三年敦煌学术讨论会开幕。我们有幸参加这样一个盛会，感到非常高兴。李子奇同志要我讲话。我是做宣传工作的，和参加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学术讨论会的同志见见面，谈点个人的感想和意见，供大家参考。

昨天刚从敦煌参观回来。过去只是从文字上、图片上得到一些间接的知识。亲眼去看一看，有了一些直接的知识了。敦煌确实名不虚传，不仅是艺术的瑰宝，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艺术的研究，史料的研究，都要从敦煌的宝藏中汲取营养。在史学方法上，郭沫若同志曾经说，史学工作者要占有历史文献，又要重视历史文物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常年留存下来的地上的文物古迹的研究，也包括对不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一九八三年敦煌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断出土的地下文物古迹的研究。要用这些文物来补充和验证历史文献的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千年的历史过去了,留下了很多的文献。这些文献的作者各有局限性,究竟反映了真实,还是没有反映真实?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让历史重演。但是,对出土的和地面上的各种文物古迹的科学考察,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历史文献的真伪和判定它们的价值。我觉得郭老的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敦煌不仅对我们的艺术家有价值,对我们所有的史学家,甚至语言学家、建筑学家、社会学家都有价值。它前后延续一千多年,经过许多朝代,每个朝代都有洞,都有泥塑,都有壁画,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艺术风格。尽管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不仅宗教盛衰本身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而且拨开宗教的神秘色彩,剔除它的荒诞的内容,更可以从中探索社会生活变化的脉络。像莫高窟这样保留了一千多年来历史演变过程的形象化的材料的地方,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希望我们的历史学家、艺术家、建筑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学者,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敦煌学,亲密合作,互通有无,并且广泛吸取外国学者的有益的研究成果。这次没有机会去吐鲁番。我们的学会叫敦煌吐鲁番学会。我们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希望这门学问能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敦煌学吐鲁番学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开阔我们的眼界,为人类认识的宝库做出贡献,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争光。这次会很有意义。我代表中宣部祝贺会议的成功,预祝敦煌吐鲁番学研究

取得更大的成果。敦煌吐鲁番的研究需要支持。敦煌在甘肃，吐鲁番在新疆，我相信甘肃、新疆的党政领导和有关方面也一定会给予更多的支持。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拟订人才的培养计划。在座的有教育部的顾问周林同志。我想教育部已经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希望能够进一步落实。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把分散在各地、各部门的人才适当地聚集起来，为研究工作者的合作和互相切磋、互相探讨创造条件。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将成为甘肃、新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中心的新起点。

在敦煌吐鲁番学问题上，直接有关的话，我只能说这么几句。

我想着重讲一下知识分子问题。这次离开北京沿途经过河北承德，山西大同、雁北地区，接着由内蒙古、宁夏到甘肃。一路上主要听宣传文教部门的同志们介绍情况，同时接触了一些知识分子。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汇报一下我自己见到和听到的知识分子和他们工作的情况。敦煌文物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科研人员共四五十位，其中有两位研究员，五位副研究员，十位助理研究员。尽管人员还不够，但是经过艰苦的努力，已经有一个研究集体了，而且这个集体的水平是不错的。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直接接触到的的是副所长樊锦诗同志和搞雕塑的沈纪元同志及沈纪元同志的夫人。我对敦煌学没有知识。樊锦诗同志用个把钟头对敦煌的历史沿革和近五百个洞子的情况分类做了介绍，要言不烦，简明清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后，她带领

我们参观，逐个讲解各个洞子的不同风格、特点所在。这是她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认识。这位女同志一九六三年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自愿到敦煌来；丈夫在武汉大学工作，也是考古专业毕业的。两个孩子，一个托在她母亲家里，一个她丈夫带着。二十年来，她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她坦率地告诉我们，也曾经想离开过，但是仍然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呢？她代表他们的集体说：敦煌在中国，敦煌理应成为敦煌学研究中心；这个重任，我们应该承担起来。这是她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同志们的共同心愿。她说，夫妇常年分居，生活上困难很多，两口子难免吵架。可是一想到外国有人讲，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就感到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刺激。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革命者，一定要争这口气。有这样的理想、这样的境界，她才能够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和生活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现在。经过老学者、专家、樊锦诗和其他同志的艰苦奋斗，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些科研成果，已经陆续得到国际上的承认。比如敦煌的临摹，到好几个国家去展览，都得到好评。昨天季羨林同志告诉我，唐长儒同志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和北大编的《敦煌文选》，国外敦煌学的研究者也很重视。敦煌学的研究已经在艺术创作上开出了美丽的花朵。《丝路花雨》连演六百多场，中外观众都认为它是我国舞蹈艺术的一个突破，是敦煌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也是舞蹈民族化的创新。

在宁夏看了一部由兰州沙漠研究所录制的纪录片，讲

宁夏人民治沙的事迹。最近报上也发表消息,说中卫县已经把沙进人退的状况改变为人进沙退。从包头到兰州铁路沿线,沙漠实现绿化长达四十多公里,包兰线通车将近三十年,没有因为沙漠的侵袭中断运输。宁夏自治区负责同志黑伯理告诉我,说中卫县是宁夏自治区绿化最好的一个县。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绿化的成绩,这是兰州沙漠研究所知识分子和中卫县人民群众共同努力、艰苦劳动的结晶。他们的治沙经验得到国际上的重视,有的国家已经派人来参观、学习。兰州沙漠研究所的刘恕同志也是个女同志。现在已经成为甘肃省的副省长。那个影片确实非常感人。在漫天黄沙的困难条件下,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干下去,没有顽强的毅力、高度的责任感,没有对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感情,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在银川,我们参观了宁夏医学院。副院长又是个女同志,一九五七年长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宁夏,几十年来一方面从事医疗工作,一方面进行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成为有成就的心血管病专家,被评为副教授。宁夏医学院一九五八年成立,二十几年毕业生已经遍布于宁夏各地,单是这个事实就足已说明,这些同志的辛勤工作,为保证宁夏各族人民的健康,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宁夏医学院教职员一百一十人,其中党员教师占到百分之四十。这样一批党员知识分子,他们为宁夏各族人民服务的精神,对于学校越办越好,具有重大意义。“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宣传部的“五七干校”就办在宁夏。这次跟我一道来的一位同志当时在那

里。离开十年，宁夏的农村、城市变得使他认不得了。那时，中宣部的干校种水稻，采取插秧的办法，农民是撒种。农民围着看，说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是开玩笑，种稻子怎么这样种。干校同志试验搞无土育秧，农民说这是糊弄人。干校的水稻平均亩产四五百斤，当地农民只有一二百斤。这次黑伯理同志告诉我们，银川平原水稻亩产已经平均达到七百斤，高的达到一千三四百斤。插秧已经普遍推广了，一部分地区采取了无土育秧的办法。采用先进的办法，可以抢种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稻子。我们这位同志到他熟悉的农民家里，问你们现在日子怎么样？那个地方可能离城市近一点，说万元户不在话下，两万元、三万元、四万元的户已经出现。黑伯理同志说，现在能灌溉的土地有四百多万亩，再修一条干渠，可以增加三百多万亩。如果再发展一点，整个宁夏平原可以成为八九百万亩的高产的粮食基地。农民由不相信科学种田，到相信科学种田，到普遍学习和采用新的耕作技术和经营管理技术，这中间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农村的进步，农民生活的改善，是和农业科技人员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在内蒙古临河县，我们访问了团结公社。这个公社已经实行政社分开，成立了乡党委，选了乡长，还成立了一个农工商联合服务公司。最使我们高兴的是，乡党委书记和农工商联合服务公司经理，都是不满四十岁的学农的大学毕业生，已经在这里工作十多年。他们安心农村工作，立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用自己的知识为农民服务，工作很有成绩。

据盟委书记介绍,这个公社是河套最好的公社之一。听了他们的汇报,几年内要做什么事情,达到什么目标,有些什么措施,讲得井井有条,切实可信。我想,如果全国五万个公社,每个公社都有两个大学毕业生在那里工作,像他们一样长期扎根农村,了解农民,懂得科学知识,我们的农村一定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有更大的发展。

在包头认识了几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或者通过自学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的领导同志。市委书记当过几十年水泥厂厂长;副市长原先是一家军工厂的厂长,五十年代到捷克留学,得过副博士学位。这家军工厂可是出人才的,在这以前,已经有一位负责干部当了自治区的副书记,另一位负责干部调任五机部副部长。和我们同到包头的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乌恩同志,也是大学毕业生,在这里另一家军工厂当过十几年厂长。这给我留下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党员企业家已经进入党政各级领导岗位。我给包头的同志说,这件事意义重大。包头的军工厂是贡献很大的,他们生产了很好的产品,而且培养和锻炼了人才。

我们在呼和浩特市参观了博物馆。馆长是个蒙古族同志、文物专家兼雕塑家。博物馆陈列了他的几尊很有水平的雕塑。给我们讲解的一位女同志是副馆长,湖南人,到内蒙古已经二十年。他们的知识渊博,生动简明的介绍,使我第一次知道,内蒙古是古生物化石的保护区之一。在他们的领导下,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在挖掘、保护、研究内蒙古地下文物、古生物化石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大同云岗，接待我们的是云岗文物研究所所长李治国同志。他在那里已经工作了二三十年，可以说成为云岗学专家了。他熟悉云岗、热爱云岗，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云岗的文物事业。每次来参观的人都要问，云岗到底有多少大大小小的石佛。沿袭下来的说法是几万几万，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他就领着所里的同志一个一个地数，白天时间不够，晚上接着干，终于把数目搞得比较准确了。这位同志的事业心、责任心很强，白天当导游、当解说员，晚上为了保护文物，还一个人拿着手电，一个洞一个洞地去察看。他说了和樊锦诗同志同样的话：人讲云岗在中国、云岗学在外国，无论如何要争口气，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国家争光。

我们参观了大同煤矿，到井下看了综合采煤机的作业情况。听说综合采煤机引进以后，因为不会操纵，有一段时间曾闲置在那里。经过技术人员和工人共同努力，综合采煤机全部安装了，投入生产，产量已达到原设计水平。我们参观的一台综合采煤机去年年产达到一百一十万吨，今年计划年产一百二十万吨。据说使用这样的采煤机，世界上年产超过一百万吨的并不多。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矿务局领导同志特意向我们介绍了局的总工程师，一位四十九岁的东北工学院毕业生。如果没有他和矿上广大技术人员的勤奋工作，是很难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的。我们还到了河北省最北部围场县参观了塞罕坝林场。这里地处坝上，正是蒙古高原的南部，过去叫木兰围场，是清代皇帝打猎的地方。经过百年的

严重破坏，到全国解放，原先的茂密森林已经所剩无几了。这是一块一千多平方公里的高寒地区，年平均温度零下一度，最冷到零下四十五度，无霜期只有五六十天，一年中刮五级以上大风的有七八十天，有五个多月冰雪封山。一九六二年开始建林场，在一位老教授的带领下，吸收了一批大学、大专和中专毕业的学生，艰苦奋斗了二十年。现在已经有一千多职工，其中工程师十三人，助理工程师五人，还有一批技术员。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他们造林五十多万亩，抚育天然林三十多万亩。造林营林面积，共达八十多万亩，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人造林场。他们说，从今年开始，造林任务基本完成，进入经营管理阶段。这个林场目前已开始为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小材小料和林木种子。把现有林木折合成木材，加上近几年伐林木创造的价值，已超过原投资二千九百多万元。二十年后林场将全部造成，每年砍伐二十多万立方米木材，收益二千五百万，两年就可以把四十年的投资收回来。从此，每年砍伐每年种植，可以保证这片森林永续不断地存在下去，而且给国家做长期的贡献。林场同志讲，除了高寒，这里喝水也很困难，冬天没有青菜，最多只能吃到土豆。林场场长张硕印同志今年四十五岁，三位副场长也都是四十多岁，都是大专毕业生。和他们交谈，看看林场的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不能不为他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所感动。

我们出来时间不长，走的地方有限，仅仅结识了上面这些同志，耳闻目睹了他们的艰难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他们创造的优异成绩。我们的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

建设的不同岗位上,和广大工人、农民、战士同心协力,英勇奋斗了几十年,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不仅是忠诚的爱国者,而且不愧作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许多同志已经成长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追求真理,孜孜不倦,献身祖国,矢志不二。他们的高尚的理想品德和卓越的才华,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骄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特别值得高兴的是,其中许多同志已经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中央关于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正在到处变成现实。在北京的时候,听说有的同志对实现十二大制定的宏伟纲领信心不足。信心在哪里呢?信心就在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这些战斗在四化建设第一线的知识分子的身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知识分子在各个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积极性更加高涨。有同志说,现在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不是没有根据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巨大的历史转折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知识分子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在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实现“四化”要求以后,他们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做出更大的成绩。我们那些在边远地区、艰苦条件下坚持岗位的知识分子,尤其值得尊敬。这些同志几十年来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于祖国和人民需要的事业。有的同志,在过去“左”倾错误指导思想下,还程度不同地受到各种各样不公平的待遇,只是在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的成绩才得到承认。这些同志没有怨言，没有为个人得失恩怨斤斤计较，而是争分夺秒，更加精神奋发地工作。这次认识的多数是中年同志，四十多岁，五十多岁，也有年纪大点的和比较年轻的。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面貌，也可以看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中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是和老一辈的学者专家、科技人员、教育工作者的培养分不开的。塞罕坝林场就是在一位老教授带动下办起来的。他们的道德学问不仅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创造，而且促进了一大批人才的成长。敦煌文物研究所这个研究集体所以能够出现，能够有今天的成绩，也离不开老专家的心血。像常书鸿同志、段文杰同志，从四十年代开始就在那里扎下根来，为了民族的荣誉、科学的发展进行研究工作，同时聚集人才，传授知识。我在敦煌见到甘肃省副省长朱宣人同志，他是学畜牧专业的，解放后回国参加建设。本来他是江苏人，江苏省有关部门也跟他商量好了，要他到那里当教授。但是他听说要在甘肃成立一个畜牧研究所，觉得在这里可以更好地从事研究工作，就断然离开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江苏，来到当时还是很荒凉的甘肃，从此一直坚持在这个地方。兰州大学负责同志聂大江告诉我们，在甘肃的老一辈学者专家，像孔宪武同志，朱子清同志，杨澄中同志，郑国锷同志，施雅凤同志，刘有才同志，徐躬耦同志，吕忠恕同志，吴有溪同志，除孔宪武同志解放前就在兰州，其他同志都是五十年代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自愿地来支援甘肃建设的。尽管甘肃的生活

条件比内地困难得多，可是他们认识到，这是党的需要，就克服重重困难，一直坚持下来了，为培养年轻一代知识人才费尽心血，不仅把他们的学识传授给年轻人，而且用他们献身祖国、献身事业的精神，用不畏艰难、不贪图安逸的精神，用为国争光、为民造福的行动，教育年轻一代。我们的中青年同志没有辜负他们的厚望。过去他们曾经担心后继无人。事实证明，在老一辈学者专家的带动和感召下，大批有作为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已经成长起来了。昨天季羨林同志对我说，他们高兴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所有老一代学者专家的共同心愿。后来居上，下一代人把老一代人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加以丰富，为祖国建设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这不仅是理想，而且是现实了。小平同志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就讲，一方面希望老一辈学者专家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同时又寄希望于老一辈的学者专家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在一定意义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更为重要。一个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自己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固然已经得到很大安慰，看到更多中青年同志成长起来，有更好的本领，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出色的贡献，那就得到了更大的安慰。老一代学者专家不再担负行政领导职务了，这就有时间把一生的经验、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希望这些老同志老当益壮、雄心犹在，能够有新的突破、新的贡献。我们也希望这些老同志还要经常关心中青年一代，鼓励他们取得新成绩，帮助他们克服缺点。我们的党和人民，我们的中青年一代，将永远尊敬老一代专家学者，永远感谢他们。

中青年同志能够成长,更重要的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制定和贯彻执行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

在座的同志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我们个人的遭遇,我们周围的同志,包括自己的老师、学生、同事的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直到今天,有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各条战线各项事业得到发展,整个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蒸蒸日上,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情舒畅,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期间,迟群说,大学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那时,人们之间成天斗、斗、斗,造反派和“走资派”斗,造反派中间这一派和那一派斗,一派内部这个组织和那个组织斗,一个组织里面互相斗。尽管那时不少专家、中青年知识分子还在坚守自己的岗位,想兢兢业业地做出成绩来,可是又提心吊胆,怕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有些同志没有办法,只好偷偷摸摸地读书,研究学问,深怕人家知道,甚至于连对自己的知心朋友都不敢公开。我们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各项建设事业都全部停顿了。但是应该承认,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地区,作为一个部门,作为一级党委,要把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提上议程,是非常困难的,更不要说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完全变了。我们的工作

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建设问题成为各级最重要的议程，很多过去提不上议程的事情现在提上来了，很多得不到支持的事情现在得到支持了，知识分子不被重视的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为一切爱国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好条件。当然，这也是一个逐步实现、逐步完善的过程，可是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知识分子施展本领、为人民做出贡献的天地会越来越广阔，条件会越来越越好。

当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还存在人们之间的斗争。这个问题是中央早已说清楚了。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我们在一九八二年开展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今年要坚决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动。这些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避免的，是必须进行的。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促进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扫清障碍。这几年来，一些地方黑势力抬头，新的“东霸天”、“西霸天”重新出现，明火执仗地抢劫杀人、强奸，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小平同志讲，严重犯罪活动不是越来越少，这两年是越来越严重，原因没有别的，主要是打击不力。群众不满意，如果再不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脱离群众。现在，女工上下班都要有人接送，晚上女孩子不敢上街，连干部上班也要耽心家里丢东西。酒泉地区的专员告诉我，那里党委、政府和工会组织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开办职工夜校。可是需要特

别招呼工会主持夜校的同志,女职工上夜校必须有人接送,或者想办法把女职工的业余补习挤到白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黑势力这么猖狂,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这么严重的威胁,怎么能安心建设?怎么能安心学习?怎么能安心工作?中央确定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要从快、从重、从严,把这一批家伙坚决地搞掉。小平同志讲要一网打尽。以后冒出一个抓一个,冒出两个抓两个,不能使这些家伙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中央的这一方针,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明显地见到成效。我们建设事业的发展,会不断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大家去了解、研究和解决。任何一个问题,只要钻进去,持之以恒,都是可以为人民、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爱国、进步、革命的传统。在旧社会,他们报国无门,现在报国无门的时代早已经永远地结束了。我们的事业正在大发展,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小平同志一九七七年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实践的教育下,这个道理,人们越来越认识清楚了。在实际工作中,不论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要发展,就不能不考虑:我们的知识到底够不够?我们的人才有没有?我们知识分子作用发挥得怎么样?这些年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遇到一些阻力,这是前进道路上难免出现的现象。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这种阻力终究要被扫除。我们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

但是仍然要为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努力。这同时就提出一个问题,在新的形势下面,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向自己提出怎样的要求,怎样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首先要继续充实自己的知识。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知识,可是事业的发展需要新的知识。对照一下二十世纪末我们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我们都会感觉到,靠现有的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责任心、事业心,在全世界是第一流的。可是,我们也要承认自己还有落后的一面。承认落后,才能下决心改变落后。为了实现确定的战略目标,无论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是文艺工作者,都还要学习、学习、再学习。要向书本学习,向前人学习,向外国先进经验学习,广泛吸收整个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重要的还是要向实践学习,向不断创造新生活的人民群众学习。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要到人民中去,到实践中去,总结人民的新创造,总结实际工作中的新经验。要在社会实践中间取得新的知识,在科学实验中间取得新的知识,在人民群众中取得新的知识。

我想向同志们汇报一下这次出来所看到的农村的一些情况。先说雁北。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从延安出发,经过兴县、岢岚、五寨、宁武、浑源到东北去。尽管这些地方当时已经是解放区,人民生活的艰难、生产条件的落后,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到现在也没有忘记。走到浑源,真是

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遍地黄沙的颜色跟天上的颜色连成一片。房上也好,人身上也好,都是一身黄。群众非常贫困,没有衣服穿,有的大姑娘连条裤子也没有。我们一个队有八十人,你脱一件,他脱一件,走到这家留一件,走到那家留一件,尽量想给群众解决一点眼前的困难。这次到雁北,也到了浑源,只见水渠纵横、一片绿色,到处是森林、庄稼、草地。雁北地委的同志很自豪地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那里人均收入只有五六十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已经摘掉了困难地区的帽子,一九八二年人均收入达到了二百七十多块钱。整个雁北地区的面貌完全改变了。那个地方的群众,不要说生活水平,就是年轻人的知识、欣赏水平,也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他们喜欢看电视,关心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关心超级女排赛中国队打败日本、美国没有。耕作制度方面,经营管理方面,农村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可以说年年在变,月月、天天都有新事物。

到了内蒙古,我们访问了两户牧民。在整个内蒙古的牧区,那个地区只能算中下的水平,最好的是东部。第一户牧民家里,男人去放牧了,只留下一位老大娘。我们问她觉得生活怎么样。她说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好多了,而且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是希望接上电线,准备买个电视机,再买个摩托车。到了第二家,他自己安了一个风力发电机,靠这个发电机看电视,已有一辆摩托车。他家五口人,平均一年四五千块钱的收入。问他还有什么打算。他说,孩子们现在放假回来了,家里的事可以让他们料理,他准备过两天就旅游

去,要休息休息身体,散散心。回来路上,我们问公社书记,这个地方现在牧民的生活比过去牧主的生活怎么样?他说,比小牧主的生活好多了。

在河套,我们又拜访了一家农户。新盖的四间房,里里外外干干净净,沙发有两套,立柜有两个,还有电视机、摩托车,院里有抽水机。问他现在有什么新的打算。他说大姑娘提出买个洗衣机,钱准备好了,不久就去买。我们又问他,你这个贫农过去受过地主、富农的剥削压迫,你现在的生活比富农怎么样?他说,不但比富农好,比地主也好。

从酒泉的柳园到敦煌参观的路上,专署的司机对我们说,现在随便哪家农民的生活,都比他在旧社会看到的地主的生活好。他又说,这里的地主,在旧社会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一有点钱,有点粮,周围的强盗就打他们的主意,整天提心吊胆。所以每家院子后面都有个秘密的洞,刚刚能够钻出钻进一个人,一遇到强盗,就从那个洞里跑出去,要不被抓住了就打死、活埋,或者把一点钱全部抢光。现在固然也有犯罪分子,但是绝大多数人民还是可以安居乐业。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里写过一段话,希望我们的贫农普遍达到旧社会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根据现在我们接触的情况看,许多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普遍超过富裕中农,有的还要更好些。当然,还有困难地区,还有困难户。但是,绝大多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已提高了。作为共产党人,作为革命者,作为爱国者,看到我们几千年来受苦受难的人民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实在

高兴啊！我们的愿望正在逐步实现，我们怎么能够不因此而更加奋发地工作？

这些变化，有的搞科学研究的同志是从报纸上、从书面材料里看到的。但亲自到农村去，亲自找农民谈谈，研究一下这几年是怎么变过来的，现在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探索，应该向什么方向前进，会有更大的收益，做出更好的成绩。一个地区和一个地区不同，一个时候和一个时候不同。满足于昨天以前的知识，我们就要落后，甚至用上半年的知识来解释下半年的问题，也是远远不够的。许多知识分子有所成就，正是因为他们懂得理论联系实际、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情况可能好一点。社会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确有的同志还需要继续解决这个问题，在学风上来一个转变。听说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大愿意研究现实问题，兴趣是古代的、外国的或者抽象的问题。这当然也有个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有完全肃清，总觉得研究现实问题有点危险性。但是，如果老是这么一个状况，社会科学要从理论上指导实践、跟上现实的发展，将是很困难的。朱宣人同志在酒泉跟我讲，他去新西兰访问，商量甘肃派一些畜牧工作者去进修，接受培训。新西兰的专家提醒说，你们派来的人，千万不要那些搞空空洞洞的理论的人，要派研究实际问题、决心探索、寻求畜牧业怎么样发展的人来。这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学以致用，否则学这干什么？资本家养活一批人才，给他们工资、房子，提供研究条件，成天尽讲空洞浮泛的概念、原理、原则，对他毫无建树，

对他的决策出不了主意，养士三千，吃饱饭就清谈，他养得起吗？这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号称做研究工作，但是不读书，不写一个字，或者满足于搬弄既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又不能给人民以科学知识和美好精神享受的空洞概念，追求所谓“自我设计”、“自我完善”，在艺术上则只想到什么“发现自我”、“表现自我”，还要照样拿工资，照样升级，这样一种风气是应该提倡的吗？需要向我们的知识分子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有学问，怎样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要有真本领，真学问，就必须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密切联系当前的社会实践，满足人民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急功近利”，如果不掌握科学规律，那是错误的；遵循科学规律，急人民之功，近社会主义之利，这没有什么不好。当然，科学研究，艺术创造，范围是非常广大的，比如历史科学联系实际就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有句老话，说知古论今，讲的是通过认识历史来认识现实，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要认识历史，取得历史的真理，只靠阅读历史文献还不行，还要进行实地考察。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谷苞同志和我谈到一个观点，认为不知今也不能知古。这是他几十年治学的经验之谈，我觉得很深刻。这是什么意思？马克思就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高级社会形态的研究，对于低级社会形态的研究有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你完全不了解今天社会的现状、人民的需要、历史发展的趋势，岂不变成了为古而古，为历史而历史？历史的研

究,归根到底仍然是为着推动今天的社会,按照它的客观规律向前发展。要在这个领域中取得成就,离开人类已经达到的最先进的认识水平,离开对于现状的了解,也是不能设想的。历史学尚且如此,其他学科更是如此。一切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调查,离不开对于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的掌握。文艺创作则离不开深入生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艺创作,都要努力认识历史和现实提出的问题,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在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掌握了知识,还要解决用自己的知识为谁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这不仅只是文艺工作者要解决的问题,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各人从事的学科可以千差万别,各有特点,而且学科上的分工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细。可是,不管从事哪个学科,研究哪种学问,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共同性是谁也离开不了的,谁也不应该离开的。中国知识分子解放前受到过民族的、阶级的压迫,解放后长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压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焕发精神,挑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反复的考验证明,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是一支优秀的队伍。最近几年来,个别同志中的一些不太好的倾向,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商品化倾向。这是同人民的要求、

同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要求不相适应的。不以人民为重，不以社会主义为重，即使一个时候在某一个问题上取得一些成就，也终究很难取得更大的成就。党和人民使你得到知识，有了知识，不为人民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自己糟蹋自己，自己不尊重自己，当然也很难得到人民的尊重。我们要发扬老一辈专家学者克服困难，一心一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主义贡献一切的光荣传统。国家兴旺发达了，人民富裕幸福了，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安慰。希望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有了知识，决不应该用来为个人争名夺利，这样的人有史以来就很难站得住，在社会主义时代更加站不住。北京表演艺术团体有极少数演员在今年春节期间表现很不好，引起了观众的抗议。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有了知识，就要像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那样，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知识分子要认清自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承担的重要使命，自觉地把自已同民族的命运、祖国的前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科学要发展，艺术要繁荣，都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同时要求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团结合作，相互学习。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分工越来越细，一方面联系越来越密切，任何一门学科孤立于其他学科之外，都很难有所突破。

要使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作用，只是知识分子这一方面的努力还不行，宣传文教部门的各级领导承担着重要的职责。

第一，要在党委领导下合理组织科研队伍，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已经走到前面了。中央同志讲了好多次，就是要组织全国的科技工作者攻关。国务院已经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统一调配、使用科技力量，包括培养和组织科技人员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社会科学落在了后面，还没有达到中央的要求。我曾经在社会科学院工作过一段，后来与社会科学院也还有一点联系，现在又在中宣部，对社会科学的这种落后状况，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我们的社会科学规划也年年在做。拿社会科学院来讲，每个所有年度规划，全院有全院的规划，我们还几次做过全国的社会科学规划，“六五”也算做了，“七五”现在正在做。有的同志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说过去的规划是拼盘子。一个所，这个研究人员报一个题目，那个研究人员报一个题目，汇总起来，就成为所的科研规划。院里再把所的规划汇总起来，说哪些列为院的项目，哪些是所的项目，院的项目合起来叫院的规划。把全国各地社会科学院的规划中重要的项目拼起来，就成为全国的社会科学规划。这个规划本身，就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没有很好地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这些规划实现与否是很难检查的。就是实现了，在我们整个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什么积极作用，也很难回答。科学工作者都很努力，都想为国家作出贡献，可是这样一种领导方法，这样一种规划方法，使得他们费了时间，耗了精力，但是很难在国家建

设中收到应有的显著效果。最近,天津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他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讨论天津市的“六五”规划、“七五”规划时,从实际出发,开列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迫切课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社会科学方面的,然后分别组织科学工作者承担这些题目。在进行工作的时候,市委、市政府给予方便,提供材料以至必要的经费。调查研究以后,要提出方案,或者一个方案,或者几个方案,由市委、市政府来做出选择。采用了并且在实施以后见到成效的方案,要给予适当的荣誉和奖励。这就改变了我们那种拼盘规划的方法。过去,我们不是讲经济工作、政治工作两张皮吗?现在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也有两张皮的问题。我们觉得天津的经验很好,值得推广。我建议社会科学院做“七五”计划,要改变过去的办法。首先到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这些综合部门去访问,到其他各部门去访问,到一些必要的地区去访问,问问究竟希望社会科学承担些什么任务。把情况摸清楚了,然后找北京的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共同研究如何承担这些任务,有的列为全国重点项目,有的列为省、市、自治区项目。这样进行研究,提出科学的方案,就会大大有益于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在七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介绍了天津的经验,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宣传文教部门学习天津的办法,改进我们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和组织,统一调配和使用力量,为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陈云同志讲,每一个问题的决策,特别是重大问题的决策,应该用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好了,只用百分之十左右的时间下决心、作决策。这才是科学的领导方法。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忙于日常工作,顾不上调查研究,往往问题来了,没有把情况摸清楚,脑袋一拍,决策就出来了。我们希望各级领导班子改变过去那种办法,真正采用科学的办法。我到日本、美国访问过。他们那个大董事长、大经理相当清闲。事情很简单,要作个什么决策的时候,就委托研究机关,或者几个专家学者承担任务,进行研究,提出方案,再拿成熟的方案到董事会讨论决定。我们的科研人员非常希望给他任务。只要我们改变过去的方法,充分信任和依靠各科学研究部门,做重大决策时虚心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我们的各项事业一定会有大发展。

第二,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切实解决在边远地区、艰苦条件下坚持岗位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过去和这次接触这些同志,注意到他们的主要困难是两个。一个是子女升学问题。这些同志五六十年代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当时还没有身家之累;现在四五十岁,孩子长大了,抚养固然有困难,更困难的是就近没有比较好的小学、中学。小学打不好基础,考不上中学;中学再不合标准,即使考取也升不上大学。我们宣传文教部门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健康问题。凡是最艰难困苦、边远荒凉的地区,营养水平也比较低,福利设施也很少,有的同志还患有这样那样

的职业病。在那里工作的知识分子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很感人的。我们要在所有知识分子中提倡这种精神，共产党员要做艰苦奋斗的模范。可是，从我们各级领导来说，就一定要采取积极态度，想办法保护他们的健康。是不是可以考虑实行轮休，安排适当的假期，避开最寒冷的时期。一下子改善有困难，逐步地年年稍有改善，这是我们应该尽到的责任。

第三，所有的宣传部门，报纸、广播、电视、文艺、出版等等，对边远地区、艰苦条件下工作的知识分子，对他们取得的优异成绩，对他们热爱事业、不畏艰难困苦的献身精神和崇高品德，过去宣传得很不够。这是必须克服的。宣传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着眼于这些同志。我们希望宣传部门的同志，希望理论工作者、记者、编辑、文艺家们，经常到边远的、困难的地区去亲眼看看在那里工作的知识分子和他们做出的优异成绩，去关心他们、研究他们、学习他们，用各种形式宣传他们。在这些地区坚持工作的同志，取得了成绩的同志，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他们的崇高品德，是我们党、我们人民的重要的精神财富。他们理应得到与他们的业绩相称的荣誉。宣传部门的同志有义务帮助全国人民了解他们，使他们的创业精神到处开花结果。

注 释：

-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认真抓好师范教育是 普及教育的关键*

(一九八三年十月)

普及初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奠基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前提。中央要求全国在八十年代基本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当前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来看,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搞好师范教育。建设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是智力开发中最重要的、关系到几代人的事情。

不久前,中宣部一些同志到华北、西北几个省(区)了解普通教育的情况,感到这方面存在的问题非常突出。当前,普通教育特别是初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教育质量普遍较差,小学毕业生合格率很低。从全国的情况

* 这是以《光明日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

看,小学的合格率、巩固率和学龄儿童入学率大体上是“三六九”,即分别为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九十。这就是说,一百个入学儿童中,到毕业时真正合格的,只有三十个。西北几个省合格率更低。据宁夏、甘肃的统计,一九八二年小学应届毕业生的合格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左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师资水平低。十年动乱中,在初等教育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就盲目普及中学,把不少较好的小学教师抽调上去教初中,初中教师抽去教高中;小学教师出现缺额,就拿民办教师来顶。结果使中小学教师水平都大大降低。加上中老年骨干教师不断退离教学岗位,让子女顶替其职业的不断增长,更使教师的不合格率显著上升。据统计,全国现有中小学教师八百多万人,从文化水平看,未达到应有学历的高中教师占百分之六十,初中教师占百分之八十二,小学教师占百分之四十五;从实际教学业务能力来看,现有中小学教师中,不合格的大约占三分之一左右。这种状况,同普通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是远远不能适应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勉强追求普及小学教育,而不想办法解决师资问题,不首先把发展师范教育这件事抓起来,把它放在第一位,就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表面上学龄儿童入学率增加了,小学教育普及了,但质量很差,毕业出来的学生不合格,结果是徒有虚名,将来还会来个大的反复。很可能到九十年代,甚至于到本世纪末,旧的文盲半文盲没有解决,新的半文盲又不断地出现。如果这样长期继续下去,对于我们各项事业都是不利的。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合格的基础上普及小学教育呢?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动员学龄儿童都来上学,上了学以后不准退学,这一点也许不难做到。但是,毕业以后是否真正合格,这就不是下命令所能解决的了,也不是只靠多花钱能解决的。合格率的高低,是衡量有没有真正达到普及小学教育的主要标志。要提高学生的合格率,首先要提高教师的合格率。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1】}只有老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不合格的教师是很难教出合格的学生的。因此,要真正普及小学教育,关键的问题还是首先搞好师范教育,下功夫解决师资问题。要建立起一个师范教育网,办好各级师范教育,逐步提高各级师范教育的水平和标准。如果我们在若干年内,使现有不合格的小学教师通过进修,达到合格的水平,同时新培养足够数量的合格的小学教师,并进一步使初中、高中教师都达到合格的水平,普及教育的工作就有了最重要的条件。目前,不要急于追求小学普及的数量,宁可在近两三年内把普及的速度适当放慢,也要首先把各级师范教育办好;应该把心思、精力、经费、人才首先放在培养师资的问题上,为普及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准备好充分的合格的师资。只有这样,才能扎扎实实地前进。

这件事情的确关系重大。而且教育的问题不像建设中小工厂那样,几年之内就可以建成,建成后就可以投入生产,就可以发挥经济效益。教育投资的周期相当长。一个人

经过学校教育,成为劳动后备军,起码应该是初中毕业,如果再进职业学校培训几年,这就需要十几年的时间。培养师资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抓紧,到一九九〇年以后,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些事情还得往后推延。如果一九九〇年以前把师资培训合格了,那么改善和发展小学教育,以至于在这个基础上改善初中教育,并且同时进行中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发展各种各样的职业学校,步子就走稳当了,普通教育事业就能更好地适应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

党的十二大已经确定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目前,国家的财力还比较困难,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办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将会逐年增加教育经费,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但是,即使有了钱,有了好的校舍和教学设备,如果教师的思想、文化、教学水平不高,师资不合格,再好的办学条件也教不出合格的或高水平的学生。相反,如果教师是合格的,即使办学条件差一点,也可以教出比较好的学生。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同样的经费、教材、设备和校舍条件,由于教师的水平高低不同,教出来的学生水平大不一样。所以,教师的培养提高,确实是发展普通教育事业、普及教育的第一位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力争在一九九〇年以前改变目前中小学师资队伍的面貌,使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都能达到国家规定的合格教师的水平。

当前,师范教育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轻视师范教育的旧观念仍然普遍存在。在高等教育中,师范院校的

地位往往低于综合大学和理工科大学；在中等专业教育中，中等师范学校的地位又低于各类中等技术学校，有的甚至还不如重点中学。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必须切实改变过来。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师范院校的建设是教育战线的基本建设。必须把加强师范院校列为整个教育工作的重点，要像经济战线抓重点项目那样抓师范教育。在最近几年内，教育经费和基本建设经费应优先保证师范教育的需要，尽快把现有的师范按批准的规模建成，逐步扩大培养能力。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新建一批师范院校。

发展师范教育，要在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切实地制定规划，付诸实施。要一个县一个县地计算，一个县一个县地落实。每个地区，每个省也都要做这样的调查，这样的规划，这样的布局。对师范教育工作，必须提出一个在质量和数量方面的奋斗目标。第一步，经过若干年，要使所有的小学教师都具有中师毕业的水平，初中教师都具有大专毕业的水平，高中教师都具有大学本科毕业的水平。在实现了第一步的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前进。这便是第二步的奋斗目标，要使所有的小学教师都具有大专师范毕业的水平；第三步达到具有大学本科毕业的水平。

各级师范院校一定要面向中小学、为中小学服务。要在招生分配、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逐步加以改革，以适应今后中小学教育多种形式办学的需要。普通高等院校也要承担培训中小学教师的任务。要充实加强中等师范学校的师资队伍，改善中师的办学条件。对面向农村的

师范，应优先予以照顾。

要进一步加强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校的建设。在抓紧培养新的师资的同时，认真做好在职教师的培训工作。师资的培养提高，看来只依靠省地两级是不够的。要逐步争取做到，每个县有一所教师进修学校、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可以把一些县的重点中学改为中等师范学校，人口少的县可以两三个县合办。教师进修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在师资、教学设备等方面，应达到重点中学的水平。

对少数确实不能胜任教学工作、又没有培养前途的，或者虽经培训仍不合格，以及其思想行为不足以为人师表的教师，要由劳动人事部门另行安排工作。劳动人事部门安排有困难的，可由教育部门组织生产劳动或参加教学服务工作。切实改变过去那种“缺人没位”的状况，使新的合格的师资源源不断地补充到教师队伍中来。要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合格教师外流，保证师范院校毕业生分配到中小学任教，任何部门不得任意截留。要根据中央规定，切实减少民办教师的比例。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情况，每年安排一定的专用劳动指标，将一部分经过考核确实合格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广大中小学教师从事着复杂、艰巨的脑力劳动，他们是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小学教师，把全部精力放到教育事业上，就是很可贵的。要当好一个小学教师，付出的劳动并不比一个大学教师少，因此小学教师同大学教师一样光荣。”【2】我们一定

要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极大的热情关心教师,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切实合理调整教师的工资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要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教师终生从事教育事业。对那些优秀的教师,要给予特殊的奖励。要吸收最好的青年报考师范院校,动员和组织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从事师范教育工作,在全社会造成普遍重视师范教育,尊重教师,尊重教育工作者的良好风尚。通过全党和教育战线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地完成普及教育的历史任务。

注 释

- 【1】 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 【2】 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了解祖国，建设祖国^{*}

(一九八三年十月四日)

广播是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一种重要途径或手段。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从八月三十日起，开设《伟大祖国》节目，已经播出十几次。这个节目以五十万中学生为主要对象，定为中学生必听节目。我是做宣传工作的，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开办这个节目非常必要。我相信，经过撰稿人、编辑、播音员和广大听众的共同努力，这个节目一定办得越来越好。

现在念中学的同学，过十年就是二十几岁，到本世纪末就是三十岁、三十几岁。二十一世纪是属于你们的。这不仅意味着你们将分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果实，而且意味着你们将成为四化建设的主力军。你们中间的许多人还将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从你们的父辈手中接过共产主义的大旗，任重而道远。从所肩负的使命来说，你们不会比你们的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讲话。

前辈更轻松。

作为新一代的祖国建设者，应当对自己的祖国有所了解。对养育自己的祖国母亲了解得越多越深，就爱得越深，就越能激发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热情和干劲。许多守卫在祖国边疆、海岛的青年战士，从电视和广播里看到或听到介绍祖国大好河山和今天的建设成就的电视、广播节目，看到或听到介绍自己家乡的人文景物的电视、广播，心情非常激动，宁愿为祖国赴汤蹈火，献出一切。同学们正在学习四化建设的本领，爱国主义是激励同学们努力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巨大精神力量。同学们是在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日益发展的情况下长大的、成长的，接受外来信息的渠道很多，这种环境有利于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所以，就是对青少年的成长来说，对外开放、国际交往也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有些青少年由于幼稚，由于对祖国和老一代英勇奋斗的历史了解不多，刚接触外国一点东西，就容易产生盲目崇拜的情绪，认为外国什么都比中国好，我们什么都不行。我相信，只要有效地帮助这些青少年进一步了解自己祖国的历史和现实，让事实来说话，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一定会成为热爱祖国、勇于为祖国献身的人。《伟大祖国》这个节目，将通过生动的事实、娓娓动听的故事，使听众了解祖国美丽的山川、丰富的资源、宏伟壮观的古迹、灿烂的古代文化，了解祖国的历史和现在，了解为开发祖国、维护祖国的独立和统一、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财富，而作出巨大贡

献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业绩。看到祖国如此美丽、可爱，看到我们的祖先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看到我们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看到我们已经取得了怎样伟大的成绩，我们就不会仅仅赞叹祖国的美丽、可爱和它过去的文明，更不会只是埋怨祖国今天的落后，而是会由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产生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决心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强大，以便向全世界证明，中华民族不仅有光辉灿烂的昨天，而且有能力、有智慧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这种由了解祖国而爱恋祖国，以及建设强大祖国的强烈的责任感，是一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它会使我们的青少年更加自觉地维护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更加奋发地学习和工作。

我们的中学同学已经学习或将要学习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通过这两门课程，同学们可以初步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这两门功课，同《伟大祖国》这个节目，可以相互补充。我们的祖国土地辽阔，历史悠久，人文景物数不胜数，这是有限的历史、地理课程所不能概括的。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三十多年来的建设成就，在课堂上提到的，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通过其他途径，运用其他形式进行伟大祖国的宣传教育。北京电台《伟大祖国》节目将提供许多同学们在课堂上所没有的知识。如果这个节目的听众在日后生活的道路上，无论是一帆风顺的时候，还是遇到困难

或挫折的时候，能以愉快的心情回忆这个节目所给予的教益，从中吸取力量，那将是对这个节目的最好的奖赏。

我在前面主要是讲了《伟大祖国》节目对我们的中学同学的意义。实际上，这个节目不仅对中學生，而且对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都是有意义的。对自己的祖国了解得太少，这种情况，在已经走上社会的青年同志中同样存在着，在中年、老年同志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果时间合适，各行各业的同志听听这个节目，也会得到教益的。

贵在坚持。爱国主义感情和觉悟的培养，并把这种感情和觉悟变成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献身的实际行动，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因此，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也不是只搞一阵子，而是要长期地扎扎实实地做下去。过去各个宣传部门，包括广播、电视，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这些部门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同志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零敲碎打的比较多，缺乏计划性、系统性，形式也不够多样。今年七月初，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发出了《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宣传战线不少部门的同志研究了文件所提出的意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落实。据北京广播电台的同志讲，他们就是研究了文件以后，决定开设《伟大祖国》这个节目的，并打算把这个节目长期办下去。这个想法非常好。“江山如此多娇”，这确实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写照，从古到今，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英雄人物成千上万，

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这是把这个节目长期办下去并把它办好的最有利条件。当然，要坚持下去，要把每一套节目都搞得有声有色，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不容易，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只要我们的节目办得好，听众就会自觉自愿地坚持听下去。

最后，我想对中学的共青团组织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角度讲几句话。我们要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共青团的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解放初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学的共青团组织是非常活跃的，他们通过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活动，如组织课外阅读、团日等等，把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我国革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模范人物，以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名字都是当时中学生所熟悉的，对我们几代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的情况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同学们的话说，时代不同了，但当时的一些好的做法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团的组织活跃了，就能把青年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我们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会更有成效。

两次传达党的十二届 二中全会精神*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一日)

一

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央准备作为正式文件下达，各单位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党员干部后普通党员的步骤传达。

要在党员干部中结合学习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组织学习讨论邓小平、陈云同志的讲话。同时，要学习《邓小平文选》中有关思想战线问题的文章、讲话。比如，小平同志在文代会的祝词，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工作会议讲话中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部分，一九八一年七月关于思想战线问题谈话，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关于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央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纪律的讲话；陈云同志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整风时发表的那篇文章【1】。要把这些结合起来学习讨论。学习讨论中，要联系本部门、本单位存在的思想问题，包括过去发表过的一些不太妥当的文章和讲话。

因此，在讨论过程中，需要把本单位、本部门公开的和内部的刊物、报纸进行清理。起码清理一下一九八一年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以后的问题，看究竟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要组织同志分别看一看这几年本单位发的材料，出的书籍、报刊、文章，本单位工作人员在这个学会那个学会上的讲话。对的加以肯定，不对的就按照实际情况吸取教训。一定不要任意夸大、无限上纲，没问题就没问题，有问题就有问题；是局部问题就是局问题，是全局性问题就是全局性问题；基本倾向是对的就要肯定基本倾向是对的，个别观点、段落不妥当，就说个别观点、段落不妥当。

学习、讨论、检查过程中，务必要实事求是。在座的同志都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多数挨过批，挨过整。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整法深有体会，绝不应该用那种方法来对待这个期间说了不好的话、写了不好的文章、出了不好的书的同志。目的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三种人”怎么划？整党决定中已经有很准确的表述。我把起草整党决定过程中小平同志一些意见的精神向同志们说一下，以便帮助同志们考虑这个问题。小平同志是这样

说的：

关于“三种人”，很多地方都提出，“文化大革命”中间反复很多，情况很复杂，对于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各有各的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办起来也很好办。这里面是讲了造反起家嘛，是跟着林彪、又跟着“四人帮”嘛！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造过一段反，后来被打下去了，或者有一段时间他闹腾得相当厉害，后来变成逍遥派了，他没有起家嘛！有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可能思想“左”得不得了，后来他观察一下，觉得这样不行，思想变了，这怎么叫帮派思想严重啊？十年中间各种人都有变化，有的是越变越坏，有的是时好时坏，要进行历史的分析。一直坏到底的，和中间有变化的，政策上要有所区别。

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执行吗？这些人和“三种人”的区别是清清楚楚的。不能不加区别。不能把那时在特殊情况下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的，也说成是“三种人”。在那种情况下，不能不随声附和说几句违心的话的人，是大量的。

“三种人”容易辨别，实际上，其中大多数人的政治面貌我们也都清楚。其中多数是年轻人。那个时候二十多岁，现在呢，大概是三十八九岁，或者四十多岁。这些人的能量很大，善于拉帮结派，吹捧迎合，改头换面。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把旧社会里面那一套全学会了。林彪提倡那一套，“四人帮”也提倡那一套。这些人中间有的确实有点本事，能写能说，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会讨人喜欢，也会办事，容易取得人们的同情。他们的基本状况是潜伏下来，隐蔽下来。这些人可厉害呀，手段多得很。他们改换面孔以后，就欺骗了一些人，包括群众，包括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他们中间，有的得到了提升，有的从当年搞极左跳到另一个极端，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起劲得很。对这些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们就会爬上来，等到土壤、气候对他们有利，就会兴风作浪，乘机上台。所以，对这些人的能量，对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危险性、危害性，千万不能低估。对这些人绝对不能信任。

“三种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搞极左的，斗“走资派”“左”得反常；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解放思想，他们中的一些人又右得反常。就拿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来讲，“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讲个人崇拜，讲现代迷信，煽动个人崇拜狂热。可是，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批评毛泽东同志，批评得简直不像话！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西单民主墙”出来以后是“踢开党委闹民主”。为什么那个时候以至于后来，都要踢开党委？就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要实现他们个人的政治野心。我们仔细查一查，都可以看到，这些人的品质是非常恶劣的，是投机分子，是冒险分子，是野心分子。

小平同志讲话中间讲了一个问题，就是从极左到极右，

有思想方法问题，也有社会根源的问题。讲思想方法，就是过去我们常说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反“左”的时候忽视反右，反右的时候忽视反“左”。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在继续批判“左”的错误的时候，为什么右的东西泛滥得那么厉害？这同对外开放以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趁机涌了进来有很大关系。对内搞活经济，也有一些社会渣滓、剥削阶级的残余，或者死灰复燃，或者故态复萌。有这么个社会条件，有这样的土壤，有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本来就不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不是坚定地拥护我们党的人，容易接受不好的影响，那并不奇怪。思想方法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一种情况；接受国内国外资产阶级影响，跟着往右边的路上愈走愈远，这又是一种情况。应该把两者加以区别。但是，也应该认识到，为什么这几年来右的东西那么多？这不是凭空出来的。单单指出思想方法的极端，不能完全说明这个问题。

这里边也涉及到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问题。我们在国内实行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人，我们都跟他们搞统一战线。可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改变。从国外来讲，我们实行广泛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只要愿意来中国访问或旅游的人，我们都欢迎。境外来旅游的，连港澳的合起来每年三百多万，将来还会更多。旅游的人多数对我们友好，但里头也有不友好的，包括搞情报、搞特务的人，包括有意识地带来各种乌七八糟东西的人。在这样一种国内国际环境中，

共产党员如果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随时随地注意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反而有所怀疑或动摇，就会发生毛病。

对这些情况，不能光从思想的片面性去解释。思想方法和社会环境这两种情况有区别，但又是联系着的。具体到一个人的身上，应该加以区别，但是也应该由此得出教训。

在这次整党学习中，我们应该首先想一想，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自己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入党的。要回忆一下自己入党时的誓言。所有的党员，首先是党员干部，要真正做到严格遵守党章、严格遵守准则，起模范带头作用。要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对照党章的第二条、第三条，检查自己这几年的言行，哪些合乎要求？哪些不合乎要求？不合乎的应该高高兴兴地做出检查，不要人家催嘛，不要等人家批评嘛，自己诚恳地、认真地做自我批评嘛！整党是全党的事，但是整党整得好不好，首先在于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不是按照党章办事，有错误是不是做自我批评，而且决心改正错误。中央整党决定发表以后，普遍反映很好，但党内外都还有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按照整党的决定办事？主要担心谁呀？主要担心党的领导，担心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做出检查，改正缺点，改正错误。

在思想界，经济犯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有几个，那很少。但是，我们不少人在精神污染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或多或少地牵涉到了。过去污染了，自己来扫除这些精神污染，从此以后不搞了嘛！别人搞就出来制止嘛！这次学习，实际

上是整党的开始。整党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至于“三种人”，在党内是少数，可是要严肃处理。特别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进行认真的、诚恳的自我批评。每一个在入党宣誓时表示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党员，都要牢记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中的那几句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2】我们入党的时候是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难道自己有错误还舍不得牺牲吗？陈云同志讲，要讲真理，不讲面子。把自己的错误检查清楚了，改正了，这不会丢面子，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是最好的。

中央文件下达以后，要在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学习、讨论，针对本单位的问题进行对照检查。在检查清理的基础上，再根据本单位、本部门发现的重要问题，组织写一些有说服力的、质量高的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发表。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八日）

二

一、按照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一号通知的提法，现在整党开始了。首先要学习。学习是整党的一个部分，一个重要的、先行的步骤。

整党的任务，就是写入整党决定的四句话：统一思想，

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统一思想既是整党的一个重要步骤和重要目标，又是全部整党工作的基础。思想统一了，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净组织，才能有正确的、共同的认识，才能按照中央的方针妥善处理各种问题。这是以后一系列工作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准备。

统一思想不限于解决精神污染问题，但是在宣传战线上，目前必须首先着重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其他方面的思想问题，搞得好的可以结合进行。在以后的一系列工作中，还要继续统一思想，不仅要解决已经出现的精神污染问题，而且要采取必要措施和通过反复的思想教育，防止继续发生精神污染现象。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又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

解决精神污染问题以及整个统一思想问题，不要图快，不要满足于表面上的声势。要把问题解决透，把工作做细，扎扎实实，保证质量。决不能一开始就走过场。文件传达了，也讨论了，但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实际问题一个也不触及、不解决，这就很不好了。领会中央文件精神，解决好目前存在的精神污染问题，用多少时间，如何部署，采取怎样的方法，请各部门自己安排。

纯洁组织，解决“三种人”的问题，清除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等，都要统一思想。如何鉴别，如何处理，采取哪些步骤，都要从具体情况出发，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搞“三种人”的时候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说是，我说不是；保了我的就不是，斗了我的就是。这就不是党性的立场，

而是派性没有消除的表现。万事开头难。统一思想这步工作做好了，以后的工作就顺理成章。否则，势必步步意见分歧，政策混乱，贻误党的工作。

从现在到明年年底，中央机关用十四个月完成整党任务，应该说时间相当充裕。

二、传达，学习，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思想和检查工作。所有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小平同志说的：这次整党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在这个问题上，领导干部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整党是为了使党员增强党性，达到党章规定的标准，履行应尽的义务。所有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要在整党过程中接受教育。

建议每个同志通过学习党章第一章的第一、二、三、四条，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第一条讲要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我们入党，都是自愿接受党的纲领、下定决心遵守党的章程，并且宣过誓的。可以回顾一下，在自己脑子里头，这几年来，入党时候立下的志愿和誓言是不是有点记不起来了呢？一些同志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出了毛病。一位理论工作者在《人民日报》写文章，提出要改变一个提法，把“自由和纪律”改成“自由和责任”，理由是责任是发自内心的，纪律是外加的。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党员，作为一个搞理论工作而又在宣传战线担负着党的重要职务的党员，在党的报纸上公开宣传这样一种观点，至少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党性是相当差了。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本来是发自内心的，

怎么能说是外加的呢？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把纪律和责任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呢？如果入党时不下决心自愿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应该说本来就不够共产党员的标准，入党多年后又提出这样的问题，起码应该承认党性严重地削弱了。现在，有些同志觉得党纲不党纲对自己无所谓，对中央的方针、政策随便怎么议论无所谓，执行不执行也无所谓。这是党章所不允许的。党章第一章的第二条，说“共产党员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第三条中规定了党员的八项义务。第四条是讲党员的权利，意思是自己享有这样的权利，也要尊重别的党员同志享有同样的权利。每个党员同志、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对照这些条款检查一下，看看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是不是那么清醒、那么严格。我们有些同志常常自己解除武装，对自己不设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至于是不是违反了党员必须遵守的义务，是不是尊重其他党员的权利，甚至想都不想。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五中全会时候就讲，要通过修改党章，提高党员的标准，增强党的战斗力。新党章对党员的要求的确提高了。不能认为这只是对一般党员讲的，党员领导干部都已经够标准了。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对照新党章认真检查，看看有哪些不够的地方。

要提倡党员按照党章规定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政治自觉性。中共中央在转发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

知中指出,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是每一个党员必尽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允许回避。如有错误,不要坐等人家批评,要主动地做自我批评。批评别人的时候也要想到自己。衡量别人和衡量自己,都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这样才能共同提高。新党员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差一些,要补上这一课。老党员经过长期斗争的考验和党的教育,基础好些,但在新的形势下,有些同志退步了。无论新党员、老党员,都要提高自觉性,通过学习增强党性。

宣传报道要帮助读者分清是非,讲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讲精神污染的表现和危害性。同时,也要采取多种形式提倡党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责任感,自觉自愿地迎接整党、参加整党,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切实切实,又要有点声势,唤起更多同志的觉悟。所谓有点声势,并不是只追求数量,而是要讲究实效,把事实搞准确,表述上也要科学。

这次整党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截然相反,还要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整党都有进步。延安整风是好的。中间“抢救运动”伤害了一批同志,毛泽东同志提出九条方针,才得到纠正。我们这次整党,一开始就要搞好,不仅善始善终,而且中间也要避免走弯路。这里很重要一个问题,是每个党员都要以正确的态度参加整党。对错误严重的同志,包括在精神污染方面错误严重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助,使他转变过来。使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觉悟,改掉毛病,跟上党的队伍,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在全部整党过程中,都不能

离开这样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三、首先要认真学习文件，深刻领会，正确理解。也可以用小平同志讲的那六个字，即：完整的、准确的。不要只抓住文件的一句话、两句话，一个方面、两个方面，要切实领会文件的全部精神实质，最低限度司局级以上干部要达到这个要求。我们这些人理解偏了，不完整，不准确，指导工作、帮助别人，就会走偏方向。我们这些人理解得完整、准确，思想真正通了，下面即使出一些偏差，也可以及时纠正。可以把现在已经接触到的有关情况、问题、材料，运用文件的精神进行分析，边学习、边讨论。结合实际，会讨论得更生动、更深刻。

四、在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上，必须接受过去的教训，切实遵照小平同志讲话和中央通知的精神，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首先着重纠正宣传战线各级领导软弱涣散的倾向。不能放过精神污染，不能容忍精神污染。在这个问题上头脑不清醒，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听任精神污染现象去祸国误民，是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严重失职行为。这既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又是对在精神污染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负责任的表现。要站在党的立场，采取坚决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在具体步骤、做法上，要严格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处理思想战线的问题，我们有两个方面的教训，既有“左”倾错误的教训，又有右的、软弱涣散的教训。不能因为担心犯“左”的错误，就犹疑不决，不敢旗帜鲜明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同时又要

继续防止和克服“左”的错误。清除精神污染，不是为了整什么人，而是为了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是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为了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更大繁荣。

和胡乔木同志商量了一个意见，昨天在中央书记处会上作了汇报，书记处同意了。这就是：我们解决党内同志精神污染问题，要划清两条界限：一要同触犯刑律区别开来；二要同敌我矛盾区别开来。党内同志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理论观点上的错误，即使是严重错误，也是属于党员中、人民中的思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两条界限，在学习、讨论中，在报刊宣传中，一定要严格地划清，不要搞着搞着就出了线。一些敌对分子、非法组织有意把水搞浑，也用精神污染的办法来进行反革命煽动。这同党内同志在精神污染问题上犯错误，是容易区别的。把这些敌对分子、非法组织活动的情况搞清楚了，证据掌握了，就应依法惩处。决不能把他们这种活动手法和我们同志在精神污染上的错误搅在一起，混为一谈。至于偷运、贩卖、传播淫书淫画和黄色录像等等淫秽物品，也是一种精神污染，这本身就是触犯刑律的，应当依法惩处。这两类人的问题，同我们党内、人民中一些同志的错误思想、错误观点的问题，性质不同，必须区别，也是容易区别的。在新闻报道中，对前两类人，只讲对他们依法进行惩处，根本没有必要描绘他们怎样搞精神污染。

小平同志讲，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

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一个共产党员,当然不应该接受和宣传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情绪,否则就是对于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玷污。但是,决不能因此得出一个简单结论,认为共产党员有了错误思想、错误观点,就属于敌对之间的政治问题,就要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共产党员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们不少同志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有些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在党的教育下,这些同志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但是有些同志身上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非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现在,我们党实行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剥削阶级思想及其残余没有肃清,有些又沉渣泛起,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也涌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马克思主义根基不深的同志程度不同地受到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并不奇怪。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写了错误作品,发表了错误演讲,作了不健康的表演,即使很严重,也还是自己的同志,也还是党内的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不要一揭露出比较严重的问题,马上就联系到这个同志问题的性质是不是变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座同志都深受其害。迫于压力,自己给自己上纲,有的又给别人上纲,上得无边无际。这一次,问题一定要解决,但务必不能重复

“文化大革命”那套办法。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每个同志身上都留下了伤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家都想总结经验教训。这本来是好事。由于每个人的理论准备不同、政治经验不同、遭遇处境不同，有的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有的不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总结经验教训，是出于好心，是想把我们党搞得更好，再不犯过去的错误。但是，有的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以至于接受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悲观心理。我们主张动机和效果统一，但是不统一甚至正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一个共产党员，动机再好，效果不好，危害了党的事业，那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进行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尽管这样，我们终究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遵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耐心的帮助，细致的工作，努力使这些同志和大家一道进步。

报刊宣传要特别注意，一定要严格尊重事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对防止说得过头。譬如异化问题，有几位党内同志讲了以后，有些非法组织接过来加以发挥，台湾、香港反动报刊也利用这点攻击我们。散布了错误观点的同志，当然要严肃考虑为什么自己的言论在敌人那里引来一片叫好声，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但是进行宣传报道，就不要把这些扯进来，不要使用“为敌人提供炮弹”、“提供理论根据”这样一些语言，也不要“向资产阶级投

降”一类提法，更不要说谁是“党内资产阶级分子”，说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就行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揭露出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问题。领导机关要掌握情况，有关部门要追查，但都不要见报，不要在报刊上讨论或批判。一个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本人应该进行自我批评，也没有理由拒绝别人的批评。但是，都要实事求是，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对自己、也不能对别的同志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同志进行批评，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风细雨，与人为善，不要搞着搞着就比赛了，你写一篇文章拔高一分，我写一篇文章拔高两分，愈拔愈高，结果又重复十年“文化大革命”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内部开会讨论，交换意见，也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一次谈不通谈几次，允许考虑，允许反复，允许申辩，允许澄清事实。不要大轰大嗡，不要施加压力，更不要搞围攻。报刊千万不要追求惊人之笔，标题、版面、内容，朴素一点好。绝对不要用“声讨”、“横扫”、“搞臭”这样的语言。要真正解决精神污染问题，还是要靠说理。摆出那么一个大架势，靠说厉害话，有害无益。要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多种多样的办法，做到切切实实，真正有效，大家都心悦诚服。所以，一方面我们说不能再搞精神污染；另一方面，在解决精神污染问题的过程中，又必须防止过头的、不讲分寸、不留余地的做法。

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靠一阵风。一阵风来了，受到压力，不跟上形势不行；没有真正解决思想问题，风过去以后，又反复了。不要提各项工作都为解决精神污染问题让路。清除

精神污染方面的报道,不一定都放在第一版,更不要都放在第一条,要看具体情况。内部讨论也好,公开报道也好,开始的时候,要着重帮助大家完整地、准确地理解中央的精神,解释的东西要多一些,批评的东西宁肯少一点。不论哪种情况,都要讲究质量。思想战线领导层中还有同志对不少问题不那么清楚,有这样那样的疑虑;可以想见,党员干部、党员、群众中间的疑虑会更多。要针对这些疑虑,做一些有说服力的回答。不一定长篇大论,一个问题几百字也可以。

要防止有人搅浑水,防止有人有意无意地从不同方面、采取不同方式促使我们犯右的或“左”的错误。一定要经常地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地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步骤办事。因为报刊要经常与读者见面,这一条特别重要。其中包括进行批评,要像中央通知讲的,写出质量高的、有材料有分析有理论的、态度严肃方法严谨的、能够以理服人并以情动人的文章。

五、整党学习在各单位党委、党组的领导下进行。中央整党决定也是这样讲的。日常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不能受到妨碍。要有适当的分工,怎么分法,请你们自己去安排,要各有侧重。这不是说管日常工作的就不参加整党学习了。要做到整党、工作两不误。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

注 释

- 【1】 指陈云同志 1943 年 3 月 10 日在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陈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3—281 页。
- 【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97 页。

在首都部分理论工作者 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八日)

—

多年以来，我们的党，我们的思想界，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包括研究工作、宣传工作、教学工作，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日益为众多的人民所了解和掌握，对于党的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也在不同的岗位上进行了抵制和论争。任何真理要为人民所掌握，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同谬误的争论、对谬误的批判。很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生活和工作在第一线，来自基层，面对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众和青年由于受别人的影响，经常会有各种思想问题，以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生怀疑。靠谁去帮助他们消除这些疑虑呢？主要靠我们在基层的同志，靠生活在群众和青年中间的同志。同志们在这方面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不可低估。尽管群众和青年中的思想问题仍然不少，但主流是好的，是不断前进的。有些人经过一些曲折，但通过实践的教训和同志们耐心的帮助，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同思想战线上的同志们年年月月、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面对精神污染的严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说话。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在座的许多同志，多年来是在说话的。这表现了同志们的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问题是，大家还处在分散的状态。作为党中央的宣传部，我们对同志们这方面工作的情况了解得不够，组织得不够，还没有形成一支队伍，共同研究问题、交流经验，共同学习，共同斗争，共同提高。我们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范围比较小。

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尽管现在还有人无视、贬低我们党的贡献，但人类的历史一定会记下这一笔。中央要我们把理论队伍组织起来。从我们的工作来讲，也意识到没有一个队伍不行。我们接受了中央提出的这个任务，着手进行了一些工作，但是进展较慢。十二大讲，要开创新局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能说有一点小局面，还没有一个大局面。这次中央的整党决定，小平同志的讲话，陈云同志的讲话，对于我们来讲，既是严肃的批评，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志们说，人家搞精神污染，是互通声息的，而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却彼此隔绝，希望中宣部采取一些办法，把大家组织起来，有分有合，多种形式，探讨一些问题，共同调查研究，集中集体智慧，可以搞得好一点，快一点，深一点。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今天开第一次会。以后还想多开这一类的会。当然，会议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规模或小或大，问题可分可合。总之，要用适当办法把我们的力量组织起来。这对于我们的整个事业是大有益处的。

理论工作要联系实际，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目前，理论研究工作中确实存在“离现实远一点好”的现象。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理论工作脱离现实是没有前途的。不改变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无法前进。我们要结合各自工作、学科的特点，结合实际情况和群众中、青年中的思想情况，考虑理论上有哪些难题需要研究，考虑攻关的题目。论争是为了发展。我们总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要清除精神污染，要研究、解决理论上的难题。我们要有信心，有气魄，有毅力。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斗争中遇到挫折失败时，是能够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是无愧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的。我们要在斗争中出智慧，长才干。请大家列出难题，按单位分别认定，然后去组织研究。这次会后，同志们还可以继续考虑有哪些需要攻关的题目。要认真读书，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和考虑各种意见，总结实践生活中的经验。例如，针对某些青年思想上的问题，可以找一些过

来人作典型，总结他们思想转变的经验，让他们现身说法。有的大学生、研究生，从怀疑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坚信马克思主义，这些人的转变会给我们很多启发。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五日）

二

说几点意见。

第一，对于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要抱乐观态度。

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整党不能走过场，一个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陈云同志讲了必须把“三种人”清除出党，讲了要严厉打击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歪风，讲了社会主义必定要取代资本主义。关于整党，文件起草小组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对整党决定草稿进行了很大修改，这个决定已经在会上通过并且公开发表了。思想战线的问题，在小平同志讲话中占很大的分量。陈云同志也指出，对于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人，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这个问题，根据小平同志的建议，中央还要专门召开会议，作出决议。

整党的任务可以完成，精神污染现象可以得到克服，在这两个问题上，所有的共产党员，包括党员理论工作者，要有乐观主义态度。按照中央的决定办事，我们的党风一定能够根本好转，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必将比现在大大提高，党

和群众的关系一定会更为密切，党一定能够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

整党决定起草过程中，小平同志、中央其他同志曾经考虑，要在肯定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已具备了整党条件的同时，坚决揭露党的阴暗面。这样一个文件，只在党内传达好还是公开发表好呢？公开发表，会不会被台湾、被外国资产阶级利用其中一些提法，大肆攻击我们党呢？后来，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都认为没有什么好怕的，通过以后就公开发表。尽管有人可能做什么文章，可是我们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敢于公布这么一个决定，就证明我们党有力量，有信心，有勇气。所以，决定通过的第二天就见报了。反应确实各种各样。台湾在说，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评论家也在说。美国《华盛顿邮报》有这么一句话：这个整党决定是所有执政党空前未有的自责书，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敢于这样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

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污染问题的讲话在党内传达以后，效果是好的。传达以前，外地和北京都有人议论纷纷，惶惶不安，说什么要点名批判十几个人啦，等等。写过不太好的文章的人，嘀嘀咕咕，哎呀，以后可得小心点，少写一点儿、少说一点儿啦！小平同志讲话一传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首先振作起来了。过去想说话，有这个顾虑、那个顾虑，现在再不说话不行了！早就希望中央发出这样的号召。现在中央支持我们，我们要响应，再不能沉默了！有过错误观点的同志也开始严肃地考虑，有的已经开始作自我批评。

北京各单位传达后的反映是好的,不是一般齐,但是大多数同志是为之振奋、为之高兴的。这给大家增加了信心。

我们国内已经形成了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个局面应该和可以巩固下来,还会进一步在各条战线向前发展。当然,我们不能等着这个发展自然地到来。要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要靠社会的主体,首先是共产党员、党员干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我们党,党的大多数干部、党员,是值得信任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值得引以为荣的。我们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研究什么问题,写什么文章、讲什么话,都要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把整党搞好,把思想战线的工作搞好,使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继续巩固下去,并且大大地发展。一切不利于这个目标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做,一切不利于这个目标的话都不要说,一切不利于这个目标的文章都不要写。当看到别人做不利于安定团结之事的时候,要提醒他们注意。

第二,党的理论工作者要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陈云同志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题目叫《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这篇讲话的精神,今天仍然适用。这就是作家首先要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不是首先想我是这个家、那个家。我们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是各界联合会。陈云同志是就文艺界讲的,讲话中提出的原则对党的理论工作者同样适用。我们的一切活动、一切言行,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是首先

想我是专家、教授或研究员。

说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党的理论工作者是不是很自然地就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呢？不能这样讲。有些同志一段时间发表的一些意见，他们的言行，离合格共产党员的要求相当远。我们大家，如果仔细检查一下，按照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也会发现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还存在差距。所以，每个同志都要再三再四地认真精读党章第一章的一、二、三、四条，反反复复地对照检查自己。远的不说，就看看一九八一年思想战线座谈会以来，在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上，这一条、那一条上，有什么做得不够的地方，不太合格的地方。找到了以后，经过努力，做到真正合格。

就拿第一条来讲，入党都要接受党纲、党章，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这是起码的条件。我们的同志这几年来不能说都没有做到，但是不是在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上有执行中央的决议不那么坚决，不那么尽心的情况呢？决议是决议，知道也知道了，好像与自己没多大关系，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举一个例子。党员义务第五条规定：“要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小平同志讲，这些年来，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常被称为“围攻”、“打棍子”。至于作自我批评，就更难了。有那么一些同志，光是批评别人，包括批评党，至于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往往忘记作自我批评了。中央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有的全国性刊物的负责人就只宣传自己如何抵

制了精神污染，而不考虑自己刊物中的某些问题。实际上，有时是进行了抵制的，有些却不一定，而且还发表过相当有影响的错误文章。所以，先清理一下，实事求是地作自我批评，然后又实事求是地批评别人，这不是更完整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吗？

党章规定了党员权利。在党员权利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值得检查的地方呢？是不是存在那么一种情况，人家侵犯了自己权利的时候比较敏感，而自己不尊重别人权利的时候就不那么在意。党章规定了每个党员的权利，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来保证它，不允许侵犯。党员权利被侵犯了，可以和应该提出申诉。我们每个党员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党员权利是否得到保证，同时也要保证别人的党员权利。中央宣传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思想战线的情况。做这方面的工作，是应该的，是份内的任务。这种反映必须严格地尊重事实，力争不出任何差错，出了差错要负责纠正。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不准别人向组织、向中央反映他的问题。具体讲吧，比如摘了某人若干文章中的一些错误观点上报中央，而且反复查对，是负责的，严格实事求是的。可是，他就抗议，说是整了他的黑材料。党内确实有这样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批评过的那种现象：我犯了错误，你知道，你可不能够向上面去报告，你要去报告，我就怎么怎么对待你。有的人就是不允许别人向组织、向中央报告他的文章和发言中的错误观点，你要报告，你就是搞黑材料。作为一个共

产党员,怎么能够这样子呢?应当襟怀坦白嘛,自己做的事、自己的观点,白纸黑字,登在报刊上,自己负责嘛。自己不报告,别人报告组织、报告中央,应该欢迎嘛。组织上知道你错了,对你进行帮助,这有什么不好呢?

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灵魂工程师如果都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正人首先要正己。帮助别人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不是真正站在党的立场。我们要共同勉励,相互帮助,使我们每个从事党的理论工作的同志都增强党性,按照党章的规定要求自己,提高自己。

作合格的共产党员,应该说是不容易的。在某一个问题上,某一个方面,原来合格了,但是稍微疏忽一下,一个时期里可能又不合格了。我们要使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经过整党都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更要自觉地首先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个要求好像不高,但是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

第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革命的、批判的风格。

小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要站出来说话,就是要我们发扬这种风格。在这方面,我们党有过好的传统,也有过教训。很有必要回顾一下我们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次清除精神污染,要把好的传统继承和发扬起来,又不再重犯过去“左”的错误。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很大的发展。过去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在党内党外

斗争中都犯过“左”倾幼稚病。经过毛泽东同志总结经验，克服了这种毛病，使党内优良传统在延安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当我们在犯幼稚病的时候，总以为革命要摆一个架势，没有一个架势不能够吓住敌人或别人。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搞土地改革，是最彻底的土地革命，也表现了最坚决的革命精神，要把封建土地私有制消灭得干干净净。执行这样一个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纲领，我们实行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做法，提出地主、富农要区别；恶霸地主、一般地主、开明地主要区别；对中农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对贫雇农应该采取什么政策，都规定得很具体。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待遇，使大家各得其所。这是合乎国情民情的政策，是顺乎民心的政策。有了这一套经验以后，我们在解放区纠正了偏差，后来在全国三亿多人口中间顺利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很短时间胜利地解决了土地问题。毛泽东同志还讲，对敌要狠，对己要和。党内斗争，原则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但是批评要实事求是、讲究分寸，组织处理一定要非常慎重。原则问题的讨论，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不能讲情面。可是出发点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最后的目的是把同志的“病”治好。我是参加过延安整风的。那时对教条主义的批评，对王明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毛泽东同志也曾经讲，一个同志犯了错误还不觉悟，要大喝一声，使他惊醒过来。大喝一声，有的时候口头上不免相当尖锐。可是见之于正式文件的时候则不同。毛泽东同志一九四

七年十二月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对于王明的新投降主义错误，是这样表述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反对了和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这个斗争，从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一直到七大，延续七八年，到一九四七年回顾过去的经验教训的时候用了上面的语言来表述。这里没有用什么剑拔弩张的语言，可是实质问题讲清楚了。很可惜呀！这样一种党内思想斗争的好方法、好传统，“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拨乱反正，其中就包括党内斗争的方针、方法上的拨乱反正。这次清除精神污染，我们一定要把好的经验、好的传统发扬起来，一定不能重复过去错误的东西。

“精神污染”四个字，打个比方，遇到北京的风沙，衣服上沾了灰尘，或者吃饭时衣服被油腻弄脏了，回去以后拿刷子刷一下，或者用水洗洗，刷不下洗不掉的，就用点汽油擦擦。这样，衣服上的尘土、油腻没有了，污染去掉了，照样是一件好衣服。就像毛泽东同志讲过的，屋子里头有灰尘，要常常打扫；脸上有灰尘，要天天洗脸。精神污染，就是这么一种性质的问题。这和有意破坏不同。比如有些坏人，有的流

氓团伙，拿着镪水往人身上喷，甚至于往人脸上喷，那就是破坏，而不是污染问题了。喷了镪水，衣服就坏了，脸上就受伤。所以中央书记处认为，清除精神污染要同处理敌我矛盾区别开来，也要同处理刑事犯罪问题区别开来。

我们在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同志会上还讲过要区别两条界限。拿异化来讲，几位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被一些非法组织所利用。这些非法组织利用、发挥、引申我们同志错误观点的情况，我们应该了解，不了解是不对的。对香港、台湾一些居心不良分子的言论，包括歪曲、篡改、吹捧、挑拨，我们也应该了解。可是，要把这些人的利用与我们同志自己的错误严格加以区别。敌人利用，一律不要见报，连发行比较宽的内部刊物也不要登。刑事犯罪也不要和精神污染混淆起来。例如传播淫秽物品、淫秽录像带等等，是一种污染，可是本身就是一种犯罪。是犯罪，就照刑事犯罪来处理，不必扯上他又是什么“精神污染分子”，不要同我们的自己同志的精神污染问题搅在一块。内部同志间讨论，也要把这种界限划得很清楚。小平同志讲得很中肯，说台湾、香港有人为我们有些同志的言论、作品叫好，国外也有人叫好，我们要想一想，他们为什么叫好，站在什么立场上叫好。

有些意见，我在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同志会上讲过了，再和同志们谈谈。

在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上，必须接受过去的教训，切实遵照小平同志讲话和中央通知的精神，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首先着重纠正宣传战线各级领导软弱涣

散的倾向。不能放过精神污染。不能容忍精神污染。在这个问题上头脑不清醒，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听任精神污染现象去误国误民，是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严重失职行为。这既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又是对在精神污染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负责任的表现。要站在党的立场，采取坚决的、严肃的、认真的态度。在具体步骤、做法上，要严格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处理思想战线的问题，我们有两个方面的教训，既有“左”倾错误的教训，又有右的、软弱涣散的教训。不能因为担心犯“左”的错误，就迟疑不决，不敢旗帜鲜明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同时又要继续防止和克服“左”的错误。清除精神污染，不是为了整什么人，而是为了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是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为了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更大繁荣。

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一个共产党员，当然不应该接受和宣传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情绪，否则就是对于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玷污。但是，决不能因此得出一个简单结论，认为共产党员有了错误思想、错误观点，就属于敌对之间的政治问题，就要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共产党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们一些同志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有的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在党的教育下，这些同志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但是有

些同志身上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剥削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现在，我们党实行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剥削阶级思想及其残余没有肃清，有些又沉渣泛起，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也涌了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马克思主义根基不深的同志，程度不同地受到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并不奇怪。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写了错误作品，发表了错误演讲，作了不健康的表演，即使很严重，也还是自己的同志。不要一揭露出比较严重的问题，马上就联系到，这个同志问题的性质是不是变了？我们在座的多数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其害。这一次，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解决是不行的，但是务必不能重复“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每个同志身上都留下了伤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家都想总结经验教训。这本来是好事。由于每个人的理论准备不同，政治经验不同，遭遇处境不同，有的就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有的就不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管怎么样，总结经验教训，心是好的，目的是想把党搞得更好一点，以后不再犯过去的错误。但是，有的同志也确实程度不同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有意无意地把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接过来了。有些同志对于我们党，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悲观的心理。我们主张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但是不统一甚至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一个共产党员，动机再好，

效果不好,危害了党的事业,那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进行自我批评,改正错误。要帮助他们分析犯错误的原因。要好心心地对待自己的人,好心心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这样,就需要我们把情况搞清楚,耐心地进行帮助,细致地进行工作,使这些同志同我们一道前进。

报刊宣传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一定要严格尊重事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对防止过头的现象。一个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本人应该进行自我批评,也没有理由拒绝别人的批评。但是都要实事求是,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对自己、也不能对别的同志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同志进行批评,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风细雨,与人为善。不要搞比赛,你写一篇文章拔高一分,我写一篇文章拔高两分,愈拔愈高,搞着搞着,就形成一种气氛,就和“文化大革命”那种气氛一样或者差不多了。内部开会讨论,交换意见,也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一次谈不通就多谈几次。允许这些同志考虑,允许他们反复,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澄清事实。不要大轰大嗡,不要施加压力,更不要搞围攻。报刊不要追求惊人之笔。“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讲尊重事实,不讲同志间与人为善,就要出毛病。题目、版面、内容,还是朴实一点好,不要用什么“声讨”、“搞臭”一类语言。解决精神污染问题,还是要靠说理。靠摆出一个大架势,靠说厉害话,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道理,只有害处,没有益处。问题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我们的讨论、批评,也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办法。要做到切切实实,真正有效,大家心悅

诚服。所以，一方面我们说不能再搞精神污染，另一方面，在解决精神污染问题的过程中，又必须防止过头的、不讲分寸的、不留余地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是按事实的本来面貌说明事实，不做任何主观的附加。事实是多种多样的，每种事情都要按事实的本来面貌去说明。这样做，比凭想像去这样说、那样说要费劲。关起门来可以想出惊人的语言，可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事情按照本来面貌说清楚，不做调查研究，不做细致的分析，是不行的。

解决思想问题不能一阵风。一阵风来了，受了压力，不跟形势不行，跟了形势，心里头不服，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等到风过去以后，又反复。不要提各项工作都为解决精神污染问题让路。消除精神污染方面的报道，不一定都放在第一版，更不要都放在第一条，要看具体情况办事。内部讨论问题也好，公开报道也好，首先应该帮助和引导大家完整地、准确地理解中央的精神。为了做到这一点，开始时，说明的文章、解释的文章可以多一些，批评的文章可以少一点。但不管是解释的也好，批评的也好，都要讲究质量。中央文件传达以后，有些地方提出不少不理解的问题。譬如异化、人道主义，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叫他去领导消除精神污染，怎么能够领导得好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防止有人搅浑水，防止有人有意无意地从不同方面采取不同方法来引诱我们犯右的或“左”的错误。我们一定要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步骤办事。因为报刊是经常不断地和读者见面

的，这一条特别重要。要像中央通知所说的，一定要写出高质量的、有材料有分析的、态度严肃方法严谨的、能够以理服人并以情动人的文章。大文章要力求做到这一点，小文章、短文章也应该做到这一点。

多年以来，我们都讲要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政治问题有两种，一种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一种是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严格分清政治问题上的敌我界限，这个并不难。非法分子、敌对分子讲异化，是要利用这个问题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有时候是进行反革命煽动，这同我们同志在异化问题上发表了错误观点是两回事情。只要分清了敌我之间的政治问题，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有些一时分不清楚，也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郭罗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个题目没有错，问题在于他的论述中混淆两类矛盾的界限，以致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可以自由发表，只能以革命舆论去反驳，不能依法对发表反革命言论的人定罪。这就完全错了。宣传反革命主张，进行反革命活动，都为我们的国法所不容。至于在人民内部讨论政治问题，从来是自由的，我们人民内部天天都在讨论政治问题。今天我们的会，不就是讨论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吗？我们的人民是生活在政治中间的，有权在宪法的范围自由讨论一切与政治有关的问题。这样的自由我们不充分吗？我几次对外国记者说，我们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起草时间二十个月，前后讨论多少次，范围大到四千人，各种意见都自由发表；这次的整党决定，从四月开始，搞了

几乎半年，参加讨论的范围也是几千人，反反复复多少次。这种政治问题的讨论不自由吗？不充分吗？妇代会、团代会、工代会以至于科学院的会、各种表彰会、各种传达会，都是讨论政治问题。说我们人民内部没有讨论政治问题的自由，是闭眼不看事实。在人民内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有错误的观点，有正确的观点。应该承认，有时还发生正确的观点受到压制的情况。可是，这在我们的宪法和党章里历来是视为违法的。我们要保障人们发表意见的权利。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首先把敌我界限划清，而这是比较容易划清的。划清了这个界限以后，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有的容易划清，有的不容易划清。一时划不清楚，只要坚持用民主的、讨论的、说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讨论，去解决，有没有危险呢？我看没有多么大的危险，不必害怕。发表了错误意见，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应该听取别的同志的批评，但是也允许申辩，允许坚持，允许保留。你发表了错误意见，要允许人家批评嘛，不能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就说是“左”的一套又来了，这个态度也不对。明明错了，但是还要保留自己意见，怎么处理？无非有两种情况：属于中央决定要执行的，那你要按党章规定，在坚决执行决定的前提下保留意见，不能因为保留意见，行动上也不执行；在学术问题，包括某些政治问题上，长期保留，长期讨论，关系不大。像近代史讨论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是政治问题，有些是学术问题，即使错了，还要坚持，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讨论的范围要小一点，在

学术刊物上进行。当然，这里涉及到共产党员理论工作者分析历史问题时是否站在人民一边、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作为共产党员，总还有一个共产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问题嘛。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各项工作都大大地前进了。我们已经总结和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完全有信心，使这次清除精神污染成为党的历史上解决和处理思想理论问题的最好的一次。

第四，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目前要着重解决精神污染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着想，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和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应该是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终身从事的事业。一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要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在我们的面前，道路宽广，任务繁重，课题很多，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这样一种观念：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只限于研究今天以前的材料、书籍，不能从书本到书本，而是必须从当前实际出发，提出和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对这些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科学地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值得高兴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所有的理论工作者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的事业天天在向前发展，新问题、新创造、新经验层出不穷。只要接触一下实际，

都有这样的感觉，上半年得到的知识、了解的情况，到了下半年就很不一样了，就有了变化了，停止在上半年的水平上，就落后了。现在不是有没有问题可研究，不是没有条件去研究，而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研究，也有条件去研究，而实际上却没有去研究。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包括在学校工作的同志、科研单位的同志、宣传部门的同志，现在迫切需要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对于各种新问题的调查、研究、论证、分析上。小平同志说，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理论问题缺乏兴趣。知识分子有一种职业病，读起书来，津津有味，其乐无穷，忘乎所以。读书自然是好事，但是千万不可忘记现实，不可忘记时代和人民要求我们回答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有所觉悟，是非常重要的。不用说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联系实际，不解决现实问题，要坚持也很难。人家怀疑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社会主义好不好，你不去了解他们的思想疙瘩在哪里，光靠关起门来翻书本怎么行呢？讲到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更多了。

总之，理论联系实际、研究现实问题，这太重要了：怎样改造理论工作的学风，应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研究。这个问题的解决，比在延安时的条件更好。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们也有责任去解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

第五，理论工作者要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深入研究重

大理论问题。

我们的会开了两次，开得很好，出了很多题目。对这些题目要分别地组织研究，有的一个单位可以承担，有的要几个单位合作。我们要改变过去这样一种状况：一个问题提出来以后，不管过去是不是有准备，大家就都涌到这个问题上。这次突出的问题是异化问题、人道主义问题，要组织比较多一点的力量来搞。但思想战线、理论工作单位也不要都挤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根据各自学科的分工、各自力量的情况分别研究。确定了题目，承担了任务以后，就真正下苦功夫，力争比前人有所突破，比外国人有所突破。这样我们就不至于搞得太单调，不至于只在一两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对各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分工合作地进行研究，要把研究问题的势头一直保持下去。整党期间要保持下去，整党过后还要搞得更好。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就会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会后，中宣部理论局还要同有关同志、有关单位进一步联系，做点组织、协调的工作。总之，要协同作战，整个理论战线、思想战线一齐动手，分工合作，力求协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八日）

注 释

- 【1】 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8页。

干部培训工作要有规划*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干部培训学习,两年以上的才叫正规化。开始办,一年也可以,最好是两年到三年。还要考虑学员年龄杠杠怎么定,最高年龄、最低年龄定在哪里。

培训要有个层次。所有干部都受正规化教育有困难,但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县一级企业、事业、学校等负责人,若干年受一次正规化教育,这是必要的。必须受过这种教育,才能继续担任或者新提拔成县级干部。四十万个大、中、小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号称十万个,每个单位平均四个领导干部,大约有四十万人,应当在几年内使他们受一次正规化教育。

县级干部要求达到什么水平?总得大专水平吧!不然,很难适应工作要求。

县委委员、区委书记、区长和县科、股级干部也得受训,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干部培训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谈话。

一年到两年。这些同志总应当达到中专水平,还应当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这些人年龄界限最好是四十岁以下。

总的要求是,县级达到大专水平,区级干部达到中专水平,包括军队营级。先开步走,营级干部一下子还不能要求都达到大专水平。

五十岁到五十五岁以上的干部没有受正规化教育的机会了,可以考虑短期进修,到党校或大专院校专业进修,加上业余学习,不受年龄限制。

这些正规学习,要考虑哪些需要有共同课程,哪些有各自特点。如军队教材,就要有自己的特点。有材料反映,农业部门的干部学习农业知识以后开阔了眼界:有的说现在才知道农业原来这么复杂;有的知道瞎指挥不行了,要向专家请教。国家经委的企业领导干部培训班办了二十期,每期课程都不一样,有的内容属于知识更新的多一些。还有专门科技人员,如医务人员,应当学专业,专业还需要细分,内科、外科……也要学共同的课程。

“干部”概念不科学,但是沿用了多年。专业这么多,人员这么复杂,中央能管什么,不能管什么?中央不管的谁来管?现在工人要学,干部也要学。有的干部,工作得很好,学习也抓得紧,势头很好,使人高兴。

干部培训工作领导小组管到哪些人?大家都想学,怎么办?要有安排。我们重点管党、政、群这个范围的,范围以外的谁管?需要培训的干部都要有单位来管,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关于学习时间问题。正规化离职学习的好办，工作不管了，一心一意学习。但是这样学的人数少。假定每年一百万人，还有一千九百万人又要工作，又要学习，时间如何安排？做得好的同志，学习工作两不误，但要每个人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精简，人减不下去。是定编不定员。（焦善民同志：我们觉得还得定员，不然后人减不下去）

从长远考虑，是不是可以索性把每周的两个半天学习时间集中一下，减少每周的工作日，如每个干部每周工作五天，有一天学习。这样，一年就有近两个月的时间，不是放假，是专门学习。有工作怎么办？可以安排轮流值班。一年两个月，也可以考虑集中使用，在机关脱产学习。两个月再加上业余学习，干什么学什么，学后实行考核制度。

还有个业余学习的辅导问题。有的干部有自学能力，但也要求有人辅导。教材，千种百种，两千万干部的学习内容大不一样。大体上各部门都有教材，没有的责成他们搞教材。要有共同的教材，也要有专门的教材。初中、中专水平的干部自修达到中专、大专水平，要有各层次的教材和辅导人员。各行业、各部门分头搞了，有好有差，要推广好的。

另外，现代化教学设备，电视大学，要分几步走。第一步，五十万人以上的城市要有现代化电视教学设备，能承担多种多样的教学任务。好处是可以用最最好的教材，请最好的教师，可以看形象，比较起来效果好。

根据现在的情况看，一种我们管，一种授权人家管，再加一条，各部门、各单位自己创造。但是需要有统一标准，

如统一的教学大纲。至于办学形式，只要够标准，要放手，不要干涉过多。

对各类干部的学习，要做分析。党、政、群、军系统的干部，实际上都是政工干部，搞政治工作的。这一大类，无论如何要把政治学习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包括时间的安排。在这个前提下也要学业务，不能对业务一窍不通。工厂党政领导干部要学管理，但是同工程技术人员要求不同。军队指挥员，要懂得现代战争的指挥艺术，懂得各兵种如何协同作战。在强调学政治的同时，还应当分别学业务。党、政、群、军学什么，要分门别类研究，还要按各级研究。

另一大类是大、中、小学教员，包括学校的政工人员。这一类干部也要学政治。他们不学经济管理，但是起码要懂得教育学、心理学。还有各自授课的专业，如历史、数学，使各级教员都成为合格的教员。现在我们的教员是低标准。从长远讲，小学教员应当具备大专水平，这个世纪实现不了，下世纪实现。要争取在九十年代实现小学教员达到县师毕业水平，初中教员有大专水平，高中教员具备大学本科水平。现在是低标准，小学毕业教小学，中学毕业教中学，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合格。教员质量不高，数量也不够。

第三大类，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科技、工程技术人员等。从现状看，这批人合格的占大多数，他们中的相当多数是大学毕业生，也有老中专生。这个行业的干部，是文化、知识水平最高的。他们面临的是知识更新问题。现在世界上科学技术确实在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原有的知识不够了。

这些人也要学政治,但是可以比前两类人学得少一些。对他们的要求,最低要爱国,拥护社会主义,爱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有民族自豪感,不要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最近,有的同志从苏联回来说,苏联搞革命传统教育,宣传民族自豪、荣誉感,有可取之处。他们的地区、工厂、学校,凡是在生产建设和各项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特别是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都有照片和先进事迹的记载,有的还立了铜像,安置在庄严肃穆的地方。我们就没有这样做。哪怕立个石碑也好。苏联的年轻人结婚时,首先到烈士墓前献花、致哀。莫斯科市一天好几百对青年夫妇穿着结婚礼服向列宁墓致哀。我们的工、青、妇等各种团体,包括教育部,要研究如何进行这样的教育,包括宣传我们民族伟大的思想家、学者、科学家等。

第四类是医药卫生人员。这些人同前头那种人差不多。当上医生的,差不多都是大学毕业,能当护士的一般大都上过护士学校。医学要实行中西医结合,对中医、中药要发掘,西医、西药也要发展。

再一类,是文化、艺术、体育人员,包括文工团、剧团、电影、艺术教育学校、文化馆、博物馆及展览馆的人员等。我们对后三种人员重视得很不够,大专院校只有考古系,没有博物馆系,人才没有来源。

再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如理论工作者,包括新闻、出版、广播工作人员等。

还有工交、财贸、农林等一大块,工作人员中有一部分

属于国家干部，有一部分是业务人员，如税收员、营业员、售货员、服务员，等等。

分若干类，学习有共同要求，又有不同内容。可不可以考虑，干部培训领导小组重点管党、政、群系统的。军队归军委领导。党、政、群系统大体四百多万干部，虽然人数少，不到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一，但却是我们干部队伍中最关键的部分，对国家状况、领导好坏关系很大。如果在若干年内能长期培训下去，普遍培训一遍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轮训，比现在的标准更高，我们的事业会大发展。其他人如何办？由各系统考虑。科技人员由科学院、科协去组织。共同的标准，同我们商量后办；特殊的，要求由他们自己去搞。工交、财贸系统的干部由国家经委负责。近一年来，小平同志提出培养军地两用人材，军队干部培训工作有了新面貌。以前军队转业干部，军职不低，放在工厂、学校、机关等岗位上，担不了那担子，地方不欢迎。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入伍人员文化水平也高了。以后，从军队退役的要达到高中文化水平，并且要具有中专水平的一门专业知识、专门本领。这样，服役人员就安心了，在军队两三年，可以学政治、学业务；退役后到农村也好，到其他地方也好，可以适应四化建设需要，路子越走越宽。

我们要有干部培训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宣传部、组织部和人事、教育等部门管。要分工负责，需要统一的统一，不需要统一的各负其责。

涉及统一的问题，就是文凭和水平的问题。现在大家学

习积极,要文凭是一个原因,对这一点不要过分责备。但是,有文凭的,也有一些水平不高,学问、本事不高。将来工资制度要考虑文凭这个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考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样有文凭,要重视那些能团结人、有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干部,着重表扬、提拔这种干部。

最近有位美籍华人提出意见,不赞成我们对外语强调得那么厉害。各种人都去学外语,学通外语得用五年到六年时间。与其用这么长的时间攻外语,不如用它去攻专业。但是,攻专业又需要外语怎么办?可以组织专门的翻译机构,集中力量,凡是新资料、新学问,及时译出来,及时出版,不必大家都去攻外文,看中文资料就可以了。这个办法花时间少,效果更大。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各行各业、各门科学都要靠翻译,现在翻译人才有,但是分散。把学习外语的时间腾出来,干部解脱了,一是可以去提高中文水平,一是可以去钻研业务。只要讲通道理,大家可以接受。翻译力量的组织也是个大问题。不仅社会上,而且学校里的外文人员都有重复现象,同样的外文资料许多部门都进口。要组织、集中使用力量。教育部门要会同有关单位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 若干政策界限*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清除精神污染,是解决党员中、人民中的思想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同处理敌我矛盾区别开,要同处理刑事犯罪问题区别开。这些意见,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在《人民日报》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一文中发表以后,反应很好。

最近中央书记处又开过两次会,内容是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在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有关政策上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掌握一些什么界限,并责成中宣部召集新闻、广播、报纸等有关部门,讨论出一些意见来。今天主要想谈谈这方面的内容,供同志们参考,讲得不对的,请同志们提出批评。

我讲十个问题。

第一,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党的总路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线，为了顺利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同志讲，八十年代以至于九十年代，我们的三大任务，是加紧经济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中，中心是经济建设。十二大制定的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各级党组织应尽的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实现这条总路线，不能照本宣科，而要结合各个时期各项工作的实际，结合各个地区的特点，明确各个时期，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的具体任务，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在制定自己的具体任务、具体政策时，要随时想到有利于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

整党是组织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清除精神污染是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都是实现总路线所必需的，都是以实现总路线为目的的。这两个迫切任务完成得愈好，愈有利于总路线的实现；完成得不好，就会妨碍总路线的实现。我们准备用三年的时间进行整党，清除精神污染需要的时间更长。我们做这些工作以及其他工作的时候，要经常想到某项工作的具体任务、具体政策要服从于总路线，而不能够违反总路线。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免出问题。总路线就那么几句话，可是非常重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情况千变

万化,各种问题都会随时涌现出来。如果不能经常把握总路线,在新问题来了以后,面对复杂的局面,就很容易出毛病,就可能迷失方向。

整党决定发表以后,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重要讲话传达以后,总的情况很好。可是也存在一些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决定和讲话,要变成实际,完满实现,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现在仍然有相当多的同志表示担心:有了好决定,有了好讲话,会不会仍然走过场;学也学了,讨论也讨论了,表面上看来,该走的步子都走了,可是三年以后,一检查,整党要完成的任务没有真正完成,清除精神污染要完成的任务也没有真正完成。最近报纸上整党的消息发得少一点,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消息发得稍微多一点。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嫌不过瘾、不带劲,甚至想采用过去搞政治运动那一套。有的又顾虑很多,担心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又来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来了。一些外国记者,有的是好意,有的未必是好意,道听途说,引申夸张,甚至无中生有,说我们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势必像过去那样又要搞政治运动。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完成一项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任务,有两方面的经验。

我们有成功的或基本上成功的经验。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的前期,是搞得比较好的。那就是必须逐步积累和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我们的政策,明确应该做些什么事,不应该做些什么事,允许做些什么事,不允许做些什

么事，一步一步怎么发展。解放初期两年多完成了三亿多人人口的广大地区的土地改革，没出什么大毛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已经有了解放区土改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制定了成熟的土地改革法，找到了一套实现土地改革法的办法。

我们也有失败的经验。运动开始，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认为讲政策会束缚群众手脚，搞到后来，又要甄别平反，还带来这样那样的后遗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个“十六条”，说这次运动不要由领导自上而下去规定框框、条条，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在运动中间增长才干，自己改正缺点。其结果，我们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当然，“文化大革命”不仅只是这个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形势估计错了，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都错了。

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一定要继承我们过去一切好的经验，坚决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中央的整党决定，任务、方针、步骤、方法都规定得很周密。对清除精神污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讲话原则性很强，政策界限也很明确。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领会中央的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当然学还不等于做。但是，认真领会中央的精神，是搞好工作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如果不按照中央的精神来掌握事情发展的动向，仍然还会出问题；出了小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也可能成为大问题。搞乱的可能性，走过场的可能性，目前都还存在。要避免这两种可能性，都必须正确了解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和总路线、总任

务的关系，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这就是说，一定要搞好整党，一定要清除精神污染，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含糊，不能迁就，不能像过去那样涣散软弱；同时又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不能重犯过去的错误。因此，经常地想到我们面临的任務，想到自己从事的工作同总路线、总任务的关系，要有利于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决不能有害于它的实现。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划清国内国外的界限，划清有益有害的界限。

异化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讨论得比较热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多年来也在讨论这类问题。国外有所谓马克思学，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思潮，有的是真正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有的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反对马克思主义，介乎其间的也有各种各样的流派。西方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有关人道主义的著作多得不得了。我们批评社会主义异化论，批评抽象的人性论、抽象的人道主义，尽管我们经过反复斟酌，在国际上的影响仍然很强烈。当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看外国人的眼色办事。可是，我们的文章、新闻报道很需要分清一些界限。有一条，我们早就通知了有关报刊，即写文章只就我们国内关于异化、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错误观点进行批评，一律不引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党以至马克思学中的材料。接待外国人，跟外国人进行学术交流、交换意见，也要坚持这一条。我们讨论国内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批评其中一些错误，是从我们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按照我国实际情况办事

的。我们这样做是合理的。他们中也会有人不赞成我们，这只好由他们。《邓小平文选》中就有一篇文章^{【1】}，讲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各国党互不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中国党是对的、是错的，由中国党和中国人民来判断。外国党是对的、是错的，由外国党和外国人民自己来判断。

小平同志讲，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界限。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要进一步分析。对资产阶级政客所讲的人道主义和一些正直的资产阶级学者所讲的人道主义，要加以区别。小平同志讲话中，已经说到资产阶级政客的人道主义，说你美国侵略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搞“中美合作所”，杀了那么多中国人，这是什么人道主义！他们如果一定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话多得很，要把他们的老底搬出来。资产阶级学者讲的人道主义，也还是可以进一步区别。其中，有的是替资产阶级政客帮腔的；有的在某些问题上，比如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反对种族歧视等问题上，态度还比较公正，和我们还有某些一致的或者接近的看法。当然，这不表明他们的思想体系同我们的思想体系是一样的，对人道主义还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它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神权等问题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可是，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特别是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这时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就其总的

思想体系来说，就不能认为是进步的了。这是举个例子。意思是说，我们的文章、报道都要做具体分析，力戒简单化。

中央的同志曾经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批评异化、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好像从此不能说人性、人道主义。更不能够一提人性、人道主义，就加上“反动的”一类字样。这是一种“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如果说讲人性、人道主义从来没有起过好作用，从来就是反动的，就太简单化了。历史本身同这种提法是不相符合的。

个别资产阶级记者散布说，我们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就是要“镇压西方文化”。这完全是蓄意捏造。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他说：“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

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2】

这段话，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西方文化中有有益的，过去我们吸收了，以后还要吸收；有害的，过去拒绝，今后更应该拒绝。说我们清除精神污染是什么“镇压西方文化”，事实上这些人对我们吸收有益的东西并不高兴，而希望我们为引进那些有害的、有毒的东西大开方便之门。我们不能上这些人的当，不能跟着这种别有用心评论走。西方记者这种论调在我们国内也有呼应。唉呀，西方人对我们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可不要再清除精神污染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我们党历来主张的，有分析、有区别、有选择地对待西方文化，做好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

最近，我们的广播电视部门有点顾虑，担心这个是不是黄色，那个是不是精神污染。我们的节目本来就不丰富，现在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态度，很可能搞得广播电视非常单调，到头来群众骂我们，不但骂广播电视部门，而且骂中央，认为清除精神污染的方针错了。请文化部电影局尽快把库存的电影，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世界的，清理一下，凡是基本上健康的，能够鼓舞人们上进的，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即使有个别镜头不太好，处理一下，都可以上映。特别是苏联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一些影片，我们在座的同志都曾经受到它的鼓舞和感染。比如《保尔·柯察金》，在五十年代对年轻人

起过很好的作用，最近重新放映，看过的同志都认为很好。一些世界名著改编的影片，在历史上作过贡献的人物的传记片，也可以演。第一批先选出三十部来，第二批再选出三十部来，第三批又选出若干部来。有的在电影院放，多数在电视台放。这些影片，我们看过了，年轻人没看过。根据我们的经验，看这些东西，尽管个别场面可能同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不那么协调，但总的说效果是好的，先清理出百把部是可以的。我们一方面要清除那些有毒的东西，另一方面要继续吸收好的东西。

这几年，我们翻译、介绍了不少国外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些很不好。好的要推荐，有毒的、有害的要清理。以后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翻译工作，还要有计划地进行，先翻什么，后翻什么，哪些公开发行，哪些内部发行，要心中有数。我们不能关起门来，不去了解世界的各种思潮。即使有害的东西，也不能不了解，有些也应该翻译、介绍，使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艺术家、研究人员，知道资产阶级世界在掀起什么样的思潮，以便分析它、批判它。翻什么，印什么，如何发行，要采取慎重的严肃的态度。有关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要好好整顿。现在有些地方出了一些外国文学的刊物，就没有经过认真的选择、鉴别。有的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外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然在清理之列。以后选题要送审，经过审查，由有关部门指定哪几个出版社出。内部出版的东西，要针对不同的对象，有组织地发行，不能漫无限制。

我们共产党人是人类文化遗产中一切积极成果的真正继承者。对于国外的东西，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我们不盲目崇拜，也不一概排斥。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方针，仍然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方针。清除精神污染，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步骤。要警惕和及时纠正“左”的错误或右的错误。报刊、新闻、广播、电视要慎重，没有把握的消息，没有把握的文章，没有把握的节目，宁愿不发或晚一点发，多找些人商量以后再定。

第三，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问题的消息、报道、评论，要在思想战线范围里做文章。

我们的同志要清楚，在这个范围做文章，就够我们做的了。不要贪心太大，到处伸手，层层加码，四面出击。这是一个很大的界限。平常我们讲三条战线，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思想战线同其他战线联系很密切，无法一刀两断。但是，我们在思想战线这样一个范围里边做文章，可以少出一点毛病。我们在思想战线的岗位做工作，尽管对思想战线上的全面情况不都了解，但是总比对政治战线、经济战线的情况了解得多一些。政治战线、经济战线的成绩，我们要大力宣传，但要对那两条战线的问题发表很多好意见，不那么容易。

中央书记处座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个是对农村的问题要注意，一个是对城市的问题要注意。

对农村的经济问题,包括生产责任制,包括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不能因为提出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就轻率地发表议论,说这个政策里头有这个问题,那个政策里头有那个问题,任意地和精神污染联系起来。在农村我们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还坚持过去的提法,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五讲四美三热爱”、“三兼顾”教育,建设文明村。为了建设文明村,就要反对一些同建设精神文明相反的东西。多年以来,我们在农村进行了惩治经济犯罪分子的斗争,今年又进行了惩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批判了封建迷信、买卖婚姻,惩治了拐卖妇女、残害妇女、虐待儿童的行为,制止了赌博、盗窃,等等。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凡是文明村搞得好的,这种事情就少。总政提出“军民共建文明村”,对农村工作有很大的推动。这方面尽管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任务仍然很艰巨。我们要通过建设文明村,反对和纠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在农民身上的影响,帮助他们解除这些包袱。考虑到农民对新名词不那么容易理解,到了基层干部那里也容易走样,因此在农村仍然执行原定的方针政策,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以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为好。现在农村已经有一些谣言,说清理精神污染,这个也要批,那个也要批,这个是污染,那个也是污染。我们宣传工作要守住一条界限,过去在农村反对过什么,照样反对下去,没有必要给它加上精神污染的名称。建设文明村,群众有各种各样的创造,像村民公约、五好家庭、军民共建,

等等。这些内容就很好，照原来的继续做下去。

农村经济政策，像雇工，党员雇工，社队企业承包，长途贩运，都出现了新情况，都有不同意见在讨论。要继续执行中央的方针，对那些有不同意见的问题，要再看一看。所谓看，就是要做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把情况搞清楚。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报纸上、新闻里头发表了一些不谨慎的东西，证明效果不好。后来发现，写文章的同志自己对情况也不清楚，马列主义的理论准备也不够。要进行调查研究，积累、整理、分析材料，对内部开展的不同意见的讨论不要压制。有关的调查材料和不同意见的讨论，一律不在公开的报刊发表。

政策已经定下来的东西，还要继续贯彻执行。比如原来规定城市个体劳动者允许带一两个徒弟，请三五个帮手，总数不超过七个人。这是国务院正式发了文件的，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说原则上适用于农村。有些地方，人数超过了七人，不要当作精神污染加以批评。社队企业承包以后出了一些问题，也不能当作精神污染。目前正在研究解决办法，要使得社队企业还能够维持、巩固、发展，防止集体经济在承包以后变成私人经济。

这几年，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对于我们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些政策，继续发展农村的好形势，不走回头路，就要认真调查研究。思想战线的同志，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向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

创造性实践学习，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他们的实际经验。

我们在农村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用了四年时间。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清除精神污染，中央的方针很坚决、很明确，全党都要执行。但是，农村有农村的特点，无论办什么事，都不能一刀切、一阵风、简单化。我们确定在农村不提反对精神污染的口号，就是按照因时、因地、因事制宜这条成功经验办事的。

我们现在城市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的不成功甚至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改革，还要继续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所有改革都要经过试点，都要进行充分讨论，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争论中间难免会有一些不妥当的，甚至错误的意见。这些问题，可坚持双百方针，通过同志式的探讨，特别是实践的检验来逐步解决。报刊发表文章、发表消息、发表评论，要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党和国家正式作了决定的东西，所有的共产党员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公开发表背离的和反对的意见。这包括在报刊上写文章、发表演讲。有不同意见，可以而且允许在内部讨论中间发表，直到向中央提出申诉。但是，在党和国家未做出改变之前，必须在行动上坚决执行原有决定。如果不遵守这一条，那是错误的，是违反党章的。我们有的同志，包括老同志，往往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这次整党要解决统一思想的问题，就要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在行动上坚决执行。如果在这

个问题上犯错误，那就应该批评，自己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例如，十二大以前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十二以后的两次《政府工作报告》，都确定我们要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公有制经济占优势地位，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如果对这些重大原则性决定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当然在批评之列，在自我批评之内。可是，这些原则怎么样具体化，怎么样贯彻执行，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讨论。在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各种不同意见都应该允许充分发表，不能说凡是发表了不一致意见的就是搞精神污染。很多东西还需要探索，需要实践。

我们有些同志说话、写文章，有的时候，兴头一来往往出格出得很厉害，其中包括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而从资产阶级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著作中引经据典，找理论根据，以至于对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散布怀疑的、否定的言论。例如，毫无根据地说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占有的分离，说这是社会主义异化的根源。出格到了这样的程度，还不应该接受批评，还不应该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

是否精神污染，主要标准就是看是否散布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是否散布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小平同志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就批评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这次又重新提出“一切向钱看”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清楚的，但是要说得使每个工人、农民都能够理解

和接受，就不容易。我们还要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还起作用，要提高经济效益，要搞经济核算，还有货币，有存款贷款，有利息利润，等等，都离不开人民币这样的计算单位。搞不好，批评得不妥当，有人就会认为不要搞商品生产了，价值规律也不起作用了，经济杠杆也不必利用了，经济效益也不必提高了，按劳分配也不对了。对这些问题要写出理论上能站得住、又能解决实际思想问题的文章，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要清除精神污染，要批评“一切向钱看”，但是又要坚持中央已经定下来的经济政策，要使我们的思想斗争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第四，正确处理党内外关系。

整党只整共产党，不要求民主党派也进行整党。原来一些党外人士有点不太相信，经过中央多次做工作，现在放心了。报纸上专门发表了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的文件，党外人士认为很好。清除精神污染，很难不涉及党外人士。他们担心，说整党不会整我们，可是清除精神污染很难脱身。写精神污染文章，发表精神污染演讲的，有党员，也有非党员。中央书记处也议论了这个问题。对文学作品、学术著作，正常的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整党以前就已经进行了的，今后还应该正常地继续下去。一个电影，基本倾向是好的，但也有缺点，不论编剧、导演、演员是不是党员，人家提出积极的建议，进行同志式的批评，有好处，没有坏处。过去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以后要更

好地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这用不着扯上精神污染问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出来一个谣言，说有几部电影要作为精神污染来批判。中央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没有任何一个同志说过这个话。这完全是捏造。不能把基本倾向好，但还有某些缺点、毛病或不足的作品，说成是精神污染。当然，也不能一说要注意政策界限了，就对该批评的也不敢批评了。

确实搞了精神污染，确实散布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散布了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的，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确定的原则，是党员从严，非党员、党外人士从宽。怎么样从严、怎么样从宽呢？党员要遵守宪法，又要遵守党章。非党员要遵守宪法，要求他们注意自己的言论、行动符合宪法，总是应该的。但是，对党外人士不存在遵守党章的问题，不能用党章的标准来要求。不论党员非党员，都应该以宪法为准则分清是非，该肯定的肯定，该批评的批评。共产党员不仅要模范地遵守宪法所确定的各项原则、制度和规定，而且应该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自我批评。对党外的同志，要多交换意见，多谈心。决不能造成一种形势，搞成党外同志挨批、党外同志挨整。大家共同接受教育、共同提高认识嘛，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嘛。从步骤上来讲，首先是党内，党员、党员干部、党的领导干部要在清除精神污染方面起模范作用，然后再来耐心帮助党外搞了精神污染的同志提高觉悟。

第五，什么叫淫秽物品。

有的地方首先处理传播、贩卖淫秽物品的刑事犯罪分子，收缴淫秽的物品、书刊、手抄本等，这种步骤是可以采取的。这里涉及到什么叫淫秽物品的问题。《宣传动态》今年第五十七期印发了苏联、英国、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关于什么叫淫秽物品的解释，以及怎么样才构成犯罪，怎么样判刑的材料。我们的法制委员会正在研究制定单行条例。在新的条例颁布以前，同志们可以参考这个东西。苏联《刑法教程》的解释和规定，大体内容和其他国家差不多。他们认为，凡是用粗野的自然主义和淫秽的形式来表现性关系的作品、图画和其他东西都叫淫秽物品。按照这一条，美术作品中的裸体像、裸体雕塑和摄影中的确是艺术作品的裸体照片，不能够叫做淫秽物品。不能把对淫秽物品的解释漫无止境地扩大化，看到一幅裸体画、一个裸体雕塑、一张裸体艺术摄影，就统统叫淫秽物品，这是不对的。怎样才构成犯罪，他们认为即使有淫秽物品，只收藏在自己家里，不拿去传播、贩卖和引诱人家，不构成犯罪。最近已经发生了到学生宿舍里一个个检查的事，看到有《大众电影》上的女演员像，就叫黄色的东西，看到日历里有一二张外国的裸体美术画，也叫淫秽物品。怎么能这样做呢？

毛泽东同志的书信选集很快就要出版，里头有一篇关于美术学校要不要有模特儿的信。他认为，男模特儿、女模特儿都需要，因为没有模特儿，就不能进行素描的训练。有关同志很有必要看看这封信，并就此在美术刊物上写点

文章。

我们现在也发现,有些模特儿被坏人勾引,去拍各种淫秽的照片,当然要管理、教育以至于处理。淫秽录像带比较容易鉴别,就按照刑法条例来处理。有些录音带难以鉴别,为谨慎起见,最好请音乐家来帮助,然后再确定哪些可以制作、出售,哪些不能。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宣传性解放,是搞精神污染。电影、电视以及文学作品,有些镜头是裸体的,有些描写是色情的,如果基本倾向不错,可以剪掉、删掉后照样放映、出版。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要把拥抱、接吻、谈情说爱一概说成是黄色的、淫秽的。

第六,关于艺术表演。

文化部正在草拟一个方案。正式下达以前,按照陈云同志《关于评弹问题的意见》处理。陈云同志讲的评弹,但对所有艺术表演团体都基本适用。陈云同志说:评弹是江、浙、沪一带的主要曲种。前些年,一些艺人在我们党落实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偏向,主要表现在书目和表演上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最近一个时期,虽然加强了演出的管理工作,但看来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在设书场的单位很多,除了文化部门,还有一些工会、街道、茶馆、供销社、农村社队和个体户,而工商管理部門只负责向他们收税,对演出内容并不过问。因此要切实纠正书目和表演不健康的问题,单靠文化部门抓是不够的,必须由江、浙、沪的省委和市委出面来抓才行。可以先召集各个方面开个会,制订书场管理的条例,规定什么样

的书不准演，如果演了该怎么办。然后派人抽查，发现违反的即照规定处理。我相信只要这样抓上几年，这股歪风是可以刹住的。

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曾经有所斟酌。原来讲，低级的、不健康的、庸俗的表演，是中央一级的艺术表演团体在今年春节带了一个不好的头，人数很少，但是这股风是从北京刮下去的。后来看了一些材料，认为只讲中央一级的不行，实际上基层问题更普遍、更严重。所以他讲：“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这样讲，范围就比原来宽了。现在不是有个说法吗？一种叫“官戏”，一种叫“民戏”，干部在场的时候，表演节目比较健康；干部一走，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出来了。有些团体两套节目，送审的是一套节目，实际上演的又是一套节目。有的晚上十二点以前是一套节目，十二点以后又是一套节目。上海、江苏、浙江看了陈云同志的指示以后，分别作了一些规定。中宣部和文化部已经把陈云同志的意见和上海的报告转发全国，授权各省、市、自治区以至于地、县，根据当地的情况作出自己的规定，颁布执行，把这种不健康的局面改变过来。坏戏、坏节目一定要禁止。传统戏要逐步改革。现在是相反，解放后改掉了的，又重新把老本子拿来演。

除进行必要的批评和加强管理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提

倡、鼓励、支持创作和演出新的、现代的作品，包括新编的历史剧、新编的现代戏。广大文艺工作者是有积极性的，问题是我们要组织，要给他们创造条件，要及时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评论界要进行一些宣传。对于其中的缺点，要采取积极的、建议的态度来帮助改进。

第七，同宗教问题有关的一些政策界限。

宗教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实际上不限于少数民族地区。中央最近正在起草文件，遵照宪法规定，重申宗教不能干预国家行政，不能干预司法，不能干预婚姻，不能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要求各地检查当地情况，坚决贯彻执行。宪法规定：“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中央关于宗教问题政策的文件中讲过，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尊重宗教习惯。宗教场所，像人家的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到那里去宣传无神论。不应该在教徒中进行有神论无神论的辩论。可是，除了宗教场所，除了教徒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时间，我们还是应该宣传无神论。学校教育、报刊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区别开来，不要把教徒的宗教习惯也当作精神污染加以批判。伤害宗教感情的文章、消息，决不允许发表。上海今年出了一件事情。一个无知的青年，发表一篇伤害回教徒宗教感情的文章，引起了很强烈的反映。经过耐心的工作，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要接受教训。过去曾经实行这样的规定，加入共产

党必须真心诚意地声明自己不相信宗教，可是党也要使这些党员不因为入党脱离群众。他们入了党以后，相信无神论，不相信宗教，但还要尊重宗教的一些生活习惯。做礼拜的时候，你一次都不去，在宗教徒群众中就孤立了。杀牛宰羊要念经，家里都是宗教徒，你共产党员不请阿訇来念经，在家里也孤立了。共产党员尊重宗教习惯，又不相信宗教，二者关系是可以处理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党员缺少必要的教育。有些地区已经发生党员要求退党的情况，他们认为与其相信共产党不如相信宗教。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如果我们工作真正做到家了，还是改变不了他的信仰，人家要求退党，应该允许。一些神职人员在口头、文字上对宗教教义进行解释，说他们的教义和共产主义是一致的。对这种问题，也不能随便说是搞精神污染。必要时可以跟他们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

第八，要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不能因为整党，因为清除精神污染，使我们的社会生活愈来愈单调，而是要使它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听说因为清除精神污染，有的服装、皮鞋的设计部门就做出规定，只准设计什么样的衣服，不准设计什么样的衣服，皮鞋不准设计尖头的。最近北京市发了一个通知，不准中小學生穿高跟鞋、烫头发、抹口红。这是对的。应该有这种规定，外国也有这样的规定。可是，不能把这种规定扩而大之，妇女一律不准穿高跟鞋、抹口红、烫头发。我们汉族人现在很少戴

耳环、项链、手镯了，可是解放前，我们的姐妹、母亲、祖母，耳朵上都穿了孔，过年过节、走亲戚都戴上耳环、手镯，头上插花，作为一种装饰。不能够说，戴上耳环、项链、手镯，穿上漂亮鲜艳的衣服，就是精神污染；不能搞得头发只能一种样式，衣服只能一种颜色。决不能够因为清除精神污染，回到过去那种走到街上一片蓝的地步。这样搞的结果，经济上对我们也不利。我们现在市场比较繁荣，如果搞得这个东西也不能买，那个东西也不能买，这种衣服款式也不能穿，那种衣服款式也不能穿，就会造成商品积压。人民群众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兴趣，多种多样的爱好，如果按照一个模式、一种格调来强求一律，结果，我们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务完不成，而且还会使党脱离群众。

《中国青年报》按照胡耀邦同志的意见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人民日报》转载了。清除精神污染和美化我们的生活并不矛盾。可以讲，清除精神污染正是为了更好地美化人民的生活，更好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在中小学学生中，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只进行正面教育，不要随意指责这个是精神污染、那个是精神污染。听说有的地方为了清除精神污染，让教员隔离检查。这样做是决不能允许的。如果教员确实搞了精神污染，也只能用批评的、说服的方法去解决。有人说：“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如果这样做，只能败坏党和国家的荣誉，极不利于清除精神污染。在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必须坚决制止这种做法。

第九，实事求是地、满腔热情地宣传我们的建设成就，表扬人民中的好人好事。

就拿思想战线来讲，就有很多好人好事值得宣传和提倡。最近，《光明日报》表扬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科学出版社。好的出版社还很多，不只这两家。要表扬好的出版社，表扬好的报纸、刊物，好的电影、文学作品，好的音乐作品、美术作品，好的舞蹈、曲艺，好的电视节目，好的表演，以及好的宣传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编辑、校对、教师、科技人员等等。小平同志讲，我们的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几年来有很大成绩。我们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同时，要通过大量事实使人民认识到，我们的理论界确实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文艺界确实有很多优秀的文艺战士。

一方面清除精神污染，另一方面表扬这些好人好事，可以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使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得到更大的繁荣。在文艺界，有些作品不好，要批评；有些作家脱离生活，胡编乱造，要引导。我们确有不少文艺工作者深入了生活，深入了人民，写出了能够反映我们时代风貌、反映人民生活的好作品。要充分肯定他们的成绩和进步。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还需要好好努力。《光明日报》开辟了一个栏目，表扬在艰苦条件下作出了优异成绩的知识分子。现在只能隔几天出一次。实际上这样的同志有的是，一天表扬一个，一年才三百六十五个，十年才三千六百五十个。其实何止三千六百五十个？思想战

线上,其他战线上,模范人物、先进人物有几十万,上百万。

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要讲我们革命之艰难困苦、时间之长、牺牲人数之多,哪一个国家都比不上。怎么样使我们的后代、我们的青年,怀念和学习这些革命先烈,懂得是先烈用他们的鲜血、生命换来了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个地方,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机关,究竟谁为革命牺牲了,查查他们的名字,写写他们的简历,不能塑像,立个墓碑,贴张照片,总可以吧!可以在适当的地方立上一块石碑或木牌,写上先烈哪一年生、哪一年死,事迹怎么样。可以结合美化环境,动员学生、职工、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来建立这样的纪念点。开学时、国庆时、清明节时,去那里悼念。这件事,准备请总工会、共青团、妇联、教育部和宣传部共同拟定一个办法。加强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的教育,不仅要讲究内容,也要有必要的形式,以便造成一种社会风气。我们一方面要清除精神污染,另一方面宣传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好传统,宣传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做出了牺牲的同志的光荣事迹,把革命的正气普遍地发扬起来。不仅要清除精神污染,更重要的是把正气扶植起来。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第十,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绝不要重犯过去“左”的或右的错误。决定性的关键,是党员干部必须模范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

一定要使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比我们历史上任何

一次同类工作都做得更好。延安整风是很好的，可是中间走过一段弯路。我们思想战线上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可是一定不能重犯“左”的错误，也不能重犯右的错误。不能以“左”的立场来反对右，也不能以右的立场来反对“左”；反“左”时要防右，反右时要防“左”。目前，要着重克服的是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最后的结果要做到每个参加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党员、党员干部，以至于党外的同志，都心悦诚服地、高高兴兴地觉得不但提高了觉悟，而且心情是舒畅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大家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为我们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所有上述问题，只是初步提出一些意见，随着工作的进展，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我们都要想办法妥善解决。如果政策界限划得比较清楚，比较正确，那就要执行，现在划得不清楚的，以后逐步划清楚。问题出来以后，要想办法解决。关键是共产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确实在整党中间、在清除精神污染中间起模范带头作用，完整地、准确地学习、领会和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要高标准、严要求对照检查，既检查自己，也检查别人，坚决、严肃、认真、完满地执行党中央关于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的决定。这样，才能通过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使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成为真正合格的党员，成为优秀党员。整党走不走过场，清除精神污染走不走过场，会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关键在我们党员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

注 释

- 【1】 指邓小平《处理兄弟党关系的重要原则》一文。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319页。
- 【2】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页。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掌握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七日）

同志们都关心和希望解决思想政治工作重要不重要、占什么地位的问题，很希望各级党委充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我们这几年思想政治工作有进步，但是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没有摆到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委，如果不把这项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目前的状况要根本改变，是困难的。同志们可以相信，思想政治工作不受重视，党委摆不上议事日程的局面，是能改变的，会改变的。

中央所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实际生活提出来的。同志们是做这方面工作的人，日常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深深感觉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把经济工作抓上去，经济发展了，市场繁荣了，人民生活改善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国家经委召开的部分省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

了，人们的思想就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了。因此，也就认为只要埋头经济工作就行了，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抓也可以，不抓也可以。我们都是过来人。远的不说，就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到五年，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很大进步。农业也好，工业也好，财贸也好，年年增长。外国人也这样看，说每来中国一次就感到与上一次比有不同，半年不来，中国的事情又往前走了。农民的生活有很大提高。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过去提高很多，原来待业人员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新增加的待业人员，大多数也是可以安排的。城市一个就业人员只需赡养零点七个人，这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比解放初的情况好得多。我听搞电影工作的两位同志说，去年拍《夕照街》，他们在北京市走了很多胡同，每个院子挨家挨户地看。房子外表差劲，但屋里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多数人家有了所谓“几大件”。每家每户算算账，谁都不能否认，这几年来城市人民生活大有改善。可是牢骚照样很多，骂娘的人还不少。这次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发现刑事犯罪分子里头，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有工作的，其中百分之七八十又是青年人。青年人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多数没结婚，每月收入至少三十几元，加上奖金，总有四五十元，甚至五六十元，日子可以过得不坏。可是，就是这样的青年人，在刑事犯罪分子中占了很大比重。这就证明，经济好了，生活好了，思想并不自然而然地跟着好了。同志们提供的材料也证明，哪个厂思想政治工作搞好了，不但生产能够持续增长，职工生活有明显提高，而且刑事犯罪分子极少，不少厂

一个刑事犯罪分子都没有。而另外一些厂，生产也在进步，工资、奖金也在增加，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好，刑事犯罪时有发生，一抓就是五六个，十几个，二十几个。文化单位也有类似情况。这些人物质生活不错，要说文化生活，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看书的都有。但是你不抓思想政治工作，他还是走上犯罪道路。

我们年纪大的人，在旧中国受帝国主义气，被洋人看不起，见到洋人横行霸道，为了争这口气，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不在话下，苏联霸权主义不在话下，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可是在我们人民中间，甚至在党内，有的崇洋媚外，在外国人面前低声下气，为了攀上“洋亲戚”，不惜出卖国格、人格，有的甚至以当洋奴为荣。是因为没有生活出路，没有饭吃，被迫以此谋生吗？没有一个是这样的！经济犯罪分子，有些地方的统计，党员竟占了百分之四十，有县委书记，有司局级干部；也有老干部，尽管是个别的，总归有嘛。还有高级干部的女儿。刑事犯罪分子中，高级干部的女儿还不是一个两个。他们组织流氓团伙，有的成了流氓头子。这都是触犯了刑律的，必须依法惩办。还有大量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也很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在比较有知识的人中间，在党内担负一定职务的干部中间，出现了这样一些人，认为要把中国搞好，过去的一套不行了，只能用美国的一套、日本的一套、西欧的一套办法了；认为马列主义不灵了，毛泽东思想过时了，要靠西方这个学说、那个学说。

生活教育了我们。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这决不能动摇。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经济工作上去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思想觉悟会自然而然提高；或者认为经济工作上去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可以不去管思想觉悟怎么样。实际上，放弃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要健康发展，也很困难。这几年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就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拨乱反正，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制定了一系列适合各方面情况的方针、政策。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加以贯彻，是很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一阵子，我们理论界有的同志批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不对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重新肯定了这个提法。当时有的同志还保留意见。现在进一步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的经济工作、技术工作和其他工作，就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党内同意这个观点的同志越来越多了。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同我们党的性质不相符合，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符合，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相符合。无数事实证明，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主观世界。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列宁曾经反复指出，工人运动只能自发地产生工联主义意识，因此必须向工人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同人民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我们是靠这个起家，靠这个胜利的。这是讲的革命胜利以前。那么，革命胜利以后，这个原理是

不是过时了？新中国诞生了，人民政权建立了，这个原理是不是过时了？大量事实证明，这个原理没有过时。不但在遇到困难、受到挫折时，我们要做思想政治工作，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灌输到人民中去；就是在顺利的时候，在胜利的时候，也仍然需要向我们的人民群众、向我们的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灌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就要求我们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决不要有比人家低几等、吃不开的想法，但也不应该居高临下地去对待别人。共产党里头有分工的不同，各行各业都同等重要，少了哪一样工作都不行。

要向我们各个地方、各个行业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讲清楚，把情绪稳定起来，把精力集中起来，踏踏实实做好工作。有些同志不大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甚至会说些风凉话。不要受这些议论的影响。首先自己要对思想政治工作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做下去，而且越做越好。

大家所关心的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实际上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谈谈这项工作中的一些政策界限。

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对清除精神污染的意义讲得很清楚，政策界限也很明确。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现在确定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那么，在工人中间是不是也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如果要提，要做，该怎么做，该

注意什么问题？小平同志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是这样散布的，就是精神污染，就在清除之列；不是这样散布的，就不是精神污染，就不要扯到清除精神污染这个题目里头来做文章。比如，这几年来，我们在农村、在城市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计划体制的改革，等等。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有少数搞得不好。能不能说，搞得不好，就是搞精神污染？不能这样讲。我们这次机构改革、新老交替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老同志。老同志识大局、顾大体，自觉地、主动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让年轻的同志上来接替自己的工作。老同志当中也有人思想不通，退得相当勉强，无非还想在第一线多干几年，能说这是搞精神污染吗？不能。提拔中青年干部可不容易呀！我去年四月到中宣部。部长、副部长中央定了，剩下的就是局长、副局长，尽可能不从外单位调，在本单位选。选这个，那些人不服；选那个，这些人不服，怎么推也推不出来。这能叫精神污染吗？能说这是对共产主义不信任，是散布了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找得出这样的影子吗？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广，前后花了四年的时间，直到去年底才在全国范围内推开。搞得稍晚一些的，能说是搞精神污染吗？不能这样说。改革有搞得好的，有失败的。试点有搞得好的，有推倒重来的。能说这些是精神污染吗？这里也有思想问题、认识问题，但与小平同志讲的精神污染不一样，是另外

一类性质的问题。

关于清除精神污染，这段时间在报纸宣传和贯彻执行中，总的不错，但是也出了一些笑话。最近我听到一句话，很有代表性，说“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凡是自己看到不顺眼的，都可以装到这个“筐”里边去。我们有些基层干部辛辛苦苦，用意也是好的，就是方法简单，他的话人家不大那么听。那么好啦，你们不照我的办，都是精神污染，装到筐里再说。所以，首先要分清楚什么是精神污染，什么不是精神污染。精神污染有它本身的范围，有它本身的性质，不属于这个范围的问题，不属于这个性质的问题，就不要都往精神污染这个“筐”里头一装了事。

农村有封建迷信，虐待妇女，拐卖妇女，买卖婚姻，虐待儿童，经济犯罪，刑事犯罪，赌博偷盗，各种各样的坏事。从思想体系来讲，更多的属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封建思想残余的反映，也有一部分是属于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反映。中国的资本主义往往和封建主义分不开。在这些问题上，过去我们进行了斗争，以后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用什么办法来做？触犯刑律的，就依法惩处。在农村，我们已经找出一套办法了，就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教育，建设文明村、五好家庭、青年民兵之家、文化站、科学技术推广站，诸如此类，创造了很多好形式。总的是建设文明村，把这些东西包括进来，用这套办法来提高农民的觉悟，反对封建迷信，同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残害妇女、买卖婚姻、虐待儿童、偷盗赌

博等进行斗争。建设文明村工作做得好的，有的一个队、一个公社没有一个刑事犯罪分子。需要照过去的成功的办法继续做下去。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是考虑到农民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农村干部水平参差不齐，要使他接受和理解新的口号不那么容易，搞不好还很容易走样。最近，刚宣传清除精神污染，农民的谣言就纷纷来了，说什么要批大包干。清除精神污染，有一些理论问题，什么异化呀，什么抽象的人性论呀，抽象的人道主义呀，什么抽象的民主自由呀，什么人权天赋呀，诸如此类，到农民那里，就会走样。与其一个新名词、新口号下去，完全走样，使很多工作做不好，出问题，不如照原来农民群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办法做下去。这样效果会更好。

工人阶级不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四化”建设的主力军，经过三十多年的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比较高。特别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城市，同农村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个人意见，要真正使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起领导作用，就要参加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同时，要灌输正确的东西，以增强抵制精神污染的能力。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灌输正面的东西要有效果，有针对性，帮助职工分析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能说工人阶级不要承担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务。具体做法、提法，我赞成会上同志们讨论的意见，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工人阶级辨别是非的能力，增强抵制精神污染的能

力。要多进行正面宣传教育。最近城市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有好多事例、材料可以当反面教材来用。前面有人翻车了，后面的人总该接受点教训。要用本单位的材料，使大家提高思想觉悟，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抵制精神污染的本领。

做这项工作时，要划清什么是精神污染、什么不是精神污染的界限。经济改革一般不在清除精神污染范围之内。改革中该试点的就继续进行试点，试点失败了就吸取教训，推倒重来，不能加精神污染的帽子。美化生活同搞流氓团伙是两回事。不能因为清除精神污染，就把生活搞得很单调。我们的经验说明，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健康向上、适合群众需要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搞得越多，那里精神污染的市场就越少，犯罪分子也越少，甚至绝迹。不要去干涉人家的生活爱好，不要干那样的蠢事。我们提倡艰苦奋斗，我们也主张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美化生活。有些干部，往往把自己看不惯的事当作要反对的事，这次一提清除精神污染，就更加反对起来了。道理讲不透，说不服人家，就说人家搞精神污染。这样做很不对，不符合中央的方针。

清除精神污染，就是解决散布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的问题。必须划清界限，不能扩大化。对于确实搞了精神污染的同志，只能按照中央的方针，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进行说服教育，不能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错误的方法去解决。毛泽

东同志讲，要好心对待自己的同志，好心对待犯过错误的同志。有好心，还要有好心的方法、步骤、语言、态度。不要像“文化大革命”时那样，“批倒批臭”，检查没完没了，无限上纲。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总结好的经验，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而且要创造一些新的、行之有效的经验。解决思想问题，千万不能简单化，更不能粗暴。否则，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带来新问题。中央已经讲了允许申辩，允许澄清事实，允许考虑，允许反复，要善于等待。更不要搞人人过关。重要的是分清是非，切实提高思想觉悟。有的同志一时想不通，可以让他多考虑一个时期。

开展西方学术著作和 文艺作品的评论工作*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

第一，近四个月来思想战线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去年十月十一、十二日召开，到今天整整四个月了。

在全会上，邓小平同志讲，整党不能走过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又说，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我们对错误倾向还是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但是批评的质量和分量不够，而抵抗批评的风气却很盛。要继续批评和纠正“左”的错误观点，但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一方面，整党和在思想战线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都不能走过场。思想战线当前要着重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

向,改变抑制批评的风气,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要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另一方面,不能站在“左”的立场,要防止搞过火斗争,防止重复过去的错误。二中全会以后,思想战线面临这么两个方面的问题。

从工作的开始,我们就遵照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指出精神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同时首先着重讲清楚要防止出毛病,防止重复过去的错误。因为出了毛病以后,就会被作为借口来利用,以继续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个别地方、个别单位有些同志,听到要清除精神污染,听到要整党,文件还没到手,或者到手后还没有很好学习、领会精神,就匆忙动手搞起来。在这些地方和单位,确实出了点毛病。经过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逐步把一些政策界限划清楚了,出现的毛病也都纠正了。不能说以后不出任何毛病,但是不至于出大毛病了。这就可以使我们已经形成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有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就能更好地按中央的方针来进行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

一位在县里工作的青年同志说,刚刚听到要清除精神污染,县、社两级的干部觉得摸不着头绪。他们中有的同志说,我们这些年的错话可不少,搞改革,有的成功了,有的不成功甚至失败了,这个账一算,还得了!后来听说,改革即使失败了,也不当作精神污染,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照过去行之有效、为农民和基层干部接受的那套继续

进行下去。这一讲，大家情绪稳定了。农村是这个情况，北京怎么样呢？我们从一开始就讲，整党、清除精神污染首先要北京不出大毛病，力求不出小毛病。现在看，没出什么大毛病。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一级，做了大量工作，从指导思想上说，是执行中央方针的，是照中央精神办事的。

几个月来，思想战线各单位，把小平同志讲的思想战线问题相当严重的情况作了一番清理。事实证明，中央对思想战线情况的估计是正确的。情况比较清楚后，要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最近发表了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收集和研究大量材料，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修改了多次。《光明日报》有一篇短评《新学风赞》，说文章不仅道理能够说服人，而且文风好，态度平等，与“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那一套完全不同，反映出两种学风。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不但要了解情况，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分清是非，讲清道理，用科学的方法，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以至错误意见的同志，使相当一部分同志以至多数同志心悦诚服地接受正确的观点。这篇文章，在党内、党外影响都是好的，在国际上影响也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组织对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进行评论，就可能搞得比较好。采取科学态度，才能对各种现实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在某些问题上有所突破。我们今天这个会是开得及时的。

第二,对西方学术著作、艺术作品展开评论,是一项紧迫的工作。

这项工作,现在已经到了不能不进行的时候,而且愈往后会显得愈重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再想把自己同世界其他国家隔绝开来,有的国家再想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样采取经济、政治、军事的办法把中国封锁起来,都是不可能了。我们同世界各国之间,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都不会越来越缩小,而会越来越扩大。党中央多次指出,我们对外开放的政策要坚持下去。要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成熟,对外开放政策要越来越完善。现在同我们建交的国家一百三十多个,同我们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国家和地区更多。各个方面的交往、合作,以及交往、合作的方式,会越来越多,领域也越来越宽。中国到外国去的人,外国到中国来的人,都会增加。光旅游一项,除了港澳同胞外,去年到中国来的是八十八万。这个情况以后还会逐步发展。

国际间交往日益频繁和扩大,我们要了解人家的学术、文化,人家也要了解我们的学术、文化。相互之间要对话,要讨论。近年来,西方学术著作翻译进来的有一千种以上,艺术作品更多。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应该做得更多、更好。

跟世界各国交往,就必须了解人家。即使为了保护自己,也需要了解人家。除了面对面的谈话以外,了解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翻译各个学科的学术著作和艺术作品。这些

著作翻译过来，出版了，一定会在我们的人民中发生影响。作者、内容，自然要介绍。但是，只限于介绍，不加以科学的评论，如果原作比较好，好作用也不能充分发挥；如果原作不好，消极作用会比较大。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独立自主，介绍过程中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加以评论。其中相当一些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待这些著作，尤其要采取清醒的态度。我们要了解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思想，要吸收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有没有价值，怎么吸取，就不能离开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的思想体系同所有和我们进行交往的人们都是一样的，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在国际斗争中，反动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放弃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共产党员必须永远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小平同志讲，经济往来我们要实行两手政策，文化交流也要实行两手政策。这种状况，加重了我们思想战线的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直到现在，我们在国内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讲，国内统一战线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实现了祖国大统

一之后，会出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局面。在大陆，旧的剥削制度消灭了，原来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不存在了。在香港、台湾这些地方，剥削制度不变，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继续存在。这又增加了国际上资产阶级的思想传入和影响国内、影响大陆的渠道。怎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我们的人民广泛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的东西，而又不受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影响，更大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成为一个需要长期解决的课题。

我们应当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今天和明天，从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中，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中，充分认识对西方学术著作、文艺作品进行马克思主义评论工作的紧迫性。

第三，做出规划，有步骤地前进。

选题算是一个规划。我们已经有了第一批选题。还应该 有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选题。下一步，就需要做组织工作，确定哪些同志分别承担一些什么方面的任务。一批批选题陆续定下来，随着就有一批批同志来分别承担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壮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可以培养和锻炼越来越多的同志。

刚才有的同志讲，我们不能对苏联盲目崇拜，他们有些学术著作水平不一定很高，我们有些学术著作水平不一定很低。这个话是对的，正像不应该盲目崇拜美国、日本一样。我们确实应该有这种自信。但是，是不是也应该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在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

课题的研究方面，在对种种西方学术思潮的情况掌握和分析方面，苏联学术界同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比是有领先的地方的。就拿我们同苏联比，我们理论工作者中能够读外文原著的同志比较少，要把一千多本西方学术著作一本一本作出科学评价，是难以完成的。全国宣传部门、研究部门、高等学校以及编辑出版部门，有很多同志是可以参加这项工作的。此外，还要吸收闲置的外语人才。参加这项工作的困难，不仅在于要懂外文，能直接读原著和有关的外文材料，还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这几年，我们翻译的东西比较多，评论、特别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评论比较少。对西方学术著作、文艺作品的评论，可以借助苏联的一些著作，但我们自己要坚持一批批地搞下去，力争达到高水平。

一位同志最近去苏联，了解到他们的办法是，介绍一本西方著作，都有相应的评论著作出版。我们可以从中选择翻译好的。这项工作需要有统一的安排。我们希望大家发挥积极性，多想一点办法。有些同志，是热心并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可以请这些同志参加工作。工作过程中有困难，理论局应该帮助。

我们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如果把队伍组织起来，计划安排得好一点，把它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坚持下去，就给思想战线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志联系实际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联系实际，主要是联系国内的实际。西方思潮传到了中国，在中国发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如果

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工作跟不上，消极作用会大于积极作用。如果评论工作做好了，会有利于我们国内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有利于我们两个文明的建设。我们应该有雄心壮志，使我们对西方思潮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在国际范围中得到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占有自己的地位。

第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评论西方学术著作和艺术作品。

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共同感受、共同愿望，就是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对西方学术著作和艺术作品的评论要避免两个方面的偏差：一方面盲目崇拜、照抄照搬，一方面简单粗暴、一笔抹煞。要真正具有学术水平，就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

评论工作要首先着眼于国内的读者，帮助他们分清是非，提高认识，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信念，使曾经程度不同地接受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影响的人能够头脑清醒。各批选题，首先要努力完成当代的，特别是其中在我们国内影响比较大的。

评论一本书也好，一篇文章也好，都需做一点调查。在哪些人中发生了影响？是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倾向、表现是什么？要使国内受了这种影响的读者看了我们的评论以后，脑筋开窍，能够区别精华和糟粕，而不至于做西方著作的奴隶。通过评论使读者进一步认识到，为要正确地学习西方学术著作也需要学点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的同志，接触大学生的机会很多，知道这些年轻人欣赏什么，受到些什

么影响。当然也还需要继续做深入的、系统的调查。经过这样一些调查,了解西方学术著作、文艺作品在我国读者中间的影响,才能评论到点子上,帮助读者解决实际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这样,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就实现了。这个要求实现以后,还要有所突破。但是真正实现这个起码的要求,也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

写一篇文章,写一本书,要占有很多材料。评论一篇文章,评论一本书,需要接触的问题、需要涉及的方面很广,需要占有的材料更多。要对面前的这篇文章、这本书做出中肯的评价,它所接触的材料、提出的问题,甚至与它只有间接关系的材料和问题,都不能不接触,不能不研究。这就要重新学习。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精神,永远是我们的榜样。马克思说,他的学说是革命的、批判的。他在和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中,批判地审查和吸取了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一切科学成果。马克思对于别人的著作,包括对于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哪怕有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都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对那些应该否定的、抛弃的东西,也层层解剖,反复论证,说明其谬误所在。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系列伟大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科学的方法。我们在评论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的时候,要自觉地学习这样的方法。

刚才有同志提到,一个美国人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以后,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问

题，很多新的现象；可是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作为对它进行本质的分析的著作，《资本论》还是站得住的，所有那些新的问题、新的现象，归根到底逃不出马克思的分析。这都是可以由马克思主义作出科学解释和科学回答的。对于这些新的问题、新的现象，西方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从不同方面进行过研究，写出过有价值的著作。我们评论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有必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尽可能全面地认真研究一百多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出现的各种思潮、学派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新的研究成果，一定要研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具有明显反共倾向的，也要研究、分析批评它的谬误，吸取其中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要真正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道理讲得使人口服心服，使被批评者也感觉到我们没有歪曲他们的原意，不是蛮横武断。这样，被批评者尽管可以不赞成我们的道理，但是也认为我们是持之有据的，是采取探讨态度的。

胡乔木同志去年跟一位同志谈话，说我们有些文艺批评文章，除了态度方面的问题以外，很重要的缺陷是没有学问。你说的那些结论对不对？也对，但是受批评的同志或者读批评文章的同志不能心服。要恰如其分地评论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就要有学问。要让每一个希望学到知识的、不带偏见的读者，确实能从我们的评论著作中学到一点东西。这决不是靠断章取义、排列几个结论性的断语所能奏效的。

要讲究质量，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要草率从事。特别是第一批，一定要确有学术价值，表现出我们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如果第一批搞得更好一些，在这个基础上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我们这项工作就可以越搞越好，真正在提高我们广大党员和人民的理论水平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五，不要妄自菲薄，要充满信心。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犯过错误甚至大的错误，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从总的历史来看，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国内建设和国际活动中取得的成就，甚至使原来怀疑我们的人也转过来肯定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来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取得的丰富经验，我们在理论上的创造——毛泽东思想，已经得到历史的承认。我们每个理论工作者，在这种实践中丰富了头脑，锻炼了才干。在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党，有可以从中进行无穷无尽的理论概括和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活动的丰富实践。经过整党、清理精神污染，深信大家一定会有明显的提高。只要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只要有正确的方向、坚定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百折不挠，刻苦用功，反复钻研，广泛吸取各种意见，一定会有好的成果。一本书，一年写不出来花两年，两年写不出花三年，三年写不出来花五年。现在四五十岁的同志，主要因为“文化大革命”，不少宝贵时

间耽误了。比如原来可以写五本书，现在振作精神，抓紧时间，总可以写三四本，写一本也是好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要有达不到水平不交稿的精神。写出来以后，要多找些同志征求意见，反复多次，把不足的地方都补上，说理不够的地方说得够一点。现有的队伍可以做很多工作。还要物色和培养更年轻的同志、水平更高的同志，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理论上的繁荣，就可以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外国朋友谈建设 精神文明及清除精神污染*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

清除精神污染要继续深入

前一阵子，有的西方资产阶级记者对我们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作了一些歪曲的报道，说我们又要搞“文化大革命”。最近，好像他们也为先前那些离奇的报道感到难堪了，就用另一种语言，说我们清除精神污染收场了。这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前些日子有些海外的华侨、学者听那些记者说中国又要搞运动整知识分子时，确实非常担心。后来有些美籍华人、华侨学者来国内一看，发现与西方记者报道、评论的不一样，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中国政局稳定，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得同从前一样。西方记者歪曲报道的影响也就慢慢

* 这是邓力群同志同法共（马列）机关报《劳动者》通讯员、中国文学专家苏珊娜的谈话。

地消除了。

“精神污染”几个字，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同情者习惯的语言来讲，就是指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对我们共产党、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影响和腐蚀。这种影响和腐蚀过去就存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收到了很大成绩，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就是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也跟着进来了。途径不是一种，方法也是多样。有学术上的影响，有生活方式的影响。举例说，淫秽的录音带、录像带、书刊，对外开放前，在我们国家可以说几乎没有，实行开放政策后，确实大量涌进来了。外国一些不友好的人带进来，一些很不好的人同我们的不法商人走私，我们自己有的人出去带回来。带进来后，蔓延非常快，对青少年起了很坏很坏的作用。从我国内部来讲，原有的封建主义历史很久，其残余思想影响很普遍。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但它的思想残余又重新泛滥起来。在这种内外结合的情况下，我国社会生活各领域，我们的思想界、工作人员、学生、工人、农民都受到了影响，达到了建国后比较严重的程度。

根据对这一情况的分析，中央认为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同志面前，要采取坚决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方针，一定要接受“文化大革命”时的教训，不能采取那样一套办法。要采取充分说理的方法，让党员和人民认识清楚，然后让大家提高认识，采取正确的态度。这样一种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对这一种方法曾

作过很好的比喻，就是“自己洗脸”。北京春天风很大，上了街，风一刮，灰尘落到脸上，回家照照镜子，发现脸上很脏，就启发自己洗洗脸，可以使脸上干净些。自己舒服，别人也觉得好看些。

本来提出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方法。可是要承认，开始有些知识分子确实担心是否要搞过去那一套了。同时，有些人因为受了习惯的影响，对如何清除精神污染也发生了一些误解。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一方面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央文件，另一方面针对各种误解造成的失误及时划清各种各样的政策界限。经过一段工作，干部、群众对中央的方针、政策、要求就比较了解了，清除精神污染工作进入了正常状态。问题要解决，方向要正确。现在有这个把握了。

拿理论问题来讲，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问题，一是异化问题，对思想界影响不小，在文艺界也造成了不小的混乱。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应该同意什么意见，或者反对什么意见，必须态度鲜明，又要把道理讲得大家都能服。胡乔木同志带领一批同志集中精力、时间，占有能收集到的材料，反复讨论，写出了一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文章发表后，绝大多数同志觉得可以接受。当然，也确有个别人直到现在还不同意这篇文章。对这样的同志，中央的方针是，想不通，允许考虑，不强迫接受，更不强迫检查。他们在理论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还可以发表出来，供大家讨论。他们的生活、工作照旧，社会活动、朋友交往

照旧，不受任何影响。有一个意大利《团结报》记者曾问我，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否意味着清除精神污染工作的结束？我说，不是结束，是继续，而且是深入。怎么继续？怎么深入？就是按照已经规定的政策界限，按乔木同志文章这样讲道理的方法，来继续深入下去。

据这一段了解和各地的调查，发现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在党和人民中的影响不小。全国有一些共同性问题，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问题，甚至每个单位都有每个单位的问题。我们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分清是非，达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影响的目的。中央早就预计到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要比三年整党花更长的时间，要一直进行下去。

把建设精神文明放在第一位， 清除精神污染放在第二位

有一位美籍华裔资本家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上说，看到各种政策界限划清后，放心了。他认为清除精神污染非常重要。他提出一个意见，也是一个希望，并打了比方说，清除精神污染好比治病，受到细菌感染，就要治病，不治病就危险了。治了病后如果不注意身体锻炼，增强抵抗力，成天想怎样治病、防止细菌感染，这个人体质就会衰弱下去。因此，他建议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同时，要从事精神文明建设。他提议，把建设精神文明放在第一位，清除精神污染放在第二

位。他的意见是对的，应该说是正确地理解了我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方针。

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同时，就讲了要批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小平同志同时提出了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的犯罪分子的活动。打击这些犯罪活动是行政、法律措施。根据已有经验、事实来看，经济犯罪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多数，是受了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所以，建设精神文明、清除精神污染要同时进行，一直进行下去。去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打击刑事犯罪斗争，十二届二中全会又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务，并非偶然。过去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很多人犯罪，如不惩治罪犯，将影响更多人。这些犯罪分子惩治了，如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加以清理，新的犯罪分子在腐朽思想影响下照样会出来。犯罪分子数量不小，但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同法国、美国、日本比，低得多。我国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人，甚至更多的人是奉公守法的。所以，一方面要打击刑事犯罪、清除精神污染，另一方面要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拿我们的语言来讲，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这个用语，用外语名词来解释，据说很不容易，最好从内容上来谈这个问题。

所谓精神文明，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叫文化建设，包括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新闻、出版，等等。从规模、水平来看，我们这些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

多。我们六年制小学至今未普及，医生还很不够，医院也很少。去年拍了不少电影片，但电影院全国还很少。这几年电视有很大发展，但覆盖面积也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科学技术因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耽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落后了一二十年，社会科学的工作人员从数量、工作规模来讲，也比资本主义国家小得多。大学在校生才一百三十多万，加上电视大学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大学，也只有二百多万人。根据计划，到一九九〇年也才能达到五百万左右。在校大学生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比许多国家都小。所以，文化建设中的各种事业还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六五”计划只能做一部分，“七五”计划再增加一部分，到本世纪末也还不能说在规模、水平上赶上了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刚才讲到犯罪分子中大多数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确有一些人是缺乏知识，愚昧。所以，精神文明建设中，文化建设的任务很艰巨。

在文化建设问题上，从表面看，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老师讲课，学生入学、毕业、升学，学的课程如数、理、化、生物、历史、地理、语文，也差不多。但实际上，从我们教育方针来看，同资本主义国家有原则区别。数、理、化是没有阶级性的，可是学了数、理、化为谁服务是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教学生学这些东西是为他们赚钱，我们要教育学生为人民服务。对有些课程，如历史、政治、品德的教育，我们要鲜明地向师生讲清为谁服务，向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我们向报考大学的学生明明白

白地说，我们的大学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本身当然没有阶级性，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我们都要学，学了这些为谁服务，我们的态度是鲜明的，宪法也规定了，必须为全国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另一方面，就是讲思想建设。思想建设用共产主义者的共同语言来讲，就是列宁说的一句话，向自己的阶级——工人阶级，向自己的人民，灌输科学共产主义。这就要求共产党员首先坚信科学共产主义。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列宁讲得很清楚，因为工人阶级虽是先进阶级，但它是生活在旧社会的，从旧社会来的，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资产阶级思想已形成了一个体系，深入到人们生活深处。列宁也曾讲过，稍为放松一点共产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大大泛滥起来。工人阶级自身只能产生经济主义、工联主义。这个原理不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适用，就是在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也适用。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一个企业、单位如果不向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只用奖金去刺激工人，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工人阶级也要进行科学共产主义教育，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

思想建设的核心，就是对党员和对工人、农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有理想、有道德，而且为了使社会安宁、生产发展，遵守必须遵守的纪律。进行这个教育，可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正成为同志式的互相

关心、互相帮助的友爱合作的关系。进行这样的教育，要结合各时期群众的思想状况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具体情况。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创造了很多好形式。随便举个例子：去年，北京市委、北京日报主办了振兴中华读书竞赛，出了一百道题让大家回答，答得好的进行奖励，奖励的东西是购书券。题目内容包含中国历史重大事件，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革命先烈，世界范围的科学家，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出题目时，又说明回答问题可参考什么书籍。题目出来后，在全北京市引起了普遍关心，收回答卷二十万份，实际上每份答卷有的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个班组，有的甚至是一个学校的集体答卷。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分工看书，然后凑到一起答卷。以前有些小青年一有空就是打扑克，现在顾不上打扑克了，都用心思学习，考虑怎样来答卷。最保守的估计，答卷的实际参加者有四五十万人。在青年职工里头，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个读书活动，由读书发展到评论书，由评书发展到评论电影、戏剧，包括外国的翻译小说。经过评书，青年人就注意从中吸收好的营养，有一些不健康的東西，知道不该学。这几年，全国范围里开展了“文明礼貌月”活动，现在已经创造出一种好的形式，使文明建设活动能够持续下去并向前发展，如建设文明村、厂、校、店、街，诸如此类。拿农村“文明村”建设来讲，从订立“村民公约”开始，建立和推广五好家庭，使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户。青年人则提出要有自己的青年活动站、民兵活动站，在一起活动。再进一步提出要有文化馆、

科技站，大家共同学习文化、科学技术。内容、项目越来越丰富，建设文明村的目标也越来越高。今年继续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扎实地推广建设文明单位的活动。现在北京市已经涌现出不少文明单位，北京市附近农村也有不少“文明村”出现。这样的活动持续下去，有希望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以至一个县、一个市都成为文明县、文明市。全国最有名的是有二十多万人口的福建省三明市。因为这个城市成了文明市，大家关系好，精神风貌好，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文明村、文明街道在全国是少数，但这个工作一直做下去，逐步改善、提高，这样的单位会越来越多。人民需要，政府、党也需要，个人生活在文明单位里也心情舒畅。空想社会主义者曾设想过乌托邦，可以不夸大地讲，有些“文明村”已经把这种空想变为现实。尽管目前水平还不高，但从历史趋势来讲，前途无限。

关于编辑《中国美术全集》、 《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四日、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

一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化遗产过去没能让全国人民全面了解,也未能使全世界人民全面了解。现在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是美术界多年的愿望。这件工作终于开始了,应该努力做好。

《全集》要反映国家水平,这就必然能达到世界水平。我们要有高度自信。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居于世界前列的,只要把发掘出来的,包括拓印的、博物馆收藏的、大家公认的精品选好,把精品中的精品选出来,就一定能得到世界上的承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出版会议上的两次讲话。

认。鲁迅先生说过，真正是地方的才可能成为全国的；真正属于中华民族的，一定会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我们要向这个高峰攀登，要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工作。我们有充分的条件，从上百万件中选出百把件、二百件还选不出来？我们的老祖宗对古代文化作出了崇高的贡献，世界上有人想抹煞也抹煞不了。同样是绘画，中国有中国的特点；同样是雕塑，中国有中国的特点。各个方面，要把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在历史上最好的精品选出来。

让人民看到中国美术精品的全貌，这件事，旧政权不可能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年来没有抓紧做。现在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再不做，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首先是对不起今人。我们的专家、学者、美术家有的年事已高，都有一个愿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部《全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要有自己的知识、辨别能力和欣赏水平把这部书编好。要紧张努力，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六年出齐第一版。出齐后还可以重版，进行修订。

要真正达到国家水平，达到世界水平，要靠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努力，光靠少数人不行。希望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博物馆，千万不要搞本位主义，千万不要搞地方主义。这是国家的事业，也是世界的事业。不要担心我的这个精品入选后，拍了照片，一调就调到北京来了。可以保证，这次凡是入选的最好的东西，原来放在哪儿的还放在那里。可是，如果你把你那里的精品藏起来，不让选，也不让拍照，应该追究责任，起码要受批评，甚至应该给予行政处分。眼

光狭窄,使得那么好的东西不能公之于众,不能让全国人民来欣赏,妨碍我们的事业。如果每个博物馆都只考虑自己,这个东西好,赶紧打点埋伏吧,埋伏后一问三不知;别人知道后来问又左推右推,找这个找那个理由扯皮,一件很简单的事,公文来往,一拖就是半年,甚至一年、两年,《全集》怎能按期完成?大家一定要有全局观点。全局观点就是向国家作贡献、向人民作贡献、向世界作贡献。夏鼐同志讲过:好东西不要轻易出国,但一定要有所介绍,介绍了以后,真正想研究的人就可能来参观,这对提高地方的威望,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只有好处。要号召大家真正献宝,不要藏宝。

书要选得好,要照得好,印得好,装订得好,发行得好。在发行问题上,六十卷成本高,价格贵,能够买得起的只有博物馆或者大专院校、图书馆、美术院校,以及世界各国对我国的文化、美术有兴趣的人,这究竟有限。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想学习,想研究,想从古代文化中吸取营养,除了在图书馆借阅,自己是买不起的。是否可以考虑一种办法,每一种画册尤其是那些最好的,搞一些散装页、单行本,在新华书店发行,供他们选择。散装的可以先不出许多,先出最好的作品。一定要想到广大的艺术、美术爱好者,特别是青年美术工作者,给他们提供一些方便。使他们花钱不多,但可以买到他们最需要的那几张、几十张或百把张。可以搞普及本,不要藏之名山。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四日)

二

出版《中国美术全集》是很大的事情。《中国美术全集》开了一个好头，现在又规划出版《中国美术分类大全》，大家都赞同。《分类大全》现在设想分十一大类，是否可以分得更细一些，需要斟酌。青铜器要不要分成专门一类，也请大家研究。《中国美术全集》六十卷，说是全集，实际不可能全。《中国美术分类大全》每一类出二十本、三十本，也不可能全。例如青铜器类，中国青铜器在世界上很有名，我赞成专门分类。如果把所有的青铜器都选上，恐怕一百本、二百本也收不全。所以只能精选。所谓全，就是精品要全，不是说只要属于这一类，不管精不精，全都选上。会上有同志也谈到这样的意见，我赞成。

《中国美术全集》第一卷出版后，反映较好，销售情况也比预想的要好。国内除机关购买外，也包括一些个人。国外也有很多人希望能买到这部书。这件事，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合作下，取得了初步的、较好的效果。《全集》毕竟只有六十卷，祖国的灿烂丰富的美术遗产绝非六十卷全集所能反映，更不要说是充分反映了，只能说是尽可能收集了一部分精品中的精品，许多方面反映得还很不够。这算是个纲，有了这个纲，是否再搞一个目，就是以《全集》为基础，然后再细分成若干类，每一类再出一套全集。分多少类为好，请大家来商量。如果是十几类，每类就算二十本，就有二三

百本。这还只是古代部分。先把古代部分搞出来，再进一步搞近代、现代部分，加起来总共搞四五百本左右。有了全集这样一个纲，再有分类大全这样一些目，就能把祖国美术遗产比较全、比较精地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展现在国外读者面前。搞好这样一件事情很有必要。如果我们不搞，对国内的人民，对老祖宗，对子孙后代都没法交待。国外不断地出版我们的东西，日本人很多事情都抢在我们的前面。如果我们现在还安于落后，一直不动，实在说不过去。所以，我觉得搞分类大全很有必要。经济上，我们有本世纪末的战略目标；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教育、科学都有规划。那么文化方面，其中包括美术方面，是不是也应该有点规划、有点设想呢？到本世纪末，我们的文化，我们美术中为大家所公认的优秀作品，应不应该把它汇集起来？我觉得有这个必要，而且应该有个统一规划。不要你搞一点，他搞一点，零零散散，应该有个体系，有个总的轮廓。根据这样一个设想，所以邀请启功同志、邵宇同志，还有其他一些老专家来共同研究这件事。这次会议，就是把他们经过几个月商量、设想的方案提交给大家，请大家好好讨论。

需要用画册来进行形象教育。不但培养美术工作者要进行这样的教育，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都要进行这样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有多方面的、丰富的内容。我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就是其中一项。对学生进行教育，除了概念的东西，还要有形象的东西。在山西有什么好的美术作品，在新疆有什么好的美术作品，有点图书、画册给他们看，

通过生动的形象，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效果好得多。如果有四五百部充分反映我们美术方面灿烂成果的画册，对于青年一代（不光是美术工作者），是十分有教益的。他们能够通过这些作品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是可爱的，中国人民是有智慧、有才干的。这会加深他们对祖国的感情。

这件事要做，再也不能推迟了。再推迟下去，很多现在具备的条件，将要慢慢地消失。要趁着一些知识丰富、鉴别能力很强的老专家还健在，还能做事，由他们来引路，来指导，把这些事情筹划起来。有了一个设想，有了些基础的东西，工作一步一步搞下去，就可以搞好，而且会越来越越好。办起来会有困难，要逐步解决。美术全集看来问题不大，现在要考虑分类大全。要研究一下，关于分类大全，“七五”期间我们要做的、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做这些事情需要准备什么条件。其中重要的无非是人力、物力、财力。可能“七五”期间分类大全只能开始出版，大量的要在“八五”、“九五”才能出版。越到后来，我们的经济发展越好一些，用于文化、教育、科学的资金也会更多一点。目前很困难，但是只要我们把应该做的工作做好了，情况会越来越越好。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要赶快动手，尽可能搞得好一点，周密一点。

编辑出版工作中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好多东西都藏在各个博物馆里，都是由各个单位，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文物部门在管理。文物部门的同志，要大力支持。要想通一个道理，你们的精品选收到分类大全之后，对你那个单位不

会有损失，相反会有好处。经过宣传，经过销售，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里都知道你有那样的东西，也提高了你在全国、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个宝贝是你那个省的，如果旅游，他想看这个东西，就会到你那个省去。千万不要搞保守主义，不可搞封锁主义，要积极配合，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办。现在每省都零零散散出了一些这一类的画册。与其用很多的精力搞那些零零散散的东西，不如集中力量把美术全集搞好，把分类大全搞好。这是全国文化界、文物界、出版界、美术界共同的事。希望这件事取得成功。只要我们大家聚精会神，集中力量，同心同德，一定会成功！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

保护·研究·利用*

——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四年五月六日)

第一，文物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新中国建立以后，地上的文物经过修整，地下的文物陆续被发现、发掘出来。对这些文物，有的写出了研究专著，有的在国内外展出，起了很好的作用。通过文物的展示和宣传，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忱和民族自尊心，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使我们的国家有了“文物大国”的美称。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物工作和博物馆事业更加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巨大成就，是在党的领导和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取得的，也是全体文物、博物馆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已经有了—支经过长期考验的、实践证明是很好的文物、博物馆工作者的队伍。这些同志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有相当高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的专业水平，有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革命精神，又有踏实、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去年，我到西北几个省调查，亲眼看到许多文物、博物馆工作者甘心情愿离开物质生活较为舒适的大城市，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在艰苦的地方工作，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们的业绩使人感动。我们的文物、博物馆工作者，作为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不愧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向这些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从文物的发掘、保护、管理来说，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次会议提出，要做到文物工作和基本建设两利，这是很对的。中国的地底下，埋藏着很多确实可以叫做国宝的文物。我们进行建设，要开矿、修路、盖工厂、起房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地面的文物，也会涉及到地下的文物。这也是以后发展的趋势。我们三十多年来建设事业取得很大成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确定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十二大又确定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在本世纪末争取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再到下一个世纪，用若干年时间，使我们真正能够达到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今后二十来年，四五十年，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农村，以至于现在非常荒凉的地区，都会有各种建设事业发展起来。这些建设，不能等到把全国的地下所有文物都考查得一清二楚之后再来进行。现在有些地区我们已大致清楚，但我们不可能提供全部准确的材料，说这里地下有好东西，你们盖工厂的时候可要注意；那里可能没有，你们到那里去盖。建设要按

照计划安排。所以，今后建设和文物的勘探、发掘怎么兼顾，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情。做到文物工作和基本建设两利，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要广泛地宣传。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损害文物而不搞建设，而是要在建设的过程中保护文物。保护文物，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这种建设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们的许多轰动世界的考古成果，都是在基建施工中发现，然后由文物考古部门清理、发掘出来的，其结果，多数情况没有妨碍建设，又保护和发扬了祖国的古代文明。这说明，进行建设，保护文物，在正确处理两者关系问题上，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好经验。需要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继续坚持和发扬下去。从根本上说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建设也好，文物保护也好，都是造福于全体人民群众的事业，都是党和国家所领导的事业，参加这些不同工作的人员，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念、共同的利益。这就使妥善处理建设和保护文物的关系有了可靠的基础。

我们已经有了《文物保护法》。大家都要遵守《文物保护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也不能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作出同法律相抵触的决定。我们的文物、博物馆工作者，首先要成为保护文物的模范。郑振铎同志当文物管理局的局长以前，自己收购、收藏了很多的古物，可是在被任命为文物管理局局长之后，他就正式向全局工作人员宣布，说从今天起，我不再收购任何一件古物。直到去世，他严格地遵守了这个诺言。这应该成为全

体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同志的模范。郑振铎同志是渊博的学者、称职的领导干部，也是非常守纪律的。

对于重要的地下文物，不具备发掘条件或发掘出来以后不具备保护条件的，我主张在条件具备之后再去发掘。已经发掘出来的文物和地上的文物，务必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使它受到损害，即使是很小的损害。我们要尽心尽力地保护文物，使文物发挥积极作用。这种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态度，应该是每一个文物工作者、博物馆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

对于已经发掘出来的文物，对于地上的文物，要进行研究。恩格斯多次指出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1】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行研究，才能对历史采取科学的态度。地下文物，首先要经过我们考古学者的发掘和研究，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中国是个文物大国，如果仅仅指文物丰富，而不包括在文物研究方面的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我们就有愧于前人，也有愧于后代子孙。

去年，我们去敦煌和其他一些文物古迹较多的地方参观，那里的文物工作者用几乎相同的语言，表达了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者的共同心愿。他们说，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他们听了都感到难过。因此，下决心奋发工作，做出成绩，让全世界都看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的中

理所当然地也在中国。他们为此已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且还将继续努力下去。我们的先人,在剥削制度下,创造了使世界为之震惊的古代文明。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就不仅要创造出第一流的现代文明,而且一定要在自己古代文明的科学研究中,当之无愧地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在这个方面,特别是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的广大文物、博物馆工作者,是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无限广阔天地的。

第二,文物、博物馆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大家通过实践,展开讨论,逐步提高认识。希望大家都来进行研究,并且把研究成果在报刊上发表。我只能出点题目,而且题目还出得很不完全,供同志们参考。

(一)文物、博物馆工作,是多学科的、多门类的、多样式的、综合性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上留下的建筑、珍宝、典籍很多,历史人物、事件也很多。就从清代乾隆年间算起吧,也有了二百多年。历史短的国家,几十年、上百年的东西,就宝贵得不得了。英国学者李约瑟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七大卷,一直到现在还没写完。文物是我国历史上各族劳动人民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物遗存,是中国人民伟大

创造力的实物见证,也是我们文明古国的标志。不从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高度来重视文物、博物馆工作,甚至采取粗暴的态度,认为这些东西破坏了也没有什么可惜,不值得经心,只要把这个厂建设起来、那条路修起来,只要这个学校、那个科研单位有了房子就行了。这能够说是全面地理解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吗?显然不能这样看。旅游的人到中国愈来愈多,今后还会更多。大多数是想到我们这里看什么呢?我们有美丽雄伟的山河,也有一些现代化的东西,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是想要了解甚至仰慕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有大量的文物古迹,这也是我们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

(二) 文物、博物馆工作对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发展,过去起了促进作用,今后还会继续起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专家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列举很多事实证明这一点。光就历史科学来讲,中国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之多,应该说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夏鼐同志说,这样久远地连续记载历史的,可能只有中国。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同志都知道,光靠文献资料来研究历史还不行。过去很多问题,争论几百年、上千年,解决不了。有些事情,因为当时记载资料的人受到局限,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的面貌。另外一些事情,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没有记载下来,长期留着空白。文物考古发掘工作,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可以起很好的作用。由于文物的考古发掘和发现,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做出结论了;过去被歪曲了的不少事

实,现在面貌搞清楚了;过去留下的空白,正在逐步被填补。郭沫若同志主张,史学工作者既要重视文献,又要重视文物,特别要重视新发掘出来的文物。他自己的研究,也走这样一条路子。从文物的发掘、保护中间,我们历史科学得到很大的好处,历史科学研究者收到很大的益处。要使我们的历史科学前进,就不能不关心和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博物馆工作。其他学科同样有这样的问題。科学工作者应该扫除陈腐的、落后的思想,真正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文物工作、博物馆工作。这一点,过去我们确实宣传得不够,包括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同志也需要不断提高认识。

(三)文物、博物馆工作,在我们整个思想、文化、宣传战线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其他各项工作关系都很密切。

由于有敦煌壁画,甘肃歌舞团从中汲取营养,搞了一个《丝路花雨》。《丝路花雨》公演以后,得到全国观众的好评;以后又到好多国家公演,得到国外观众的好评。它的创作者们,尊重敦煌壁画,学习敦煌壁画,提炼敦煌壁画。陕西搞了一个《仿唐乐舞》,湖北搞了一个《编钟乐舞》,许多同志看了,外国的观众看了,都一致称赞。我们很多文艺作品,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电视剧,能够真正做到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很多是从我们古代文物里继承了优秀的东西,其中包括直接从文物中学到的东西。文化艺术工作的创新、发展,不能离开本民族文化的基地。在这方面,我们有成绩,但是做得还不够。我看前途无量。我们在各方面都要向外国的长处学习,比如绘画,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学习

西方的素描基本功。但是不能离开我们自己的基地。其他艺术形式也是这样。总之，文物、博物馆工作已经为我们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今后会更加大有作为。

（四）同意王震同志说的，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增多，我们的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起愈来愈大的作用。

我们同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是能够吸引很多人的。只有保护得好，研究得好，才能吸引愈来愈多的旅游者。要年年有新东西吸引外国朋友。搞得不好，旅游事业会妨碍文物的保护；搞得不好，会促进文物事业。朱穆之同志说，旅游跟文物的发展，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旅游要想办法支援文物工作，文物工作反过来也可以支援旅游。国外有许多是文物和旅游结合在一块儿。我赞成这个意见。这里也包括园林。外国一些公园，确实有引人入胜的地方，但是有的公园找不到什么古建筑。我们的园林、名胜到处都是，每一个旅游点及其周围都有不同时代的文物、建筑，发生过许多历史事件，出现过许多历史人物。如果园林不只有花草树木，而且有文物古迹，吸引力就大了。人们到这里，就不但锻炼了身体，呼吸了新鲜空气，而且欣赏了古代艺术，得到了知识和精神享受。

（五）做好文物、博物馆工作，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有利于培养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最近一两年来，青年学生中间出现了一种很好的事情，

就是做社会调查、长途旅行。大量的是农村调查。他们亲眼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非常得人心，很有成绩。这改变了其中一些人的糊涂观念。外出旅游，看看祖国的山河及文物古迹，也好处很大。去年我到甘肃，听说兰州大学一批青年人准备组织长途自行车旅行，从兰州出发，骑车到敦煌。我相信，这样一种旅行，结合对沿途历史文物的调查，特别对敦煌、酒泉、张掖等地文物及历史的了解，会增强他们对祖国的感情。爱国主义的感情、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件事、一个东西，对于培养这种感情、思想，可以起很大作用。要通过我们的文物工作、博物馆工作，使不同觉悟、不同知识水平、不同经历的中国人，看到我们的祖先曾经为人类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看到我们在鸦片战争以后又曾经受过什么样的屈辱。通过这样一种比较，只要不是确实偏见很深，都会从中受到教育。

那天请教夏鼐同志，旧中国有没有有计划、有组织地发掘文物。他说，只是有数的几个点，大多数是奸商盗墓，发掘了以后，卖给商人和外国人。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发掘的东西多了。解放前夕，国民党把一些国宝运到台湾去了。现在，我们和台湾比，究竟哪里国宝多呢？专家们一致认为，大陆多得多，其中大部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发掘出来的。这就是了不起的成绩。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国宝，一些最好的被他们运走了，而我们在三十多年之内，又发掘出许多稀世珍宝。通过这样一种比较，人民会作出结论：新中国比旧中国好。我们的文化工作者，特别是文物、博物馆工作者不要推

卸我们的责任，不要轻视我们的成绩。振兴中华，缺少不了我们的努力，缺少不了我们的贡献。

(六)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包括经济、政治，也包括文化，这是我们的总方向、总任务。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只是政治上有特色，经济上有特色，社会主义搞得不好，就是文化上不行，既没有中国特色，也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那么我们的总方向、总任务中，起码缺少一个很大的方面。当然就文化方面说，实现这个总方向、总任务，要做的工作很多。至少必须看到，我们的文物工作、博物馆工作，在文化战线上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担负着重要的任务，是不可缺少的。鲁迅一九三四年给陈烟桥写过一封信，讲有地方色彩的东西，倒容易成为世界的，为别国所注意。鲁迅说的，是一种规律性现象。真正民族的东西，才能够是国际的东西。我们文化战线的各行各业、各个方面，都有个民族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朱穆之同志、贺敬之同志都反复讲过。我们不能搞国粹主义、排外主义。一切外国的好东西，要大胆地吸收，要有这样的气魄。也是鲁迅讲过，历史上的盛世，吸取外来的东西都是气魄很大的，一到了对外来的东西这个也害怕，那个也害怕，这个也不让进，那个也不让进，这个朝代就快没落了，或者已经没落了。我们的新中国正在朝气蓬勃地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既要大胆吸收外来的一切优秀东西，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立足于本国，立足于我们自己。

文化建设要有中国的特色，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优秀的文化传统，来创造出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新文化。这个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包括科学研究，包括文化艺术，包括人民的心理感情状态、精神状态。要把中国历代劳动人民长期形成的优良的传统，融化在我们今天和以后的文化建设中。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文物工作、博物馆工作，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都可以做出重大贡献，大有用武之地。

第三，加强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领导问题。

很多同志提出加强领导的问题。我们自己和许多同志都有个经验，就是正确地加强领导，必须尊重专家，尊重专家的意见。文物、博物馆工作专业性很强，没有知识，又不尊重专家，很难领导得好。我们文物、博物馆工作者自己要尊重专家，并且经过努力使自己逐步成为专家，同时要向党政领导介绍我们这里有哪些专家，他们有什么成就，他们的知识对于我们的工作起了什么好的作用，我们过去是怎样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的。有些问题没有把握的时候，要建议领导向专家请教。如果本地的专家还没有把握，就向外地专家请教。搞文物不是试制新产品。新产品试验，一次不行可以搞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文物是几千年留下的，你用这个办法试验一下，用那个办法试验一下，就破坏得没有办法恢复了。没有把握，千万不要随便决策，包括发掘、

陈列、出售、出国展览，都要谨慎。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哪些问题有知识，可以下决心；哪些没有知识，要向有知识的专家请教。同样，作为领导同志也应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郭沫若同志是大学问家，是开辟中国历史科学新路的人。他曾经主张挖武则天墓，以便早点揭露历史上的一些奥秘，解答一些疑难问题。夏鼐同志说，你这个发掘的愿望很好，可是要考虑到我们现在对发掘出来的东西，还缺乏保护的办**法**，就算发掘出来很多好东西，没有把握用科学方法保护，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个损失很难弥补。与其这样，不如继续让它留在地下，我们自己看不到，让我们的子孙有把握挖掘的时候看到，也是可以的。夏鼐同志是郭老的下级、学生。郭老一听，这个道理比他那个道理对，就撤销了他的意见。我们要学习郭老的态度，也要学习夏鼐同志的态度。没把握，不能随便附和，你是领导我也不能附和。周恩来同志对文物的保护一向采取谨慎态度，非常尊重专家。出国展览的展品都经过他一一审查，哪个可以出国，哪个不能出国。这个权力不能下放。所以，加强领导，一定要把尊重专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没有这一条，领导愈加强，危险性愈大。

现在有个新的形势。老干部从第一线陆续退下来了。这些同志身体还不错，都很想做一点工作，其中有些人对文物有爱好，也积累了一点知识。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同志，在第一线的时候，忙得一塌糊涂，业余爱好可以，想研究就不可能了，想去帮助一下也没有时间。现在，各级党和政府里

都有一些这样的热心家，他们退出了第一线，有了条件，我们又给他们创造条件，他们就有可能用大部分时间来关心文物、博物馆工作。他们有声望，对文物、博物馆工作过去给予了很多支持，现在还继续关心，以后争取他们更多地支持我们，我们的队伍会愈来愈大。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把这些热心家请出来。

胡耀邦同志讲：责任在身，当仁不让。我想加两句：据理力争，谨慎从事。党和政府让我们管这方面的工作，属于我们工作范围内的事情，不能推推让让，得过且过，该管的也不管，该说的也不说，该办的也不办。如果发现同《文物保护法》及有关正式的条例、条令、细则、规定相违背的事情，要出来讲话，不能顾虑重重。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谁违反了宪法、法律，就是违反了党章，我们就有责任出来维护宪法，维护法律，维护党的政策方针。在具体工作中，一定要谨慎从事。

注 释

- 【1】 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3页。

从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谈起*

(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已经准备了两年的时间,教育部、中宣部和其他有关单位,各省、市、自治区和一些高等学校,都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起草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这个文件改过好多次,参加起草的同志还觉得不满意。提交中央书记处审议的时候,书记处同志提出,还没有涉及到高等学校的改革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文件同当前实际结合得不够密切,要紧紧密结合当前高等院校的改革来考虑思想政治工作该怎么做。书记处同志指出这一点,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可以使我们这次会议开得更好。高等学校的改革不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可是不能离开改革来谈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既有利于推进高等院校的改革,又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从实际出发,联系实际,更有针对性,这就可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期间，何东昌等同志找了一些同志座谈高等院校的改革问题，讨论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设想，可以弥补原来文件的不足。我们要认真学习《政府工作报告》，了解全国的形势、中央的主要决策和方针、政策、措施，了解高等院校需要进行一些什么改革。这样来考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改进，如何加强。

会议领导小组要我来讲一讲。我只能就几个有关问题谈一些还不成熟的意见，作为参加会议讨论的一种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个问题，对邓小平同志最近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初步理解。

关于面向现代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到本世纪末，我们所实现的现代化，还不是高水平的现代化，还要继续奋斗几十年，才能逐步达到高水平的现代化。所以，面向现代化，首先必须坚决执行党的十二大的决议，完成十二大确定的目标，实现十二大的任务之后，还要为达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而继续奋斗。按照过去习惯的说法，现代化就是农业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国防的现代化，这是着重讲生产力或者生产水平的现代化。最近一个时期，中央同志多次讲，世界范围正在展开一场技术革命，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认真研究，加倍努力，更好地吸收世界技术革命的成果。我们面临着一种挑战，我们曾经丧失过许多机会，这一次一定要抓住机会。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好了，完全可能在世界技术革命中间大大加快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当然，技术革命的领域很宽，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究竟我们在世界技术革命过程中间先着重解决什么问题，后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不能设想在所有的方面都同时达到最高的水平，而是要有重点、有步骤，区别不同情况。在这方面，国务院已经有比较具体的设想和安排。中国人口多，劳动力多，有的部门、有的领域、有的地方要采取知识密集型的办法，有的仍然要实行劳动密集型的技术水平比较低的生产和经营。要广泛研究和吸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技术成果、科学成就和经营管理经验，又要严格地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我们有大批有相当专业水平的，有造诣、有贡献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的高等学校，还要为国家培养和输送更多的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充分相信他们，依靠他们，为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都在积极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高等学校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还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当然，面向现代化，不仅仅是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发展生产力，是为了逐步提高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了资本家获取更高的利润，这同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是有根本区别的。我们出国访问的同志都看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工人的生活水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明显的提高;同时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国家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仍然为资产阶级所占有,劳动者所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小的。实现现代化建设,不是一个同社会制度无关的过程。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确有一个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专门讲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四项政治保证。前些年,有的同志曾经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法提出意见,说现代化是一个生产力的概念,比如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技术上讲,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差别,何必加上一个社会主义呢?按照自然规律办就是了,现代化有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呢?从技术上讲,从自然科学领域讲,现代化的确只是一个生产力的概念,可是进一步就应该想到,我们现代化的方向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们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本身就包括了社会制度方面的规定。最近《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这些书翻译出版以后,听说有的大学生中重新发生争论。所以,有必要搞清楚,面向现代化,要大力学习和吸取一切对我们有用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先进经验;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来讲,又始终不能忘记社会主义方向。总的来说,面向现代化,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面向世界,首先要考虑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美国干涉我们的内政,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同我们作对。我们多次提出,希望他们废除与台湾关系法,认为这是干涉另一个国家

内政最典型的法律,可是美国当局从来都是拒绝的。我们还面对苏联的威胁。这些都会给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困难。我们周围有很多友好的国家,从更大范围来讲,现在的世界还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我们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我们要维护第三世界的权益,我们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环境。面向世界,就要想到这么一种世界政治的状况。

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虽争得民族独立、但仍然需要继续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发展自己民族经济的国家,存在着正在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国家和地区。所谓南北的争论,就是发达国家剥削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国家希望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希望南北合作,希望北方支持南方、帮助南方。中国支持南南合作,愿意参加南南合作。所以,面向世界也不能离开对世界经济的分析。如果说我们对世界政治还有比较初步的了解,那么对世界经济,我们就了解得很少,研究得也很不够。中央确定对外实行开放,不是收,而是还要继续放。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就需要我们对世界经济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面向世界还有第三层意思,就是要了解世界的思潮。现在,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状况怎么样?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资产阶级思潮的状况怎么样?对外开放,我们可以了解和掌握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的经验,择善而从,

促进我们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但是正如小平同志早就讲过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作风也要涌进来。现在我们国内思想领域的很多问题，是同世界思潮分不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记者，宣传我们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镇压西方文化”，说中国又要搞“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又要挨整。这样一类舆论，通过广播、报纸、书刊以及其他种种渠道广为流传，向我们施加压力。这没有什么奇怪。《共产党宣言》就指出，资产阶级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前几年，陈云同志也提醒我们，说资本家毕竟是资本家。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不要资产阶级批准，要人家来举双手赞成，那才是奇怪的。我们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近一段时间，中日、中美关系都有发展，这对我们的建设事业有好处。日本首相中曾根访华期间，在北大有个讲演，说他们对我们整党、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感到很担心，担心我们政局是不是稳定，会不会影响对外开放政策。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在复旦大学讲演，宣传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我国的总理说，他去访美，是利用他们的讲台宣传我们对台湾的方针政策；里根访华，是利用我们的讲台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说来说去，他们的一套就是：你和我搞经济往来、文化往来，就不能搞整党，就不能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就不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你要搞，经济往来就会遇到障碍，就不能得到发展。按照他们的立场、观点，整党、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同经济建设是对立

的。按照我们的观点，搞好整党，反对精神污染，正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共产党员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原则，照搬他们的观点。我们党没有在国际资产阶级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屈服，而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有步骤地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通过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的工作，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风刹住了。我们要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世界各国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文艺作品。要经常关心和密切了解世界各种思潮的变化和发展。把这些东西介绍过来，同时要进行分析、评价，帮助我们的读者正确认识它们的长处和短处。面向世界，不能不坚持两手，一方面要越来越开放，同时要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只有坚持这两手，而且运用得好，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面向未来，有中国的未来，有世界的未来。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央确定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总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在这个基础上，到了下一个世纪，经过各族人民的努力，高水平的现代化也能够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而且一定会越做越好，取得完满的成功。我们相信，在世界范围内，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资本主义还会有发展，但是他们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过去遇到过困难，我们有过严重的失误，今后也还会遇到困难，也很难说完全不会发生失

误。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有力量、有信心在克服这些困难、纠正这些失误之后继续前进，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

我们要争取持久的国际和平，制止霸权主义发动世界战争。我们也不能忘记，世界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缓和，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越来越尖锐。所以，我们始终没有说过世界战争的危险已经过去，我们只是讲，通过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世界战争是可以制止的，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忘记和放弃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战争威胁、反对侵略扩张、反对核竞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主要力量、中心任务是搞好经济建设。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很难搞建设。我们的建设搞得好，也就大大增强了保卫和平的力量。

我们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从考虑当前的实际出发，同时也要考虑高等院校的未来。培养人才，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至研究生，十七八年，将近二十年。要设想一下，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发展，已经和即将向我们的高等教育包括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一些什么要求。从一般情况看，搞社会科学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到能够独立工作，需要十年左右。据何东昌同志讲，搞理工科的人可能不要这么长。不过，理工科毕业到成为成熟的工程技术专家，恐怕也得十来年。国家已经把教育列为重点，高等教育能不能搞上去，和我们每个同志的工作状况有直接关系。

实现党的十二大规定的战略目标，包括高等学校要完成输送人才的任务。随着经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输送人才的数量越来越多，知识水平、思想水平越来越高。就拿今年入学的大学生来讲，到一九八八年毕业只有二十一二岁，到本世纪末才三十岁出头，那个时候就要成为我们建设的骨干，或者要担负一个方面的独立工作。从教师队伍来讲，现在老教师还在起很大的作用，但第一线的教学任务主要是由中年教职员，即五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担负。再过十来年，现在的中年同志也六十岁或者六十岁以上了。他们在退居二线之前，要担负起为国家培养新的人才的任务，包括培养新的师资人才的任务。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都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都要把自己现在的工作，同祖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密切结合起来。

第二个问题，对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应该怎么样估计。

教学也好，思想政治工作也好，对象首先都是学生，目的都是培养人才。对学生思想情况的分析，要考虑不同的层次，首先要看爱国不爱国。“振兴中华”这个口号，是北京的学生在庆祝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口号，现在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口号。这个口号很有代表性，它说明，我们的大学生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儿女，在他们中间普遍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这是一个基本的、非常重要的事实，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可靠基础。我们的工作做得对头，就可以使绝大多数学生一步步提高自己

的思想水平,更好地学习各种科学知识,为实现振兴中华做出努力。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总任务、总目标实现了,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更大的胜利,国家更加兴旺发达了,人民更加富裕幸福了,今后陆续进校的大学生或者在学校学习的大学生,他们的爱国感情、振兴中华的觉悟会比现在更高。这几年来,学生的思想政治情况越来越好,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党中央的政策见效了,甚至有过怀疑、有过动摇的人也接受了事实的教育。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事实教育下,会更热爱我们的祖国,更愿意为振兴中华做出努力。随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成长,爱国主义的热潮将继续向前发展。

更高一个层次,就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其中核心的问题是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我们的大学生中,大多数是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其中有些青年,在有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还能够自觉地挺身而出,维护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工作的成果。大学生中少数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活动形式也在变化:前几年明目张胆地宣传资产阶级腐朽的一套,并相当活跃;这一两年,他们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继续明目张胆宣传那一套了。前几年也好,目前也好,拥护四项基本原则,但是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模糊认识的人还不少。他们是爱国的,是赞成振兴中华的,想为国家做出贡献。但是,他们中有的人有个前提,就是要国家给他们满意的工作、地位、待遇,一旦满足不了,甚至遭到一些挫折,就牢骚满腹。我们要满怀热情地、

耐心地帮助这些青年处理好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的关系，使他们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

展望未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富裕幸福，加上我们的工作做得好，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会越来越多，中间状态的人会向这边靠拢，坚持自由化的人越来越少。历史的趋势是这样。第二种前途，如果工作做得不好，特别是建设事业有重大的失误，思想政治工作非常松懈，甚至被放弃了，那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就会减少，中间状态的人就会增多，而且会跟着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跑。总的趋势，我们相信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决定的因素是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不但是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有整个国家形势的发展。总的形势好，但是如果我们松懈，或者工作不对头，就会发生一些曲折。我们要考虑到两种可能，全力争取好的前途，更加主动积极地开展工作。

第三个问题，对教师队伍，包括党政思想工作队伍的分析。

教育部同志讲，我们这个队伍是可以信赖的。我同意这样一个估计。可以信赖，就是说经过长期的考验，证明这支队伍不愧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党和人民把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一代一代青年的重任交给了我们。我们一定要百倍地振奋精神，肩负起这个历史的重任。

从爱国、坚持四项原则的两个层次来看,教师队伍的状况、党政思想人员的状况都是好的。教师中有相当一批人很早就要求入党,并且已经具备了党员条件,为国家、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仍然没有被吸收入党。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端正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把那些符合党员条件的同志吸收到党内来。教师队伍中间,坚持搞精神污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只是极少数。请同志们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坚持”,不是讲在某个时候、某些问题上迷了路,经过中央指出,同志们帮助以后,诚心诚意改正了的人。教师队伍里,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的,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的,大有人在,很多事情非常感人。应该对他们作出高度的评价,大力宣传他们的崇高精神和光辉事迹。

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至今还有很多问题。过去,以至现在,我们有很多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或没有做好。上面讲了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工作问题、待遇问题、生活问题等等。如果政策真的落实了,广大高等学校教师心情会更加舒畅,工作会更加努力。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当前一个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将大大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现在的中年知识分子,四十来岁、五十来岁了,经过这几年的努力,高等教育后继乏人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还有许多问题要抓紧解决,要为目前我们这支可以信赖的队伍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

第四个问题，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是要更好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革除弊端，促进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不能离开改革谈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而要通过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改革。这里还包括高等学校自身的改革问题。应该说，在改革中，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比过去不重要，而是比过去更重要，承担着更重的责任。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开制度的改革不行，离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不行，离开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不行。各方面的改革，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方法的应用，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都离不开人。没有先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些事情怎么进行并达到预期的效果？高等学校的体制应该改革，这个问题，何东昌同志还要专门讲。高等学校的设备有的好，有的差，也应该改进。“七五”计划正在制定，以至于一九九〇年以后高等学校的方针该怎么定，要解决的政策性问题是什么，其中包括对高等院校教职员、党政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政策，这些都要一个个地解决。但是，即使改革方案是正确的，即使有了很好的设备，方针、政策经过中央批准，完全合乎实际，如果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方案的执行，政策的贯彻，都会发生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有一个讲话，专门讲思想政治

工作问题,《红旗》已经全文发表。耀邦同志引了毛泽东同志《实践论》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1】胡耀邦同志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解释:我们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不但应该以身作则,实现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而且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去影响和引导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实现这个任务。我们一定要弄通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通过实践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革命实践。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离不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个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更适应了,改造客观世界的任务就能完成得更好。改造主观世界需要做思想政治工作。耀邦同志说,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用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用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干部,教育工人阶级,教育人民群众,启发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并通过反复的实践,提高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

我们在讨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时候,有必要重新温习毛泽东同志上面的这些重要论点,学习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讲话。

第五个问题,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

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是现有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应该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是要培养、补充新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从长远来讲,后一个问题更重要,而且必须从现在就着手。国家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是水平更高、觉悟更高的学生,向学生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也应该水平更高、觉悟更高。

这件事,教育部的同志多次同中宣部的同志进行过讨论。清华大学的同志提出双肩挑,就是既要懂政治,又要懂业务。光懂政治,业务一点不懂,在学生中没法做工作,在教职员中更没法做工作。工作要做到每个有专业知识的人身上,要和他们有共同语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对专业一无所知,只讲些一般的政治原理,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能说服人,没有针对性。最近教育部提出一个意见,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要实行双学位制,我们很赞成。如果学了政治,还要学一门业务,而且比较精通。胡乔木同志几次讲,我们大学要设立政治系,培养政治工作人员,包括各级党委的后备人员。政治系毕业以后,再学一二年专业。这样搞下去,我们政治工作人员的后备队伍,不但是某一专业的学士、硕士,甚至于是博士。达到这样的专业水平,又懂得政治,去做思想政治工作,资本就更雄厚了,给人家谈就容易谈得进去了。

很多同志提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待遇职称问题。这个问题,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切实可行的办法。将来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不是可以考虑政治系毕业后,再取得一个学

位,然后去一个专业教几年书,达到一定的水平,再抽出来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骨干,或者兼做思想政治工作。现在已经实行研究生兼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

有这样一个问题。同一个年级毕业,把学习成绩最好的留下来做思想政治工作,不一定比他成绩好的人去当教员,经过若干年,原来学习成绩不一定比他好的成了讲师、副教授,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什么学位也没有,什么职称也没有,工资也比较低。这个事实教育了我们,从长远设想,考虑让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也掌握一门专业,有所成就,取得学位职称,做思想政治工作兼职到一定时候,就转过来成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骨干。这还只是初步的意见,希望大家充分讨论,找到一种比较好的办法。现有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年龄不大的,也可以考虑去学习一二年专业知识,然后继续做思想政治工作。

第六个问题,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三条。

第一条,实行校长负责制。

第二条,建立和健全教职员代表大会制。高等院校的教职员代表大会的主体,应该是教员、职员、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工人的比重不宜太大。

第三条,党委应该摆脱行政事务,不能包揽一切,要集中精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中间,应该包含监督行政领导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如果把这条实现了,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定会有大的改善。

主要是这么三条。我们对改革要采取积极态度，要有勇于改革的气魄，又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和必要的准备工作，实事求是，稳步前进，坚决而又有步骤、有秩序，务求取得实效。看准的，条件成熟的，要不失时机地先做起来。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开。

注 释

- 【1】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两个文明一起抓， 两个建设一起上^{*}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八日）

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决定在福建省三明市召开工作会议，目的是向三明市和其他先进地方学习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交流全国大中小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会前，胡耀邦同志要我转告大家，建设文明单位，建设文明城市，工作要扎实，不要搞形式主义。会上，廖井丹同志作了主要报告，项南等同志作了很好的讲话，三明市委、北京市委、总政群工部介绍了自己的经验，还有十几位同志作了很好的发言。到会同志还带来了七十五份总结各地经验的材料。从所有这些经验中，各地同志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参观了三明市的十几个文明单位。确实可以说，这次会议是交流精神文明建设经验的盛会。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福建省三明市召开的全国“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在五年内实现三个根本好转。从现在起到一九八七年，还有三年多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刻开会，对于今后三年实现三个根本好转，会起很重要的作用。三明市的成绩很突出。李先念同志曾经到三明视察，肯定了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同志们都说，这次会议在三明召开，地点也选得好，不仅是因为这里精神文明建设起步早，抓得好，而且他们的经验确实比较全面、比较系统。三明市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典型。三明的同志既有富于远见的指导思想，又有扎扎实实的过硬功夫，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取得了显著效果。三明市的经验，中小城市可以学，大城市也可以学；新城市可以学，老城市也可以学；县以下的乡镇也可以学。大城市学三明，困难可能多一点，是不是分成若干块，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老城市的改造比新城市的建设费事、费钱，也有很多麻烦，但是，只要结合实际运用三明经验，也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如果全国具备一定条件的城市都建设到现在三明市的规模和水平，全国的面貌就相当不错了。三明起步的时候工农业总产值是四个多亿，经过三四年的工夫，现在达到七个多亿。看来，不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文化水平，要建设得像三明市一样，时间可能长一些。由于我们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经济、文化的发展已经进入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继续坚持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种势头会保持下去，会有新的发展，后十年会比前十年规模更

大、速度更快。因此，可以设想，到本世纪末，全国二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县，只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三四个亿，工作切实抓上去，建设得同三明市一样或接近三明的水平，是有可能的。从长远来讲，三明的经验也会起作用。当然，三明市本身还会发展，经验也将更成熟，其他地方也会创造出许多新的经验。把三明的经验和本地的经验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完全可以搞得比原来设想的更好、更快。

三明市早已闻名全国。这次大家到三明市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同志们说，在三明市开会期间，看得愈多，问得愈细，愈使人心服口服。过去从电视上看，毕竟是间接的；看文字的东西，总是比较抽象；到了这儿，抽象的东西具体化了，理性的东西加上感性的东西，印象就深了。希望三明市的同志把他们本来已经很好的报告，进一步修改补充，使它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具有说服力。

各地向三明学习，三明的同志说，三明也要向各地学习。三明市的经验比较系统、比较全面、比较突出，但从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问题、某一个单位的经验来讲，其他城市超过三明市的地方还很多。只要三明市在实践中取百家之长，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今后的工作一定能够进步得更快。

在这几年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各地都创造了许多好经验。这些经验都很值得重视。北京除了大会介绍的经验以外，还有一个市委关于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争取提前实现首都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实施方案，其中强

调“软任务”要实行硬措施，要继续抓好门前三包、综合包户服务、改善市容，重点放在整顿百里长街一条线、两条河、九个公园、十五条街道。天津也有军民共建一条街的经验、市民义务劳动建设海河沿岸公园的经验。深圳提出排污不排外，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正确处理宽与严、堵与导等关系，是做得好的。鞍山市的“八风”即工厂的厂风、医院的院风、商店的店风、学校的校风、公安机关的警风、农村的村风、街道的街风、五好家庭的家风，实际上是八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单位的建设经验。发现和提倡不同方面、不同类型的典型，然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推广，这个做法也很好。还有军民共建文明川藏运输线的经验。这条运输线，从成都到拉萨，二千四百公里，加上复线，总长三千二百多公里。那里的同志，在高寒、缺氧、经常发生暴风雪和雪崩的艰苦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把精神文明建设搞起来了，又反过来促进了运输的畅通，避免了许多事故的发生。现在，解放军在城乡已经有五万个共建的点，还要继续发展和提高。全国大小工业企业四十多万，如果根据不同条件，使相当数量的企业同附近农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加上军民共建的点，我们的文明单位、文明村一定会大大增加，文明之花一定会开遍全中国。这次会上提供的邯郸市开展工农共建活动和中原油田工农共建文明矿、文明村的经验，很值得推广。常州广化区清潭街道办事处建设新住宅区的经验也很好。北京这几年新建了一些居民区，成片的宿舍楼拔地而起，为群众解决了不少困难，不过样子显得有些单

调,恐怕不少大城市都是这样。中小城市的建筑设计倒是丰富多彩一些。当然,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降低造价,推广标准设计,结果就一个模子,依样画葫芦。建筑要设法降低造价、节约成本,同时也要考虑多样化,各地有各地的特点,各民族也有自己的特点,不要走到哪里都是一个模子。各种艺术,包括建筑艺术,都有个民族化的问题。各种公用设施、居民住宅,都要保持和发扬民族特色。

学习和推广三明经验应该从何着手?我想主要围绕这个问题,谈一些个人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本地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科学地、客观地估计本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和趋势,总结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定城市建设的规划,包括近期规划和远期规划。

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现很多新城市,旧城市也有很大的发展。因为缺乏统一规划,尽管建筑面积成倍增加,但很多城市没有形成比较理想的格局,往往这里建一块,那里建一块,零散杂乱,缺少章法。我们搞城市建设也确实没有经验,知识不够,长期没有认识到城市建设像三明市同志所讲的,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它牵涉的方面不只是一个平面,还是一个立体;不只是一个行业,而是有多种多样的行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只要不发生外敌大规模入侵的情况,我们就要坚定不移、始终一贯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些年来,我们经济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干部经验的积累,使我们在城

市建设上具备了比较好的条件。我们应该学会城市建设这门科学，制订出比较好的城市建设规划，并且付诸实施。

第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这是我们经过成功与不成功的比较之后，得出的一个共同的认识。

物质文明建设需要人力、财力、物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不是不需要物质设施，只讲精神就可以了呢？三明的经验告诉我们，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没有必要的物质设施，也不行。黑龙江的同志讲，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搞得好，好在用财有道，钱用得硬、用得巧、用得美。我想，还应该补充一句：聚财有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位同志作了一些调查。现在向同志们介绍一下。

三明市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八年是四亿五千多万元，一九八三年达到六亿七千多万元，增长百分之五十一。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市政公用事业、文化娱乐设施、住宅和商业网点的建设等方面，投入了不少资金。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三年的四年中间，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用于城市建设的费用，就有四千零一十八万元，平均每年一千万元。此外，还筹集了一些资金。

前面说钱花得硬，意思是，四千多万元资金的来源，是正当的、合理合法的。这里有五笔账：工商税和公用事业费附加九百七十一万元；工商企业利润提成百分之五，一千四百七十万元；公用企业（自来水公司、公共交通公司等）利润留成百分之八十，七百九十一万元；预算内城市维护费二

百五十四万元；省拨给的住宅投资二百一十万元；环境保护费、公房周转金、园林收入等三百二十二万元。除了这四千万元，他们还利用了一千七百万银行贷款，建设住宅和自来水厂。住宅建成以后，作为商品出售，然后归还贷款。这也是合理合法的，是用得好的。他们实行“三个一点”的办法，就是市财政出一点，集体单位出一点，居民自愿捐献一点。用这“三个一点”筹集的钱，来搞公益事业，如小街小巷的治理等等。他们还采取“滚雪球”的办法，集中建设商业网点和集市贸易市场，取得一定的盈余，然后再来扩大商业网点的建设。这部分资金来源，也是合理合法的。拿集体单位出钱来说，几个大厂要办电视大学，需要建设插转台，市里就把各家的资金集中起来，统一建设，既满足了企业的需要，又方便了全市人民。群众自愿捐献，主要是搞义务劳动，捐钱很少，有的只几角钱。这种做法，可以使各单位和群众更加关心并且群策群力地搞好公益事业的建设。

花得巧，是说把这些钱全部用在城市建设上，绝不挪作别用。在城市建设费用中，他们又坚决控制人员经费的开支。据说，许多地方的城市建设费用中，人员经费的开支占了三分之一，有的甚至高达二分之一。三明的城市建设费用中，人头费控制在十分之一。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例如市政工程公司是事业单位，他们实行企业管理，搞承包工程，不仅节约了人员经费，而且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又如严格控制环境保护工作人数的增加，公用事业扩大了，建设增加了，环境保护的工作人员一直保持在二百三十人以内，负责

主要街道的清洁卫生。小街小巷的卫生，包给街道，组织退休工人和职工家属来负责。人员经费开支这头控制住了，才有可能把百分之九十的城市建设费真正用于公用建设事业。三明的这个经验值得各地学习。各个城市都可以计算一下，按照国家财政的规定，可以筹集多少钱，用于人头费的多少，搞公用建设的多少，如何利用有限的城市建设费加快城市建设。出路在哪里呢？三明的上述办法就是出路，即控制人头费的支出，增加建设事业费的支出。三明花钱花得巧，还有一项很典型的经验。他们把沿江的垃圾堆平掉，从银行贷款，建设了长二百五六十米的红杏商场，据说只花了七万多元。一年多的租金等项收入就还清了贷款，还有盈余，又可以搞新的商场。在这样的商场里，国营的、集体的、个体的、合资的商店，外地的商贩、本地的农民，都可以摆货摊，相互竞争。商品的品种相当多，日用品、副食品，走一趟就可以买齐了。这给居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你看，清除了垃圾，改变了市容，还赚了钱。这实在可以说是“化腐朽为神奇”，是很值得各地借鉴的。

花钱花得美，是说把钱用到了改善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解决了一部分住宅问题，而且做到了路平沟通，交通方便，美化环境。他们从四千万元资金里，拿出二百八十万元支援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建设。人民群众在八小时以外，也能够参加健康的、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了。我们看到的青少年宫、儿童公园，就是用这笔钱建设的。麒麟山公园除了义务劳动外，也是用这笔钱建设的。

上面说的三明市的这些市政建设，还不包括各个企业事业单位自己搞的住宅和文化福利设施。除了上述四千万元做的那些事情以外，各个企业事业单位还用自己利润留成中的福利基金，建设了住宅，建设了文化福利设施，如工人俱乐部、工人之家、学校、医院、托儿所，等等。这些单位还动员职工搞花圃，搞小园林，美化环境。三明市四年来共建设宿舍七十万平方米，其中五十万平方米是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出钱盖的。按城市人口十四万计算，平均每人住宅面积已经达到六平方米以上。这在全国是高水平的。三明钢铁厂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五年赢利九千七百万元，提取利润留成二千八百七十五万元，其中福利基金一千零一十八万元。他们用福利基金盖了六万五千平方米住宅、一所拥有二百五十个病床的医院、一个有一千九百个座位的俱乐部，还新建了四千多平方米的校舍，办了托儿所、幼儿园、保健站。他们还动员职工义务劳动，搞起了花圃、水池、雕塑。结果，明显地改善了职工生活，美化了环境。

三明市筹集资金进行市政建设、文化娱乐设施建设和美化市容的经验，是可以普遍推广的。合理合法留的钱，每个城市都有。从他们的经验来看，只要领导重视，一抓到底，城市建设的资金是可以通过多种正当的渠道集中起来的。正当渠道来的钱，数量可能不算很多，但只要用得硬、用得巧、用得美，经过几年的努力，完全可以使城市的面貌有大的改观，为群众办很多好事。三明城市不大，人口较少，而且是新城市，维护改造需要的经费不算多，建设起来也比较

快，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大城市、老城市，确实困难得多，但如果像三明这样压缩人头费，利用利润留成中的福利基金，利用银行贷款等进行城市建设，还是能做很多事的。三明市的这些钱，并不是只用来搞精神文明建设，相当一部分是用于物质文明建设的。这说明，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只讲精神，它同样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同志们都说，过去讲建设精神文明，只讲虚，不讲实，设想很美，落实不了。我们这次在三明参观，学到了一条，这就是搞精神文明建设也要虚实结合。

第三，旧城市的改造，新城市的建设，做规划的时候，用人、用钱的时候，都要把绿化放在重要的位置。

一进三明市，首先看到市区周围群山都是一片绿色。这里森林覆盖面积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市内大街小巷布满花带花坛，到处是小花园、小花圃。市区平均每人绿化面积，已经达到三点七平方米。市委、市政府设想，准备把高围墙改为绿篱笆或栅栏，把单位园林化引向街道，引向楼院，引向家庭，使每个市民日常经过的路都有树、有花、有草，每个家庭都根据自己情况搞百花齐放的小花坛，大家都生活在绿化之中，呼吸新鲜空气，很快解除疲劳，有益身心健康。这个设想很好。全市准备把已有的公园继续办好，还要建一些新公园。我们老城市的改造，在拆迁旧房子盖新的建筑之前，在建筑区、街道楼群之间，一定要留出空地来，用作绿化。新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起码要做到平均每个人绿化面积达到国家规定的三至五平方米。无论新老城市，只要

周围有山,就要作出规划,逐步实现绿化。要广泛动员群众,分片承包,进行义务劳动,坚持种树种草。每个城市都要搞若干苗圃。我国森林面积只有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三。这种状况要逐步改变,有条件的要组织专业植树队伍。首先要做的是在居民区和居民区附近种花、种树、种草。绿化祖国,造福后代,年年要做,长期要做,这个世纪要做,下个世纪还要做。如果把森林都砍掉了,自然会反过来惩罚人类。我们无论如何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森林面积被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大部分农村甚至于一部分小城市烧柴。我前年在云南农村作了一点调查,大概一户每年要烧掉五立方米木柴。全国农村将近两亿户,如果都烧柴,一年就要烧掉十亿立方米木柴。有些地方烧枝枝丫丫还不愿意,要烧大块。现在我们森林采伐全国每年大概是四千万立方米。这样继续烧下去,又不植树不绿化,烧不了多少年、多少代,就会不可收拾。所以,现在一方面要节约柴禾,改灶;另一方面,如果煤运不去,要普遍地提倡每家每户种薪炭林。

第四,听了三明市的经验,我提了两点意见。一点是,卫生保健工作本来做得好,但是介绍经验的时候,怎么样做工作,做了一些什么工作,起了什么好作用,讲得很少。另外一点,今后设想中没有说到儿童少年的工作。他们已经有相当规模的青少年宫。建议三明的同志更加强调为儿童少年多做事,做好事。

革命是为了后代。我们现在的每项工作,都要随时想到为后代创造尽可能好的工作、劳动、生活条件。我国劳动人

民有个好传统，家里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首先供奉老人，至于孩子，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不少人认为，孩子来日方长，小时用不着多管。建国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实行了计划生育，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独生子女越来越成为家庭的“重点保护对象”了。父母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使小宝贝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玩得好一点。这是好现象。要继承我们的优良传统，尊重老人，可是也一定要把儿童少年的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时时处处为孩子们着想。我们搞物质文明建设，搞精神文明建设，现在看来，为孩子们做的事还是太少。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日用工业品的展销会，新产品、新品种、新花样绝大多数都是成年人需要的。现在提倡优生、优养、优育，需要做的事太多了。从母亲怀孕之日起，我们的医院、街道、单位就应该关心她们的身体健康，定期进行检查，保证营养，保证休息，进行孕期卫生、孕期保健。孩子出生以后，就要重视搞好儿童保健、儿童营养、儿童衣着、儿童用品、儿童教育、儿童读物、儿童电影、儿童戏剧、儿童活动场所，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摆在我们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搞精神文明建设的同志的工作日程上，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及时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就物质文明建设还是就精神文明建设来说，为孩子们办事，领域都很宽。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好了，儿童少年德、智、体、美能够全面发展，我国人口素质就可以大大提高，后代就会胜过前代。这是关系我们民族和国家前途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中华民族的子孙，一代一代体质越来越

健康，智力水平越来越高，道德品质越来越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可以代代相传，就可以更快地得到发展。

三明市已经普遍地建立了幼儿园，争取尽快做到每个孩子都进幼儿园。他们已经做到小学生普遍升初中，初中毕业生普遍升高中或职业学校、中专，而且已经开始筹办高等学校，目前主要是培养师资。他们还搞了电视大学。希望各个城市对照三明找找差距。农村普及小学教育困难比城市多，普及中学教育更不是在很短时间能做到的。但是，在城市普及小学、中学教育是可以而且应该做到的。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要培养合格的师资，包括幼儿园的保育员、教师，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学校的教师。现在全国普及小学教育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个说法，叫做三、六、九，就是学龄儿童百分之九十入学，百分之六十巩固，合格毕业生只有百分之三十。有些地区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很重要的原因是师资不合格。要真正普及小学、普及初中，目前中心环节是抓师范教育。中师、师专、师范大学新培养的教师，必须各自达到合格的水平，才能够分别教小学、初中、高中。原先的教师达不到水平的，要有步骤地进修。关心儿童、少年，就会把父母、家庭的积极性动员起来。党和全社会都要为孩子们着想，为孩子们办事。搞精神文明建设的同志，在这方面要承担重要的责任。这样，就可以使每个家庭，每对父母，同党、同政府、同我们搞精神文明建设的同志，心贴在一起，心连着心。革命战争期间，我们为了后代，流血牺牲在所不惜。现在搞和平

建设，如果不把儿童少年的工作放在应有的地位，那就要脱离群众。

第五，心中想着人民，一切工作为了人民。

这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也是这次整党的一个核心内容。三明的工作做得好，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他们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从群众反映最强烈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着手。像解决公共交通的问题，市领导同志亲自坐公共汽车，和群众同甘共苦，确实经过调查研究，措施也就得力了。实验小学门口一个厕所粪便四溢，十年无人理睬，学校有意见，居民也有意见。市委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厕所边开现场会，用臭气来清醒大家的头脑。接着，市领导同志带头掏粪填土，拆旧建新，当场解决问题，得到群众的一致称赞。他们每年年初，都在调查研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列出群众反映最强烈、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提出工作任务。两三个月进行阶段性检查，每个月还有专题检查。市委常委和正副市长每个星期有六天的时间共进晚餐，沟通情况，交流思想，有些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这种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同只在机关办公室里想问题、定方案的做法完全两样。我们的同志都想为人民做事情，如果方法不对、作风不对，只在办公室里凭空想，对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不作调查，不进行了解，即使费很大力气，也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也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建国以后，我们有了全国政权，很多事情可以通过下命令去办，而且有报纸、广播、电视、书刊，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可是，有了这

些条件,如果不了解群众的意愿、群众的困难,不从这些地方着手搞好工作,还是要脱离群众,还是要引起群众的不满。“大跃进”、十年“文革”,党和群众的关系疏远了,群众对我们的意见多了。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三明市的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恢复了而且的确发扬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提倡优质服务,要求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切切实实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会议要强调解决服务态度、服务质量问题,要提高服务质量,端正服务态度。我想,这里就应该包括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共产党员,首先要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端正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三明市的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我们的同志要真正把这条学到手,要真正了解群众的困难,了解群众的愿望,了解群众要求解决的紧迫问题,采取措施,一个一个地解决。所谓一抓到底,就应该体现这样一种精神。这些问题解决以后,各行各业优质服务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第六,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三明市的同志在实践中认识到,物质生活提高,不等于思想觉悟随着提高,共产主义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确实有如春风润物,潜移默化,大大提高了群众特别是青年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多种多样的方法,很值得

我们学习和参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就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穿于群众的思想 and 行动。要通过群众觉悟的提高，通过群众自觉的历史创造活动，来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任务。这几年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是成绩的，而且已经建立起一支经过长期考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队伍。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拨乱反正的实现，各项方针政策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过去“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能够在新的条件下，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本身，是充满创造性的工作。它必须随着时代前进，适应新的情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种新情况相结合，在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面临经济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我们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同时又有许多新的任务要去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很活跃，也会发生一些新的思想问题，尤其需要我们努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新的形势，为我们开辟了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广阔的用武之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像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有许多新经验。由上海开始接着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振兴中华读书、评书和讲演活动；对职工进行系统灌输，正规轮训；农村文明村镇建设，等等，都应该充分肯定，并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加以发展。我们要

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要了解在城市改革和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出现的各种思想情况,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来保证《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方针、任务的正确执行。改革需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和加强,又会促进改革的发展。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用正确的、积极的态度来迎接和努力促进各方面改革的进行,勇于创新,在工作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接受考验,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进一步搞好思想政治工作,中央准备解决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待遇问题。原则上,具有同等学历的人,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可以同业务干部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我相信,党和国家的关怀,一定会鼓舞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庄严职责。

第七,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二大报告关于两个文明建设的科学决策。

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问题,十二大已经从指导思想、从理论原则上正确地解决了。问题是我们不少同志的认识还没有跟上去,没有按十二大提出的要求办。为了不断提高认识,还要经常温习、反复领会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关于两个文明的科学论断,特别是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部分,要重新学习一番。

《政治报告》说:“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

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1】

报告说：“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3】社会主义除其他特征外，“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4】

报告说：“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并且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5】“我们必须从这样的理论高度和政治高度来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和作用，并且下定决心，保证尽一切努力，同时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永葆革命的青春和活力。”【6】

报告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一切文化建设当然也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

下发展。”【7】“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8】“我们全党和全社会的先进分子，一定要不断地传播先进思想，在实际行动中发挥模范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9】“我们不仅要努力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而且要在全社会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10】

报告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我们在生产建设中不仅需要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而且需要培育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我们决不容许任何方面的政策和工作妨碍以至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今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检查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除了检查物质文明建设的情况以外，一定要检查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11】

报告又说：“我们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适应建设时期的新的条件和情况，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工作认真做好，用革命的思想 and 革命的精神振奋起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12】

十二大的报告，包括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决策，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是全体共产党员、党的各级机关和所有干部都必须严格遵守和贯彻执行的。每一级机关，每一个同志，只有忠实执行的义务，决没有违反的权利。只抓物质文明建设，不

抓精神文明建设，或者只抓精神文明建设，不抓物质文明建设，都是片面的，都是同十二大的精神不相符合的。这次整党，要统一全党的思想，其中就包括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思想统一到哪里去？统一到十二大精神上去。如果经过认真检查，确实存在这种或那种片面性，不管主观上怎么想，都必须改正过来。现在全国经济形势很好，今后还会越来越好。物质文明建设发展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如果我们不认清这种形势，不努力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就要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甚至脱离群众。两个文明一起抓，首先领导上要有正确的认识，这确实是个关键。领导重视了，很多具体问题，如机构问题、经费问题，各种扯皮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三明的经验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注 释

- 【1】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46 页。
- 【2】 同上书，第 247 页。
- 【3】 同上书，第 248 页。
- 【4】 同上。
- 【5】 同上书，第 249 页。
- 【6】 同上书，第 250 页。
- 【7】 同上。

-
- 【8】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1 页。
- 【9】 同上。
- 【10】 同上书，第 251—252 页。
- 【11】 同上书，第 252—253 页。
- 【12】 同上书，第 254 页。

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 研究宣传提纲*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就明确地把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并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一项重要保证。

* 这是邓力群同志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部分同志起草的文件，未公开发表。

几年来,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在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包括调整所有制结构、改革企业经营方式和国民经济管理方式,都进行了许多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村的改革有了很大突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的突出任务,是加快城市经济改革的步伐。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城市经济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是经过反复研究、充分讨论以后确定的,它涉及到生产、建设、流通、分配各个领域,是一个比较配套的、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个方案所要进行的改革虽然是初步的,还有不少需要改革的问题因为条件不成熟还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但走好了这一步,就可以为以后更深入的改革打好基础。

实践证明,只有全面地系统地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才能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进一步调动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理论宣传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研究、论证、宣传中央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使之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自觉行动。改革是破旧立新的过程,必然会遇到“左”的思想残余和各种因循守旧、习惯势力的阻碍,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误解和曲解。思想理论工作者要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扫清思想障碍,为它的正确贯彻加强思想工作。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必然会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甚至会经历一些挫折。思想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出理论的概

括,使改革的发展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经济体制的改革十分复杂,提出的问题很多,需要组织广大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通力协作,进行深入的研究。根据这几年改革的实践,根据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我们提出以下一些应该着重加以研究的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占居重要的地位。它贯穿于生产、交换、分配等生产诸关系中,并决定它们的性质。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状况,建立合理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对于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的配置作了原则的规定,即在坚持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按照这个原则,这几年,在壮大国营经济的同时,城乡集体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十九点二上升到一九八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二;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的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七点四上升到一九八三年的百分之十六点六。劳动者个体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农村中自营个体经济的比重显著提高。城镇个体劳动者

一九七八年底只有十五万人，到一九八三年底增加到二百三十一万人。除了全民、集体、个体这三种经济形式以外，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施行，逐渐出现了一些中外合资经营、外商独资经营的企业。到一九八三年底，中外合资企业有一百八十八个，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有五十二个，协议投资总额七亿六千多万美元。今后，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工作做得好，外商来华投资一定会比现在有显著的增加。

对于经济形式的这种变化应当怎样认识？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判断一种所有制结构是否合理的标准，只能是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否适应现实的生产力状况，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违背了这个客观标准，从主观意愿出发，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结构，结果妨碍了生产的发展。现在我们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使之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多层次的状况，是对过去“左”的做法的拨乱反正。当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列来说，各种所有制形式是有高级和初级之分、有高级和比较高级之分的。比如，封建地主所有制比奴隶主所有制高级，资本主义所有制比封建地主所有制高级，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高级。同样地，对于同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经济形式也可以作相类似的分析，如同生产力水平有先进、落后之分一样，生产关系也有高级、低级之别。同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相对于同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相联系的集体所有制，相对于同手

工劳动相联系的个体经济来说,是一种较为高级的形式。正因为如此,在社会化大生产已在我国居于优势的条件下,必须巩固和发挥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但是,肯定国营经济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经济形式,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顾生产力的具体状况,普遍推行这种形式。正如过去的实践表明的,这样做,不仅体现不出它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反而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彭真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说:“国营、集体和个体这三种经济,各在一定范围内有其优越性,虽然它们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但都是不可缺少的”。【2】对于社会化大生产,采用个体经济的形式当然是不行的,反过来说,对于社会化程度较低甚至主要是手工劳动的那些生产活动,人为地实行国营经济也是不行的。我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都必须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合理配置、协调发展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性,已经为这几年经济的迅速发展所证实。

对于个体经济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济的性质应当怎么认识?劳动者个体经济的生产资料属于个人所有,是私有制经济的一种形态。它既不同于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同于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它存在于不同社会,从属于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现在,我国个体经济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根本不同于解放前,也不同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它得到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扶植,并和社会主义经济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在

我国，正如宪法所指出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中外合营企业，既有社会主义成分，又有资本主义成分，类似全行业公私合营前的公私合营企业，应属于国家资本主义性质。至于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由于它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我们国家的法律，接受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管理，是受社会主义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因此，也不同于解放前外国资本在我国开办的企业，它可以算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如同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一样，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现在，上述的这些经济形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今后还要积极发展，这对于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是十分必要的。这些经济形式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各增加到占多大比重较为适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促使它们健康发展，等等，都应该加以认真研究。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这些经济形式有了比现在更大的发展，也不会出现个体经济成为“汪洋大海”、国家资本主义掌握经济命脉的状况，因而不会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各个社会都不是纯而又纯的，就是说，都不是只有一种经济形式。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的，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形式。在我国，只要公有制经济占优势地位，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那么各种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的存在和发展，就决不可能改变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那种认为我们现在调整所有制结构，就是回到了“三大改造”以前的状况，甚至是离开了社会主义道

路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是十分错误的。

不同的经济形式都有自己特有的运动规律。在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情况下，既有各种经济形式运动规律独立起作用的一面，又有这些规律相互影响和制约的一面。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各种规律，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和对各种经济形式都适用的价值规律。同时又要研究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还要下大功夫研究各种经济形式运动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找到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制约其他经济形式运动的途径和办法，以发挥它们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面，限制其不利的方面，保证公有制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应当肯定，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们要有这个信心。马克思说过：“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3】在我国社会，公有制经济就是这样一种生产，这样一种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普照的光，完全可以引导、制约其他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三

我们的经济改革，不但要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

济形式,而且同一种所有制也要实行多种经营方式。同样是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就有分户经营、分组经营、生产队经营、各种联合体经营等等;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家庭联产承包这种分户经营的形式,又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同样是全民所有制,除了有国家经营以外,还需要有别种经营方式。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国营小企业,可以实行集体承包或个人承包、租赁经营。”^{【4】}这些办法,在以劳务为主的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和小的零售商业中,可以广泛地采用。就是国营企业,也有部属企业、省属企业、市属企业、县属企业之分,有组成公司的企业和不组成公司的企业之分。生活中已经存在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今后还会出现许多新的方式,现有的方式有些也会被淘汰消失,这是必然的趋势。之所以需要采取多种经营方式,是由于生产、流通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实行物质利益原则。只有根据生产、流通的具体条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经营方式,并把经营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他们的经营成果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过去的一个长时期里,流行的观念是:一种所有制形式只能有一种经营方式。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就是认为所有制和经营方式,所有权和使用权(或者说经营权)是不可分的。这种理论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可以分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完全不分离,例如资本的所有

者同时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一种是所有权和使用权有一定程度的分离，例如在股份公司里资本家组成董事会，决定经营方针，具体的生产经营业务交由聘请的总经理等去进行；一种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完全分离，例如借贷资本家、完全不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股票持有者，他们只是资本的所有者，而资本的使用权则属于职能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全民所有制经济来说，其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关系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有不同的地方。区别在于：从总体上来看，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必定要有一定程度的分离，但又不能完全分离。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所有，他能够自己经营，也就是说可以做到所有权和使用权完全不分离。而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这种生产资料不可能由全体人民的代表——国家去直接使用，而必须分别交给各个企业去使用、去经营，给企业以必要的自主权。这就是说，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所有权和使用权不能完全不分离。过去，国家把企业管得死死的，企业的自主权很小，既束缚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又使国家的经济管理机关包揽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出现了瞎指挥、官僚主义等等弊病。这就是没有把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当分开或分得不够所造成的恶果。

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又不能完全不分离。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只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而且要在生产、流通、分配过

程中体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攫取利润,不管生产资料归谁使用、怎样使用,只要资本所有者得到了平均利润,他的所有权就实现了。所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所有权和使用权完全分离后可以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要按照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保证生产不断增长,以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从各个企业取得一定的收入,用来进行重点建设,资助经济落后的地区,发展各种文化教育事业,救济受灾的生活困难的群众,等等,这是使全民所有制得到实现的重要表现。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国家还必须根据全体人民利益和经济的全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统筹规划、全面安排,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使企业的活动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如果国家放弃了这个职责,只靠一个个企业完全独立经营,也就是说使所有权和使用权完全分离后,那么由于经济全局的问题往往不是企业所能清楚地了解和掌握的,而企业考虑问题又往往从自身的局部利益出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经营就有可能背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就难以保证。这些,是就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整体来说的。至于说到各个企业,那就要根据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具体确定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程度,给予企业不同程度的自主权。有些分离程度小一些,有些分离程度大一些。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对一些小型的国营企业也可以实

行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完全分离,对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国家不规定任何计划,而是通过其他形式引导企业按照正确的方向使用国家的生产资料。究竟哪些企业的分离程度应该小一些,哪些企业的分离程度应该大一些,哪些企业可以完全分离,以及它们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各占多大比重为好,都要通过实践进行探索。

应该看到,正确地有条件地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不但不会妨碍全民所有制的实现,而且会有利于它的实现。因为这样做,可以把统一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把国家的集中领导和企业、劳动者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增加产品的数量和品种,改进产品的质量,提高经济效益,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分离后,会不会出现企业按照不正确的方向行使使用权,以致影响全民所有制实现的情况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前,企业运用它的自主权使用生产资料时,如果只顾局部的利益不顾整体的利益,不履行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或者搞歪门邪道,那就会使企业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受到损害。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由于有些相应的措施和办法没有跟上,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依靠国家掌握的物质力量,依靠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的运用,依靠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的健全,依靠经济信息的交流和引导,依靠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等等,一般来说可以把这种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即使发生了个别企业错误地运用生产资料使用权达到了改变所有制性质的严重情况,

国家还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制止，包括收回企业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改组或关闭这种企业。所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正确地分离的各种改革。我们相信，只要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采取适当的政策，所有权和使用权一定程度的分离后，一定会带来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的积极成果，而不会削弱、更不会破坏全民所有制。

四

只要存在着不同的所有者和社会分工，人们之间的劳动交换就一定要通过商品的形式。在我国，既然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存在和发展着广泛的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具有客观必然性。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这一点没有深刻的认识，不是努力为商品生产的发展创造条件，而常常是不自觉地加以限制。从理论上说，主要是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简单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以为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产生资本主义。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主要地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公有制和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基本的特征，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性质，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不同于简单商品生产。只要坚持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所固有的那种尔虞我诈、

互相吞食、盲目活动、无政府状态等弊病，就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妥善处理多种关系，如进一步搞活和加强管理、计划安排和市场调节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很好地进行研究。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大力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这里面包括把自给性生产尽可能地转化为商品性生产，特别是包括增加社会商品总量。

发展商品生产，从城市来说，主要是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打破条块分割，改变地方部门都自成体系的做法；改革税收价格体制，推进专业化协作。从农村来说，主要是发展专业户、重点户，以至建立各种专业组、专业队、专业村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现在我国的生产产品，无论是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除了自给的部分以外，绝大部分都已经作为商品来进行生产。不作为商品生产的产品，有一些还应当改变过来。比如，建筑业生产的住宅就可以商品化。现在的职工宿舍是作为福利设施来建设的，国家花的钱很多，不仅没有收益，房租连维修费也不够，补贴很多，背的包袱很重。这种制度虽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违背商品生产的规律，长期下去既不利于使建筑业成为赢利的行业，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也不利于住宅紧张问题的解决，非改变不可。而要把住宅作为商品来生产，就要改变房租过低的状况，相应地提高职工的工

资。邓小平同志指出：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房租也要调整。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

发展商品交换是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流通搞活了，就能促进生产和消费；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和消费。现在，我国的商品生产很不发达，人民的消费水平也还比较低，但是已经出现了买难、卖难的问题。这说明疏通流通渠道、做到货畅其流的迫切性。流通体制的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改革的方向，是把原有的按行政区域、行政层次统一收购和供应商品的流通体制，改变为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形成城乡畅通、地区交流、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流通网络，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第一，有计划地缩小计划收购和供应商品的范围，扩大自由购销。除了重要的农副产品、紧俏的工业消费品和一部分重要的生产资料仍需由国家有计划地收购和分配一部分以外，其余绝大多数商品都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国家有计划收购和分配的商品，也要尽可能地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按照商品流通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组织收购和供应。第二，打破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状况，全民、集体、个体都可以从事商品交换，短距离的贩运可以，长途贩运也可以。这样，才能使流通渠道多样化。第三，打破按照行政区划、行政层次设置商业批发机构的状况，发展各种类型的、开放式的贸易中心。现在按行政层次设置的一、二、三

级批发站要同所在城市的贸易中心合并,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使政企分开。这样,就可以改变现在的行业、地区对商品流通的分割,有利于按照经济的内在联系组织流通,发展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第四,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特别是逐步改变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能源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偏低的情况,以促进商品在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流通,调剂余缺,发展深度加工,方便人民生活。

在我国,无论是农村和城市,无论是农业、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都广泛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劳动力和土地、矿山等重要自然资源已不是商品。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说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经济?主要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从理论上加以正确回答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可以同计划经济相统一的,发展这种商品经济不等于否定计划经济,坚持计划经济更不等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

五

由于各种经济形式和各种经营方式的存在和发展,由于计划收购供应的产品品种和数量的逐步减少,经济生活中市场调节的部分正在逐渐扩大。就是计划规定的生产、收购任务,有的企业也不愿意承担,而愿意自行生产和销售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

调节为辅的原则还要不要坚持、能不能坚持和怎样坚持,这是一个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陈云同志说过,我们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计划好比一个笼子,没有笼子不行,鸟就飞掉了,也就是说整个经济会失去控制。我们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主体必须有计划发展,这一点不能动摇。问题是怎样理解计划经济,怎样实行计划经济,我们要开阔眼界,打开思路。过去一个很长时期,我们把计划经济同实行指令性计划,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等同起来,以为只有给企业规定产品的品种、数量等指标,才算是有计划。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党的十二大的报告指出,计划管理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形式。除了指令性计划之外,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的指导性计划。现在,指令性计划范围虽然缩小了,但是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却扩大了。指导性计划虽然没有强制性,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可以由企业根据市场供需的状况自主确定,但实际上国家通过自觉地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对企业进行引导和控制,必要时还可辅之以行政手段,因此,它仍然属于计划管理的范畴,而不属于市场调节。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看到,在我国经济中,指令性计划的部分加上指导性计划的部分仍然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市场调节的那一部分,是受价值规律自发作用支配的,但由于它的范围是有计划规定的,它的活动在总体上还要受到国家计划、政策和法令的制约,并接受国家的工商行政管理,因

此,这部分生产、流通活动,也可以纳入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

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形势,计划管理上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尊重和运用价值规律。首先,计划的内容要改变过去侧重于使用价值的情况,重视价值指标和价值平衡,并且使它同使用价值的指标和平衡很好地衔接起来。不仅要计划产品的品种、数量,还要计划成本、利润、资金利润率等;不仅要计划商品零售额的增长,还要计划资金周转率的加快;不仅要计划上多少基本建设项目,增加多少生产能力,还要计划建设的投资效益,计划投资的回收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降低消耗,提高效率,增进经济效益。在价值平衡方面,要特别注意国民收入的生产总额和分配之间的平衡,以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前提下,要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使积累基金的增长同生产资料的增长相适应;消费基金的增长同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搞好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平衡,并且使这种平衡同物资平衡相衔接。总之,对待价值指标和价值平衡,必须从过去那种处于单纯计算和反映的消极状态转变到起促进和控制的积极作用。其次,在计划的贯彻执行中,要改变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状况,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和经济办法。指导性计划固然主要靠经济手段去引导企业执行;就是指令性计划,由于企业拥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也不能光靠行政手段去贯彻。无论是产品品种、数量和价格等的确定,都应当注意市场的需要,考虑产

品的价值和供求关系，使企业进行生产能够得到必要的价值补偿和正当的经济利益。在计划管理中要尊重运用价值规律，已经讲了几十年，但事实上至今还没有很好解决，经济手段的运用在计划中还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今后，要把各种经济手段的运用作为计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规划，在确定计划目标和任务的同时，就要相应地确定调整价格、税率、利息、工资等的措施，以保证计划的实现。

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我们现在要发展商品生产，强调重视运用价值规律，是不是意味着价值规律是我们经济的基本规律呢？不是。这里要把商品生产一般同它在不同的社会中所采取的特殊形态区别开来。在简单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确实是基本规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尽管价值规律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支配一切过程和一切方面的基本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而不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起支配作用的基本规律，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满足全体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规律，也不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还广泛地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及有计划发展规律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实现。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客观上是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及有计划发展规律制约的。因此，我们在运用价值规律的时候，必须注意使它的作用体现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而不能与之相违背。总之，否认、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不对的，把价值规律看

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不对的。

六

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分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过去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统收统支、平均主义等弊端，都是分配关系不合理的表现。所以这几年的改革，很多是从分配领域中开始的。分配问题解决得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对于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等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分配问题。他指出，在按照个人的劳动量分配消费品之前，必须先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于生产补偿的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和后备基金，扣除用于满足劳动者共同需要的各项基金等等。根据这个原则，在分配领域内首先要解决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国家集中过多，使企业缺乏必要的机动财力，也影响职工的消费不能随着生产的发展得到相应的提高。前几年，我们实行各种形式的利润留成和利润包干办法来扩大企业的财权，同时普遍推行奖励制度以提高职工的收入，改变了国家财政集中过多的状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企业和职工一起挖国家收入的现象，企业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的状况没有完全打破，奖金发放中的平均主义现象也仍然相当普遍。

总结这几年的经验,针对出现的问题,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首先要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保证重点建设对资金的需要,又要使企业保有一定的财力和自主权。只有解决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使企业的经济利益和它的经营好坏密切挂钩,才能为打破企业内部的“大锅饭”,使职工个人的收入同他们的劳动好坏挂钩提供前提。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现在已经找到了利改税这种比较好的形式。第一步利改税实行之后,效果不错,今年十月要全面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这是城市改革中很重要的一步。随着利改税第二步的全面推行,企业的自有资金将逐渐增多,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

- (1) 如何引导企业自有资金在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和储备基金之间合理分配?
- (2) 如何引导企业正确使用生产发展基金?在允许企业跨地区、跨行业使用生产发展基金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和不合理的生产布局等盲目性?
- (3) 在企业有了部分扩大建设和增加消费的自主权之后,国家如何有效地实现全社会消费和积累的合理比例,使基建规模同国力相适应,使消费基金的增长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 (4) 在企业自有资金逐步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发挥银行调剂和分配资金的作用?
- (5) 国家和企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财力分配的原则是什么?决定这种分配的有哪些客观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也就是说,哪些事情必须由中央集中举办,哪些事情应

当由地方去办，哪些事情则要由企业去办？

实行利改税以后，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固定下来了。这样，企业可以在实行各种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把职工的报酬同他们的劳动好坏和贡献大小紧密联系起来，打破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状况。具体办法，可以是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也可以由企业用自己的资金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多种工资形式。今后，国家将只对企业规定工资总额和征收超额奖金税，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由企业因地制宜地自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撇开自然资源优劣和物质技术条件好坏的差别，在不同企业中工作的职工，即使付出了等量的劳动，由于企业经营水平不同，他们所得的报酬也会不同。这就提出了一个两级按劳分配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是在社会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直接进行的，而事实上，在劳动者和社会之间还有企业这个环节。企业经营的好坏，是职工劳动好坏的综合反映。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作出社会评价，是评价每个职工劳动贡献的前提。因此，是不是有一个国家先在各企业之间实现按劳分配的问题，这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回答和论证。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广大农民的收入提高很快；工厂企业实行奖金不封顶和自费改革工资等办法以后，职工的收入也会有较快的增加。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党政干部的收入，这是好事情。对此，绝大多数干部是高兴的，这说明我们的干部是有觉悟的。当然，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也要随着经济的

发展逐步提高,在八千万企业职工的工资问题解决之后,二千多万机关干部的工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对于这部分人的工资制度的改革,现在也已经设想了一个方案,就是实行结构工资制,把全部工资分为四部分:(1)基本工资,是保证职工本人和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的;(2)工龄工资;(3)职务工资,担任某种职务时拿该种职务的工资,职务改变了,工资也要相应改变;(4)年终奖励,奖金多少视工作好坏而定。这个方案,一方面保证了大家有饭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劳动者的关怀;一方面又较好地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当然具体化起来,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基本生活需要的标准订多少,赡养人如何确定,工龄工资是按年限递增还是不增,年终奖金怎么确定,等等。还有一个问题,结合工资改革,要改变粮食和食油购销价格倒挂的状况,把对职工的价格补贴改为工资。这些改革的原则和方向都是正确的,但牵涉面很广,不仅要解决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还需要过细的算账,既要保证职工的实际工资有所增加,又要使国家财政能够承受得起。

上面这些改革,指导思想都是在分配关系中正确体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这个原则本身就要求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兼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改革过程中,企业也好,职工也好,都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国家的利益,不能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思想理论工作者应当全面地阐述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内容和意

义,为分配制度的改革扫清这样或者那样的思想障碍,促进改革的健康发展。

七

通过上述各项改革,企业在生产、流通和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扩大了,这些权力由谁来负责行使?这就有一个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

过去,我们的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企业的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然后生产行政工作由厂长负责去执行。这种领导制度实行的结果,往往是名曰集体领导、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既然大事由党委决定,厂长实际上难以负责。而党委集体讨论,又往往议而不决,互相推诿、扯皮;不仅效率很低,一旦出了问题也找不到负责人。这种状况,同现代化工业生产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强有力的统一指挥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恩格斯说:“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5】。列宁说:“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6】

现在,中央决定在国营企业中逐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的生产指挥、经营管理由国家委托厂长(经理)全权负责。实行这种制度可以消除上述的种种弊端,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大家所承认的。但是,有些同志担心,企业的经营管理由厂长负责,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削弱思想政治工作,削弱职工的民主管理;厂长大权在握,会不会滥用

职权,个人组阁会不会乘机拉帮结派,开除工人会不会乘机打击报复,等等。应当说,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这些问题并非实行厂长负责制必然要出现的,就是在实行中有些企业出现了上述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

实行厂长负责制,并不是否定、削弱党对企业的领导,而是改变了党的领导形式。厂长行使职权,必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计划、法令,这些都是党的领导在政治、业务方面的体现。而且厂长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要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这是党的领导在组织上的体现。我们不能把党的领导简单地归结为企业党委的领导,好像企业党委不起领导作用就没有党的领导了。同时,在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企业党委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否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计划、法令,仍有保证监督的权力和责任。党委要支持厂长正确地行使职权,对工作提出建议,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正确的贯彻;如果厂长错误地行使职权,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有关的规定,党委可以提出质询,以至向上级建议审查、处分厂长,直到建议撤销厂长的职务。企业党委不再包揽行政事务,还可改变目前企业中党不管党、许多矛盾都集中在党委身上的状况,有利于党委集中精力加强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有的同志说,党委没有权说话就不灵了。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来不是靠权力而是靠真理说服人的。靠权力只能压服,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且把这个真理同工人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使人心悦诚服。所以,问题不在于党委权力减少以后思想

工作会削弱，而在于能不能根据新的条件改进思想工作的方法、形式。而这个问题，确实是企业党委、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下功夫探索，创造经验，努力加以解决的。

实行厂长负责制，决不是否定、削弱职工的民主管理，相反要大大加强职工的民主管理。保证工人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这里的关键，是要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使它在审议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规章制度和各项重要措施方面，在讨论决定有关职工切身利益的事务方面，在监督厂长行使职权方面，真正发挥作用。对厂长的正确决策，职工代表大会要动员群众给以支持；对不称职的甚至违法乱纪的厂长，职工代表大会可以进行批评以至提出罢免的建议。企业工会要切实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职工的正当利益，积极配合厂长正确行使职权，同时要抵制和反对损害职工民主权利和漠视群众正当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当然，在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如何进行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找出一套有效的、可行的、具体的办法来。

八

对外开放，是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对外经济贸

易,利用外国资金,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将会加快我国现代化的步伐。邓小平同志说,正像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一样,对外开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补充。实行对外开放,同过去比,其本身就是一项重大改革,同时又需要其他方面的改革与之相配合,必然会碰到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我们去分析研究。

发展对外贸易,就要改革现行的外贸管理体制。这几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很快,但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亏损增加较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现行外贸体制不合理,外贸经营单位对盈亏不负责任,吃“大锅饭”。这种体制不改变,不能促进外贸工作提高经济效益,也不利于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外贸系统要逐步实行政企分开,外贸企业要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同时外贸企业要逐步改为代理制,进口和出口都由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自负盈亏。实行这样的改革以后,国际市场的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势必要增加,由此会引起什么问题和应当采取什么对策,需要作深入的研究。

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快已有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开办经济特区的主要目的,是要吸引外资特别是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包括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保证外商取得的合法利润能够汇出去以及让出部分国内市场,等等。我们需要引进哪些先进技术,采取什么措施才能真正

把这些技术吸引进来，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过细的研究，订出规划、法律和各项具体的办法。同时，吸引外资创办合资或者独资企业以后，如何加强监督管理，既利用其积极作用又限制其消极因素，也需要经过研究订出一套办法来。在这些方面，不但要研究我们的实际经验，还要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办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的经验。

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推进国内的生产建设是十分重要的。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还刚刚开始，需要大大加强。当然，对先进技术的引进，要考虑到我国的生产、技术、资源以及企业的管理水平和职工的文化素质等各方面的条件，以选择那些适用的、综合经济效益最高的技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我们要看到它的两重性，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那些科学管理方法，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并使之社会主义服务；对于那些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旨在控制、分化、剥削工人的制度和办法，则不能照搬。

随着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展，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越来越紧密。我们必须面向世界，研究国际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金融、市场行情等等，不但要有总体的研究，而且要有分地区、分国别的研究。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机构、研究力量都很薄弱，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对许多情况的了解还处于一鳞半爪、肤浅皮毛的状态，很不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今后要下决心加强这

方面的力量,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为我们制定正确的对外经济政策提供依据。

注 释

-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1页。
- 【2】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82年12月6日第1版。
- 【3】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57页。
- 【4】 《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84年6月2日第1版。
- 【5】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页。
- 【6】 列宁:《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 宣传党的政策*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这次到福建，看了一些地方和单位，知道了很多新的情况，了解到很多新的经验，使我们受益很大。

刚才有同志谈到，福建省宣传文教工作当前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用四句话概括：不适应，出不去，搞不活，力量弱。从中央宣传部来说，这些问题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我们也还没有解决好。这次整党中，一些同志对我们提出意见，中心问题就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宣传工作怎样适应这个情况？应该和必须适应，我们也在努力，但是到现在还不能说适应，距离还很远。每一行有每一行的困难，宣传工作可能有一点特殊的困难。大家都讲宣传工作战线长。战线确实长。毛泽东同志讲过，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各行各业都希望我们帮助进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福建省宣传文教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谈话。

行宣传，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可是，很多事情我们事先没有知识的准备、理论的准备，任务一确定，就要我们立即宣传。这就是困难。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后，宣传工作的任务可以说比过去更明确了。宣传工作怎样适应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是摆在我们面前以至今后还要继续研究、继续解决的问题。经济建设的行业很多，其中的业务问题、科学技术问题很多，我们缺乏知识，要宣传，就很困难。即使有一些基础知识，如果要我们把思想、精力都用到钻研各行各业的业务和科学技术问题上去，实际上办不到，也不需要。

那么，我们的宣传工作怎样来适应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要求，怎样为经济建设服务呢？我只能谈点想法，供大家参考。

我们的注意点应当有所侧重。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宣传部门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应该着重研究各种政策、各种经济建设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问题。政策的作用，主要是调整、解决经济关系中的问题。我们要经常关心某项政策要解决什么样的经济关系问题，以及政策确定之后经济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然，这不是说业务、科学、技术不要宣传，而是说主要依靠和推动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有专长、有学问的同志去宣传。这样，我们才可能把思想、精力、工作更多地放到经济关系这方面来考虑。

比如说，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单位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贯彻执

行。我们应该研究报告中所涉及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在三明市，我曾经给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部长谈到这件事，提了几个问题。问题提得不完全，比如智力投资、文化建设就没谈，这方面也有经济关系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有所研究，而且确有成果，那在改进和加强经济建设的宣传方面就可能有点进步。如果做得好，也可能对有关部门、有关行业多少有点帮助。在这方面，我们过去不是一点没做，而是做得很不够。经过整党，我们能不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呢？我想是应当的，也是可以的。

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政策制定以前、制定过程中或者贯彻执行过程中，人们都会有各种想法，社会上会有各种思想动向。这和前面说的经济关系问题有关。思想问题经常会发生，经常会遇到，这个时候有这个时候的思想，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思想。任何一个政策，任何一种经济关系的变动，都会在社会上引起不同的反应，在干部和群众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认识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及时了解这些思想动向，掌握得比较准确、比较全面，那么我们在进行宣传时，就不至于像大家所说的，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话，没有新东西，缺少针对性，不能够解决人家脑子里头的思想问题。

所以，我们的宣传文教工作怎么样同整个经济建设相适应，要从上述两个方面来考虑。当然，即使研究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有困难。经济关系不能坐在屋子里头只靠书本来研究。我们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要读各种书，有比较广泛的知识，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生活之树常青。

生活天天在变化,经济关系的许多方面也在变革。原来的知识尽管很丰富,但面对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新生活,也是不够的。多年来,党中央再三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但是,从全国思想界,特别是中宣部本身来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能够解决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界、思想界比过去活跃,经济建设方面的讨论也比过去活跃,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多少有所贡献,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够的。中央有同志讲,中央很多政策的提出和确定,不是靠我们的理论界、思想界,特别是一些大的政策,都是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确定的。这是完全正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讲,理论应该指导实践,走在实践的前面。在中国,理论走在实践前面的,还是我们的党中央。

我刚才同省委研究室的同志讲,做宣传工作、理论工作,联系实际不能只限于今天以前的材料。每个部门、每个同志,要力求做到同新出现的事物和新出现的典型建立一定的联系,对新出现的经验能够有灵敏的反应和准确的把握。我还建议,研究室的同志是不是按照分工,分别联系一个点。我想,宣传文教单位是不是可以建立这么一个制度,就是由从事各个方面工作的同志,按照分工各自联系一个点。要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可以考虑普遍地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福建全省文教部门干部一万九千人,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每人联系一个点,就可以有很大收获。只要同联系点上的人交上朋友,你去找他,他就会把知心话跟你讲;他那里有问题,你不去找他,他也会到你这里来,向你

反映，向你求教。研究经济关系，了解思想动向，对于写文章，进行创作，塑造人物，也有必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写了个领导方法的决定【1】，提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要有一般号召，还要有对个别单位的具体指导，而且要用个别指导来丰富一般号召。这个原理，对各行各业都是适用的。进行典型调查，用以丰富我们的知识，这是我们搞精神生产、从事思想工作的同志的最可靠的办法。舍此没有别的办法。历来的学问，历来的科学，都是走这条路的。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马克思早就说过，理论的观念必须要由大规模积累的实际经验来完成。靠今天以前已有的经验、已有的材料，固然可以有所进步，但是，要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推动历史的发展，不走这条路不行。所以，我们要走这条路，也要影响我们这个行业的干部都走这条路。这就是深入生活嘛！一个人可以到很多地方去走走，但是一定要有重点。作为省一级的同志，包括部长、副部长在内，如果一个人联系十几个点，很难做到，联系一个点是可以坚持下去的。整党以后，能不能把这个办法切实实行起来呢？厅长、副厅长，局长、副局长，室主任、副主任，一个人联系一个点。这样，我们同生活就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也同群众的思想动向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我们宣传中央的精神也好，宣传省委的精神也好，就会有新的材料，新的语言，也有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没有这些东西，只能照本宣科，想说一点别的东西是说不不了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才五年半，我国变化确实很

大。这种变化，你不到生活中去了解，光是靠看报纸，印象毕竟不深，只能得到概念的东西、原则的东西。原则的东西是对的，但是，你要说服人，只靠原则就不行了。如果我们在深入、经常、密切地联系一个点的同时，再走马观花，多看些地方，然后把典型经验和一般情况结合起来，就会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脑愈来愈丰富，那就能够跟上时代和生活。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讲得很清楚，很多问题在机关解决不了，迈开大步进行调查，就解决了。这几年党中央的政策所以见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都来出主意。我们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的涌现、推广和改进，就是把八亿农民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动员起来的结果。现在城市开始改革，也会出现许多新事物、新创造，你对这样的情况不了解、不调查，光是靠坐在机关里翻这本书、翻那本书，就要落后于实践，落后于生活。山西有个同志前年就讲过，天天讲解放思想，怎么样才能解放思想呢？调查研究，才能解放思想。你不搞调查研究，就不能解放思想。他还讲，农村的变化很快，半年不下去，你的思想就显得落后了，一调查研究，思想就解放了。因为新事物摆在面前，启发自己考虑问题了。这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他们总想发明，我们在于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靠自己头脑中的空想，而是靠对现实关系的研究，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你不做调查研究，怎么发现？你不做调查研究，天天讲解放思想，怎么解

放？我们宣传部门，包括中宣部，如果说很多工作没跟上去，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是否很好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如实地反映事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说明事实。你不做调查，怎么去反映事实，说明事实？要改进工作，恐怕这一条最重要。中央的文件很好，省委的精神也很好，我们想发挥一点，想具体化一点，但是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不出新道道来。我想，遇到这种情况，索性暂时停止讨论，分头到联系的点里去了解一下，然后再回来讨论，就会好得多了。

宣传部门的同志读书多一点，但是也要承认，我们的理论准备还是不够的。应该读的，读得少，或者没有读；多少年前读的，现在忘得差不多了。有个别同志说，那些东西已经过时了，现在用不着了，也不必再去读了。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举例说，现在的生活确实比党的十二大的精神丰富得多了，这证明十二大的报告确实好，确实正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是，能不能说，现在的生活已经证明，十二大确定的那些基本的东西已经同当前的生活不相符合了，已经没有用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前两年的进步，靠十二大；今后要继续进步，还得靠十二大。我们终究还是搞共产主义的，还是相信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理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还是相信共产主义必定要在全世界实现的。刚才有的同志谈到，“两户一体”同共产主义精神是不是相符合的问题。联合体，是多种形式的新型合作经济。专业户、重点户，也并不都是个体经济。专业户、重点

户中，多数还是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当然也有的违反国家的法律、法令。现在需要的，是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的、全面的、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只要对生活了解得深一点，用马列主义去研究，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就会看到生活本身正在丰富共产主义的理论。

现在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农民富裕了，收入几千元的户全国到处都有。可是许多干部的收入比农民低得多。中央在讨论工资改革时说到，农民增加收入的问题，不能说全国都解决了，但总算走上路了。城市通过改革，解决两个“大锅饭”的问题，也开始找到路了。这样搞下去，中小学教员、党政干部，收入是最低的。现在要考虑解决这个问题。在没解决之前，我们在座的同志是不是眼红，说人家一年收入万把元、几千元，我才一千多元，甚至一千元还没有，每月五六十元，工作就消极了？没有。难道能说这不是共产主义觉悟，能够说这同共产主义思想是相抵触的？能说这种精神状态不可贵，不值得称赞？我们的作家为什么不去宣传这些人，表现这些人？我们在建瓯县听了良种场负责人的介绍：五百多亩地，二百多职工，一年收入五十四万元，职工每人年收入一千四百元。他们的孩子上小学、上中学全部免费，宿舍平均每户四五十平方米，去年盖了一幢科研大楼，花了十七万元。但是，这个场里的支部书记工资并不是最高的，每月只七十多元。这样的领导干部，难道能说一点共产主义的理想也没有，一点共产主义的情操也没有？相反，有的地

方条件并不错，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个别领导干部精神状态不好，那里社员的收入在降低。这样一种鲜明的对照，如果我们的作家深入、具体地了解了，写起来不是很生动、很有意义吗？这证明，生活在前进、在发展，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中国人民中间、在干部中间是个活生生的现实。实践是个伟大的学校。为什么我们有的作家、理论家偏偏看不到这个事实，或者看得不够呢？一方面是缺乏生活，另一方面理论也确实学得不够，领会得不够，包括对党中央的东西也学得不够、理解得不够。

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还是要认真学习理论，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学习《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中央的文件、中央的决定，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讲话。遇到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听到各种议论的时候，要重新拿来翻一下。这次三明会议上，有些同志希望我就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问题讲几句硬话。十二大的文件上说“决不容许任何方面的政策和工作妨碍以至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就是硬话。所以，不要以为文件读过了，就没有必要再读了。我们的宣传文教部门、思想理论工作部门，不是说要掌握思想动向吗？一个新的思想动向出来后，特别需要我们抽出点时间来看点书，重温中央的文件，这就会帮助我们自己头脑清醒，也从这里头找到思想武器，来分析新的思想动向。

首先，要使现有宣传干部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在讨论和修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稿时，陈云同志讲，特别要

提醒我们的干部学哲学。现在就可以考虑,宣传文教部门整党以后,针对每个部门的情况,在具体部署上可以各有侧重,这个部门着重读这方面的书,那个部门着重读那个方面的书。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把过去没有读或者读过忘记了的书,重新温习,要抽出一段时间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讲了自己的经验。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几次要他读一点哲学著作。后来,他读了马列的哲学著作,也读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哲学著作,包括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一些哲学思想比较丰富的电报。经过这个学习,使他自己的思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是联系一个点,一是多读点书,要从这两个方面来改善我们宣传文教部门的工作,提高水平。这个方面水平提高以后,我们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就会更有把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就会更有成效了。

注 释

- 【1】 指毛泽东 1943 年 6 月 1 日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7—902 页。

在城市经济改革思想教育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的发言，主要就几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意见。

一、关于会议本身的几个问题

我们的会，是城市经济改革思想工作座谈会，同时也是调查会、学习会、经验交流会。在大会、小会上，大家互教互学，人人是先生，人人是学生。大会口头发言十四个、书面发言十六个，都是很好的教材。对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来说，这是一次向地方、向基层工作的同志学习的好机会。我对城市经济工作、特别是城市经济改革知识很少，在这次会上学习了很多东西。我要向大会、小会发言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这些老师们给我上了一堂很好的课。

书面发言还来不及全部看。就十四个大会口头发言来说，涉及到的有省、市、自治区一级和省辖市一级如何宣传城市经济改革的经验。就基层来讲，有工业、商业服务业改

革的经验。工业中，有钢铁、煤炭、机械、化工、文具用品等不同基层企业改革的经验。商业服务业方面，还有合资企业的经验。每个发言都各具特色、富有创造，不但引人入胜，而且启发思想。我们大家都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经济改革，都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共性。而这个共性又寓于各自的个性之中。所有的发言，不是千篇一律，不是千人一面。情况不同，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不同，得出的经验也不同。语言的表达也丰富多彩，没有套话，没有空话。这充分说明，从事城市经济改革的领导干部，辛勤努力，刻苦钻研，实事求是，勇于探索，代表了职工群众的意愿，集中了职工群众的智慧。特别可喜的是，从大家的发言中可以看到，不但在各级干部中，而且在广大职工群众中，出现了一种理论兴趣。大家都从实际出发，积极地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努力从理论上解答各种现实问题，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和推动改革的实践。参加这种理论研究和讨论的人数之多、兴趣之浓厚、积极性之高，是多年没有见过的。由于有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开始学会从实际出发提出意见，又到实践中去检验这些意见并加以丰富和发展。

到会的同志，是全国城市经济改革中走在前面的人们的一部分代表。口头发言、书面发言，都是城市经济改革中先进典型经验的一部分。仅就这部分经验的介绍来说，就足以证明，断定城市经济改革将会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是不合乎实际的。城市经济改革，确实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

新问题，也出了很多难题。难题之一，是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企业党委要从日常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管党员，管干部，管党的建设，做思想政治工作。无论对厂长来说或是对党委书记来说，都要改变过去的习惯做法，适应新的情况、新的要求来进行工作。关于这个问题，袁宝华同志讲话的第三部分，已经作了很好的分析。要使城市经济改革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确实比过去加重了。我们究竟是知难而退，还是迎着困难上？遇到困难感到发愁的时候，到先进单位看看，请他们介绍一下成功的经验，就会精神振奋，勇气倍增。遇到问题自己不能解答，就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有理论准备的同志共同来讨论一下，争论一番，从实际出发重温有关的理论著作、中央的有关文件，绝大多数问题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思想就可以豁然开朗。感到经验不够、知识不够的时候，就下狠心重新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有经验的人、向内行学习，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学理论，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以极大的毅力提高自己。有时感到自己落后了，这没有什么可怕。要如实地承认落后。更重要的是决心改变落后。这样，就一定有希望从落后变成先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经过这次会，我们自己，并且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来影响周围的同志，共同来增强信心，提高本领，把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到新水平。

让我们共同学习一下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一段话：“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

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1】

这种正视困难、研究困难、坚韧不拔地战胜困难的精神和科学态度，应该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城市经济改革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具有的。

会议开始的时候，廖井丹同志作了一个启发性的、提出问题供大家讨论的开幕讲话。七月二十九日上午，袁宝华同志以《经济战线各级干部要做城市经济改革的带头人》为题，作了很好的讲话。刘实同志介绍了工会系统在城市经济

改革中进行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给我们很大帮助。

会议提出了一个供讨论的《关于当前城市经济改革的宣传提纲》的稿子。我的意见，《提纲》还是以各级干部为主要对象。干部的思想打通了，就可以结合实际，做好职工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一道解决各种思想认识问题。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还是要围绕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好好学习和领会报告提出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步骤。对于遵循报告精神进行改革取得成功的经验，要加以提倡，加以推广。对于疑虑、误解，要加以解释，加以疏导，使各级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和国家确定的指导思想上来。

我们的机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要做的事很多。邓小平同志说过，改革要贯穿整个四化的全过程。改革中，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但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发生什么样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事先很难预计。城市经济改革的试点，多年来已经在搞，但在全国范围配套进行，这还是起步。毛泽东同志讲，打仗要争取首战必胜。把起步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正确地贯彻执行，就能增强改革的信心，提高改革的本领，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一大批干部，取得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为下一步、下几步的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集中力量了解、研究、解决改革中随时出现的问题，应该成为今年以至今后几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提纲》不能、也没有必要回答所

有的问题。主要应该回答当前迫切需要回答、又有把握回答的问题。没有把握的问题，可以暂时不写，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以后再来补充，时间也来得及。

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深入基层、深入人心。我们要靠这条思想路线取得城市经济改革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重申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这条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以及为这条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五年半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和发展。生产增长，经济繁荣，四化建设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逐年改善，心情舒畅。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调整外交格局，开展对外交往，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吸引愈来愈多的人们了解中国、关注中国，同中国人民建立和发展平等友好的关系。这些我们亲身经历的事实，可以列举很多很多。我想着重指出的是，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党中央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央的倡导和指引下，不但各级领导干部，而且基层干部和群众，都在认真学习、努力执行这条思想路线。不少领导干部和先进的基层单位，学得很好，用得很好，在工作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是最值得高兴的一件大事。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同志来东北视察工作，曾就真高举

还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讲了一篇很深刻的道理。他说，“两个凡是”是假高举，不是真高举。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才是真高举。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也要靠这四个大字。他还讲到，各级领导机关做好工作，要实事求是；每个基层单位，以至每个生产队，要做好工作，也要实事求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根据这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并贯彻执行。中央每次在确定统一的基本政策的同时，总是提醒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因地、因事、因时制宜，提醒干部要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政策的制定要符合当时当地的情况。实际情况变了，也要适应这个变化，来修正、补充、充实以至改变原定的政策。大家都承认，我们的农村工作有大的突破，农村形势愈来愈好。之所以好，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就是因为我们的党中央、各级党委和基层的同志，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深入基层也罢，调查研究也罢，要想给基层工作的同志一点帮助，也应该多进行一些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宣传，务必不能就基层工作的具体问题指手

划脚。

去年我到华北、西北七个省、市、自治区跑了一个半月，今年春天到浙江、山东跑了半个月，六月到福建跑了三个星期，这次又听了十四个大会发言，都使我感觉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就农村来说，我们总的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可是各个地区、各项事业所采取的责任制形式却很不相同。山东烟台地委书记告诉我，全国农村的办法是“统分包”，他们的办法是“统专包”。他们是按照烟台的实际情况，采取这种办法的。又例如都叫专业村，我在福建去过的地方，就有花木专业村、渔业专业村、竹木专业村、工副业专业村。工副业专业村，有的专门生产凉鞋，有的专门生产小五金，有的专门生产塑料制品，有的专门从事食品加工。他们各自按照本村资源、技术、资金、劳力、经营管理经验的不同，从事对自己来说最合适的专业。他们对本地情况最熟悉。按照自己的情况办事，生产发展了，生活也提高了；违背自己的实际情况，生产不能发展，生活也不能提高。这种正反两方面的教育，都同当地群众的实际利益息息相关。在生产第一线，对于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带来的结果，感受得最直接。这也是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能够较快较好地接受党的这条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村改革对城市经济改革的启发，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发挥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政府工作报

告》贯穿着这条思想路线。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方针和步骤，同全国城市目前的情况是符合的。因此，我们在学习报告的时候，不仅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怎样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正确的方针、步骤，而且要遵照这条思想路线，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原则和部署。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总结我党长期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经验，用以指导全党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思想路线，也是今后实现党的总任务、搞好四化建设、在本世纪末力争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要求的，是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着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前进，或者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都不能使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因而都是主观主义的，都不是、也不能真正解放思想。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克服妨碍思想解放的这样两种毛病。袁宝华同志发言中分析了改革问题上“左”的思想影响的七条具体内容，又指出不是说一切妨碍改革的思想都是“左”的思想，要针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这也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的问题。

三、在坚持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不仅发展集体经济，而且支持、指导和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的发展，积极引进外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壮大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结构，党的十二大的报告、宪法的规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基础。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宪法还规定，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

合资企业中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类似我们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的公私合营企业。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关于这个问题，最近邓小平同志接见香港人士时说，大陆十亿人口搞社会主义，这不会变，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搞资本主义，比如香港、台湾。我们内地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外国来投资不就是搞资本主义吗？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补充。比如外资到上海去，不是整个上海都搞资本主义。深圳也不是，还是搞社会主义。容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有些管理方式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这也是试验。大陆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去年九月，小平同志还说过，吸收外来资金和向外借债、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等等，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它不会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

到会一些同志反映，干部和群众中对于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外资的引进和增加，有的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是因为对于这两种补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的大小不了解。实际上，拿一九八三年的情况来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占百分之九十九，个体工业占百分之零点一，其他包括中外合资工业和外来投资工业占百分之零点九；在全国农业总产值中，公有制占百分之七十六，私有经营占百分之二十四；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公有制商业占百分之八十八点七，个体商业占百分之六点五，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百分之四点七。解放以后，我们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九五〇年以前，原有工业固定资产不过一二百亿。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三年累计，工业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八千九百七十亿元，新增固定资产六千四百四十亿元。加上流动资金，大约是一万亿元。吸收外来投资，即使达到三十亿元，也不过是一万亿元的百分之零点几。小平同志说过，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外资冲击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它们今天不会，将来也不会左右我们经济的全局，而且社会主义经济一定会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大。我们报刊上对个体经济、中外合资经营进行宣传，是对的；但一个时期以来报道量过多，远远超过了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而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贡献和其中的大量好典型，相对来说宣传不够。这就难免增加一部分人的疑虑和误解。

第二，是不了解这两种补充对我们国民经济是有益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严重后果之一，是城镇大批青年

不能就业,数字将近两千万人。以后历年都有待业青年在增加。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全部由国家包起来,还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吸收一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业吸收一部分,同时通过发展个体经济来安排一部分?这个道理,同志们都有亲身体会,很容易理解。我们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多事情应该办,都由国家包起来,又办不了。国家采取积极方针,鼓励待业青年从事个体经济,既减轻了国家负担,又方便了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秩序,显然是有利的。至于吸收外资,让外商分得一部分法律允许的、按合同应该分给他们的利润,他们当然得到一部分好处。我们自己,则可以用这个办法弥补建设资金不足的一部分,同时又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这方面的好处,也是很清楚的。

第三,现在个体经济的出现,外来资金的引进,社会经济条件不但和旧中国完全不同,也和三大改造前完全不同。旧中国,甚至在三大改造前,个体经济是几千年来私有制的产物。经过三大改造,可以说旧社会那种个体经济几乎没有了。旧中国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掠夺我国资源,在中国投资、设厂、开矿,搞各种事业,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些外国企业,有的完全被没收,有的被征用,有的被挤走。标志我国社会半殖民地性质的那种外国企业,到三大改造前已经在我国大陆上完全不存在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制定政策,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并且从货源、市场、

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扶助，宪法也明确规定保护其合法权益。只要我们的管理工作跟得上，就可以使个体经济依附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个体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存在矛盾的方面。我们要随时了解这些矛盾，妥善解决这些矛盾。至于外来资金的出现和将来适当的增加，这是我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自主确定的一种政策，同旧中国丧失主权、接受屈辱条件，性质根本不同。我们的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它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保护”。【2】对外经济交往，过去我们吃过一点亏，今后也难免一点不吃亏。这主要是个经验问题、知识问题。吃一堑长一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信心经过切实的努力，学会这方面的本领，逐步做到少吃亏、不吃亏，真正实现平等互利。

第四，有的同志在城乡雇工问题上产生疑虑。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明确规定，允许请两个帮工、带五个徒弟。开发性的事业可适当超过这个数字。其他方面超过这个数字的看几年再说。雇工问题不公开宣传报道，工作上要引导他们走合作经济的道路。实行这样的政策，对经济活跃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农村也好，城市也好，确实出现了个别雇工数量较多的情况。雇工问题比较复杂。怎么叫雇工，确实是雇工的有没有剥削，剥削量多大，是什么性质的剥削，都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进行具体分析。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这是我们从当前实际情况

出发分析雇工现象的理论依据。可是，现在的雇工，确实也有同旧社会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特点。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条件下，不存在劳动者丧失一切生产条件、只剩下劳动力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马克思说，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劳动者真正“自由”了，“自由”得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我们现在不存在这种情况。在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有些经营能力强或有一技之长的人，经营得比较好，资金增加得快。这就产生了一方面有人希望出去找活干，另一方面也有人希望有人到他那里干活的情况。这是现在出现雇工现象的一个社会原因。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事实，出来寻找活干，不是因为饥寒交迫、走投无路，而是想挣一笔钱，来办一件他想办的事，或者学一门技术，便于他自己增加新的生产门路。他们出来干活，命运和旧社会出卖劳动力那种情况当然不同。总的说，雇工问题还看不大清楚，需要继续观察。

我们应该深刻领会中央有关政策的精神，用以观察和处理城市经济改革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使自己成为清醒的、坚定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保证城市经济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四、全面准确地理解、执行和宣传“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为了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年来我们侧重批评和克服平均主义的毛病。现在还有同志留恋

平均主义，还不认识或不承认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使劳动好的人吃亏，劳动不好以至不劳动的人占便宜。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在实际工作中，要用大力气批评和克服平均主义的毛病。与此同时，也要注意批评和克服另一种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的表现，去年曾经被概括为“工农兵学商，大家一齐动手挖中央”。经过去年六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这种毛病有所克服。今年决定城市经济改革后，又出了一种新的说法，就是把城市经济改革归结为“企业多得利，个人多拿钱”。其中后半句话，也是错误认识的另一种说法。这些错误认识没有能够及时地得到澄清，同我们宣传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没有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宣传“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分不开的。

多年来，我们宣传按劳分配，只讲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要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这种宣传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与此同时却很少甚至没有讲清楚按劳分配所说的劳动所得，不是拉萨尔所说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而是马克思所说的有折有扣的劳动所得。我们报刊上确实没有人公开宣传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但是，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模糊，分不清什么叫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什么叫有折有扣的劳动所得。看来，我们有必要重新认真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也有必要结合目前出现的思想问题全面准确地向职工群众宣传这些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社

会总产品中，首先要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要从中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

只有进行上述扣除之后，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对扣除之后留下来的这部分消费资料，应以劳动为唯一的尺度，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某个劳动者为社会提供了多少劳动量，也从社会领回等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政府工作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决我国当前按劳分配的问题。《报告》把“大锅饭”分成两类：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国家通过利改税，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问题，解决第一个“大锅饭”的问题。国家通过利改税，把行政管理费，国防经费，用于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科学教育、卫生保健事业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等扣留出来，集中起来，有计划地进行分配，既可以保证国家财政稳定增长，又可以较好地解决集中

资金、保证重点建设的问题。国家用上述办法扣除之后，企业还要做必要的扣除，即从企业留下的收入中扣除设备消耗的折旧资金，原料、材料、动力、燃料的消耗资金，企业必要的管理费用，企业生产发展资金，企业集体福利资金等。企业做了这些扣除之后，剩下的部分，以奖金、工资的形式，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在职工中进行分配。这样，才能正确地解决第二个“大锅饭”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农村的办法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国家农业税很低；集体提留部分也很有限，主要是用于五保户、教育、卫生、干部补贴等；社员留给自己的，有一部分要用于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其余的才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而城市国营企业、集体企业除向国家交付利税以外，还必须提留相当数量的基金，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和进行扩大再生产。这也说明，城市经济改革不能简单照搬农村的经验。

由此可见，要全面准确地执行按劳分配原则，需要从两方面做好思想工作。一方面，要使职工认识平均主义的毛病。过去我们宣传各尽所能比较少，以后要进一步加以宣传。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要使职工各得其所，真正做到多劳多得光荣，少劳少得也心服口服，使每个职工自觉地认识，个人劳动所得同企业经济效益要紧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要使职工在关心个人利益的同时，能够关心企业利益、关心国家利益，认识到“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认识到国家和企业从社会总产品中做出

种种必要的扣留，不但对国家、对企业，而且对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要发展，生活要改善，必须进行积累。国家要积累，企业也要积累。在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问题上，我们有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新中国建立以来，有两段时间积累过高，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调整二者关系，取得了成果。前两三年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一九八二年曾降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下。当然，积累率过低，也不利于生产建设的发展。恩格斯说过，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和源泉，就是积累。陈云同志多次说，分光吃光，国家没有希望；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国家才有希望。意思也是说要有必要的积累，社会才能前进。

我们要坚决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但是决不能够“按酬付劳”。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对企业、对国家采取雇佣的态度，是不应该的。改变这种态度，需要实现民主管理，提高和保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也需要在职工群众中对于按酬付劳的思想和行为，对于雇佣观点及其表现，进行说服、批评、教育工作。与此同时，我们要积极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大力表彰对国家、对企业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同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不但不互相抵触，相反，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注 释

- 【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2页。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82年12月5日第1版。

宣传部门需要研究城市 经济体制改革*

(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

想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一些问题，请同志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间结合自己的实际陆续进行调查研究。

第一个问题，我国社会目前阶段的经济结构。

目前，我们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还有个体经济和中外合资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按一九八二年的统计，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占百分之七十七点八，集体占百分之二十一，两项共占百分之九十八点八；农业总产值中，全民占百分之三点六，集体占百分之七十一一点七，两项共占百分之七十五点三；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占百分之七十六点六，集体占百分之十六点一，两项共占百分之九十二点七。因此，个体经济和中外合资企业，只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黑龙江省宣传系统局以上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即使再有相当大的发展，也不可能左右我们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决定我们经济的性质。这里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每种经济形式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各种经济形式也有它们运动规律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的不理解，甚至担心，原因之一就是对于这方面的关系没有很好地理解。

马克思有个重要论点，即各种社会形态里都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它一定要影响、并作用于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1】}遵循这个原理分析我们的实际，研究清楚了，就能提高贯彻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的自觉性。

昨天我们参观了一个养牛专业户。他请了两个长年工，可能还雇零工，养四十九头牛，今年收入据说可以达到三万多元。这种个体户同旧社会的个体经济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产前、产中、产后都同公有制经济密切联系着。他能够从开始养一头牛到几头牛，直到四十几头，是靠银行贷款。他现在除了自己居住的房子外，还有牛圈。牛圈原来是生产队的，七千元卖给他。他的饲料是从集体购来的。牛奶挤出来以后，由我们的牛奶站全部收购。防疫要靠防疫站。这个专业户的生产，从头到尾，可以说天天生活在公有制的影响或者包围之中。离开公有制经济，他就不能存在。所以，

这种个体经济同旧社会的个体经济很不一样,有新的特点。

我们在宁安县杏山乡看了一个被叫做农机专业户的专业户,实际上是联户经营企业。为主的叫王世成,出资四千元,三个兄弟和他大舅子各出两千元,加上银行贷款,买了四台拖拉机和配套的农机具。这有点类似初级社,劳动入股,资金入股,盈利分红。王世成分盈利的百分之四十,三个弟弟和大舅子分百分之六十。雇四个工,管饭,每人每天工资五元。这个企业前后左右和公有制经济都有密切关系。

这样一类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深受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和制约。这种“普照的光”渗透到它的各个方面。个体户也好,专业户也好,联合体也好,只要把他们各自的情况搞清楚,就可以看到同集体所有制经济、乃至全民所有制经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依存关系。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中外合营、外资经营的企业。我们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特别是为了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吸引外资,建立合资经营、外资独家经营企业。宪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这也就是说,都决不能丝毫损害我们国家的主权。

把个体经济、中外合资和外资独家经营这样一些现象孤立起来,不去考虑它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它的各个环节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包括协调一致方面和互相矛盾方面,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把这些关系

搞清楚,可以增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自觉性,也可以增强我们通过执行这样的政策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越来越取得伟大胜利的信心。

第二个问题,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

将来要实行政企分离,企业变成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在国家允许范围内行使自主权。政府部门要腾出手来,考虑整个经济方面的问题,考虑有关全局性的问题。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宁安县那个农机专业户当过机耕队长。他说,过去使用集体的拖拉机,看到某个零件磨损得够呛了,还是凑合着用。后来折价卖给他了,零件有点损坏,就急着赶快换好。拖拉机是自己所有的了,就希望它用得时间长一些。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可以启发我们考虑很多问题。任何一种经济形式,任何一种经营方式,都要使经营同物质利益密切结合,这样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在现阶段,考虑经营方式,不但要使之同全体人民的利益相结合,而且还要使之同本企业以至劳动者个人的利益相结合。我们过去搞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方向没有错。但是,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我们不仅在三大改造中发生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等毛病,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形式的理解也过于简单化了,似乎一种经济形式只能有一种经营方式,这就无法适应经济生活中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现在我们所说的搞活经济,除了调整所有制结构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在同一种所有制的范围之内,搞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现在究竟有多少样?还很难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

任制，有的是家庭承包制，有的是小组承包制，有的是专业承包制，有的是联合体承包制。家庭承包制、小组承包制、联合体承包制，其中也是多种多样。这个村跟那个村不一样，这个专业跟那个专业不一样，各有特点。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经营方式去适应各个地方、各种生产门类和经济条件的特点，所以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够充分调动起来。这种经营方式的不一样，是在同一种所有制下的差别性。还要考虑保持它的统一性。农村讲统、分、包，不只是分。统和分，中间经过包，结合起来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政企分开以后，企业自己独立经营，除了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极少数品种和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以外，国家主要是运用经济手段、经济立法和行政手段来实现国家计划，并保证企业沿着一个共同的方向进行活动。政企分开，不应当导致经营的结果偏离正确的方向。

从这里又可以看出，所有权和使用权，这中间既有分离的一面，也不能完全分开，绝对分开。至于哪些该分，哪些该管，管的程度有高有低，分的权有大有小，这些问题，都需要具体地、实际地进行研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所有权是所有制在法律上的体现。政企分开以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使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不成为一个空的东西，而是在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中得到实现。例如，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通过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生产，逐步改善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企业有了自主权，总应该想到经营的目的不该违反社

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遵循这样一个基本规律,企业该怎么办,国家该怎么办,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大家的经验比我丰富,一定会在调查研究 and 讨论中间取得好成果。

第三个问题,计划经济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关系。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最近国务院通过的企业扩大自主权的十条,允许企业完成任务之后,自销超额的产品。农村也好,城市也好,越往前走,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越要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发展以后,对计划经济会发生怎样的影响?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能够不能够统一?如何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早已原则上作出了回答。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的,而计划经济要采取多种多样手段,引导市场调节,使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得到健康发展。

好比说,我们现在是通过国家计划规定这个厂那个厂、这个部门那个部门生产多少什么样品种的产品,要达到什么规格和质量,还有成本、利润、税收等方面的要求。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因为允许自销,有的企业就任意扩大自销部分,影响国家计划任务的完成。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除了通过国家计划直接进行控制以外,还要采取一些经济手段来保证计划的实现。就拿刚才说的那个养牛专业户来讲,我们贷了款子给你,你需要按照贷款的条例交利息;我们平价供应你饲料,你就应当把你的牛奶卖给牛奶站。现在经济生活开放了,搞活了,需要越来越多地采取经济手段,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地发展。

第四个问题，个人物质利益和按劳分配。

这次到黑龙江参观，想起《哥达纲领批判》里的一段话，觉得很重要，希望大家结合我们的实际生活来加深理解。这里只说其中的两句话。一句是，社会主义社会即我们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那位姓王的农机专业户说，拖拉机成自己的了，零件稍有磨损，就尽快想办法换。过去一部拖拉机四个人，现在只要两个人就行了。过去，拖拉机使完了就往那里一扔，不考虑怎么样维护，现在就积极想办法维护得好一些。他的工作量比原来集体的机耕队增加了三倍。过去亏损，现在盈利，一年毛利一万多元。这就有一个马克思所说的“旧社会的痕迹”的问题。我们不能放松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教育，但是不要忘记，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的。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不顾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水平，强求一律，点滴不漏地“一大二公”，结果呢，跟我们的愿望相反。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都不能不考虑“旧社会的痕迹”，何况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在确定政策的时候，确定办法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因素。过去不承认这一点，结果就成为拖拉机站亏损的一个原因。这里联系到《哥达纲领批判》在谈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的另一句话，就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3】。人的智力有高有低，体力有强有弱，劳动技能和使用生产工具的本领有大有小，生产经验有多有少，这在劳动

者之间是千差万别的。像前面提到的王世成，不但有些本领，自己能开车、修车，而且还会经营。过去我们拖拉机站的工人入冬就没事干了。他不是这样。他还搞多种经营，开了一个油坊，秋翻地完了以后，还组织劳动力去榨油，榨完油，也该春耕了。他还准备搞一个农机具的维修站。这样的劳动者，同别的劳动者差别很大。他的本领大，能力强，给社会提供的劳动多，得到的报酬也应该多。本领小的，给社会提供的劳动少，从社会领到的东西也应该少。辽宁朝阳重机厂王亚忱同志讲，他们那里一位技术人员提出了一个什么设计，一年多收入了三十万，要奖他一千五百块钱，说服来说服去大家才勉强同意，而另外一位铸造车间的工人干活干得好，为厂里增加产值两万五千元，给他奖金一千多，大家没话说。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要真正以劳动作为分配的尺度，不容易。马克思讲，社会主义社会里头，只有以劳动作为分配尺度，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可是，劳动者之间有的本领大，有的本领小，因此有的提供劳动多，有的提供劳动少。我们要承认人们天赋的差别，承认一部分人的天然特权。马克思所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就包含承认劳动者的个人天赋的差别。

对于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过去从理论上理解得不够，实践上也没有完全解决。所谓“大锅饭”、“平均主义”，就是不问劳动多少好坏，都得同样的报酬，这一来他就不必去多学习生产经验，多学习劳动技能，多掌握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你承认这一条，就提高了他的积极性。今天差一点，

明天会好一点，后天就更好。

第五个问题，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项大政策，是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实行的一项大政策。中外合资企业，有社会主义成分，又有资本主义成分。但是，中外合资企业也罢，外商独资经营的企业也罢，都必须遵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接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管理。邓小平同志最近接见香港人士的时候说，大陆十亿人口搞社会主义，这不会变，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搞资本主义，比如香港、台湾。我们内地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外国来投资不就是搞资本主义吗？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补充。外资到深圳，深圳还是搞社会主义，允许一些资本主义进入，有些管理方式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这也是试验。深圳，主体是社会主义。所以深圳和香港不同。他又说，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这个已经见效了。中国采取开放政策，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我们要很好理解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

第六个问题，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没有经济做基础不行。建设精神文明，只讲虚的，不讲实的，不虚实结合，也建设不起来。在座的同志分工在精神文明建设这个领域工作。就从刚才同志们的发言来看，几乎每一项工作都涉及到经济问题。究竟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这中间有没有一种

经济关系，该怎么处理，我们现在已经有些经验。事业单位企业经营，这就涉及到经济问题了。人才开发，智力投资，有助于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做基础，也办不成。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智力投资在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还认识不够，买部机器，舍得出钱，要培养一个人才，总觉得效益不大，所以不乐意干。即使从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来说，这个问题也需要解决。

提出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只是提纲式的讲点意见，目的是给同志们出些题目，希望同志们分别按本行业的情况去接触一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再一边学习全会的文件，领会它的精神，结合我们的本职工作进一步进行调查研究，争取在今后的经济改革中间，使宣传文教战线的工作能够更好地跟上和适应中央的要求。

我在延边的会议上讲，我们这些年来各项工作取得成绩，归根到底，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于这条路线已经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这里想补充一点意见，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我们党历来提倡的群众路线是密不可分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如此反复循环，不断使我们的认识愈来愈正确，愈来愈完备，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里把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合乎我们的历史观，也合乎事实。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我们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正确，就在于坚持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又充分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总是不断地把群众的创造加以总结，加以提高，形成中央的决定，然后又到群众中间去检验，并且加以丰富，然后再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工作二十五条，提出扩大生产队自主权，反对瞎指挥和形式主义。那个时候生产责任制还只是肯定分段包工，没有开包产到户的口子。等到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就说三种地区即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当时设想的，是八亿人口中两亿人口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口子一开，不但这两亿人口搞起包产到户来了，八亿人都逐渐地搞起来了。这样一来，出现了大包干。一九八〇年农村工作座谈会，肯定了包产到户，肯定了大包干，说这也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原来虽然允许搞包产到户、大包干，但是入了“另册”，现在入了正册了。一九八二年一号文件肯定这种形式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要进一步推广。一九八三年又来一个一号文件。从这五次的文件来看，我们党决定农村政策的时候，不是从领导机关的愿望出发，而是充分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他们的经验加以集中，然后坚持下去，再经过提高并总结新经验，又坚持下去。所以，离开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贯彻不了，至少是贯彻不好。

现在，农村有了好的经验，城市改革也起步了。在城市

改革中,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要努力贯彻我们党历来提倡的群众路线。这中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充分尊重群众和基层干部的首创精神,悉心研究他们的经验,学习他们的经验,把他们的经验集中起来、提高起来,同时像中央所说的,要允许各地因时因事因地制宜。不能束缚群众的手脚,也不能用一个模式要求各个地方、各个企业、各个单位。这样,群众心情舒畅,基层干部也会感觉到事情好办。

注 释

- 【1】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57页。
- 【2】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 【3】 同上书,第12页。

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农村 经济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

今年六七月间,我趁参加两个全国性会议的机会,在福建、吉林、黑龙江三省做了一点农村调查,看到几个问题,写出来供中央同志参考。

一、兴办工副业,发展商品生产,是农村致富的关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经济政策逐步搞活,特别是普遍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现在,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部分农民开始富裕起来。但就整个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农民能够普遍富裕起来,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要求来看,靠单一的种植业或养殖业是困难的。许多地区的经验证明,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兴办乡镇工业(包括农副产品加工,轻纺工业和某些机电产品的来料、来样加工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才能逐步把城乡经济活动密切联系起来,解决农村剩余劳

力的就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使农民普遍富裕起来。

吉林省榆树县是全国有名的商品粮县,建国以来共向国家交售粮食一百六十亿斤,平均每年交售四点五七亿斤,贡献很大。但由于单纯抓粮食生产,收入不高,一九七八年全县人均收入只有一百二十四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发展多种经营,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办了一些乡镇工业,县城鞋厂的产品不仅供应许多大城市,而且大量出口。一九八三年工副业产值二点七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四(一九七八年为百分之八点四),人均收入达到四百元。

福建省晋江县陈埭公社是种双季稻的米粮仓,但五年前全县人均收入仅五十二元。现在,多种经营和工副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采取集体、个人或联营等多种形式,接受城市工商部门的来料和来样加工,兴办了五百四十三家工厂,建立了食品、五金、草织、皮革、塑料、建材等八大行业的商品生产网络,产品销售二十多个省市和欧美、非洲、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全公社出现了队队办工厂、家家生产忙的繁荣景象。一九八三年,全社工农业总产值七千一百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五倍,其中工副业产值四千二百零七万元,占百分之五十九点三;人均收入高达五百二十六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九倍。这个社还吸收了泉州、厦门、漳州三个市和附近五个县的一百多名青年来就业。

兴办乡镇工业,需要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指导和支援,

包括信息、技术和设备。看来，发展城乡联营或者把那些不宜再集中于城市发展的工业（如粮油和土特产品的加工，奶、蛋、禽、水果、蔬菜的加工，以及饲料工业、制糖、酿酒等），有计划地扩散到农村，势在必行。这不仅有助于扩大农村商品生产的范围，使乡镇经济更加繁荣，从根本上改变落后面貌，而且可以大大减轻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业集中带来的困难，也有助于城市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这是涉及到我国城乡工业合理布局的大问题，需要在政策上加以引导。

二、大力扶持和积极引导专业户发展

专业户是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骨干力量，也是广大农民走向富裕的先行者。扶持和引导他们的发展，做出好的榜样，可以带动广大农民。“一户带四邻、四邻带全村”。前面说到的陈埭公社，有二十六个大队，其中十六个大队通过“两带”发展成了不同行业的专业村。福建省龙海县九福公社长福大队，通过“两带”，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百花村”。全村八百一十一户人家，户户养花，去年卖花木的收入达一百四十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七。该县严溪头村二百三十五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八）从事竹木器生产，去年产值达八十多万元，占全村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五。

发展专业户，除了有关方面在信息、技术、设备和产供销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外，还需要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许多有远见的基层领导人，把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作

为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他们一方面积极支持农村中有文化技术的人找门路发展生产,带头致富;一方面教育专业户致富不忘集体、不忘乡邻,在建设农村精神文明上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帮助文明户和五好家庭广开生产门路,也发展成为专业户。没有这条思想保证,“一户带四邻,四邻带全村”的局面就难以形成,甚至出现专业户同广大农民之间的各种矛盾。吉林省榆树县红星乡已经做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专业户成为群众公认的文明户。福建省一些地区已经提出了“专业村一定要建成文明村”的要求。他们这些可贵的经验应当加以肯定,并加以宣传推广。

三、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机械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会不会影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这是许多同志一度担心过的问题。几年的实践证明,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对农业机械的要求更迫切了,农民说:“有了拖拉机,不用起早贪黑喂牲口,省心省力又省钱。”吉林省的农机由个人承包或联户经营后,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一点二倍,增加的部分都是农民自己出钱买的。现在农民要求购买农机的呼声很高,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要求。购买汽车和拖拉机,这是普遍的要求。在水稻产区,要求供应质量好的插秧机和收割机。东北地区,要求尽快解决耗能低的烘干设备。东北地区秋收时已进入霜期,粮食含水量大,不经烘干储存,容易霉烂变质。去年吉林省农民代国家储粮食三十多亿斤,因发生霉烂变质问题,农民代储粮食的积极性降低。

为适应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机械必须相应地有个大发展。各地都建有农机生产和修配厂，但技术比较落后，也不配套。因此，要求国家农机生产管理部门加强调查研究，引进新技术，组织生产不同地区需要的农、林、牧、副、渔各业的机械设备。“七五”计划中，应当把农村的这些需要考虑进去。

四、有关“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一个遗留问题

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顾实际，过急地要求全国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据说，当时搞了一批试点县，由国家贷款，买机械、建农机大院、搞修配站等，要求是全盘机械化，达到骡马不进地的程度。吉林省榆树县是试点县之一。该县在农机化上共投入一亿多元，许多设施和设备因经营管理不善，效益低，损失很大。现在，一些设施和设备已折价归户所有，而全县仍欠国家贷款五千多万元，只好按承包土地的数量均摊到户。这样，农民年年付息，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认为这是一笔冤枉债。省、县的领导同志也觉得对不住农民，要求国家豁免这笔贷款，或先挂账停息，待以后再行处理。

我觉得吉林省的要求是合理的。据了解，全国类似榆树县这样的贷款近四十亿元，其中三分之一可以收回，其他的只能作挂账停息或豁免的处理。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作出决定，早些出安民告示。

引导专业户成为文明户*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

不久前,我们去吉林省榆树县,红星乡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帮助专业户成为文明户、又帮助文明户成为专业户的经验。天津的做法叫做建设双文明户。他们通过这种办法,把两个文明建设落实到户。这是一个大创造,具有全国意义。

党的十二大讲得非常明确,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经过两年,各地出现了许多文明村、文明单位,甚至文明城市。建设文明村、文明单位、文明城市的工作怎么做,这个问题在苏州、三明召开的精神文明座谈会上已经得到解决。但在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如何落实到户,大家还在实践,在探索。红星乡提出专业户应当成为文明户,文明户要发展成专业户,不仅使两个文明一起抓落实到单位,落实到地区,而且落实到户。这个做法很可贵。

* 这是刊登在《半月谈》的一篇调查短文。

现在，农村的专业户不少，有的是家庭承包，有的是个体或联户经营。情况虽然不同，但在生产中都起了带头作用，走在前面，收入也大量增加。这些专业户大多数能够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勤劳致富，奉公守法。但是毋庸讳言，也有极少户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不讲文明。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我们教育和引导。

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又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专业户带头发展生产，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我们应当热情鼓励，积极支持。但不能讲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程度就自然而然地会相应提高。所以，只抓一个文明不行，要两个文明一起抓。

专业户要向文明户前进，既当物质文明建设的带头人，又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带头人。比如说，村民公约是大家订的，大家都要遵守，专业户也应遵守。专业户要讲职业道德，学习时事政策、科学文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传授技术，等等。这些要靠自觉自愿，也要教育、引导。

但是，要提请大家注意，我们要求专业户成为文明户，一定要防止向他们摊派，防止向他们揩油。不要一说这个问题，就要他们给邻居贷款，要他们捐献，从经济上打他们的主意。还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要求他们，要求他们在积极发展生产的同时，遵守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做到三兼顾，不断提高道德水平。

总之，专业户要发展，觉悟要提高。我们要保护和支持

他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同时要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农村两个文明建设落实到户，专业户要成为文明户，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做农村工作的同志还要帮助文明户和五好家庭向专业化生产前进。在农村，有些人可以是文明户，但不一定懂专业技术，奉公守法的不一定懂生财之道。应该分别不同对象，采取不同办法，按照当地条件，帮助他们向专业化生产前进。现在商品经济越来越发展，能办要办的事情愈来愈多。榆树县的同志跟我们说，在他们那里，只要一户种上一百棵葡萄，他的收入就大大增加。而种一百棵葡萄并不困难，技术也容易学，也容易管理，收入也容易增加。在农村，如果发展专业户时把文明户的工作加进去，同时帮助文明户向专业户转化，就能使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问题在农户中落实，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层皮”的问题在那个地方得到解决，政治与经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就会解决好。

农村有专业户，城市有个体工商户，对他们也要提倡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结合起来。

全国农村的专业户，如果大多数都成为文明户，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就会大大提高，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就能加速实现。

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 其他工作的关系*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文物保护法》，是个很好的法。它总结了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多年来文物保护的经验。这个法颁布两年了，执行是有成绩的。但是，也要承认，还有许多问题要进一步解决。破坏文物的情况，在一些地方还相当严重。有了法，怎么认真执行，使文物保护工作以及文物事业管理工作确有更大的进步，仍然需要很好地研究。文物保护工作同有关方面的工作究竟有些什么关系？这里想举出十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文物保护和文物维修。

这个问题，包括一件古董损坏了怎么维修，一座古塔倒了或者快要倒了怎么维修。今年春天到杭州，听到有的同志主张，把雷峰塔重新修起来。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赞成鲁迅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文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意见，倒了就倒了，何必再去修呢？从更大的范围说，北京就面临圆明园要不要重建的问题。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了，就维持现状，不要修复，留下这么一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破坏中国文物的见证，使现在的人以至后代认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认识清王朝的腐败，认识由此造成的我们民族的耻辱。另外一种意见，主张照原样修复，图是有的，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修复。当然主张修复，也有不同的意见。最近，听说由当地农民集资，准备恢复一部分。有同志认为，是不是先把地下的东西清理一下，再来恢复旧的建筑，使埋在地下的东西不至于受到损失。另外一种意见，地下埋藏的东西就不管了，把地面上清理清理，原来是个什么园，就搞成一个什么园，基本上按现在保存下来的旧图的样子恢复。所以，题目虽然讲的是文物保护和维修工作，但涉及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有的我们有经验，有的我们还没有经验。

第二，文物的保护和文物的使用或者叫利用。

这里包括的内容也很多。比如文物的展览。故宫博物院经常展览各种各样的古文物，各省、市、区也有这样一类的展览。这就涉及到博物馆的建设，博物馆的工作。这里还有国内文物的相互交换问题。我去年到甘肃、青海几个省。拿甘肃来讲，各种各样的彩陶非常多，堆不下，保管也发生困难。我向他们建议，是不是可以把其中重复太多的清理出来，送给每省的博物馆一套。其他省如果有多的东西，也清理出来同甘肃交换，同别的地方交换。如果更多，还可以送

给县一级的博物馆。文物的保护终究还是为了使用。应该让它发挥作用,而不是为保护而保护。我们和旧社会地主老财根本不同嘛。地主老财有了个宝贝,就传给子孙后代,谁也不让看。我们要利用文物,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进行科学研究,包括历史科学、自然科学,包括文学艺术的借鉴等等,使它为我们四化建设、为繁荣我们的科学文化做出贡献。我们的同志都是好心,文物也一定要保护好,但是该利用的不利用,忘记了保护文物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使用,是为了对我们的四化建设、科学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那就不全面了。

第三,文物保护和地下文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我们对文物的普查、勘探做了一部分工作,大量的工作没有做。究竟哪里有宝贝,有些什么宝贝,是不是心中完全有数?恐怕距离还很远。怎样组织考古调查;调查以后哪些着手发掘,哪些暂时不发掘;发掘要具备什么条件,不具备必要条件就暂时不发掘;发掘以后如何鉴定……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都同考古及文物的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家实际上干的是一件事,当然有不同的侧面。中国历史长,几千年来朝代更迭,有分有合,经过各种各样的反复、曲折,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每个朝代的東西都有保存下来的。地下文物,地面文物,上下几千年,极其丰富。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怎样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需要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四，文物保护和城乡建设。

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二者关系可以处理好，基本建设搞好了，文物也能保护下来。建国三十五年来，因为基本建设，破坏了一些文物，这是事实。但是总的说来，凡是引起重视并采取了必要措施的，随着基本建设的开展，使更多的文物发现出来了，保护下来了。我们已经提出，文物工作、基本建设要做到两利。这个要求反映了我们过去的实际。当然不是说，这个问题就已经完全解决。拿最近一两年的事实来看，平朔煤矿的建设同文物的保护工作都做得比较好。矿区勘探过程中，发现一两千座古墓，基本建设的领导单位很重视，没有造成破坏。现在搞出来的好的东西一万多件，次一等的更多。也有不好的例子。有个县城搞建设，事先知道地下有古墓，有文物。省里同志提醒，县里的搞文物管理工作的同志也提醒，希望在建设中能够保护文物。当时还提出，全国人大通过了《文物保护法》，一定要遵守。该县的一位负责同志说：这是你们的法，管不住我。党章规定，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干部，要在国家宪法、法律范围之内活动。这个观念，在这位同志头脑里，似乎没有地位。过去一个工程，拖个三年五年不算回事，现在基本建设搞投标承包，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资效果，是个好现象。这发生一个新问题。文物工作部门要同基本建设部门的同志好好商量，努力找到妥善的办法，一方面加快建设速度，一方面又能够使文物保护下来。

第五，占用的古迹、名胜（包括古建筑）保护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一些古迹、名胜、古建筑、文物保护单位，被别的单位占用。这方面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续解决了一大批，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如果占用单位有这方面的知识，采取了保护措施，问题还不大。如果拆的拆了，年久失修的任其倒塌，或者在它周围随便建设这个，建设那个，有的还不许文物单位和研究人员去考察，那么若干年以后，那里的文物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第六，文物保护和宗教寺院。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寺观划归宗教单位管理。这是就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来说的。一方面，划归宗教单位管理的寺观，落实宗教政策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另一方面，如今各方面都在改革，宗教单位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点改革。今年春天胡乔木同志去杭州，正好“观世音”过生日，看到那里到处一大把一大把烧香，搞不好会引起火灾。如果一定要烧香，是不是引导一下，烧三炷香够了，不要一大把一大把烧。宗教单位是不是提倡一下，宗教徒多来做一些公益事业，比如修桥补路，扶老携幼，以及搞点学问、搞点科学研究等等。把宗教徒吸引到这些方面，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条件，为四化建设作点贡献。历史上，宗教徒搞学问的不少，大学问家、大科学家有的是。福建有个自然保护区，解放前交通很困难，基督教徒、传教士到那里建教堂，其中有些人对那里的自然环境、植物、动物进行系统的考察、收集资料，有些还作了些研究。我们决不应禁止宗教，但是，确有一个

妥善引导的问题。这方面过去也有好的传统，只要工作得法，宗教徒中不少人可以为人们多做好事。

第七，文物保护和园林管理、建设。

这方面的关系，过去有处理得好的，也有处理得不好的。我们很多园林里，或多或少都有些文物、古代建筑，或文人墨客的遗迹。有这些东西，可以使园林增色，不仅使游客看到美好的自然环境，呼吸新鲜空气，而且从这里得到文化艺术的感染，精神的享受。文物和园林可以兼顾，也应该兼顾。

第八，文物保护同旅游。

这两件工作，应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我曾经大胆地说过这么一句话，外国旅游者到中国的一年比一年多，除了要同我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很可能大多数是对我们作为文化古国这么一种状况有兴趣。因为有兵马俑，希望到西安参观；因为有长城，希望来北京旅游；因为有敦煌，愿意往甘肃去；诸如此类。我们老祖宗留传下来的东西，还是有很大吸引力。我们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旅游局出了一部《旅游辞典》，说到三千多个地方，其中不少都有文物古迹。我们要吸引旅游者，开辟旅游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文物，因此要保护。但是，搞文物工作的同志也不要太担心，生怕旅游者来了之后，会破坏文物，因此只是想多关闭，少开放。旅游开展起来，不仅可以提高我们作为文明古国、文物大国的地位，而且可以增加收入，其中一部分可以用于文物的保护、维修。只要从全局考虑，办法得当，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双方要互相照顾，互相尊重。比如敦煌，的确是无价之宝。敦煌研究所的同志，担心人来人往过于拥挤，或者用强光拍摄照片，会损害壁画。这是有道理的。我们旅游部门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和他们合作，研究一种办法，使得既能很好地开展旅游，文物又保护下来了。敦煌准备建立几个人工的壁画窟，完全是临摹，泥塑、壁画都照原样。一般的旅客，到这里就行了。真正研究敦煌文化的学者专家，可以特殊优待，允许看原来的莫高窟。夏鼐同志说，法国拉斯科旧石器时代的壁画洞，便是采用这个办法。我觉得这个意见值得考虑。旅游开发起来以后，还有住房问题、交通问题、招待问题。美籍华人贝聿铭是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他建议，像故宫这样世界上少有的古代建筑群，它周围的新建筑，在设计、形式、高度上都要充分考虑到同故宫的协调。现在我们的旅游都采取包干办法，经过中旅社，对旅客一次收费。文物部门的同志提出，旅游者要看文物，但是旅游收入文物部门拿不到，维修就发生问题。旅游收入的分配上，是不是也要考虑文物部门的这一要求。

第九，文物保护和文物市场、文物出口，以及防止和打击文物盗窃和走私活动。

文物不是不能出口，而是什么东西能出口，如何出口的问题。在这方面，有关部门曾经有过一些规定，也还需要根据现在情况搞一些新的规定。规定要不断完善。但是，有了规定，就一定要执行。文物市场还有个怎么管理的问题，其中包括收购、保管、销售，也很复杂。比如荣宝斋、琉璃厂，

是个国内市场，中国人到那里买，外国人也到那里买。国内文物的流通，要杜绝特殊化。不能因为是高级干部或高级干部的子弟，就特殊照顾。这对我们的高级干部、高干子弟也是一种爱护。哪些可以上市，哪些不能上市，也要执行规定。流散文物，就是过去流散在民间的，你有这个，我有那个，相互之间转让，或者到荣宝斋卖出，或者到荣宝斋买进，这是指民间的，不是国家发掘的。像古钱，每个博物馆该有的都有了，多余的是堆在仓库里头好，还是拿出适当部分作为商品流通好？我个人意见，除了国家、地方和有关部门保留必要的数目以外，剩余部分清理出来出售，有利于保护。堆在那里，不去管它，即使有人管，也感觉反正很多，不经心，不如拿到市场上去卖。喜好这种东西的人，买回去，比你保管得好。这是一例嘛。也还有其他的。仓库里大量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有计划地清理，妥善处理。

公安部门、海关部门过去在防止和打击文物盗窃和走私的犯罪活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有很多经验。我认为应该结合新的情况，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第十，文物保护和文物事业的经营。

这两件事也是完全可以互相促进的。文物事业的经营搞好了，可以增加收入，用之于文物的保护工作，使文物保护得更好。国家每年拨给文物局这个口一笔文物事业经费。他们自己以及所属单位（不包括地方），通过经营，也可以有些收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家给的和自己经营所得再逐步增加，对于文物的保护，大有好处。可以做

的事情很多，在经营的门路、经营的方法、经营的品种各方面，要想出很多办法。比如出版，现在我们出了一套《中国美术全集》，不知道究竟是赚钱还是赔钱。我看了第二卷的样本，装潢、版面、取材都不错。这样的事情，有计划地搞下去，有什么不好呢？文物经营中还有一种情况，在有文物古迹的地方拍电影、电视，且不说强光的照射会损害文物，有的用在电影、电视上的不过几秒钟，但是实际上拍的要几十倍地多于这几个镜头。许多同志对这种情况深感忧虑。

第十一，文物管理工作中，中央和地方分权或者职责划分问题。

今天在座的都是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在文物问题上，有的地方非文物部门的同志和中央及一些地方文物部门的同志矛盾相当尖锐，虽然《文物保护法》有规定，但是还不够明确。大家摆摆，看究竟有些什么争论，有些什么矛盾，怎么解决好，这里有一个放权问题，也有一个抓紧问题。究竟放些什么权，放了以后，我们该管什么，中央部门又怎样依照《文物保护法》及有关细则抓紧管理？

第十二，文物保护和涉外关系。

拿一些文物出国展览，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文物的交换，要认真考虑。哪一级文物出国展览，哪一级文物不能出，出国展览怎么样签订合同，怎么样保护展览文物。有些外国人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要同中国合作来保护我们的文物。这种态度应该欢迎，但是所谓共同保护、共同整理、共同使用，就要非常慎重。有些事情，也不能搞得太死，一律

拒绝。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好？一个原则性的意见是：规定范围，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吸收一点资金，吸收一点技术，吸收有益的经验，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文物。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答应些什么，才不会有损失，要仔细研究。

周总理过去对文物的出口、文物的出国展览管理得很严格。适应新的形势，周总理说了的，也还是可以改变。但是，学习总理对这个问题的严肃的慎重的态度，这是必要的。这种问题，确实不能粗心大意。在这方面，过去我们有成功经验，也有不成功经验。要把这些问题全面地研究一下，分析一下，在原有基础上使工作做得更好。

列举了十二个方面的关系，可能还有没想到的。

这些方面的关系，实际上也是矛盾、问题。要保护文物，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不少。这是我们工作中间的一个困难。矛盾少，烦恼也少。现在对外开放，国内到处在建设，也出现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这是前进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前进中的烦恼，我看值得高兴。只要我们把这些矛盾都找出来，如实地把情况搞清楚，在这个基础上寻找解决的正确方法，各方面的事业可以进一步发展，也会更有利于文物事业的发展。

我们应该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眼界要更宽一点，思想要更解放一点。不是孤立地谈文物保护，不是单纯的守摊子思想。在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中，摆正文物保护工作的位置，处理好各种关系，建设事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文物也能更好地得到保护。那么，各种事业同文物管理事业之间的

矛盾要解决,有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原则,或者说总的要求呢?恐怕还是应该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文物的保护工作、文物事业的管理工作。稍有经验的人都懂得,文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不能像新产品那样,可以一次、两次、几十次、几百次地进行试制;试制不成,无非是重来,只要最后成功了,就可以投入市场。文物这种东西,稍一不慎,粗枝大叶,就可能受到损失,而这种损失有时是很难甚至无法弥补的。破坏了敦煌原有的壁画,即使补上,其价值也要大为下降。这是个前提,文物不保护,还有什么文物经营?只有保护了,才有经营。文物保护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因为文物珍贵,就采取消极保护的办 法,不论什么东西,谁也不许动,谁也不许看,谁也不许知道,这也不利于文物的保护。总之,在文物的保护上,两种片面性都要避免。

学习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 研究改进宣传工作*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

这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主要是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会前，到会的同志分别在所在地区、所在单位学了一段。那一段的学习，是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就文件学文件。

在这一段的学习中，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多多少少都可以从《决定》中看到自己几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假如把《决定》比作一个汹涌澎湃、广阔深邃的大海，它确实汇集了全党同志、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中每个个体创造性劳动的点滴水珠或细小溪流。大家都认为《决定》顺乎潮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流、合乎民心，读后感到振奋、感到鼓舞。

二

我们这次学习了几位中央常委同志的讲话。他们的讲话，谈的都是全局、大局问题。我们又听了国家机关几个重要部门负责人同志的讲话，谈的是这些重要部门或者说重要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了全局，能够从全局的观点来看局部。了解了局部，又能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全局。

经过学习，我们对现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经济体制的历史变化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从过去走到现在的大致过程。

胡乔木同志的讲话，回顾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说明这个《决定》是如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在理论上突破了哪些传统观念、固定观念，使马克思主义得到重大发展。会上听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介绍，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重要科学论断的理解更清楚些了。

同志们说，这次学习会，时间不长，收获不小，同前一段学习比，认识加深了、提高了。

三

同志们又说，对这次学习的收获，不要估计太高。要达

到认真学习、深刻了解、准确掌握的要求，还有待于今后更大的努力。严格说来，学习还只是开始。

这里提出几个问题，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1. 这个《决定》同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一些重大方针、政治原则、思想原则的关系。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定》对经济体制要进行全面改革，有系统地又分别地作出许多规定。这是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丰富和发展。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不正是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吗？《决定》根据政企适当分开的原则，规定了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规定了在服从国家计划和管理的前提下赋予企业的各项自主权。这一方面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又是对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次深刻改革，有利于国家民主生活的发展，有利于法制建设的健全。这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丰富和发展。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突破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我国现状，制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这是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条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丰富和发展。《决定》指出的“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这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不正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吗?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工,改革党、国家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制度,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因此也就能够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对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党中央运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制定了切合我国实际的经济体制改革整套方针,显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伟大生命力。《决定》的执行,各种具体制度的改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起来,必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进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阶段。共产主义思想是更灵了,还是不那么灵?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答案都只能是肯定的。

《决定》有力地批判了平均主义,强调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制度。我们在这方面还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中普遍实行的分配制度。它是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解决社会主义阶段全社会劳动者之间分配问题所遵循的原则或确定的制度。在现阶段,如果不坚持按劳分配,或者把平均主义误认为是社会主义,那就违背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我们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同时也要看到,不能把按劳分配这种社会主义阶段所实行的社会政策,等同于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在坚决实行这一制度的同时,还要在共产党员、先进分子中,提倡用共产主义态

度对待劳动、对待工作。这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制度，而决不会妨碍贯彻执行这一制度。以此为例，怎样更好地理解各种现行政策，都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讨论。

《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

2.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决定》中有一段话：“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做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2】

把这段话归结成为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经济。按道理说，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不论商品生产或者商品交换，都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

可是，实际生活里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中、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于这种严重经济犯罪分子或者新的剥削分子，我们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给予法律制裁。这个事实并不能改变全

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实际生活还有另一方面,除了上述两种经济形式外,还有个体经济、私人经济、中外合资、外方独资这些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经济形式,而且这些经济形式将来还会有所发展。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已经有名副其实的资本家参加到我们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来了。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3. 公有制经济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

《决定》指出,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力量,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私人经济,以及吸收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都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实际生活中,这些经济形式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的过渡的经济形式。比如吸收外来资金,有同全民所有制合作经营的,有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营的,也有同个人合作经营的。这些经济形式,有共同的经济规律,也有各自的经济规律。这些经济规律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其中有些规律起着主导作用或支配作用。

《决定》提到的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物质利益规律,按劳分配规律,价值规律,再生产规律,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生产都要共同遵守的规律,等等。这些规律中,我们讨论比较多的是价值规律,对其他规律很少讨论。

今后进一步学习，不但要研究各种规律，而且要研究各种规律怎么样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怎么样共同起作用，哪些规律起主导作用、支配作用，如何起作用。

研究任何一种规律，都需要同其他规律联系起来，才能研究清楚。比如，我们党政机关及企业、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要实行改革，首先就要研究按劳分配规律，又必须联系到研究价值规律。要使工资的增长、价格的调整安排得合理，又势必要考虑到消费和积累的关系，研究有计划按比例规律。还要考虑，工资的增长、价格的调整、消费的比重都要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积累的增加，都要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合理的关系。这又不能不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4. 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够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决定》的学习，要同“七五”计划建设方针的学习结合起来。

5. 正确地对待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

《决定》中有一段话：“对于锐意改革的干部和群众，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于在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除了严重违法乱纪者必须依法处理外，都要采取疏导的方针，批评教育帮助的方针，而不要戴政治帽子。改革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和不同理论观点，可以展开讨论。不要在干部和群众中分什么‘改革派’、‘保守派’，要相信思想一时跟不上形

势的同志会在改革的实践中提高认识。”【3】

我们对这段话的理解和讨论也很不深。在《决定》里，为什么不提在改革过程中防“左”反“左”或防右反右，或者什么为主，什么为次，这里包含什么意思，应该怎么理解？

“保守”两个字，按本来的含义，是指思想落后于实际，跟不上形势发展。逻辑地说，这应该是右的，实际生活中也确有这种情况。同时，也存在拘泥于过去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固定观念，受“左”的思想束缚很深，对改革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说这是“左”，也符合实际。

传统观念、固定观念，如果加以具体分析，有的是“左”，有的是右，有的既说不上“左”，也说不上右。

改革过程中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以至倾向问题。我们还是应当按照中央的方针，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千万不要一刀切。

上面说到五个方面，这次学习中或者接触很少，或者没有接触。即使讨论得比较多的，也还需要继续学习。这些都只是就我们这次会议的情况来说的。总之，学习的任务还很重。我们还要继续认真学习，对《决定》的精神实质求得一个总体、全局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然后再来回答一些具体问题，回答干部和群众中的一些实际存在的思想问题，就比较容易了。

四

《决定》是我们实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各项“施工方案”，党中央、国务院正在研究、制订之中。这就给了我们时间，给了我们条件，使我们能够在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分别组织干部学习决定。赞成同志们的意见，干部的学习要分个层次。主要领导干部、中层干部、一般干部中，应有不同要求，有不同方法。学习不要搞突击，进度安排得从容一点。

建议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做思想工作的同志，要采取适当方法，力求学得更多、更好、更深一些。

以后，每个“施工方案”，每个统一部署，在党中央、国务院下达后，除了学习这些具体方针外，也要结合起来重新学习整个《决定》。这样一步一步学，一步一步做，就能够保证每个步骤的实施以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都沿着《决定》的总方向顺利地向前发展。

五

《决定》指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总的说来还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广大干部不是都很熟悉，这就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保持清醒头脑，进行精心指导。”【4】

今后进行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从领导思想来说,要经常注意处理好下面几种关系:

1. 服从大局、顾全大局。

小平同志今年国庆讲话时说:“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5】

小平同志今年十一月一日在军委座谈会讲话时又说:“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6】

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上讲的是军队,实际上也是讲各条战线。宣传战线、思想战线理所当然地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服从大局,照顾大局,在大局下面行动。

实际生活中会有只看局部不看全局、突出局部损害全局的问题。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就一定要改变过来。

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宣传工作、思想工作,要引导和说服人们兼顾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

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7】十二大根据这个总任务，又确定了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要为这个总任务、总目标而奋斗。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怎么样为这个总任务、总目标奋斗，怎么样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结合各自实际情况，确定措施、方法，不能简单地照搬照转。

2. 改革工作要与整党密切结合。

我们的宣传工作、思想工作，要有助于改革和整党互相促进。要经过整党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陈云同志说：“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8】

《决定》指出，“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9】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弱肉强食根本不同，但是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决定》又指出，“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克服一切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就越要加强党风党纪的建设，维护和健全党内健康的、正确的政治生活。”【10】

这说明，《决定》继续坚持了十二大提出的，“从思想上

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11】过去的有关规定，要继续执行。党中央、国务院还将陆续作出新的规定，也要贯彻执行。发现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等问题成堆了再去解决。

3. 理论工作者要密切联系实际，实际工作者要重视理论。

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理论，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也要好好学习。大家共同克服理论和实际联系不够甚至脱节的毛病，更好地贯彻执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小平同志最近和外国友人谈话时指出：“实事求是毛主席坚持的思想路线。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把它继承下来了。中国遵循这一原则解决自己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且已经见效。”【12】“我们也意识到，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但这影响不了大局，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13】

六

我们宣传战线同志的思想工作同经济建设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要改变为相适应。要在改革中处理好上面

说到的各种关系，首先应该解决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就是改革需要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能够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改革是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冲击”。如果“冲击”的是那些不适应实际情况的思想和办法，没有什么不好，这种“冲击”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一种解放。对党、国家和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体制进行改革，使党的组织从包揽一切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时间和精力对行政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监督和保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对人民团体的领导，这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和加强。

有同志提出，今后思想工作的任务、作用、地位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讲话，已经作出了正确回答，现在和今后仍然适用。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学习一下这篇讲话。

耀邦同志讲话中引证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著名论断：“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14】

这段话实际上讲了四个方面的关系。“革新军制”，现在

说就是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现代化的技术条件”，现在说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战术”，现在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进步的政治精神”，“进步的政治工作”，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完成各项任务时都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改革各项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人去做。而人都有思想。人的思想不好，前面三条很难发挥应有的效力。人的思想好了，这些方面就能够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既讲清楚了思想政治工作同改革各项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相互关系，讲了路线、方针、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讲清楚了思想政治工作本身的地位、任务、内容和作用。

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是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是适用于各项工作的普遍原理，对经济工作同样管用。过去管用，现在管用，将来也管用。当然，进步的政治精神，进步的政治工作，具体内容和具体做法，都要适应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任务而有所变化，有所发展。

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对于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作了全面的准确的阐述：“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的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是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

织纪律观念，是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我们全党和全社会的先进分子，一定要不断地传播先进思想，在实际行动中发挥模范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15】“我们不仅要努力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而且要在全社会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这就是国内各民族之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干部群众之间、军民军政之间以至全体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友爱互助、共同奋斗、共同前进的关系。”【16】

特别要强调的是，上述内容要结合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方面、不同对象的情况，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决定具体的思想内容和工作方法。内容要有针对性，形式要有多样性。说理的东西要有吸引力，形象的东西要有感染力。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一般寓于特殊之中。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经常记住这个道理，切实按照这个道理办事。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毛病，就是脱离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对象，不了解人家想的是什么，不了解人家那里发生了什么问题，只是照本宣科。不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了解具体情况怎么样，需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因此就发生了“两张皮”的现象。不会对症下药、量体裁衣、看菜下饭、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即使你讲的道理正确无比，人家也不爱听、听不进。

七

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实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是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各条战线都要服从于这个大局，服务于这个大局。宣传战线、思想战线很长，部门很多，都要按照这个大局的要求，端正各自的业务指导思想。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业务，宣传、反映经济建设，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那么，从宣传部门来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侧重点呢？这个侧重点，是不是可以说是研究各种经济关系呢？

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要全面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也可以说要全面调整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如果不了解、不熟悉、不研究各种经济关系和各种物质利益关系，我们怎么能够正确地宣传和反映这些关系呢？怎么能够使我们的宣传工作、思想工作很好地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呢？

研究各种经济关系，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很短时间可以做好的工作。如果我们经过认真学习，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了全面的准确的了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研究每一个步骤所涉及的经济关系要怎么调整，研究这种步骤本身要引起的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及有关的经济关系的变化，看清这个步骤在整个改革中的地位，由此一步一步地研究下去，那就可能使我们对经济关系及

其变化的了解一步一步深入，从而使宣传工作、思想工作一步一步地得到改进和加强。

每一种经济关系的调整，每一方面物质利益的调整，一定会在有关的群众中引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反映，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经济关系的同时，要了解和掌握有关的思想动向，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宣传工作、思想工作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都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曾经建议，宣传战线的各部门，要同自己业务有关的单位和典型建立经常的联系，经常到那里做调查，深入了解那里的全面情况。我们要把这种调查研究的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同时，还要进行另一种调查研究工作，这就是，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各项政策，上级部署了各项工作之后，在认真学习这些政策、部署的同时，要抽出一部分人，到基层去，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就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包括开调查会。调查研究，要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掌握了各方面的情况和材料以后，再来研究怎样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上级的政策和部署，就好办多了。

本部门办任何一件重要的事，在作出决定以前，先要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情况不清楚，还没有把握的问题，决不要匆忙决定。调查清楚了再作决定，即使时间拖长一点，也可以。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作了决定，付之实施以后，还要继续调查研究，看执行的情况怎么样。有些同志批评中宣部这几年布置的工作很多，不少没有落实。我们接受这个

批评,力求改正这一缺点。也要说明,布置的工作合理地减少了,落实的问题也不能由中宣部全部承担。中宣部应该承担的是什么呢?就是布置工作前要调查研究,布置后还要调查研究,看看是对的还是错的,有什么缺点需要纠正,发现执行得好的典型和执行得不好的典型,介绍或推广好的典型经验,帮助执行不好的地方总结教训,用适当方式提请大家注意。这类工作,我们过去做了一些,做得很不够。今后要认真改正这个重大毛病。

调查研究应该占有一切能够占有的材料。这些材料要经过核实,准确无误。掌握了丰富的材料,还有一个分析研究、综合整理的问题。这就需要科学方法,需要基础理论。因此,宣传工作干部、思想工作干部都有学习理论的共同任务。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要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7】。我们一定要下狠心,学会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

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宣传党的政策,侧重抓住这三件事,对改变宣传工作同经济建设形势不相适应的状况,是不是可以起到比较大的作用,请大家考虑、研究。

八

明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前，逐步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方案，已经知道的有：进一步完善农村改革的文件，党政工作人员工资改革方案，改革物价体系的初步方案，科技体制改革方案，教育体制改革方案。这些方案先后付之实施以后，我们都要承担宣传的任务。

宣传部门业务范围内的工作：

文代会的召开。

新闻工作会议的召开。

文明礼貌月活动按期举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继续开展。一切行之有效的宣传活动，如表彰英雄人物、英雄集体、先进人物、先进集体的活动，振兴中华读书活动，职工双补以及系统灌输、定期轮训，等等，要适应形势继续加以坚持、改善。

这里要说一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是分层次的，也是相通的。前些日子胡耀邦同志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见，说对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士兵、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应当长期以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为中心，并且要有一定的形式。这件事，共青团要用心抓，工会、妇联、教育部和党委各级宣传部门都要抓。去年七月，根据胡乔木同志建议的向人民、向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先从爱国主义入手的意见，中宣部

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发出了《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抓这件事，效果是好的，要坚持下去。

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优良传统、历史人物、文化遗产、文物古迹，名胜风光等。最近小平同志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外籍华人谈话说，在旧社会，黄皮肤的中国人被人家看不起，成为世界上的二等公民、三等公民。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是靠蒋介石统治旧中国的二十二年，也不是靠台湾，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次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再次写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爱国主义教育就很自然地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联系起来、贯通起来了。

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同样很丰富，可以包括中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切从事反压迫、反侵略斗争的历代先进人物的事迹。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铭刻着：“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林觉民的遗书，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狱中绝笔》，秋瑾的革命诗词，至今读来，令人感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夏明翰同志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周文雍同志和陈铁军同志的刑场婚礼，多少同志在敌人刑场上高唱《国际歌》，在火线上冲上去把敌人压倒。正是成千上万共产党人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先进分

子，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作出了最大牺牲的。他们用鲜血和头颅筑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实的基础，为苦难的中国开辟了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此外，同志们都提出宣传队伍的建设问题，包括干部培训、使用、选拔、待遇问题等等。请同志们分别做点调查，做些准备，提供点方案。中宣部也要分出一部分力量，从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在适当的时间召开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会议。

总之，我们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开创宣传工作的新局面。

注 释

- 【1】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350页。
- 【2】 同上书，第350页。
- 【3】 同上书，第367页。
- 【4】 同上书，第365—366页。
- 【5】 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 【6】 邓小平：《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 【7】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 【8】 陈云：《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 【9】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页。
- 【10】 同上书，第366页。
- 【11】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 【12】 邓小平：《中国遵循实事求是原则解决错综复杂问题》。《人民日报》1984年9月9日第1版。
- 【13】 邓小平：《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 【14】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 【15】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
- 【16】 同上书，第251—252页。
- 【17】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当前宣传工作中要注意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日)

最近一个时期，中央常委同志连续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讲话。这些讲话的精神，对宣传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三月七日在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重新强调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重新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小平同志的讲话，是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根本上澄清了某些混乱，统一了思想。这以后，小平同志在同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的谈话中再次讲了这个意思。在小平同志两次讲话之前，出了他的一本书，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的这本书和三月七日的讲话，已经规定为第二期整党的学习文件。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四川省宣传文教系统干部会上的讲话。

胡耀邦同志二月八日就党的新闻工作发表了讲话，在中央书记处听取文化部汇报的时候还讲了一篇话，要点是要使我们的文化工作者，特别是我们的作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同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挂起钩来，同时代精神挂起钩来，反映蓬蓬勃勃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四月十一日下午，耀邦同志集中就文艺工作问题讲了一篇话，对文艺工作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都作了回答，这对于统一文艺工作中的不同认识有重要的作用。

这里，想谈谈我在学习中的一点心得，和同志们一起讨论。

一、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一个民族总要有精神支柱。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首先要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这一年多来，我们有些报纸宣传的、提倡的，什么能挣会花、吃喝玩乐、玩也是生产等等，同这种精神是相反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是非常宏伟的，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可是，这些成绩同我们本世纪末所要实现的任务来比，距离还很大很大。关于我们的总任务、总目标，党的十二大有规范的提法。经济建设是中心，要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但中心还不是全部。十二大报告有一章专门讲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有一章专门讲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法制建设。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小平同志讲，本世纪

末只是第一步,下个世纪还要奋斗五十年,才能使我们十二大规定的总任务完满实现,经济上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六年多来,我国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发展方面成绩是最突出的,八亿农民非常满意。六年多来,四川省农民的平均收入增加一倍以上。全国大体上也是这个状况。但是,这个成绩同我们本世纪末的目标以至于下个世纪接近世界水平的目标来比,可以说低得很。去年全国农民平均收入三百五十五元。一年三百多元,一月才三十多元,一天才一块钱。这算个什么水平!目前我国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同世界水平比差距大,同国内先进社队比差距也很大。我看了一些先进社队,有名的山东牟平县西关大队,每年从纯收入中分给农民的部分控制在人均一千元以内,其余用来扩大再生产,用来搞集体福利。其中福利一项,包括每年建设一批两层楼的住宅,每户使用面积八十多平方米。我参观了几户农民家庭,家具比较好,电气化程度比较高。中国农民普遍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就可以算是普遍富裕了。按这个标准,农民一年全家的收入大概总要八九千元甚至更多。现在三百五十多元,一家五口也不过一千五百元,还有六倍的距离。这样的水平,没有理由陶醉,没有理由骄傲,没有理由停步。

现在到处反映,中小学教师的住房困难极了。《人到中年》这部电影,尽管不能说尽善尽美,但确实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中青年知识分子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困难的生

活条件。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居民如果能够人均七平方米，四口之家有三十平方米的使用面积，有卫生设备，就很好了。北京经过这些年来的建设，也才达到人均四平方米。要使职工和教师住房比现在平均增加一倍，仅此一项，我看“七五”期间完不成，“八五”期间也很难完成，一九九五年能够实现，就很理想了。

教育体制改革决定的稿子，听说大家最满意的是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城市比较容易做到，农村可不容易啊！不讲别的，师资哪里来？师资凑数都不容易，够水平更不容易。理想的师资，按我们现在的要求，教小学的应是中师毕业，教初中的应是大专毕业，教高中的应是大学本科毕业。能按这样的规格，真正实现名副其实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在本世纪末也不容易。一县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这个要求不算高。听说四川省现在还差一半。

对待社会主义建设，我认为四川同志讲的“实事求是、稳步前进”这八个字非常重要。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有步骤地进行。用这种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建设，就要求我们艰苦奋斗十几年、几十年。我们做各种事情都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一年多来，一些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给人家一个印象，好像中国进入“福利社会”了，万元户多得很，放开手脚穿好的、吃好的，痛痛快快地玩吧，尽情享受吧。这怎么能同我们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相适应呢？宣传报道用这个办法、那个办法来吊大家的胃口，吊得胃口大大的，可是拿来供应每个

人的东西却不多。这样的宣传，的确脱离群众，脱离国情。有的还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说成是旧观念，把为人民做出牺牲说成是旧观念。我们经常讲，要宣传按劳分配，同时提倡用共产主义态度来对待劳动，对待工作。最近我看到一个同志的文章，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提倡共产主义劳动违反马克思的原理，违反中国社会的实际，站不住。我不赞成这样的观点。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千成万的劳动者正在从事不计报酬、不计定额的劳动。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到处都有。情愿个人眼前做出点牺牲，也要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国家和人民，来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倡的精神素质。人民的生活，干部的生活，要随着生产的增长逐步有所改善，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决不能脱离生产发展追求生活的改善。老一辈的人为了我们现在的人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们今天活着的人，享受了他们用终生奋斗和牺牲换来的幸福的人，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把他们艰苦奋斗精神指责为“旧观念”。否定和抛弃这些所谓“旧观念”，再去搞一套同这种精神状态、精神境界、精神素质相反的什么“新观念”、什么“能挣会花”、“吃喝玩乐”，人民是不会赞成的。

提倡什么样的精神状态、精神境界、精神素质，宣传部门很值得从前一段的工作中吸取教训。我们不但在目前，而且在将来，都要积极地、有说服力地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为国为民，识大体，顾大局，必要的自我牺牲。这样一种精神，在各种问题的处理中，都要坚持下去，提倡下去。

耀邦同志提出重唱向困难进军的歌。不只是歌曲，小说、戏剧、电影、散文、诗歌、美术，都应该贯彻这个精神。教育、出版、新闻、广播电视也应该贯彻这个精神。有理想、有纪律，其中就包含必要时候的自我牺牲。没有一点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我看很难遵守纪律。理想不经过奋斗能够实现吗？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我们根据现实的情况，找到了现实的力量，用现实的办法来实现伟大的理想。现实还不允许我们一味享福，而是要求我们继续艰苦奋斗。这个道理，只要把我们眼前取得的成绩和我们将要实现的目标来比较一下，大家都是可以想得通的。

耀邦同志讲要号召青年向困难进军、向科学进军。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这不单是对青年，对我们各条战线的同志都有意义。向困难进军，向科学进军，这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是一致的，是符合四化建设的要求的。

二、研究商品经济关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商品经济本身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有的解决了，更多的还要继续探讨。我们在思想战线工作的同志要关心这些问题。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我们要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现在常说的商品经济，包含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也包括个体经济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还包括中外合资经营或外国独资经营的商品经济。后两种经济成分，是国家政策允许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此外，还有非法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

活动。这里面有全民所有制中、集体所有制中某些不太安分守己的人以权谋私，也还有中外合资经营中的外方以及独资经营的某些人，超出我国法律规定范围进行的商品经济活动。两年来，我们国内市场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我们希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法律范围之内私有制的商品经济和中外合资或外国独资经营的商品经济也得到发展。目前，所有这些都还发展得远远不够。另一方面，非法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活动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很值得继续认真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调查研究。我只想说，这样一种情况，给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也可以说我们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一种“挑战”。我们要坚持党中央、国务院所规定的政策，促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在继续前进中使我们的政策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又不要使商品经济关系中某些消极因素侵蚀我们的党和人民，侵蚀我们的干部队伍。社会生活非常复杂，不能说你是搞商品经济的，我是搞思想政治工作的，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生活不是这样。法律、政策允许的，我们要宣传；不允许的，我们也要研究，非法的应加以抵制。消极因素的侵蚀在一段时间里是越来越严重，淫秽录像带是一个例子，各种低级趣味的书刊泛滥又是一个例子。许多同志反映，我们队伍内部也发生互相挖人才的现象。人才的合理流动是完全必要的。有的地方是不合理流动，比如乱挖中小学教师，使得一些学校无法开课，严重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中央已经说了，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发生，要制止。归纳起来，就是“一切向钱

看”的坏风气确实已经侵入我们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侵入到党内政治生活。有商品就要有货币，商品流通就要进行货币交换。老祖宗说过，到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既不要商品，也不要货币。事实证明，这种设想不符合实际。可是能否做到商品经济又发展，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不至于变成单纯的金钱关系，党内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不至于受到金钱关系的侵蚀呢？昨天一位同志讲，我们的银行本来是国家进行宏观控制的一个有力的经济杠杆，可是银行得到上面的信息，就有人捅给什么企业、个体户了：“你注意哟，现在有新的精神来了。”原因是什么？就是后者和银行的某些工作人员有一种默契，默契下面掩盖着金钱关系，可以彼此得到好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与这样一种金钱关系是分不开的。要做到商品经济大发展，而党内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又不受到侵蚀，这是很不容易的。这里不但要有各种政策的规定，各种界限的划分，而且要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我们要表扬那些做得好的同志。各条战线、各个地方、各个单位都有很多同志能够抵制金钱关系的侵蚀，像毛主席说过的那样：坚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在我们宣传队伍里，在我们其他各条战线上比比皆是。我们要发现这样的人，总结他们的经验，从这里研究出一些道理来。他们为什么能抵制住侵蚀，能把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坚持下来，

而另外的人却同他们相反,在金钱面前打了败仗?陈云同志看了一份新华社内部材料,讲上海有三个工厂的厂长,在去年那种不正之风中,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中,能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陈云同志指示,要经过核对,向全国报道。他由此提出,新闻报道、广播电视和我们的整个宣传工作,都应该大力提倡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这样的典型。中宣部已经把陈云同志这个指示通报各地和有关部门。我们要用这样的事实,来反驳那种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张现在不宜提倡共产主义劳动,不宜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观点。

物质利益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同唯利是图不能同日而语。它包含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物质利益关系,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的物质利益关系。一切向钱看,同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我们还要继续贯彻。几个“大锅饭”还没有完全解决,平均主义还没有完全克服,还有待于我们去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不能同按劳分配原则划等号。胡乔木同志曾经多次说过这个意见。他说,看到一个人要淹死了,我们的模范人物跳到水里把这个人救起来,没听说他要求人家给多少报酬。前几年发生过一场争论:大学生张华救活了一个老农民,自己却牺牲了,这到底值不值得?张华以后,有华山抢险英雄集体的出现,对上述争论进行了很好的回答。按劳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必须遵

守、必须执行、必须贯彻的原则。但是，如果把这个分配原则等同于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那就取消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实行按劳分配，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必要条件和步骤。共产党人不能眼睛只盯着按劳分配而驻步不前。这方面，还有很多思想政治工作要做。解决与此有关的各种思想问题，不能回到“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

我们希望在研究经济关系时，注意新的经济关系的出现，以及在人们思想上引起的变化、发生的影响；研究哪些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哪些是我们应该抵制的。这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要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建立密切的关系，取长补短，共同研究。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了解各种实际存在的思想问题。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也要常常向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请教，问问他们对遇到的思想问题该怎样回答好。否则，乱讲一通，搞得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结果还是老调重弹，与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人家听起来不顺耳，不合潮流。

三、如何看待自由的问题

在全国第四次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致了祝辞。其中说道：“对于创作自由来说，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这对两方面都提出了要求。一方面，党和国家要为作家创造必要的条件、环境、气氛。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就包含着创作自由。对于党员作家来

说，党章、党的政治生活准则所规定的党员的权利，也包含着创作自由的权利。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着不是积极为作家充分享受其应有的创作自由而创造必要的条件、环境、气氛的情形。一些地方甚至妨碍这种自由的实现，甚至还在横加干涉，或者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用粗暴的、简单化的办法对待作家，对待艺术创作这种细致的、有其特殊规律的精神劳动。要彻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另一方面，祝辞也要求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自由环境相合拍。这也就是说，要同宪法合拍，对党员作家来说，要同党章合拍，要保证宪法、党章有关规定的实施。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和日益繁荣，无论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还是作家，都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这个祝辞两方面都讲了，讲得很全面，需要我们正确地理解。在一些地区、一些单位、一些同志那里出现了一些同刚才所说的精神不相符合的议论。有的同志担心，提倡创作自由，是不是就不要党的领导了呢？这些同志在党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上，认识是简单化的。还有另外一些方面的议论，比如讲，这次作协的会所以是划时代的，就是因为党中央提出了没有前提的创作自由。有的说这次会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有的还进而片面地宣传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表演自由。理论界则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只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甚至讲马克思主义只是真理长河中的若干绝对真理的颗粒，由此提出学术自由，理论自由。

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同志在二月八日的讲话中说,祝辞说的创作自由是什么意思呢?作家怎么想,怎么写,你能够禁止?可是写出来后,交给出版社,交给报刊编辑部,人家可以出版、发表,也可以不出版、不发表嘛。党的新闻工作同文艺创作应该有区别,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言。新华社有一个好的作风,他们在内部,对任何问题都可以充分自由地、民主地展开讨论,但是见之于公开的新闻报道,则必须忠实地反映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声音,不允许利用党给予自己的工作权利来公开宣传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和精神相违背的东西。因为经验、水平不够,他们也传播了一些不应该传播的消息。但总的来说,新华社对待新闻事业的态度和工作作风,是符合党的要求的。

小平同志在三月七日的讲话中说,自由和纪律是对立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这对所谓没有前提的创作自由的提法,是一个正面的回答。我建议做宣传工作的同志研究一下目前在自由问题上的一些议论,重新学习和加深领会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我们究竟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还是应该同意刚才说的那些关于自由的论点?我们很赞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诗人裴多菲的几句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里说的自由,是指从封建制度的压迫和束缚下解放出来。多少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思想家为此献出了生命,我们共产党人继承了这样优秀的传统。可是,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自由问题

上毕竟还有原则的区别。其实，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里也还有另外的话。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就曾经说：自由，自由，多少恶行假汝之名以行。她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看出了资产阶级自由的另一方面。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商品的一段分析，讲得很形象，对我们理解资产阶级自由的实质，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他说，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资本家双方，在劳动力自由市场上都是非常自由的。我到你的工厂里做工，需要一天得到多少工资，没有多少工资，我就不到你工厂里去。资本家也出个价钱，说我只给你多少钱，超过多少钱我就不能雇你，你不来我就找别的人。最后达成了契约的关系，我也愿意卖，你也愿意买，买的人自由，卖的人自由。马克思讲，在劳动力自由市场上，真是自由的乐园；离开了劳动力市场，情况马上变化，资本家昂首阔步往前走，劳动者则垂头丧气，等着到工厂以后当作一块皮，听任资本家愿意怎么揉就怎么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这样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是这样的民主，资产阶级的平等就是这样的平等。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包括斯大林、毛主席有许多科学的论述，他们建立了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自由观。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在这样的问题上，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丝毫动摇。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涉及的问题很多，是不是可以考虑先从两个方面入手来研究：一个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一个

是自由与纪律的关系。

恩格斯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列宁反复论证了恩格斯的这个命题。毛主席有所补充，或者说有所发展。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就把改造客观世界和认识客观世界联系起来。毛主席希望取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自由。他曾经讲，我们还没有取得自由，经济上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没有建立，我们是不自由的。天天想自由，急于求成，搞“大跃进”，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经济条件，不量力而行。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结果碰钉子，吃苦头。所以，不经过实践检验取得的认识，只是离开必然的主观的自由、任意的自由。一个时候你脑子里可能觉得自由，只要一接触实际，就不自由了。不实事求是，是不能取得自由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如果背离实事求是，只能进入不自由。

接触到的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同志，都说感觉担子很重，压力很大，要做的事情很多，而力量有限，总是不那么自由。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只有老老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把实际情况搞清楚，分清主次、缓急，这样才能逐步取得自由。

中国有句俗语：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这样自由，也可以说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了。可是，有一点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大气层里鸟是可以任意飞的，离开大气层，到了没有空气的地方，再有本事的鸟也飞不动；海阔可以任凭鱼

儿游泳、跳跃，但是水深就同鱼的生长有密切关系，什么样的深度才有什么样的鱼，到了一定的深度，有些鱼就不能生活了。天也罢，海也罢，都是条件。前不久，《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杂感，讲孔夫子的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解释得很好。我们平常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今天想出这个事，愈想愈迷人，可是等到一接触实际，这个条件也不够，那个条件也不够。事实证明，不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是谈不上自由的。改造一个社会，改造一座山、一条河、一块田，甚至于改造我们自己，改造自己的家庭，都是如此。不认识客观规律，不认识由这种规律最终决定的必须遵守的规矩，想自由也自由不了。

还有自由和纪律的关系。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其自由必须接受宪法的约束。我们宪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把权利和义务统一起来，不但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都能很好地解决了的。享受权利，同时要尽一定的义务；要求人家尽一定的义务，应该同时赋予必要的权利。刚才讲创作自由。能够自由到让那些不健康的小报任意泛滥吗？说一个很滑稽的事：一个写乱七八糟小报文章的人，希望小报广为发行，但是他规定一条，自己的孩子不准读这些小报。这起码在他家里就不自由，限制了孩子看他写的污七八糟的东西的自由。淫秽的录像带能够允许吗？资本主义国家有脱衣舞的表演自由，我们能够允许吗？发行小报也好，制作录像带也好，不仅是你的权利，还必须想到读者、观众受到什么

影响。作为一个公民，有义务使我们的其他公民健康成长，得到美的享受、健康的享受、高尚的享受。

自由和社会责任从来都是分不开的，当然每个社会有每个社会的特定内容。我们的社会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我们的创作自由以及其他种种自由，都要首先想到人民大众，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没有前提条件的自由，究竟是些什么自由呢？根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四项基本原则。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创作自由也好，演出自由也好，表演自由也好，新闻自由也好，出版自由也好，学术自由也好，都同宪法打架，不相符合。如果触犯刑律，不仅要挨批评，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共产党员不仅要遵守宪法，而且要遵守党章。从入党那天起，我们就宣誓自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执行党的决议。没有这种自觉和要求的人，就不能入党。只有具备了这样一种觉悟和决心的人，才能入党。我们从来不强迫任何一个人入党，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时期也是这样。要真正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要经受很多考验和锻炼。我自己在北平参加学生运动的时候，接触到的进步青年不少，一起参加救亡运动、参加进步活动还可以，可是一问他，你已经做了那么多工作，参加了那么多活动，为什么不入党呢？他就说了，你们共产党的铁的纪律，我这个人接受不了，我可以在你们党的领导之下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但是从组织上加入党，我还不具备条件。那时是这样，到了和平建设时期，纪律问题上的考验不像战

争年代、地下工作时期那么严峻了，可是实际上这个问题仍然到处都有，可以说天天都遇到。

刚才所说的自由问题上的一些不妥当的观点，不少出自共产党员之口。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的讲话，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是中央全会同意的了的，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的，党内有约束，人民代表大会有约束。可是，某些党员同志却公开提出同中央关于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相反的意见，而且讲了一个歪道理，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建立的，上海是污七八糟东西最集中的地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麇集一起，而共产党不怕污染，在那里建立了党。他没有想到我们在建立党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口号，尽管只有十几个代表，却勇敢地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宣战。这里联系到多年来一直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讲得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没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我们提倡“双百”方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科学。有同志多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要马克思主义占优势。这些观点往往出自共产党员的嘴巴。对于这样一些观点，应该不应该批评呢？我看是应该的。百家争鸣，包括在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的平等的、民主的讨论，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党员只要不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也还应该通过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方式来解决。中央多次讲，党内在进行不同意见争论的时候，实在说服不了，他非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可，就要把他从现在领导岗位调下来；调下来以后，他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也还要提醒他，还是要在党章允许的范围内申诉，要接受一点教训。

遵守宪法的公民，遵守党章的党员，到底比不遵守宪法的公民、不遵守党章的党员自由还是不自由呢？究竟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比资产阶级自由观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呢？这些问题，值得联系实际进行研究，找到正确的答案。我认为，遵守宪法的公民是得到自由的公民，遵守党章的党员是得到自由的党员。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一个共产党员，处处感到党的约束，这也不自由，那也不自由，这样的人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我看想创造也创造不了，想积极也积极不起来。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又最好地发挥了积极性、创造性的同志，在党内真是成千上万。最典型的是周恩来同志。他自己也讲，好多事情从来没想到要他去做，党命令他去做，尽管过去根本没有接触过，没有知识，没有准备，但是服从决定，钻进去，获得了自由，工作取得了成绩。我们党内有很多这样的好同志。有同志说不应该把自由和纪律统一起来讲，纪律是外加的，责任才是内心的。共产党员入党，遵守党的纪律，是出自于内心的。只有有这样觉悟的人，为了维护党的纪律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人，才配取得共产党员的称号。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关系 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三日)

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今天闭幕了。

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专门讨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第一次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会议讨论了如何在全国范围内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达到在全体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使我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常化、制度化、系统化的问题。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我们的会议,是在彭真同志倡议下召开的。邹瑜同志在会议开始时作了很好的工作报告。为了召开这次会议,司法部在制定规划、总结试点经验和编写教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司法部门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会上几个试点经验的发言和印发的一批材料,都可以作为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全国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普及法律常识的借鉴。由于到会代表充分认识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大家对规划和工作报告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这次会议开得是成功的。会上讨论确定的全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规划以及它的实施部署，待上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后下达。我们相信，依靠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这里，我讲几点意见。

一、认清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意义

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对于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法制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颁布了新的《宪法》和几十个法律、条例和决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1979—1984）已经出版，国务院颁布的近二百个经济法规和大量其他方面的法规也正在汇编。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正在逐步充实、完善。这几年，立法工作进展较快，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确保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否则就没有保障。有了法律，还必须使广大干部群众掌握法律、运用法律，这样法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全民普及法律常识的目的，集中起来说，就是使广大群众能够更自觉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广大干部能够更自觉地依法办事，并同各种危害人民权利的行为作斗争。

8 新中国建立以前，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在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里就已经产生了属于人民的法律。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各边区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建立的革命政权，都制定了施政纲领和法律、法规，建立了相应的司法、执法机关。但是，就全国来讲，还是国民党或者是外国侵略者制定的“法”，那时讲“依法办事”就不能革命了。同时，由于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特点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切工作必须服从于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的开展，服从于争取战争的胜利，那时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事情紧急，情况变化快，所以党的政治领导主要靠政策。当时制定的法律还很有限、很简单，基本上还是属于党的政策的一种辅助形式，有些法也是直接由党中央审定发布的。那个时候，在我们的干部以至人民群众中是习惯于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有了全国性的政权，就不仅要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了。但是，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上，我们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

程。这个曲折过程，是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密切联系着的。一九五八年以前，法制建设处于比较正常的发展状态，国家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一九五四年九月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1】这一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蒸蒸日上的。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党内产生“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党内和整个国家的民主生活遭到了损害，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相应地受到削弱。十年“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横行，他们肆意破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众所周知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2】，“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3】。这是合乎党心、民心的重大决定。从此，我们国家重新走上了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康发展道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全自觉地、坚定地用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来抓这件大事，主要是十年内乱的教训，使我们党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一次飞跃。邓小平同志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

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4】这是从痛苦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的一条结论。历史经验说明,有了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才能把我们立国的四项基本原则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才能保障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民主权利,发展人民民主,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沿着宪法所规定的道路前进,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国家长治久安。

其次,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化建设的轨道上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这几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城乡市场活跃,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农村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巨大胜利,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稳步前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前,我国法律对经济的作用,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护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国家、集体的公共财产和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从根本说,以《宪法》为核心的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维护、保障和促进的作用。经济法是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

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5】目前经济法在我国的法律中已占很大的分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三十六个法律中，经济法占了一半以上。国务院制定的有关经济方面的法规就更多了。今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它将越来越显得重要。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以及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节奏，都在加快。在经济工作中如何适应新的形势，有效地保障社会主义经济有条不紊、活而不乱地健康发展，无论是宏观控制还是微观搞活方面，都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法制建设中，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立法。至于一些制定具体法律条件尚不成熟的，可以先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一些超出行政法规调整范围的，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已授权国务院在必要时可以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待经验成熟时，再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目前，我国管理经济工作的总的趋势是，从过去主要依靠政策，转到既要依靠政策又要按照法律办事的轨道上来；即使是管理经济不可缺少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它们所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也要逐步用法的形式加以规范化，以便有所遵循和进行监督。经济法的制定需要抓紧，经济法的实施更需要抓紧。经济法是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规范，只有人们都严格用它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动，社会经济才能顺利发展。

再次，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还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的建设,实现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有利于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6】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没有社会主义。我国《宪法》已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的原则和基本要求载入它的“序言”和“总纲”,并规定了若干条款。《宪法》要求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为教育人民的法定内容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指导方针,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7】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对精神文明的文化建设方面,即发展教育、科学、卫生体育和文化事业都各自单列一条;特别是对“扫除文盲”、“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和鼓励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依法“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等作了明确规定。《宪法》把“受教育”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一,规定并鼓励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8】。与此相适应的,为了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提高社会道德水准,促进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国家已经和正在制定的一系列法律,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意义上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保障和促进作用。从总体来看,社会主义法律是根植于社会主义制度,

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施加于人们思想的影响所产生的法律意识,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范畴。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推进人民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道德风尚的树立和发扬,实现整个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

此外,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对于提高国家行政机构的效率,加强人民武装部队的建设以及调整对外关系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从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来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对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认识到。

二、各级干部都要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恢复和逐步完善,近几年来,我们开展了各种法制宣传活动,特别是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的斗争显示了法制的威力,许多干部和人民群众正在养成守法的习惯,一批能够铁面无私地执法和奋不顾身地护法的模范人物不断涌现。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在一些单位、一些干部中还相当突出。还有一些地方发生干部利用职权,任意侵犯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违法事件。我们必须同这些违反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现象作斗争。

守法,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也是全国所有公

民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所有公民，包括各级干部，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以为法只是管老百姓的，干部可以例外的观点，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所谓“礼遇君子，法制小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封建意识的遗毒。我们党历来有个传统：要求党员和干部遵纪守法，比要求一般军民更加严格。这是我们党保持工人阶级先进部队本色的一个重要标志。现在有些干部把这个传统丢了，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已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之外，甚至干出欺压群众、违法乱纪的坏事。另一种因素是，一些同志习惯于过去的一套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不习惯依法办事，有的甚至把法律看作“碍手碍脚的东西”。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认识不清，是老观念、老习惯作怪。也有不正之风，如“关系网”、“保护层”以及个人主义、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因素。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主要是使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懂得法律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认真学习法律，自觉地增强法制观念。当然，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广大干部知法懂法，依法办事了，就可以带动广大群众也这样做。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了法律，就能依法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监督各级领导干部和一切国家干部忠于职守和严于法纪，检举和依法制裁那些为非作歹的违法干部。我赞成邹瑜同志报告中讲的，全民普及法律常识和加强法制教育的对象，首先应当是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因为他们无论是在执法方面还是在宣传群众、影响群众以及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方面，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有人问：“讲依法办事，把党的领导摆到那里去了？”这种看法把依法办事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了，是一种糊涂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使社会主义法制具有“极大的权威”，并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9】的法制原则，“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10】。党章的“总纲”中写了这样的准则：“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1】党的十二大的报告指出：“特别要教育和监督广大党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12】所有这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依法办事同党的领导是一致的，把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至于从这里还引申出来比如“党大还是法大”一类问题，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我们的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政策实施的基础上，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程序形成的。它体现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统一意志，也凝结着党的意志；党的活动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行事，那就等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也就实际上损害了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作用。我们有的同志一听说“法治”，就担心党的领导不起作用了，这是对我们党已经不是处于革命战争时期，因而必须改变那时的领导方法缺乏认识的表现；是停留在过去所谓“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观念和方法上面，不懂得实行社会主义法制

恰恰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表现。事实证明，我们党越是通过实行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充分地发挥国家机关的作用，更加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就越是能使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更有力地保障社会主义秩序的稳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为实现党提出的战略目标而团结奋斗。这难道不是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必须遵循的领导方式和应起的领导作用吗？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充分认识这一点，积极促进我们各项工作走上法治的轨道。

有的同志提出：“今后按法律办事还要不要政策？”这牵涉到如何认识法律和政策的关系。法律具有国家意志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它不同于政策。但法律和政策，在代表人民意志和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方面，本质上是一致的。过去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是依靠政策办事。人民有了政权以后，就不仅依靠政策，还必须把成熟的政策制定为法律，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过渡。经验证明，凡是新的重大问题、重要改革，总要有个探索试验阶段，这里有一个从政策指导到制定法律的过渡问题。先是用政策作指导，经过试验，成功的就坚持，不成功或者不完全成功的就修正。法律要有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政策经过社会实践证明是成熟的、正确的，才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所以法律是依据党的政策制定的，是成熟的政策的定型化、法律化。当然，法律的实施和适用，以及根据形势变化要求加以修改或废除，也必须接受党的政策指导。在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发展

进程中,出现一些新问题,一时得不到法律具体条文作为处理的依据,这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党的政策精神灵活地加以处理,不能因为法律条文没有具体规定就一推了事;也不能不顾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基本原则自行其是地乱加处置。一般来说,党的政策比之法律,具有较大的灵活性、适应性,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指导。当适应情况变化而确定的政策还没有形成法律的时候,在实际工作中仍应根据政策精神办事,并注意总结经验,加快实现政策向法律的过渡。

有人认为,现有的法律、法规是阻碍改革的“框框”,主张“法律也要松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经济体制改革,当然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富有活力的新体制;也要相应地冲破一些陈旧的观念。但是,我们的改革决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也决不可冲破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及其用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恰恰相反,我们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使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共同富裕。法律要体现这个根本目的。如果说这是个“框框”的话,那么这个“框框”是应该有也必须有的。它不会限制和阻碍改革,恰恰相反,它像轨道那样,可以保证改革的列车沿着正确的方向飞驰前进。为了保证搞活经济,法律对那些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的非违法行为和犯罪活动一定要加以限制和

制裁。不这样做，改革就会遭到破坏，国家和人民利益就要受到损害。我们不能拿空话而要拿严肃的法律行动来解除人们“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可是，前一段时候，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清醒头脑，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走私、套汇、投机倒把、欺行霸市、扰乱金融、勾结不法外商坑害国家等违法犯罪活动制止不力，执法不严；有的把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仅仅看成是不正之风，结果让一些不法分子“自由自在”地活跃于社会主义经济舞台上，竟无人查究。如果要求这样的“法律松绑”，那就会绑住社会主义，放任资本主义活动。当然，为了适应改革的发展要求，某些法规或法律条文有“立、改、废、立”的更新、完善过程，但从总体来说，法律没有国家权力机关作出决定，任何人也无权任意改动，更谈不上什么“松绑”了。

三、把法律交给十亿人民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一要有法可依，二要依法办事。目前，我们有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一批法律、法规，应当认为，在重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可以说有法可依了。但“徒法不足以自行”，现在问题的焦点在于人人要依法办事。而要依法办事，就要使体现全国人民意志、由人民制定出来的法律为全国人民所熟知、所掌握。这是人人依法办事的基本条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法办事的必然要求。为此就必须通过宣传教育，使全国人民人人知法、懂法，正确地守法和自觉地维护法律。总之，人民要成为法

律的主人，法律要成为人民手中的武器。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我们普及法律常识，把法律武器交给十亿人民，将汇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把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正如彭真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所说：“十亿人民养成人人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观念和习惯，同违反和破坏宪法的行为进行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体现了人民意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的新宪法，又由全体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来保证它的实施，就一定能够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胜利发展中发挥伟大的作用。”【14】

争取五年左右时间在全体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是做到这一点的重要一步。各级党委都应充分认识它的重要意义，并把这一任务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最近有的同志讲了这样一个看法：“建立法制容易，普及教育难。”这个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我国一般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许多地方的经济还不发达，各方面的任务又很繁重，特别是农村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人员分散，流动性大，要把这项工作做好，确实会有许多困难。但是，从党和国家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心愿来看，这件事是非抓不可的。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中，不少青少年罪犯被抓了，家长说：“现在你们挺积极，早干什么啦！”批评我们的干部过去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一是教育不够，二是管得不严。为了准备这个会，我们有的同志看了劳教所、劳改队，大多数是青少年，

是“文盲、法盲加流氓”。这些人犯罪，虽然主要应由他们自己负责，但是我们当干部的，也确实有愧于职守，没有把这些人教育好。长春有个黑咀子劳教所，今年元旦前夕，长影的同志同他们联欢，有位老演员在联欢会上说：“年轻的朋友们，你们的位置本来不应该在这里，而应该在四化的洪流中！”当场青年们都流下了眼泪，有的泣不成声。现在这一代青年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的，我们有责任把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的一代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社会主义的江山常青不衰，才对得起无数为人民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所以，我们各级党委、各级领导，都应当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下定决心，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强领导，深入发动群众，认真制定和实施自己的规划，努力促其实现。胡耀邦同志最近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明年年底以前，要求有三百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做到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根据这个要求，我们也应重点抓好这些大、中城市及其郊区县农村普及法律常识的工作。普及工作要因地因人制宜。除了需要全民普及的宪法和几个基本法律外，对其他一些重要的法律，应区别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并采取适当的方法，组织实施。开展这项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人员、经费、设备等物质条件，各级党委、政府和行政领导，要本着讲求效果、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安排解决。会上介绍的本溪、大庆等试点单位的经验证明，只要领导重视，全党动手，下决心扎扎实实地抓，全民普及法

律常识的工作是可以做好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由于这项工作牵涉到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因此要办好这件事情，需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司法部门主管，各方协同配合。全民普及法律常识可以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创文明单位活动以及社会综合治理等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包括制定各种岗位的守则、条例以及乡规民约等。法制教育应列为干部、职工、农民以及城镇居民的政治教育重要内容之一。学校从小学到大学，以及各级党校、各类干部学校、干部培训班，都要设置不同层次的法制课程。司法部门还要结合公证、律师工作，公开审判和民事调解工作等司法活动进行法制宣传。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也都应根据各自工作对象的特点，提出不同的重点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和学习辅导活动，为搞好这一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全民普及法律常识教育中，各级干部、党员首先要带头学好，成为学习和宣传法律的模范。从会上介绍的许多经验来看，这是一条基本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干部在经济方面要努力学会掌握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以及商品经济的规律——价值规律来管理经济；在政治方面要努力学会按照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来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事务，进一步说，管理经济也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但是，现在我们许多干部缺乏法律知识。因此，我们不仅要扫除文盲，还要扫除“法盲”。我们的各级干部都要知法、守法，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应当把是否知法，是否按法律办事，作为

考核、选拔干部的基本条件之一。对肆意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干部，要坚决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政法部门的干部和所有执法干部在奉公守法的要求上更应当严格，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不该再出现“违法的执法者”了。强调抓好干部学法，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实施全民普及法律常识规划，以干部学法来带动全民学法，也是我们党致力于提高干部素质、提高全党领导水平的一个重要措施。

法制宣传是党的宣传部门分内的职责。全民普及法律常识是全党的大事，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这一教育同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这是摆在我们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和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宣传工作干部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法制宣传本身是一项宣传工作，而今后宣传工作的内容和活动又必须合乎法制的要求。普及法律常识是一项全民的教育，而推行这一教育又必须靠宣传作为它开道。因此，党的宣传部门和宣传战线的干部，更应认识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和自己应负的责任，支持和协同司法部门准确有力地开展法制宣传工作和进行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中央领导同志对法制宣传都非常重视，彭真同志强调“要做到依法办事，离不开宣传工作”。他对新闻单位多次提醒：一是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法律和有关决定，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发布的東西，不能想登就登、不想登就不登；二是法制方面的新闻报道和文章分量太少，要增加，要

开辟一些专题栏目；三是在新闻报道中出现了一些不合法律的事例和用语，要注意避免。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节目和新闻电影等天天要同广大群众见面，文学艺术作品包括电影和图书、刊物等也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它们也是宣传法制的重要工具。上述有关部门及各级、各类文化宣传单位一定要把法制宣传列为自己的工作内容。宣传法律，首先要熟悉和掌握法律，避免在宣传法律中出现违反法律的现象。记者、编辑、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以及一切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员，不仅要积极宣传法制，而且也要把自己的工作和工作成果纳入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这一要求，对于一个“灵魂工程师”来说，乃是起码的要求；对于一个公民来说，则是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更重要的是，任何精神产品都必须顾及它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现在在一些报刊、广播、电视的宣传中，在一些电影和文学艺术作品中，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和遵守法纪少了，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少了，宣传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少了，宣传个人的和局部的利益必须服从全局的利益少了。而对一些相反的东西则宣传得多了。这是不符合党的十二大文件、《宪法》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的。至于在宣传中出现的一些不合乎法治要求的内容，也不是个别现象。例如，有些报刊报道招聘乡长，把触犯刑律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说成是“改革的功臣”，等等；有些报告文学、通讯或新闻报道严重失实，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好的效果，引起当事人要求追究法律责任；还有一些小报借宣传法治为

名,利用案例编造渲染低级趣味的东西,对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不良影响。所有这类问题,都应认真注意,加以解决。应当看到,之所以会产生这类问题,有多方面的因素,缺少法制观念和应有的法律知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在全民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中,我们各级宣传部门的干部和思想战线的同志一定要先学一步,学得更多一点、更深一点,学得更有成效,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注 释

- 【1】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9页。
-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 【3】 同上。
- 【4】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 【5】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
- 【6】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8页。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82年12月5日第1版。

- 【8】 同上。
- 【9】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7 页。
- 【10】 同上。
- 【11】 《中国共产党章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9 页。
- 【12】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6 页。
- 【1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 页。
- 【14】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82 年 12 月 6 日第 1 版。

坚持企业改革的 社会主义方向*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举办这次研究班，正如同志们所说，是有收获的，大家学到了不少新东西。如果说，开始的时候有人嫌时间长，等到结业的时候就嫌时间短了，觉得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需要读的书还很多。这证明，我们的研究班在国家经委、全总负责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很有成绩。企业管理研究班已经办了二十二期。我们很希望这样的研究班能继续办下去，这也是大家的愿望。同志们结业以后要继续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陆陆续续到研究班来共同学习、共同讨论。自从我们的研究班开办以来，不仅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支持，而且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一些地方和部门也相继办了一些与他们工作有密切关系的研究班。这是好事。继续办下去，越办越好，对提高企业素质和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举办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

管理水平会有帮助。

今年二月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有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有的已经公开发表,有的发了文件,有的在一些会上传达了。这些讲话的精神,全党都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我们企业的同志,不管当厂长的,还是当党委书记的,当工会主席的,当团委书记的,或者是做其他工作的,都应该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学习一定要同我们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切实领会,采取有效办法,努力来解决现实问题。我想,同志们回到本单位以后,应该把这件事情首先抓起来。邓小平同志三月七日关于国际问题和国内思想工作问题的讲话已经发表了。我认为,在研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時候,应当以小平同志那篇讲话的精神为指导,来分析研究各种问题,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求得较好的解决。为此,我提出几个问题来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个问题,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涉及的企业社会主义方向问题。

小平同志说:“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1】陈云同志讲:“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2】我们脑子里要时刻想到,企业的一切建设,一切工作,包括经济体制改革,都是社会主

义的。正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必须进行改革；我们的各方面的改革，又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在实际工作中，如何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很多问题值得研究。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使企业的生产活动和经营活动，服从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服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偏离和损害这种利益。理论界不少文章在探讨，有些意见很好，能够给人以启发，也有些意见是明显不妥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有一系列规定。在贯彻执行中，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我听到一种议论，也看到一些文章，认为“适当分开”还不够，还要搞得更彻底，要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希望同志们包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和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对本单位以及周围单位的情况和各种意见，了解一下，做点分析，看看哪些意见和办法能够使我们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哪些意见和办法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一定要避免在方向问题上出毛病。按照规定，税后留利的百分之六十为生产发展基金，百分之四十为集体福利和奖励奖金。如果百分之六十的绝对额越来越大，到了一定的时候由这部分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就有可能超过原来国家的固定资产。这部分固定资产，究竟算国家的还是算企业的？有两种意见：一种说，不管多少统统算国家的；一种说，上缴国家利税之后的留利，不能算国家的，而应当归企业所有。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做？我们讲，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搞着搞着，国

家利税的部分不是大头，留给企业的部分可能是大头。承包、租赁给职工集体或个人的小型国营企业，国家所得到的利润在企业利润中占多大的比例，才能使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中得到实现？能不能只相当于使用费，甚至只相当于折旧费？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又应该怎么看、怎么办？上面提到的只是同志们现在想到或者遇到的问题中的几个，事实上还有更多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要大家来回答。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保证了社会主义方向，并在这个前提下充分发挥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职工生活的逐步提高；一种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按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最近指示，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还有许多实际工作要做，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不能认为所有问题都已经完全解决了。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共产党员，都要时时刻刻把这个问题放在脑子里。

第二个问题，社会化大生产有很多要共同遵守的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早已社会化了，并且同它的占有制度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生产社会化的水平也越来越高。除了由于占有形式的影响所产生的特殊性，单就支配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来说，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企业有很多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我们要认真研究，根据我国情况有选择地加以采用。应当承认，我们在经营管理方面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比如，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成功的那个年代，日本丰田的汽车生产能

力、生产规模比我们的大一点，但不多。可是，经过几十年，两者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丰田比我们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发展速度快得多。这就要好好研究它的经营管理经验。有些是必须学习和引进的，有些当然不能学习和引进。在这样的问题上，一定要有科学的态度，有细心的研究，有实事求是的分析。一九七八年底，我访问日本时，到丰田总装厂看过。听我们在那里实习的同志讲，总装厂的工人，最多干到四十二岁就干不下去了。劳动的紧张程度，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像。列宁讲过泰罗制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我们研究清楚了没有？我们的毛病，一个是闭着眼睛不学，说反正我是社会主义，我的这一套优越；另一个是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而自己的什么都不行。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管理方法有两重性，这种观点没有过时。对于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即把反映剥削关系的方面去掉，把合理的、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的东西，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学过来。我们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

第三个问题，要密切注意和解决出现的新问题。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且对于计划体制的改革作了原则的规定。半年多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在前进过程中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决定》里就讲，越是搞活经济，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去年第四季度以来，的确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里，也

有的去干投机倒把的勾当。个体经济是不可缺少的，必须适当发展，但是个体户中也有些人专门干投机倒把的事。引进和利用外资，搞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由外商办独资企业，均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有些在订合同的时候就吃了亏；订了合同以后，对方有的又不按照合同办事，搞违反契约的非法活动，以及其他一些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小动作。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对于已经出现的消极现象必须引起警惕。

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可是，把商品交换的原则同党内政治生活、国家政治生活的原则等同起来，混淆起来，甚至取后者而代之，这种思潮、这种现象却是我们不能允许的。现在办事，很多情况下没有钱不成。单位之间发生关系，同样是共产党员，同样是党员干部，有时候按照党的原则、国家的规定，该办的事反倒办不成。所以，怎么做到按照中央的《决定》，发挥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通过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这些办法，使我们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越搞越好，同时有效地防止和克服消极现象，使我们党内的、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不受商品交换原则的腐蚀，是所有共产党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一年在《农村调查》的跋中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

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3】这里提出的原则，今天也完全适用。

我们现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也要看到，民族自尊心问题在我们一些共产党员中间、在我们一些青年中间，现在成了一大问题。有些人为了个人得到好处，可以不顾一切，做出有损于人格、国格和民族尊严的事情来，使人痛心和感到愤慨。总之，经济领域中，正确的东西，等价交换、按劳分配这些原则，我们是要贯彻执行的，应该说现在贯彻执行得还不够。但是，这些不能等同于、更不能代替我们党内和人民内部政治生活的原则。这个问题我们每天都可以遇到。

第四个问题，厂长负责制通过试点、总结经验以后，要普遍推行。

如何当好厂长，特别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厂长，这对在座的和将来更多的厂长同志来说，是一个考验。要把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精神体现在你们的言行中去，随时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

现共产主义。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同时也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懂得两个文明建设都是厂长的分内任务。这里有一个需要正确回答的问题,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提出的,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谁来代表国家?据一个城市对几十个工厂的厂长做调查,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认为,厂长应代表国家,而百分之七十的厂长讲,要说心里话,厂长应代表企业和职工。这个情况很值得研究。所以,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谁要是当了厂长,却忘记了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精神,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也不是一个好的厂长。

第五个问题,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思想政治工作,党委、工会、共青团要用心思抓好,但是不能认为只是这些部门的事。工作有分工,又要有合作。无论厂长或是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共青团书记,都不能认为厂长就是管行政,可以不做思想政治工作;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没有地位,低人一等。有的同志说,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党委没权了,地位降低了,思想政治工作被人看不起。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问题出在哪里,要具体分析。我听了首钢、一汽、大庆等几个先进企业的介绍,觉得他们的经验很值得大家参考、学习。在首钢,思想政治工作,党务工作,宣传工作,根本没有被人看不起的问题。首钢的经理、厂长和党委书记,每次布置工作,都是既布置生产建设,同时也布置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说,既布置物质文明建设的工作,同时也布置和物质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两项工作同时讨论,同时布置,同时

下达。下达的时候，经理、厂长既要讲生产建设的工作，也要讲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既要讲思想政治工作，也要讲这些工作同生产建设的关系。首钢有一支强有力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光宣传员就有八千多个，每一个班组都有，不脱产。这些宣传员往往是班组里生产较好、思想也较先进，是大家公认、推出来的。上面布置的工作一层层下到班组，宣传员结合完成生产任务抓思想政治工作，信息上来也很快。班组的信息，通过这些宣传员，半天就到了厂部。在那里，思想政治工作有力量，见成效，做宣传工作的人觉得自己在生产建设中间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待遇问题也得到合理解决。工人不把他们看作尽说空话的人，领导生产的同志也认为他们的工作是不能缺少、不能削弱的。抓生产的同志懂得，生产还是要靠人，人的思想问题解决了，气顺了，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所以，说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党委没有权力了，作用小了，这种说法不合乎我们实际生活的要求，也不合乎党的要求。我们还是要靠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中阐述的道理来管理好企业。

注 释

- 【1】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 【2】 陈云：《两个文明要一起抓》。《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 【3】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同国外友人谈对外开放*

(一九八五年七月)

萨米：贵国的决策者是什么时候想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个问题的？

答：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以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朋友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接着受到邻邦的封锁。面临这种封锁，我们不能不强调自力更生。一九七六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清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那套东西，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毛泽东主席在世时所没有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我们党中央回顾过去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引进先进的设备，吸收外国的投资，同时也欢迎外国的技术人员来帮助我们建设，欢迎外商

* 这是邓力群同志七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先后同扎伊尔通讯社社长兰杜·卢萨拉·卡萨和埃及《金字塔报》副总编辑萨米·德苏基的谈话。

到中国来投资或合营、独资经营企业。到现在为止，各种各样的合资、独资经营的企业大概有两千个。实行开放政策以后，我们的对外贸易比过去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这给我们经济建设带来的好处是明显的。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叫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促进了我们国家的新技术的发展。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你现在用的这个小录音机，在一九七六年以前是特别稀有的商品，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就可以生产，产量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萨米：你们实行的开放政策，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还比较容易理解，你们怎么样向中国的青年一代解释这种政策的正确性？解释利用外国资本对实现你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好处？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里为什么允许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答：对于青年人来讲，最好最重要的是事实的教育。实行开放政策以后，在经济建设上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越来越明显。我们取得的成就越大，我们的人民和青年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就越深。现在，我们的青年人的问题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实行开放政策以后，某些副作用也越来越引起我们注意。所以，我们在制定和执行这个政策时，一直坚持这一条，就是吸收外资、同外资合营企业，以至于允许外资在中国独立经营企业，但这只是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我们始终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们经济的主体。我们发展生产的目的是逐步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目前，在我国合资、外资独资经营的企业虽有

两千个左右,但总的投资额大概没有超过一百亿元人民币,折合几十亿美金。这个数字,大约只占我们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一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的青年人对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个道理很简单,外国再好,我们也不可能企求他们把全中国的事情办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要靠我们自己人民的辛勤劳动。

萨米:听说中国前不久搞了一个运动,叫清除精神污染,而这个运动是针对开放政策的受益者的,请问是不是这样?

答:没有搞运动。说搞运动,是西方资产阶级记者的歪曲报道。我们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象不是实行开放政策以后的受益者,而是开放政策以后的受害者。在决定实行开放政策的同时,我们党中央作了两个方面的分析,认为一方面实行这个政策对我们的经济会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朽作风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潮传到了中国,而一部分青年人缺乏鉴别能力和科学分析能力,认为资产阶级思潮中的全部观点都是正确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引导我们的人民、干部、青年对这个思潮进行分析,使他们认识清楚哪些是有益的,我们应该接受;哪些是有害的,我们应该加以拒绝。我们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允许有错误的人参加讨论,允许进行反批评,也允许保留自己的意见。如果有人在一一定的负责岗位,他的错误观点给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了

损害，本人坚持错误不愿意改，就把他的工作调动一下。

兰杜：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走到何处去？说得清楚一点，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你们的国家正在前进，但你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会不会动摇？你们进行的这场革命，在道德品质方面会不会有某些危险？

答：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我们改革的方向或者叫目的，是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使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能够得到比较快的发展。

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创造条件，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原有的经济文化水平比较落后，这个目标决不是短期内能够达到的。我们党的十二大确定，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水平。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以及国际上的经验，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目标，实现这个设想，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是不可能的。只有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必须同中国的特点和中国的情况密切地结合起来。外国的先进经验一定要给予重视，一定要很好地借鉴，但重要的还是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办事。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党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了两个和过去不同的重要政策，一是对外开放，二是对内搞活经济。我们允许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以至于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从我们的实践来看，这种经济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且是有益的补充。

在实行这两个政策的同时，我们党中央清醒地估计到，

会带来一些消极的东西，带来一些副作用。那时候，我们就决定了所谓两手政策，一手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另一手就是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作风的影响和侵蚀。事实正如我们估计的那样，实行开放政策以后，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所以，一九八二年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分子的斗争。一九八三年，我们又在政治上进行了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一九八三年第四季度，我们在思想领域里，对受到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消极影响的现象，比较集中地进行了批评。我们党十二大确定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如果没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保证，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走偏方向。所以，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做工作，同时进行，不断出现新的问题，然后就不断地解决新的问题，从而不断前进。

对“四有”宣传教育问题的意见*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六日)

邓小平同志今年三月七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陈云同志六月二十九日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了《两个文明要一起抓》的书面讲话。我们要认真学习、宣传这些讲话的精神。最近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就是向全体党员、向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四有”教育。按照这个精神,薄一波同志把抓好理想、纪律教育作为巩固和发展整党成果的首要任务提出来了。

这几个月来,我们的新闻、报刊在宣传“四有”方面有比较明显的进步,青年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有起色。比如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宣传部门负责人干部会上的讲话。

《中国青年》杂志、《解放军生活》杂志会同边疆十二家青年报刊联合发起的“为边陲优秀儿女挂奖章”活动，老山英雄代表在江西、北京、山东、安徽、上海等地的报告，《山西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广播对“真正的牧马人”曲啸同志事迹的报道和宣传，不久前北京支援边疆两代垦荒队员几十年艰苦奋斗如一日的光荣历程的宣传，南极考察队事迹的宣传等等，都在广大青年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拿青年的话来讲，就是“同龄人来教育同龄人，用八十年代青年中的模范来教育八十年代的青年一代”。这使他们感到亲切。他们听了老山战斗英雄的讲话，从中受到很大启发，深感自己同那些战斗英雄都是同一代人，年纪差不多，别人能在边疆战斗、流血、牺牲，自己不应该总是计较个人的得失。我建议，报纸特别是中央一级报纸，能够逐步做到经常都有这方面的消息、报道、通讯或评论，长短不拘。我们的人民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天天都有新的创造，符合“四有”精神、体现“四有”精神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先进事迹层出不穷。我们的编辑、记者要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去一个地方，就要详细了解这个地方、这条战线、这个部门的事。在我们报纸的版面上，要把“四有”的宣传教育长期坚持下去，坚持到本世纪末，坚持到下个世纪，以后还要继续坚持。随着时代的前进、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要不断有新的内容、新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深刻地反映出我国人民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风貌。

“四有”很重要，大家很重视。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

对于“四有”的重视，能不能作为我们思想理论工作、宣传工作的指针，长期坚持下去呢？过一阵子以后，“四有”的宣传教育会不会停顿呢？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使“四有”的宣传教育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口号上，而必须结合各个地方、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情况，结合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不同时期的思想实际，深入地进行下去，不断丰富和提高，一步步地把“四有”教育在全社会普及开来。拿在青年中进行理想教育来说，要真正使这项工作能够拨动青年的心弦，就要摸准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青年人的思想实际，就要了解他们的亲身经历，从他们的亲身感受入手。有同志讲，要善于发现青年身上的“闪光点”，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斯诺二十二岁来中国，那时充满了幻想和浪漫色彩。当他看到旧中国绥远省灾区的苦难生活后，在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说，这场亲眼目睹的饥荒，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斯诺的这个话是很值得我们想一想的。

当前，一是要认真领会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精神；二是要了解本单位同“四有”有关的思想实际；三是要努力按照中央的精神，通过深入细致、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解决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的思想问题。一定要了解本单位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概括地讲，无非是有同“四有”精神相符合的东西，也难免有同“四有”精神不相符合的东西。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说到正确认识形势的时候，讲了两条。第一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好的历

史时期之一，这要充分肯定。在这个大前提下面还有第二条，就是要承认，我们各条战线、各个地方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这个估计也符合我们宣传工作的情况。我们应该肯定，这几年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宣传战线的干部有很大进步，思想在提高；同时也要承认，我们的工作中间还有很多问题，很多困难。把本单位党员和群众的基本思想情况搞清楚，对我们同志中那些思想、言论、行动符合“四有”精神的，就要发扬，加以提高；不符合的，就要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切实地改变过来。我们的党员，首先要提高自觉性，特别是党员干部，要首先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样才能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群众，再加上各方面的工作，包括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逐步使全国各族人民、全体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劳动者。

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最近下去调查、参加会、看材料，听到各种情况、反映和意见，想在这里提出五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这些问题到底该怎么看，只要认真学习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可以找到正确答案的。

第一，改革和理想、纪律教育的关系问题。

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我们进行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这个全面的改革是目前压倒一切的艰巨任务。我们改革的性质、目的、方向、步骤，在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讲话中间也都有了明确的说明。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学习的时候，需要回顾一下，我们关于改革的宣传，哪些符合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精神，应该坚持下去，哪些不符合，应该改正。自去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十个月中间，报纸、刊物、广播、电视有大量关于改革的言论，有报道、消息、通讯，也有评论。它们是不是全都符合事实？是不是全都符合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精神？认真回顾一下，对于我们改进以后宣传工作会有很好的作用。还是老方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符合的就肯定下来、坚持下去，不符合的就改正、修正。宣传单位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也有必要回顾一下，看我们搞得怎么样。这种回顾，要采取科学的、严肃的态度，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要马马虎虎，走过场。由于我们的改革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其中有些情况也比较复杂。如何正确地进行宣传以促进和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中央已经多次指出我们这方面的缺点，并对改进宣传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需要根据这些精神回顾一下前一段、特别是近半年多来的工作，认真检查总结。把这件事做得认真一点，仔细一点，切实一点，真正吸取教训，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沿着小平同志、陈云同志指出的正确方向，一步步前进。

第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自由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或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自由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不同观点，值得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前一阵子，我们的一些报纸、刊物、学会，

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讲演不少。我们应当搞清楚，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党的观点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存在离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议论？这就需要研究，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

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基石，已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按照四项基本原则谈自由，是对的，是合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谈自由，是错误的，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干涉、限制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各种自由，干涉和限制党章所保障的党员的各种自由。出现这种情况，必须坚决纠正。另一种是无视甚至有意违背宪法的规定、党章的规定，鼓吹、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自由等等，也就是我们多年来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小平同志最近几次讲话中间，有两个重要的提法。一个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就是有针对性的。甚至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之后，也还有争论。上述小平同志关于自由化问题的意见，是对这个争论的最好回答。这个意见是最近讲的，但是只要细心读一下小平同志文选，就会发现，表明这一意见的思想老早就有了，而且一向是这样讲的。比如小平同志在讲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时，同时就讲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侵蚀，指出要采取两手政策，提倡“四有”，坚决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等等。还有一个提法，说在我们的国家，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搞，我们大陆内部就统一不起来了。又说，搞自由化就会使我们内部成了一个乱的世界，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

前述两种提法，是将马克思主义和当前实际密切结合的非常重要的提法。我们在研究、分析各种关于自由问题的议论时，要掌握这个精神，掌握这个武器。要用这样的思想武器来区别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和资产阶级自由观，弄清我们讲的发扬民主、坚持“双百”方针、提倡创作自由等等，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在哪里。在这些问题上认识不清，界限掌握不住，就会在实际工作中出偏差。希望大家注意这个理论问题。

第三，“一切向钱看”问题。

小平同志关于理想、纪律的讲话摘要发表时，没有把批评“一切向钱看”的内容整理进去。刚才薄一波同志提到，有的报纸展开争论，有人说“一切向钱看”不对，有的报纸发表倾向性意见，认为“一切向钱看”有道理。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远不只反映在报纸上。小平同志说到没有理想的表现，举的例子首先就是“一切向钱看”，说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他又讲，对这种现象的批评要准确，不要不适当。这就是对前一段报刊关于“一切向钱看”问题讨论的一个回答。现在大家体会到这种错误思想对我们事业的危害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很多好事没有钱可难办了，有了钱什么事情都能办到，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伤天害理，谋财害命，腐化堕落。问题不在于钱本身，而在我们对

钱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社会风气，我们的党风，我们党员的党性修养，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以至于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党的一系列政策，都可能被歪曲，受到冲击。正如小平同志讲的，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要批评，但要准确、恰当，不能乱批。

有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要起作用，也要有经济核算，核算要通过货币，交换也要通过货币。不能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所需要的交换和货币关系，把我们经济建设中讲究经济效益，统统批成“一切向钱看”。解决这样的问题，要划清很多界限。不能把“一切向钱看”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同，它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首先要考虑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同时又要讲价值规律，讲利润，讲经济核算，讲经济效益等等，这些不能归结为“一切向钱看”。我们多数精神产品还只能通过商品的形式来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群众服务，虽然也要讲经济效益，但是不能只讲赚钱，把赚钱放在第一位，更不能脱离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目的。科、教、文、卫、体都是事业单位，这些事业单位要把自己的事业管好，把钱用好，进行企业化管理，搞好经济核算。应当努力使这些单位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尽可能一致，但出现矛盾时，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这些单位从分工的根本性质来讲，不承担直接为社会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任务；相反，物质生产部门积累的资金，要分出一部分来

交给这些部门，发展这些事业。再有一条，刚才讲，等价交换是需要的，价值规律是要遵守的，经济核算是要讲究的，可是决不能把这些同党内政治生活、国家政治生活所遵循的原则，以及人们之间的思想道德原则混淆起来，要严格加以区别。张海迪同志讲，她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启发，在自己的生活中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在于贡献，不在于索取。云南前线的战士集体写了一首诗，说“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能够讲等价交换？能够讲经济核算？能够讲价值规律？能够讲按劳分配？都讲不通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货币交换的原则，客观上有它们明确的适用范围，要自觉地加以正确运用，如果盲目地听任这些原则滥用到党内生活、国家政治生活和人们之间的思想道德关系上来，弄成金钱至上、拜金主义，我们还提倡理想、纪律干什么？那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就走偏方向了。

第四，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合的问题。

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现在干的是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邓小平同志讲本世纪末是一步，下世纪三五十年又是一大步。胡耀邦同志昨天讲话把下一世纪分成两步，一是到党成立一百周年，二〇二一年，使我们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二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二〇四九年，使我国经济接近或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共产

主义理想，坚持共产主义世界观。小平同志讲，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同时要讲清楚实现我们的理想要通过什么步骤，眼前我们干什么，下一步干什么。理想要有个内容，主要两条：一个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搞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是使祖国兴旺发达，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现在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是我们从小、从年轻时候就干的事情。为什么在那样艰苦条件下能坚持下来？就是靠这个理想。那不是个别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成百万成千万的人。要讲爱国主义，振兴我们中华民族。要强调有理想、有纪律。

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在青年中间，从爱国主义入手是对头的。今年以来，一些报告、活动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看到，在我们的思想界的一部分人当中，在一部分干部、青年当中，崇洋媚外、丧失民族自尊心的现象在滋长。面对这种不良现象，我们主要应进行正面教育和引导，使绝大多数人提高觉悟，激发爱国热情，同时对少数糟蹋民族自尊心、糟蹋国格和人格的事，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舆论上的谴责。我们的报纸、刊物和整个宣传工作、思想工作，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维护民族的尊严，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最近中央书记处也谈到，我们有些广告崇洋媚外，贬低自己，要认真进行整顿。

第五，在宣传工作中贯彻党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同志同外宾谈话时讲，历史教训告诉了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宣传工作也要贯彻这个原则。

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是论人处事,包括表扬好的,批评不好的,都要贯彻唯物主义原则,实事求是。我们的表扬或批评,只要是能够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说明事物,效果都是好的,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果违反唯物主义原则,失实了,表扬和批评就会起不好的作用。就是因为失实,我们有的报纸直到现在还没有卸掉包袱,还欠着账,该更正的还没有更正。毛泽东同志说,搞唯心主义最省力,搞唯物主义最费力。贪图省力,很多毛病都从这里产生。为什么表扬好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就是因为没有把情况调查清楚,如实地反映出来。批评不好的,也引起很大的不满意,为什么呢?也往往因为是道听途说。抓住一点两点,满足于表面现象,然后发挥上纲,添油加醋,这能不引起人家反感吗?我前些日子到外地,几个地委都讲到北京的报纸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你一登,有的地方失实或严重失实,全中国都传开了;他那个地委、县委,在全地区、区县人民中抬不起头来,有口难辩。我们的编辑、记者和全体宣传工作人员要学点唯物主义,使唯物主义精神在我们的工作中真正得到贯彻。

另一方面,前一段我们报刊上有些言论片面性相当大,这也是一种不实事求是。基层的同志、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对这种片面性也很不高兴。他们不一定写信驳斥你,可是相当反感,结果是不信任你那一套就是了。是不是有意识地搞片

面性，让人家讨厌我们呢？不是。毛病在于思想方法，从这个极端走到那个极端。我们在各项工作中都可以遇到思想方法问题，什么一刀切，一窝蜂，以偏概全，不合逻辑，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有些扯皮、顶牛也与这个问题有关。所以在这一段学习中间，在贯彻唯物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要多讲一点辩证法，使我们的思想力求避免片面性，达到全面性。

这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一个任务。做宣传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进行“四有”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自己首先要遵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有一个计划，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把这件事摆上我们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日程。本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已经写了，在适当的时候，要在我们干部中间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包括他的军事著作中丰富的哲学思想。

总之，一定要坚持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文件学习和当前干部的思想实际密切联系，提高我们干部的“四有”水平。要随时注意新情况、新问题，使“四有”的学习、教育不断深入和逐步提高。

注 释

- 【1】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坚持对共产主义的 忠贞和深情

——为老师闻天同志八十五岁诞辰而作

(一九八五年八月)

今年八月三十日，是张闻天同志八十五岁诞辰，七月一日是他逝世九周年忌辰。由于他的老战友的关心和督促，由于他的几位学生和亲友的共同努力，《张闻天选集》最近问世了。这是对闻天同志的最好的纪念。此时此刻，他的每一位战友、学生和亲友，哀念和欣慰之情，是语言文字难以表达尽意的。

这样的感情，多年来始终沉积交织在我的心中。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张闻天同志平反。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到北京车站迎回他的骨灰在八宝山安放。同年八月正式为他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重新肯定毛泽东同志关于闻天同志“功大于过”的公正评价。现在，闻天同志的选集和《回忆张闻天》一书又公开出版。生活在前进，闻天同志在党的历史上

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但是，为闻天同志的不幸遭遇和逝世而产生的深切哀痛，我却至今无法摆脱。作为对他的人品、学问素所敬佩的学生和下级，我有责任写一点文字来纪念他。

一九七六年夏，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掀起了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早已被指为“风源”，“四人帮”又在通过这里追查“风源”的“后台”。有一天批判会中间休息，一位同志告我，张闻天同志去世了，随即递给我一份七月十三日的《新华日报》。消息登在第三版右下角，共七十八个字。报纸在闻天同志的几个朋友和学生中传看，彼此相对无言。回到会场，虽有斥责的声音、严厉的面孔，我却陷入沉思。几十年他与我师生过从的往事，一件件历历在目。一九五九年以后，他陷入逆境，除了一些会，我们之间已极少能够见面；一九六四年我下去“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往来就完全断绝了。听说他还在默默工作，勤奋学习，进行经济调查，不断地追求探索。他默默地离开了我们。当时，不能表露悲愤之情，也不能献一束花来寄托哀思和悼念，只能把这一切深埋在自己的心底。

在沉思中，突出地浮现在眼前的，是“文化大革命”初的一件事。我和几位被隔离的同志天天在机关大院里劳动，分几次看完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写着天津某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就所谓“六十一人集团”问题追查闻天同志的情况，其中抄录了闻天同志写的一份短信。大意是，为营救六十一位

同志出狱，当时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正式向中央报告，闻天同志批准，声明这件事完全由他个人负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听刘英同志说，当时闻天同志还先后给康生写过两封信，希望中央就这件事说说话；康生不但扣压了他的信，而且斥责闻天同志“制造混乱”，警告他不许再写。六十一位同志出狱的问题，七大以前中央正式作过结论，其中原委和这些同志在狱中斗争的情况，党内很多同志都知道。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来了一个是与非、敌与我的大颠倒。少奇同志得到中央批准营救这些同志的正确做法，被说成是“阴谋”，他和这些同志的关系被说成是“叛徒集团”的关系。据我所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揪斗彭德怀同志，闻天同志也被游斗；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事情重新提出，调子越来越高，他被监护起来，处境更加不好。他自己受到严重的政治压力，又面临着一个涉及全党安危的大问题，而且被反复追逼。在这种情况下，闻天同志仍然像杨尚昆同志回忆文章中说的，“不推诿，不含糊，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独自承担责任”，保护了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时穷节乃现，风雨识知交。闻天同志的确不愧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楷模。这件事使我深受感动，告诉我身处逆境的时候，应该如何净化自己的灵魂，纯洁自己的党性，忠于事实，忠于历史；告诉我在孤处小小隔离室的时候，也要看到党的事业的广阔天地。体现在闻天同志和许多老同志身上的这种忠贞不屈的崇高精神，支持我走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艰难途程，顶住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

粉碎“四人帮”以后，王震同志多次向我转达，说刘英同志告诉他，“文化大革命”中，闻天同志曾一再提及他还记得名字的学生，希望他们经受住考验，不要垮下去，也经常流露出对学生们的信任之情。一直到卧病在床，奄奄一息，仍然是这样。刘英同志回到北京以后又告诉我，我被审查的时候，《红旗》杂志社有人去调查我的情况，闻天同志在回话中讲了我的优点，也指出我的缺点，说我没有政治问题，写材料证明他和我的关系完全是同志间的正常关系。刘英同志把闻天同志亲手写的这份材料交给我，作为老师留给学生的珍贵遗物，我将永远保存起来。“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天各一方，不能互通音信。但是，老师思念、关心和信任学生，学生思念、关心和信任老师，彼此的心是相通的。他的垂世之作，他的高风亮节，还在继续教育着活着的学生们。遗憾的是，他却再也不能亲自考查检验学生们的表现，学生们也再无法向他汇报和请教了！

一九七八年四五月间，王震同志叫我去他家里，郑重地把刘英同志要他保存的闻天同志一九六二年来的四十几万字遗稿给我，再三叮嘱要认真整理、编辑，搞好以后尽早出版。我双手接下闻天同志的遗稿，真如捧着一团火，心情非常激动。回到家里粗粗翻阅，有的是读书、看材料的笔记，有的是学习、研究的心得，有的是已经成篇的文章，有的是系统的著作。看完闻天同志亲笔写下的文字，眼前又出现了他的音容笑貌和伏案疾书的身影。

记起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杨家岭礼堂

作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之后，闻天同志是中央领导同志中第一个主动要求下乡的。他率领农村调查团，到陕北、晋西北进行了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回来写了《出发归来记》。文中既写了他的亲身体会，又严肃地剖析了自己的学风。《出发归来记》表明他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他思想上、理论上成熟的标志。一九四四年整风结束后，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成立中央政治材料室。同年六月，组织上调我去当他的秘书。随后筹备出版《参考资料》，由他任主编，我改任材料室秘书，作为他的助手，参加刊物的编辑工作。每期的选题商定后，他总是亲自承担一两个题目，从收集、整理材料到起草和撰写，都是亲自动手，送给大家征求意见后，又亲自改定。对于其他承担选题的同志，他总是叮嘱要首先占有大量确凿的材料；文章写完，他又和作者一道反复讨论、修改，直到定稿。他一再告诉大家，研究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用材料说话，不是先有结论，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整理和分析材料，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切忌主观臆测、凭空推断，切忌看到一点皮毛就妄加引申。经过整风，材料室的同志普遍有了从事理论工作的人要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不能停止在书本的字句上的觉悟。但是，究竟怎样做研究工作，怎样收集、整理和分析材料，却还很生疏。经过闻天同志言传身教，大家逐渐树立起正确的学风，提高了各自的研究水平。我自己从事实际问题研究的第一课，是从这时开始的。第一课的老师，就是闻

天同志。由于他的教导和示范,使我开始懂得,做研究工作,走什么样的路,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样的教导和示范,使我终生难忘。

从王震同志交给我的遗稿中看到,多少年过后,纵然是在逆境中,闻天同志这种刻苦勤奋、一丝不苟的精神还一直保持着,直到病危不能握笔的时候!

随后,我即邀集了他在京的几位学生,包括马洪、曾彦修、何方、徐达深、孙尚清等同志,商定广泛收集闻天同志的文稿,文学方面的另行出版,其他部分收集后编辑《张闻天选集》。在此期间,首先从四十多万字的遗稿中选出若干篇公开发表。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文章,使读者看到闻天同志的真知灼见和理论勇气,在拨乱反正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并经中央同意去东北做地方工作。材料室的几个同志,包括我,也向闻天同志要求并经中央组织部同意,去东北工作。我们是分头离开延安的。后来知道,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这份关于争取东北斗争胜利的至关重要的文件,是陈云同志同闻天同志、高岗讨论并一致同意后,由陈云同志主持起草,用三个人的名义向东北局和中央发出的。后来又知道他出任合江省委书记。一九四八年初,《东北日报》发表东北局关于土地改革的总结,说合江省土地改革是健康发展的,省委掌握政策比较稳,特别在

团结中农、保护民族工商业方面做得比较好。同年七月，东北局组织部调我到东北局巡视团。分别三年多以后，在哈尔滨见到闻天同志，又一次有幸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见面后，他多次对我说，做了三年多实际工作，有经验也有教训，需要静下心来读点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要读，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读。闻天同志告诉我，中央已决定重印列宁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四章，号召全党克服经验主义倾向，要我认真学习领会。在他的指导下，我根据自己的体会，写了两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专文，经他审阅，批给《东北日报》发表。

这个期间，闻天同志把他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草稿交我阅读，使我受到启发，大开眼界。在此以前认识到工作中要坚持全局观点，实际上只是农村土改的全局，没有看到整个东北土改后经济发展的全局；虽然也按照土地改革的总方针检查了土改工作中的错误，可是还没有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进入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尽管知道土改后要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生产运动，可是没有想到同时要有步骤地开展供销合作活动。闻天同志这篇文稿，使我的思想进入到一种新的天地，面前展开了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远大前程。我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把他的稿子抄了一份，寄给当时已经在开展供销合作社工作并创造了经验的吉林汪清县县委书记王录同志，请他把全部有关材料寄给我。很快收到了王录同志的信，他也说看到闻天同志的文稿后兴奋不已，寄来了

我要的材料。我看后都送给闻天同志参阅，同时请《东北日报》派记者去那里采访。记者连续采访的报道，由我修改并报告闻天同志，陆续登在《东北日报》。从此，我同王录同志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不断寄来新的材料，把他的意见、建议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告诉我。我也常去信向他询问情况，提一些问题请他调查和研究。这时，东北局已经从哈尔滨迁到沈阳。王录同志寄来的好几份典型材料由我整理后送给闻天同志，他看过后都很高兴，批送《东北日报》先后刊出。我集中力量研究汪清县供销合作社的经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著作，特别是关于南区合作社的篇章，同时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如何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著作，并把学习和研究中遇到的问题随时向闻天同志汇报。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间，闻天同志要我替东北局起草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定草案和章程草案。其中提到，要在收购农产品和销售工业品、日用品方面为社员服务，薄利多销，在供销活动中同私人商业进行和平竞争；号召农民入股，股金不限，赢利按股分红；富农成份的人也允许入股，股金不限，分红一视同仁，但不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草案发出后，闻天同志告我，东北局的同志一致同意。但是不久，在一次东北境内商业厅长的会议上，有同志批评赢利分红是错误的。闻天同志多次同我和其他几位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讨论这些批评意见，都不同意。他要我根据讨论情况起草《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等问题的

意见》。起草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要到我屋里谈谈他的看法。这个稿子，经他修改后由他签名报送东北局。他的意见后来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实践也证明是正确的。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闻天同志辞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职务，改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局巡视团也宣布结束。由他提名、经东北局组织部批准，调雍文涛同志和我任财委办公室正副主任。他亲自组织处级以上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以后的各章节，每个星期讨论一次，每次讨论他都结合东北全境解放以后的实际情况反复阐述他在《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一文中的思想。他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回来，传达毛泽东同志重要报告的精神，使大家对全国胜利后即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势，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认识。

一九四九年四月，东北局确定建立辽东省，闻天同志任省委书记，我被调任辽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五月初，随闻天同志到达安东（今丹东市）。六月上旬，闻天同志告诉我，接到中央来电，要我立即交代工作，到中央报到。动身以前，他要我到 he 家里吃一顿便饭。席间他讲，本想结合辽东实际工作，研究一下东北以至全国经济情况和方针政策的问题，希望我当个助手，帮他调查、整理材料。我也有这种愿望。话虽不多，惆怅惜别之情溢于言表。闻天同志说，中央已经来了调令，不能提意见，你还是去吧。当晚，我即离安东经沈阳前往当时的北平。整整三十六年过去了，此情此景，宛如昨日。

一九四九年八月我经莫斯科到新疆的伊犁，九月到乌鲁木齐。不久，闻天同志出任我国驻苏大使。一九五二年夏，他经苏联阿拉木图到乌鲁木齐，检查中苏协定中在新疆项目的执行情况。我陪他参观了纺织厂、发电厂、农机厂、水泥厂、汽车修配厂、露天煤矿。王震同志向他介绍了解放军驻疆部队节衣缩食、开发荒原、发展农业的情况和今后规划。他为王震同志作为核心的新疆分局和生产建设兵团在短短一年多时间中取得这样大的成绩而感到高兴。

一九五二年十月，我调回北京，在中央办公厅工作。闻天同志每次回国报告工作或休假，我都前去拜望，他总要向我介绍在苏的见闻和看法。一九五五年，他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从这时起，隔几个月我就去看他一次，多数情况是一起到颐和园、天坛等处散步。他谈得较多的意见是，我们要积极参加世界和平运动，但是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对国际法，应该研究，分别对待；我们外交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亚非拉，支持他们争取民族解放、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驻外使馆要组织工作人员系统研究所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情况；要加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情况的研究；等等。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分析。此外，他还就很多理论问题发表了一些见解。像以往一样，他以平等的、同志式的态度娓娓而谈，虽无惊人之语，却论证周密、恳切服人。每交谈一次，我仿佛又上了一堂课，开阔了思路，增长了见识，消除了对一些问题的疑惑。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闻天同志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作为一名学者，开始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不断地把研究心得写成笔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汇报。中央办公厅把这些文稿也发给我。下去“四清”以前看到的是几份《政治经济学学习笔记》。毋庸讳言，这些文章中有些观点未必经受得住实践的检验，受着时代思潮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从这些文稿特别是已经收入他的选集的一九六一年八月到一九六四年二月的另外七篇文稿中，读者可以看出，闻天同志忠于共产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奋攻读、周密调查、严谨治学、甘于寂寞、坚韧求索的精神，可以看到他对实践进行理论概括而得出的很多至今还给人启示的独到见解。贯穿于闻天同志文稿中的宝贵精神，是很令人敬佩、很使人激励的。

我在闻天同志身边工作的时间有两段，即一九四四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九四八年七月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一共只有两年多。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前，我就已经是他的学生，很多受到闻天同志教育的事情留在记忆里，不能忘怀。

一九三七年四月到延安以后，我被分配到中央党校教育处当秘书。同年七月一日，中央党校全体师生、工作人员举行建党十六周年纪念大会。参加这样公开的、隆重的大会，是我入党一年多后的第一次。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到会了。讲话的除主持会议的李维汉同志外，还有毛泽东同

志、张闻天同志，使我这个新党员第一次受到党史的教育。后来又在延安城的小礼堂听毛泽东同志、张闻天同志批判张国焘的总结发言，第一次受到党内原则斗争的教育。

一九三八年四月，马列学院成立，闻天同志任院长，我由党校送去学习。按照由浅入深、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教学内容少而精的原则，头三个月是学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后三个月学中国近代革命史、西方近代革命史和哲学。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由吴亮平同志任教。每个问题讲完后，都由闻天同志主持半天课堂问答。他抓住问题的要点，联系当时的革命实际，根据老同志、新同志、有实际经验的同志、有书本知识的同志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问题，请不同的同志回答，从中考查学生的理解程度，然后有针对性地做概括性的讲解。提问题的时候，同学们一方面担心点到自己的名回答不清楚、不准确，另一方面其他同志又非常专注地听被点名同志的回答，考虑哪些问题回答得好，哪些不够好。提问结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全神贯注地倾听闻天同志的讲解。闻天同志讲课，语言朴实无华，思路条理清晰，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听了以后，使大家能够把从书本上读到的，从教员口里听到的，以及自己脑子里想到的有关问题，融会贯通地进行思考，一步一步地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理解，一次又一次增强了马列主义的信念。下课以后，一方面担心下次会不会点到自己头上，另一方面又热切地盼望下次的课堂问答早点来到。

中国近代革命史教材，是闻天同志在抗大的讲稿整理

而成的，讲义只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闻天同志在马列学院接着讲了《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反动时期》，讲了四五次《苏维埃革命运动》，着重讲根据地的建立、发展、挫折和根据地建设的方针、政策问题，分析了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在马列学院用五六个半天的时间，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明确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一系列主张的正确性，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他还向我们作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问题的报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他指定学生、教员、工作人员中十儿人去听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讲演，回来后进行传达、组织讨论。亲自约请毛泽东同志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记得清楚的，有《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反投降主义的报告、《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他还请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中央同志到马列学院作有关工作的报告；又要主持学校经常工作的张启龙、王学文同志邀请从前方回来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到马列学院作报告。

在思想品德修养、党员党性锻炼方面，他曾亲自在学院讲了《论待人接物问题》。请少奇同志讲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请陈云同志讲过《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政策、党的支部工作等

中央领导同志和他自己在马列学院的报告和讲课，以及几位教员的讲课，使在校学生受到了马列主义、党的历史、党的路线、党内生活准则的基本教育。就我自己的体会

来说,入党前确信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有革命热情,也有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做出牺牲的决心。但是,对社会发展的规律,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区别及联系,中国革命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的曲折终将取得胜利,党内生活的准则,以及应该怎样加强党性锻炼使自己成为合乎党章要求的党员这些问题,到中央党校学习四个月,前后两段工作八个月,才开始有了初步的理解。马列学院六个月的学习,使我这种理解更加完全了、更加深刻了、更加提高了。这对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党员的成长、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每当遇到挫折、犯了错误、身处逆境的时候,没有垮下去,而是熬过来了,我总要想到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我们的院长闻天同志和上面说到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教导,总要想到马列学院全体老师们包括王学文、艾思奇、吴亮平、杨松、陈昌浩等同志对我的教导,总要勉励自己,为求不辜负他们对我们这些学生们的期望。

第一班还没有毕业,秋天又招收了第二班。直到一九四一年五月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七月又改为中央研究院。马列学院一共办了八个班,学生不到一千人。成立马列学院的目的,是培养党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干部。入学的学生,不少在延安各机关、前方及各根据地或长或短地做过实际工作;毕业以后,大部分奔赴前线或到陕甘宁地区做实际工作。第一期学生毕业后,选出一些同志,又从抗大、陕北公学调来一些同志,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室、政治经济学研究

室、哲学研究室、中国问题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编译室。延安整风开始后，曾批评马列学院教学中没有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我个人的看法，大部分同志受到基本的理论教育后分赴各地做实际工作，比较容易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而留校工作、研究或教学的同志，包括我自己，确有重视书本、轻视实际工作的倾向。这不能不说同闻天同志没有向这些同志经常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有关系。这个缺陷，在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之后，由闻天同志率先组织调查团，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得到了补偿。其他同志也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教育，有了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的觉悟。

一九三九年秋，我被调任教务处教育科长，随后任教育处副处长，接着又接替王学文同志任处长。当时学院领导体制是，有一个包括老、中、青干部在内的总支委员会，在院长张闻天同志领导下管理全院教学、行政和党的工作。总支书记是张启龙同志，总支常委中还有副院长王学文同志、组织科长李国华同志、行政处长王涛江同志，也有兼总支教育科长的我。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融洽。从此，我一面继续当闻天同志的学生，一面又是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学院工作，多数情况下是张启龙、王学文同志向闻天同志请示报告。有时闻天同志到院部来同总支的同志谈话，我也参加，亲自听到他对院务工作的指示。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同志号召开展生产运动的同时，还号召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开展学习运动。闻天同志组织中宣部几位科长和几位经济学家，从

头到尾读《资本论》第一卷，每星期至少三十页，进行讨论，风雨无阻，直到读完；也让我参加了这次学习。当时我对经济学有兴趣，读的时候不少问题似懂非懂，听了讨论，特别是闻天同志的解释和发挥，再次感到闻天同志是一位传授知识、解除疑惑的好师长。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第一次听闻天同志的报告，直到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他去世，四十年中，当他学生的时候或当他下级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或分开的时候，顺境的时候或逆境的时候，他都是我的老师。他至今还是我的老师。在任何情况下，闻天同志始终坚持对共产主义的忠贞和深情，尤其是我要铭刻在心、永志不忘的。

封面
目录
正文